



ISSN2097-5287
CN 37-1372/Z

德州学院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学报

2025 3
VOL.41 NO.3

山东省优秀期刊

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编委会主任：刘印房

编委会副主任：孙乃龙 唐延柯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家峰	马锡骞	王丽燕	王新芳
王 鹤	冯 琨	曲铭海	吕志轩
朱 超	仲 冲	刘印房	刘丽霞
刘艳芹	许士才	孙乃龙	杜亚丽
李春光	李春辉	李 亭	李洪亮
杨振生	杨 颖	张锦辉	陈 伟
陈 超	房 敏	顾相伶	徐慧清
郭长友	唐延柯	董文会	曾强成

主编：刘印房

常务副主编：孙乃龙 唐延柯

副主编：李春辉 李 亭 徐慧清

1985年创刊

2025年第41卷第3期

（总第201期）

2025年6月出版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25 年 第 3 期
第41卷 (总第201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刘 晋(1)
-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朱文琦 孙绪民(7)
-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向度 祁玉伟 韦玉霞(11)
- “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田 雨 李 眉(16)

文学·艺术研究

- 重黎—羲和氏族衰微考 张德苏(21)
- 清华简《筮法》阴阳五行思想申论 孙 航 沈孝凤(26)
- “以赋著论”: 陆机《文赋》体制探微 沈 强(34)
- 《魏书·释老志》“旧式村坞”处标点勘误 公维章(40)
- 不同版本系统《录鬼簿》剧目书写差异研究 杨晨阳(43)
- 《红楼梦》时序错乱问题辨正
——以戴不凡《时序错乱篇》为中心 职 伟(52)
- 清人编选的三部咏物诗选本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王 乐(59)
- 古尔纳《天堂》中的跨文化空间及其文化意义 高文惠 崔秀霞(66)
- 对抗性的发现
——论阿多诺电影思想的嬗变 莫小红 陈 啸(70)
- 汉语“除 X”类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动因 缪以健 崔云忠(75)

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

论董仲舒经济伦理的公平原则 段方乐 张福磊(82)

地域文化研究·风物研究

文化共情教学下德州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课程融合研究 杨 博 宋其勇(86)

高校教学研究

大文章 小切口 宽口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 陈 伟 王 敏 崔玉今(90)

产教融合视域下网络舆情分析课程建设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 莉(96)

“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探究

——以德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汤 敏(101)

“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创新 张 雪(105)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41 No.3

June 2025

MAIN CONTENTS

New Productivit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LIU Jin (1)

Th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ed Culture.....ZHU Wenqi, SUN Xumin (7)

A Study on the Decline of the Chongli–Xihe Clan..... ZHANG Desu (21)

On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ought of *Shifa* in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 SUN Hang, SHEN Xiaofeng (26)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tyle of Fu :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Lu Ji ’ s *Wen Fu*
.....SHEN Qiang (34)

The Intercultural Space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Gurnah ’ s *Paradise*
..... GAO Wenhui, CUI Xiuxia (66)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of DONG Zhongshu ’ s Economic Ethic
.....DUAN Fangle, ZHANG Fulei (82)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 CHEN Wei, WANG Min, CUI Yujin (90)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刘 晋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新质生产力以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质量关系论、动力论、要素论和发展规律理论等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量关系理论;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动力理论; 以系统论视角考察生产力内部构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新型生产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科学技术;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01-06

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发展动力、内外关联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对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作了科学预见。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方位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 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新质生产力既从本质上延续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的本体性规定, 又从明确发展质态、创新发展动力、变革生产关系等方面形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阐释, 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成果, 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探寻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有利于科学认识生产力发展的叙事逻辑、理解新质生产力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为在实践中推进生产力跃升提供理论遵循。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质量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先进生产力质态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质量关系理论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 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在总体上是不断

断发展和进步的, 其运动同样遵循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2]的基本规律。作为衡量人类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能力的基本尺度, 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呈现为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生产力的量变贯穿于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全过程, 主要表现为各构成要素在数量上的积累、生产能力上的提升和组织方式上的完善, 如劳动者技能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等等, 这些变化推动着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过程通常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劳动技能的娴熟而逐渐催生。每个发展阶段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 而是在前人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通过劳动实现物质资料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升, 同时也为下一步生产力的质变创造条件; 生产力的质变主要表现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在特定历史阶段展现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取得的文明成果。当各类结构性要素的变化和积累达到能够引起质变的度, 就会引起生产力质的跃升, 它代表着一定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和状态。在新的水平上, 生产力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结构性量变, 从而推动新的质变的发生。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 生产力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推动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和进步, 从而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迁。

(二) 新时代明确“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适

收稿日期: 2025-03-13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新发展研究”(22DKSJ03)。

作者简介: 刘晋(1987—), 女, 山东聊城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时把握生产力质变的临界点,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力系统跃迁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根本论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生产力三要素不断演进,促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量”的积累与增加,为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另一方面,进入新时期,人类迎来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基于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的生产力要素日益在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经济发展亦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向创新要发展成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亟须新的理论对生产力发展方式、方向和目标进行指导,这就为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必要性。针对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因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这里突出强调“先进生产力”质态,不仅体现了对我国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经济发展“从量大到质优”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而且昭示着生产力在完成“量”的积累后通过“质态”的突破实现“质”“量”并重发展的新趋势。

(三)先进质态内核: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质量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新质生产力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质量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尤其体现在对生产力“质”的方面的创新。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绿色高效生产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为旨归,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形成的崭新生产力形态。

1. 新本质。“质”是标志事物存在的规定性,是区别于“量”的基本范畴。新质生产力的意涵决定了其不是对于传统生产力在数量、规模、速度方面的单线增加或扩展,而是一种全新的“质”“态”“类”的变迁和飞跃,代表着对于传统生产力的替代和否定,意味着二者在构成模式、发展动力和生产效能上有着根本区别。传统生产力总体展现为“以物质作用于物质并形成物质形态改变”的状态,其发展主要以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劳动工作强度为手段,且往往伴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智能信息、先进制造对于生产的推动力日趋增强,它们作为独立的要素加入到生产力系统中,通过与其他单体要素相融合并改变生产结构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深层次变革。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革,形成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在此过

程中逐步摆脱高消耗、低效能的经济发展方式,助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实现生产力从“总体增长”到“整体跃迁”的“质变”。

2. 高质量。近年来,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配置有效性不足、重点领域风险性较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增长点。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在质态标准、发展要求、价值指向上都具有内在契合性,并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和系统性支撑。具体来说,应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变革,促进产业体系、经济发展模式的飞跃,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牵引效应”;应以数据等新兴要素带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并通过赋能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乘数效应”;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化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结构效应”,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阶段性转换。

3. 高品质。在数字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秉持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向新而行、以质致远,“智”造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生活环境方面,新质生产力摒弃了“三高一低”的传统生产方式,运用算力、数据、云平台等要素进行生产,具有资源投入低、环境污染少、生产效能高的特点,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环境的绿色化变革;产品供给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大力推进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形成优质高效的产品供给体系,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丰裕的物质条件。如穿戴机器人、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产品,不仅满足了多元化、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更是科技缔造美好生活愿景的真实写照;个人发展方面,新质生产力为劳动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传统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通常以加大劳动强度或延长工作时间来促进生产发展,个人收入也与改造自然的物质性劳动直接相关。新质生产力依靠生产技术创新、组织方式更新、产业结构革新等内生动力实现发展,显著提升生产过程的质效水平,极大缩减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人们的能力、个性、需要和社会关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动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动力理论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分析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背景下展开的,在系统考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

对生产力革命性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思考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并研究了社会制度对于二者结合的深度影响。

1. 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增强赋能作用。通过对比机械织布机与传统手工织布机在形状、功能和效率方面的区别,马克思指出“那么,这里生产出的产品,必定比材料的加工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的情况下所生产出的产品要好,而且花费要少”^[4]。由此可见,新机器可以在同样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并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基于此类科技应用的广泛成效,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5]“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6]。

2. 社会制度对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结合关系的深度影响。资产阶级曾不遗余力地促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结合以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家毫无节制的逐利过程中,及其在生产中衍生的一系列工艺、产品、自然力都“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7]。本应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导致劳动异化,与人形成紧张的对峙关系。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其内生矛盾从而真正推动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囿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形态下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态、影响深度无法作明晰的展开,但其分析对于解决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向。

(二)科技创新为主导: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3]这就要将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走出一条以创新驱动质优、以质优支撑创新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如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呈现出自身发展的逻辑,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并以自身发展带动生产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该问题上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动力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创新由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向“核心力”转变、由“因素”向“要素”地位的提升,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重要机遇、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动力理论在新时代取得了创新性发展。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这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在发展初心、发展过程、发展指向等方面都会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价值归宿,让人民共享发展红利,为生产力发展提供顺畅机制和良好环境。

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以新促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新”,关键在于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供给、高效率转化,以新技术场景化快速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破解产业和产业链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二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实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三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催生先进模式。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赋予生产资料以数字化属性,催生了“数据+算法+算力”驱动的新模式,不仅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还通过模式创新重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形成更先进的经济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坚持系统论发展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由于生产力直接体现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简单要素是在任何社会形式下的生产都需要具备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哪个阶段的生产都需要有劳动者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结合起来形成能动的生产过程,从而制造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生产力会随着生产条件、现实需求以及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生产要素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不断发展更新的态势。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新旧要素的更迭变化,马克思还具体说明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这表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除了上述“简单要素”之外,还包括科学技术、分工协作、组织管理、自然力等。而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是生产力系统不可或缺的渗透性要素。

(二)要素跃升为内涵: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科技进步背景下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革命性提升,必然要求其基本要素也作出相应的优化和升级。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变是构成生产力总体质变的关键。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对各生产力要素进行质的重塑,不仅要纵向实现各要素“质”的升级革新,还要横向实现新质在排列组合方式上的重构,使整体生产力迸发出更强有力的合力,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在科技创新引领未来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坚持系统观念,以实现生产力质态跃迁为目标,形成了对生产力系统要素协同机制的整体把握,科学阐明了新时代生产力各要素内涵的发展变化和总体要求,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1. 新质生产力强调诸要素的新质革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而科学技术属于“精神生产力”,需要通过“物化”到生产资料上改进生产技术、“物化”到主体上提高劳动者科学素养,才能从“一般的生产力”转变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改造社会生活。这种“物化”与“结合”的程度与深度,赋予各要素新的时代特点。一是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革新的推动力量。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者主要依赖体力劳动和传统技能,通过手工操作和简单的机械工具来完成任务,而数智时代的劳动者更多从事技术含量密集的复杂劳动,劳动者具备高水平的学科素养、较强的主体性和创新意识,是有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能够承担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任。二是劳动资料质量的革新。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物质载体,其变革和升级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劳动资料的演进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革、提升和变化上,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全方位的智能工具综合体,不再仅作为“劳动者器官力量的延伸”而发挥作用,而是逐渐体现出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形成具有自动化运作能力的技术工具系统,不仅代替和解放人的体力劳动,而且代替和解放人的脑力劳动”^[10]。三是劳动对象种类的增多和空间范围的扩展。劳动对象是劳动主体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对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象的种类逐渐增多。在传统生产劳动中,土地、矿产等天然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主要的劳动对象。到了数字经济时代,人们还可以利用可再生资源(新能源、光伏风电)、各种人工合成的资源(合成纤维、纳米材料)、经过人类复杂加

工的材料(石墨烯等)进行生产,劳动对象的种类呈现出多样性。与此同时,数据这种抽象性的数字化原料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也进入劳动对象领域,它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了重塑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组织形式呈现出公有制转变的特征。此外,劳动对象空间范围的扩大,人类劳动作业的领域从地表拓展到深海、低空和高空、太空,并由此衍生出低空经济、深海经济等产业模式,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2. 新质生产力强调诸要素的新质组合。生产结构中各要素结合的比例结构、方式方法都会对生产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要素的组合向最优化发展,最终目的是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背景下实现生产要素间的优化组合,需要从技术和组织两个层面推进。在技术层面,需发挥科技创新的增强赋能作用,为诸要素建立新的连接方式与手段,提升生产力系统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而重塑劳动过程,推动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例如,将数字信息技术引入传统制造业,实现各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协同联动,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有效提升;在组织层面,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打破阻碍科技创新和要素共享的制度藩篱,推动区域、产业之间资源的流动和共享,促进要素高效组合、顺畅流动。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并非诸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在科技创新的全面融入下实现新型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通过互嵌共生形成“合力”推动生产力的整体跃迁。

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建立新型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阐释是从生产力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展开的,将其置于人类共同活动方式的角度进行考察,突破了将生产力理解为单独的、经济范畴的思想桎梏,使其具有了深刻的唯物史观内涵。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静态内涵。马克思将生产力与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物质生产实践即“共同活动方式”相联系并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1] 532-533} 这就意味着,只有在人们的劳动交往和共同活动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力,生产力直接体现在共同劳动的社会结合之中。同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12]。生产关系是特定经济关系的结合,其主要内涵包括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以及“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13]。

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关联。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影响的纽带。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但生产方式的变革可能会引发现实的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制度政策予以调整,如果调整不到位,就会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阻碍,从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会通过影响生产方式的形式,最终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时,则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产关系内涵的新变化

当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推动生产方式向智能化、绿色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在此影响下,生产关系范畴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由于大数据、云平台等自身带有共享性生产要素的融入,以及电商企业、数据分析机构等需要依靠社会群体共同参与才能实现社会化运行等机构的诞生,使得生产资料使用权和所有权形式上的社会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公众持股、合伙投资等现象的日益普遍也表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向混合制和社会所有制趋势发展;从劳动者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方面来看,新质生产力关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推进人类福祉与进步为价值导向,在出发点上便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以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者能够主动占有“自己的劳动力”,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劳动积极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同时,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多样化消费产品和闲暇时间又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就从内在机制上消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与个体的对立,促进劳动进步、生产力提升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随着数智化生产的推广,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性日益增强、劳动时间更加弹性灵活、工作场景也不再拘泥于实体办公场所,而是向社会各类场景和领域延伸,人的主体性更加凸显,管理者也可能是生产者。这就使传统刚性垂直的管理模式向柔性的员工管理模式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共生合作的方向发展。

(三)新型生产关系为动力: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涵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范畴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这种变迁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二者的相互作用,关注新型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为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多潜力和空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2]

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加公平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一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围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从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二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不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有效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活力;三是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力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智力保障和技术支撑。一是健全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领导作用,以有为政府的统筹领导为保障,通过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协同攻关,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难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科技动力。二是深化激励创新的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研单位经费管理体系,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成果评审制度,树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让更多作出实际贡献、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成果脱颖而出。建立持续性激励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让科技成果与产业链对接更加紧密,让成果从“样品”成为“产品”之路更加顺畅,促进科技生产力发展取得实效。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通过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与国际相通相融的规则标准,为新型生产要素的跨国流通与市场整合打造透明稳定的制度环境。持续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管理等体制改革,优化开放合作环境,加强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为构建新质生产力注入全球化的协作动能。要推动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通过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效引进

优质资本、关键资源、先进技术,提升吸纳和影响全球资源的能力。同时,还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科技创新网络,提升全球范围配置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水平,拓宽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空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环境支持。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001).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3.
-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001).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42.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17.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2.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42.
- [8] 资本论: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08.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
- [10] 刘同舫. 以唯物史观理解新质生产力[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4): 27-36.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94.

New Productivit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LIU J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new productivity has realiz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Its innov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lations theory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power theory, factor theory and development law theory. The advanced productivity quality state of new productivit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productivity quality and quantity relations theory; the core element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ower;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to examine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enrich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enrich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law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productivity;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朱文琦¹, 孙绪民²

(1.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358; 2.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 集中表现为红色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标识前进方向、注入发展动能和凝聚社会力量。与人民群众期待及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目标相比,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面临协同效能有待提升、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红色文化社会性转化创新不足等困境。站在新的起点上, 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应强化党的领导,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 推动红色文化融合发展。

关键词: 红色文化; 乡村全面振兴; 内在逻辑; 现实困境; 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07-04

新时代以来, 在科学统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基础上,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全面乡村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从侧重多领域合力推进到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反映了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时期创造、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通过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而不断弘扬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 生动传播红色文化”^[1]。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题中之义, 也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一、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1], 红色文化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宝贵精神财富。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 集中表现为红色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契合性, 这种契合性既是理论付诸实践的应然诉求, 也是不断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必然要求。

(一) 红色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标识前进方向

方向问题是前置性、根本性问题, 前进方向至关

重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在伟大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 凝结着党和人民自力更生、浴血奋斗的光辉历史, 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坚定不移沿着红色文化标识的方向前进, 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1]。“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重中之重, 乡村全面振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 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地实施, 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既不能走弯路、回头路, 也不能走邪路。为实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2050 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必须始终沿着党和人民用鲜血铸就的发展道路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愈加砥砺前行共同记忆, 为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奠定了精神底色、指明了奋进方向。

收稿日期: 2025-0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唯物史观叙事研究”(24BKS042);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课题(tsqn202211103); 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两个结合’视域下济南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JNSK2025B022)。

作者简介: 朱文琦(1983—), 男, 山东潍坊人,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二)红色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发展动能

红色文化是由红色历史元素、红色精神元素、红色遗产元素等组成的综合体。在通约意义上,红色文化既包括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和传承着的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红色传统等,也包括物质形态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文物、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红色博物馆等。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守好红色文化这个传家宝,在将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经济效益。实际上,“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385]。新时代以来,党坚持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原则统筹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创造性推动红色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多地锚定乡村振兴市场有效需求,多管齐下挖掘乡村红色底蕴、激活红色资源,积极开展红色乡村旅游、红色产品研发和红色情景体验,推动红色文化“火”起来、乡村群众钱包“鼓”起来,进一步提振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信心和底气。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明确,“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4]。这也进一步表明,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

(三)红色文化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社会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标志着我国乡村振兴进入了新阶段。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农产品产业链重构、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动荡,对中国农业生产布局及农产品进出口政策造成冲击。从内部环境来看,相较于城镇,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仍较突出,乡村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供给能力间的矛盾持续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在乡村表现较为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仍需付出艰辛努力。“红色代表革命性特质,由表及里彰显红色文化的最终形态。”^[5]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程中锻造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凸显了党坚守初心使命领导人民战胜风险挑战不断走向新胜利的革命意志,是汇聚乡村全面振兴思想共识、发展合力的“粘合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6]党和人民创造的红色文化,是我们体悟革命精神、总结斗争经验、坚定乡村全面振兴信心的思想源泉。

二、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困境

红色文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应当看到,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还面临诸多困境,与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及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等“五大振兴”目标相比还有差距。

(一)协同效能有待提升

新时代以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指引,国家相继出台实施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并制定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基本建构起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体系,但从红色文化赋能视角考察,目前政策协同仍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缺乏具体而有效的匹配政策,文旅、农业、民政等部门合作机制有待健全,区域差距明显。以红色文化旅游为例,当前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7]这实际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文化治理体系、文化治理能力与文化治理效能间的内在张力。二是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民自主性参与度不高。由于政策学习宣介不充分、议事决策过程存在信息差等原因,部分村民认为开发红色资源、打造红色课堂、兴办红色产业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责,与自己无关,因此将自己视为“旁观者”“局外人”。三是内生动力不足,缺乏专项化、常态化支持,部分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动力和贡献力较弱”^[8]。

(二)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短板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朽情怀,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制胜密码,既是开展党性教育、党史军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也是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宝贵资源。“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390],这一特性决定了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必须采取审慎态度。而反观现实,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短板。一是红色资源挖掘修缮不足与市场过度开发同时存在。据统计,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达3.6万多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总数超过100万件(套)。^[9]这些红色资源,很大部分分布在乡村。一些乡村由于缺少必要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及监管手段,红色资源识别保护、修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管理粗放。一些乡村则偏重红色文化的当前经济效益而忽视乡村传统文化

建设,一味迎合市场甚至“蹭流量”的做法,弱化了红色文化的教育意义。二是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同质化”倾向。红色文化既有一般性规定又表现出“在地性”^[10]特征,不同的红色文化,比如井冈山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等在基本内涵、依托载体、表现形式上各有侧重,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模式也应结合实际、突出特色。但现实中,红色文创产品、红色文化体验项目、红色景观单一化、雷同化明显,“千村一面”现象较为普遍。

(三)红色文化社会性转化创新不足

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于运用创新思维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推进乡村各项建设的发展动力。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3年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20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11]这充分反映了红色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潜能,也为我们查找红色文化的社会性转化不足提供了思路。一是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创新不足。打造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竞争力,是现代经济规律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也是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然而,乡村区域性红色IP培育力度不够,既不能形成个性化优势及规模效应,也难以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二是红色文化产业链创新不足。红色文化社会性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打造贯通全领域、连接各节点的红色文化产业链,最大限度推动红色要素融合及红色产品、红色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充分释放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和经济价值,各地虽有探索,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思考和长远规划。三是一些乡村红色文化呈现方式仅限于线下场馆,红色文化数字化转化创新不足。多数乡村数字化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型信息技术与红色文化运营关联度不高,数字化红色文创产品研发基础薄弱。

三、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化策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12]99}站在新的起点上,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应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一)强化党对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领导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社会长治久安,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归根结底要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为此,一是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将红色文化赋能

工作融入基层党建体系,体现到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考核之中,将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成效作为衡量基层党建水平的重要指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转化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实际成效,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红色文化赋能保驾护航。二是坚持顶层设计与乡村实践相统一,以科学精准的配套政策筑牢乡村全面振兴基础。特别要关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落后乡村的红色文化赋能问题,支持具备条件的乡村开展“一地一品”试点创新。要增强“政策供给的全面性与针对性”^[13],探索设立红色文化发展专项基金,从金融服务、政策咨询、税费减免等方面加大对乡村红色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三是突出主责部门,完善协作机制。尊重文化市场运行规律,在红色文化社会性转化的痛点、难点、堵点上下功夫,把更好践行政府主导责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结合起来,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协同、合力共进的乡村振兴工作格局。

(二)加大人才引育力度

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是推动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12]194}夯实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基础,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引”,一条是“育”。一方面,要在“引”上创新突破。“要着力抓好招才引智,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投身乡村振兴。”^{[12]39}加强乡村文化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干部选拔、管理、考核、使用机制,鼓励支持讲政治、懂技术、有情怀的干部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加快形成优秀文化干部向乡村流动的选人用人导向。创新交流合作方式,通过文化课题研究、文化结对帮扶、文化产业开发等形式,完善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激励保障机制,吸引企业家、高校教职工及社会红色文化工作者、红色文化志愿者等关注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另一方面,要在“育”上求实效。立足乡村红色资源及红色文化传承实际,继续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计划,加大对乡村本土红色文化人才、红色文化团队的培养培训力度,借助开发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研学项目、营销红色创意产品等实践活动锻炼人才、培养人才,确保乡村红色文化事业发展后继有人。选树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带头人,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带动乡村群众积极投身其中,使广大乡村群众真正成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三)推动红色文化融合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红色文化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牢牢把握红色文化产业振兴这个基本环节。近些年来,红色文化与科技、旅游、金融、制造业等交叉渗透,衍生出了许多新的文化产业业态。红色文化产业融合持续发展,提高了红色文化附加值,日益成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是要推进红色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14]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探索建立红色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新形式、新业态、新模式,将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应用于红色文化产品研发营销全过程,增强乡村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加快培育乡村振兴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二是要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15]要着力打造乡村红色文化特色,优化文旅产业运营环境,以红色文化资源为中心培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位。通过沉浸式体验增强游客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使乡村红色文化旅游成为人们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信心的载体,同时拓宽乡村振兴发展渠道,助力乡村群众增收、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N]. 人民日报, 2021-06-27(001) .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31.
- [3]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4.
-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5-02-24(001) .
- [5] 张志强. 中国红色文化精神特质及教育传承机制[J]. 河南社会科学, 2022(10) .
- [6]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9-05-23(001) .
- [7] 朱虹, 宋丹丹, 胡兵. 中国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4(3) .
- [8] 李珍珍, 张辛欣.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实现路径: 基于湖南地区的调查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3) .
- [9] 王珏. 革命文物, 绽放时代光彩 [N]. 人民日报, 2021-04-07(014).
- [10] 赵月枝, 沙焱. 地方红色文化的当代意义[J]. 红旗文稿, 2019(20) .
- [11] 尹婕. 红色旅游别样红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11-25(012) .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13] 邵明华, 刘鹏. 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研究: 基于对山东沂蒙的考察[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
- [14]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0-09-19(001) .
- [15] 习近平.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9-23(002) .

Th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ed Culture

ZHU Wenqi¹, SUN Xum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ent logic of empower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red culture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red culture marks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injects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consolidates social forces for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pared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e accelerated promo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other goals,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mpowered by red culture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need to improve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ed culture. Standing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empower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red cul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crease efforts in talent cultivation,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Key words: red cultur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optimization strategy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向度

祁玉伟, 韦玉霞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32)

摘 要: 伟大建党精神是引领广大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源泉。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树立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践行向度。从目标向度看, 要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夯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基础; 从转化向度看, 要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 夯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教学基础; 从创新向度看, 要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夯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动力源泉; 从全员向度看, 要构建全员育人的体制机制, 夯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力量支撑, 形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有效合力。

关键词: 高校; 伟大建党精神; 三全育人; 践行向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11-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时代追求。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高校承担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使命, 需坚持问题导向, 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 推进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切实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实践。本文拟探讨三全育人背景下,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向度, 以期的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取得实效提供有益参考。

一、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目标向度

目标是对活动预期结果的主观预设, 是引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动力因素和价值尺度。在人的实践活动中, 目标总是指引主体依据客观需要掌握和引领客体, 并利用客体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从目标向度把握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活动, 是合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基础。

(一)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推进民族

复兴伟大斗争中坚守和弘扬的意志品质,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决定性作用推动着社会发展, 同时也孕育塑造着先进的社会意识。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形成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另一方面,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作为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体, 既反映着客观对象的主观映象, 又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 促进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支撑,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寻求变革、谋求自强, 最终探索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 伟大建党精神将继续引领和推动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高校是培养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主阵地, 其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活动, 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目标向度高度统一: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历史是人的历史, 社会是人的社会, 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依赖于具有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的人才接续奋斗。只有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优秀人才, 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本质上是要将其中

收稿日期: 2025-03-10

基金项目: 2025 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增强‘五个认同’视域下高校大学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山东省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深耕齐鲁文化资源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山东高地”(2024XTN206); 德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与青少年民族观的培育”(2024WT08)。

作者简介: 祁玉伟(1995—), 男, 山东德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

蕴含的伟大精神力量“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238}。只有在“理想的力量”引领下,广大青年学子才能在实践活动中既满足自身的需要,又实现社会价值。“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4]322}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充分把握其明确的目标指向,通过系统化教育让伟大建党精神在广大青年中生根发芽。

(二)用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人凝聚人培养人激励人

把握立德树人的目标向度,就要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以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人、凝聚人、培养人、激励人。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落实“社会主义建设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的关键举措,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铸魂育人。一是引领青年学生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伟大梦想根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我们党战胜困难、抵制诱惑的精神力量。理想信念决定青年学生的人生发展方向、行为准则、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是提升青年学生思想觉悟的精神之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伟力。二是鼓舞青年学生以执着的奋斗精神投身伟大事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仅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奋斗主题,更是新时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力源泉。要用党的初心使命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激励青年学生自觉担当起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大任,以执着的奋斗精神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三是培养青年学生以无畏的奉献精神投入伟大斗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和魄力。中国共产党通过英勇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代青年正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但仍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这就要教育青年学生发扬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投入新的伟大斗争之中。四是引导青年学生以“强国有我”的胸怀投身伟大事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我们党砥砺前行的政治品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引导青年学生坚定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视为奋斗目标。只有如此,广大青年才能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情怀统一起来,练就过硬本领,把有限的青春奉献于人民的事业。

二、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转化向度

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丰富理论内容和深刻价值意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完善提供了价值导向和重要资源。将伟大建党精神的普遍教育价值转化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工作,转化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是合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前提。

(一)实现教育内容的有效转化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需要

将丰富深刻的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从教育的目的和过程来看,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并成为自觉行为规范,是教育内容通过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只有教育主体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对教育内容进行整合使其适合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才能达到教育对象对科学理论的认知、认同和践行。从人的认识的形成与发展的运动规律看,正确认识的形成离不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这就需要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贯彻到各个教育环节。每个教育环节的目标要求是一致的,但不同环节的内容选择和教育方式又要有区别,从而达到在核心目标引导下层层深入、逐渐提高的效果。经过百年锤炼和接续发展,伟大建党精神已经成为内涵清晰、指向明确、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为使伟大建党精神在青年学生心中扎根,应科学设计课堂环节、课外环节、实践环节的教育内容,使青年学生在学习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反复锤炼中,不断加深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

将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切合实际的教育内容,是推动高校立德树人任务高质量落实的必然要求。将伟大建党精神有效地转化为教育内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教育内容的实适性,是进一步促进立德树人任务落实的有效切入点。从理论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营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伟大建党精神贯穿着深刻严谨的唯物史观叙事逻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问题意识,彰显着意境深远的价值追求。持续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涵,能够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深度和时代价值,为现有的教育内容注入新的思考维度,实现精神与理论的融会贯通。从实践维度看,伟大建党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目标的契合性和内容的耦合性,是助力青年成长成才的宝贵资源和

生动教材。将伟大建党精神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精准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有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伟大建党精神向高校教育内容转化的实践理路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教材体系。教材是课程教学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只有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成果充分融入教材体系,才能进一步契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就教材目标而言,高校教育是增强青年使命担当意识的重要途径,要凸显伟大建党精神对广大青年的引领作用,展现教材体系构建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特色。就教材内容而言,要通过教材修订将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及理论成果写进教材。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逻辑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材中,将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材中,将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逻辑体现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材中,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逻辑融汇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另一方面,丰富专业课教材的思政育人要素,进一步挖掘、梳理、加工不同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多样化思政元素,使其与伟大建党精神实现内容上的融合。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教学体系。一是将伟大建党精神纳入教学内容。高校思政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要充分体现伟大建党精神对大学生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课程思政以综合性教育为主,要在不同专业课的教学中实现与思政课程的内容互鉴,注重教育和引导学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进而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除课堂教育外,也要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假期社会实践等多种教育方式,引导学生弘扬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在润物无声中提升教学实效。二是将伟大建党精神纳入教学评价。一方面,要明确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教学体系的评价标准,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各门课程教学的针对性评价。另一方面,要注重将学生参加的实践活动、志愿活动、宣讲活动等纳入教学评价体系,注重增强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效性。

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于课程体系。一是协同各门思政课程的建设,在保持课程设置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加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建设。二是建设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的精品课程,注重在精品课程的遴选立项、评比和验收中设置“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指标,鼓励在最能体现创新和教学实效的课程中

加入伟大建党精神元素,建设具有示范性、辐射性和品牌影响力的精品课程。三是开设伟大建党精神专题选修课程,由专门教师组织教学,让广大学生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洞悉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自觉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三、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创新向度

随着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大学生信息获取、传播与交流方式不断革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有模式,创新高校德育路径,发挥新媒体优势,合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一)创新是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取得实效的手段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坚持方法的守正创新。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着力点,在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的把握,力争取得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效。

社会的发展进步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创新。从教育对象来看,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处于迅速走向成熟却又未完全成熟的阶段,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在形成。将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内化为影响学生行为的主导力量,使伟大建党精神由话语表达转变为现实价值,首要的前提就是推动教育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从教育内容来看,当前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入解读依然在进行之中。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具体的楷模事迹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阐述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知深度,对教育方法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教育环境来看,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对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面临的复杂环境,深度挖掘新媒体资源,需要教育载体的进一步创新。

(二)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创新路径

教学理念创新是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取得实效的思想引擎和精神动力。教学理念是教师在对教学工作的本质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对教学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教师要突破传统观念,深刻认识到新媒体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的重要价值,积极参加新媒体技术培训,自觉利用新媒体平台和新的科学技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教师以问题意识和实践意

识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4]296},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逻辑。教师要引导学生将伟大建党精神与时代问题相结合,通过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赓续伟大建党精神。

教学方法创新是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只有创新教学方法激活教学过程中的各要素,才能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编织起有效的表达网络。一是深挖文化资源,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要依托地方党史教育资源,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展览厅、党史文化展览馆、VR党史体验馆等硬件建设,给大学生提供多维度的教学体验。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深挖伟大建党精神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学校特色、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源。二是创新方式方法,拓展网络教学的广度。依托网络App开展“微学习”“微思政”“微党史”,促进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便捷化、可视化、网络化。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建设网络课程,打造“微课程”。建设伟大建党精神学习网站和开发短视频软件,方便学生获取学习资料、查询各类信息、进行互动讨论。

教学载体创新是高校弘扬伟大精神实效的重要路径。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在学校组织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专题讲座;创新性地推进实境式教学和情景式教学,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相互配合中创设研学基地。要结合时代发展进一步开发新的教学载体,将伟大建党精神与改革开放成果、生态文明建设等成果相结合,依托社会进步成果开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新局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塑造多元化教学载体,通过网络党史知识竞赛、网络伟大建党精神征文、网络红色诗歌会等活动,创新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教学载体。

四、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全员向度

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能否取得实效,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校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要树立全员育人理念,构建全员育人格局,统筹协调高校一切育人资源,建立健全保障制度,合力形成全员弘扬、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氛围。

(一)全员育人是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支撑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全员育人是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础和保障。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5]139}。大学生学习生活于高校之中,与同学及学校教职工持续互动和深度交往,建构起丰富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正是在这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大学生不断实现个人的成长,不断推动其社会关系的拓展和深化,实现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在学校教育中,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对学生产生“力”的作用,全体教育工作者就会产生“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6]592}。只有充分发掘所有育人资源,将高校育人体系的所有岗位、所有人员都纳入其中,才能形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合力,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落到实处。

构建全员育人格局、形成全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合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力量、积极动员、协调组织。一是要进一步筑牢全员育人的理念。“好老师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小到学业好坏,大到学生的学术兴趣、职业选择,再大到学生的人生观,教师所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7]52}由于工作岗位的差别,教育教学一线教师直接接触学生,落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工作责任比较直接,教育意识比较明确;其他岗位的工作与学生教育教学关联度不高,相关岗位工作人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责任意识不强,为此需要进一步筑牢全员育人意识。二是要切实改变重知识技能讲授、轻思想道德培育的教风学风。重科研轻教学、重讲授轻引导、重个人发展轻学生成长的现象影响了全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践行力度,如果不从根本上优化教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良好的考核评价机制,那么将难以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三是要畅通全员育人的有效沟通机制。营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良好氛围,关键在于形成协同联动的体制机制。具体而言,要在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专任教师之间构建有效的信息交流、沟通与互洽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把一切积极因素和育人力量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二)全员参与高校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有效模式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彰显全员优势。推动全员参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要引导高校全体教职工进一步明晰自身在高校育人中的责任,厚植育人情怀,推动专业素养和专业输出能力的提高,彰显高校育人的全员优势。一是提升全体教职员工的“三全育人”意识,积极引导全体教职工恪守职业道德、强化奉献意识、坚守育人初心,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本职工作的始终。二是强化全体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自身思想觉悟、理论水平、业务能力,是教职工发挥优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前提。一方面,培养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育人排头兵,形成以优秀教学团队为引领、多主体协同发力的

合力育人新局面。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岗位的职责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培训和专题研讨,增强教职工自觉性和责任感,营造协同育人的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压实育人责任。一是明晰不同岗位教职员工的主体责任。明确领导干部肩负带头育人的重要使命,为全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制度支撑、资源支撑,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形成育人合力;明确管理干部承担协调育人的关键职责,需要解读好、执行好相关政策,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明确专任教师肩负兢兢于育人的重要职责,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伟大建党精神落实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明确工勤人员要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在与学生的沟通与服务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二是抓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加强组织领导。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育人实践中,领导干部不仅是组织者,更是实现全员参与的带头人,能够发挥典型的示范效应。要加强目标管理和责任考核,使之成为推动全员参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抓手。此外,要通过建立反馈机制,及时反馈教育效果和检验情况,进一步落实责任机制。

聚焦部门协同,落实有效沟通机制。一是以党建工作为抓手,完善经验总结机制。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推进党支部学习制度化、常态化,为各部门之间的

沟通互动夯实基础。在整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资源的同时,也要对全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落实情况进行经验总结,形成“总结-凝练-落实”的良性循环机制。二是推动各部门之间资源共享,协同育人。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过程中,各部门之间责任不同,资源和优势各异。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明确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以及每个人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做什么”“怎样做”,以提高工作效率,促成合力育人、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002).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姜朝晖.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The Practice Dire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QI Yuwei, WEI Yuxia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CPC is the spiritual source that leads the youth to grow into talents. To promote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roblem awareness, adhere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clarify the practice dir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als, we must grasp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consolidate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we must transform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in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consolidate and promote the teaching foundation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we must adhere to self-confidence, self-improvement,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source of power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staff, we must build a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all staff to educate people, consolidate and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It forms an effective joint force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the practice dimension

“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田 雨, 李 眉

(青岛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深化劳动教育, 强化高校思政课的思想引领效能, 塑造大学生精神品格。“挑山工”精神能够融入高校思政课关键在于, 其与高校思政课理论体系具有内在契合, 且在思政课教学与大学生实践活动中具有多维度体现。为有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高校要重塑思政课教学范式, 深度熔铸“挑山工”精神内核; 培育校园文化新生态, 强化传承“挑山工”精神血脉; 融合社会实践与网络资源, 深度践行“挑山工”精神使命。

关键词:“挑山工”精神; 高校思政课; 价值意蕴; 逻辑理路;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16-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泰山挑山工不在“快活三里”久留的事例,^[1]对“挑山工”精神给予了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2018年6月12日至14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 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深刻阐述了事关新时代山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殷切希望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2]这一嘱托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近年来, 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工作稳步推进, 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以提升高校思政课育人实效已成为教育领域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将“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教育尤其是高校思政课已成为学界和教育界共识, 相关探讨则充分彰显了“挑山工”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价值。如武丽民等人认为我国高校应紧跟时代步伐, 深刻认识“挑山工”精神的教育作用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3]赵传华等人认为“挑山工”精神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引, 能有力推动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4]王金花等人认为新时代发挥泰山“挑山工”优秀品格能助力培养大学生的优良品质, 提升高校育人实效性。^[5]同时, 学界针对“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也展开了相关探讨。如肖宏云等人认为泰山“挑山工”优秀品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华民族伟大精神高度契

合, 是地方高校思政课程建设的宝贵资源。^[6]学界多聚焦于通过挖掘“挑山工”精神资源、完善培养方案、搭建实践平台以及将其全方位融入思政课的理论学习、课堂互动和校园文化营造等育人场景。^[3, 4, 7, 8]然而, 多数研究集中于理论层面的阐释, 在探讨“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 以及如何将“挑山工”精神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促使其切实转化为大学生实际行动方面, 尚未形成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体系。因此, 深入剖析“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厘清二者融合的逻辑理路并探寻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既是推动“挑山工”精神走深走实的有效途径, 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促进高校思政教育迈向新高度的必然要求。

二、“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挑山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瑰宝, 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能有效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深度引领, 促进其思想与行为的高度统一, 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一) 有利于深化劳动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在此过程中需把立德树人融入各教育环节与不同教育领域。^[9]其中劳动教育是五育并举的重要方面, 但也是目前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收稿日期: 2024-12-09

作者简介: 田雨(1991—), 男, 山东临沂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研究。

育体系中的短板。^[10]在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体系构建中,“挑山工”精神的融入对于深化劳动教育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挑山工”精神蕴含着埋头苦干和坚韧不拔等精神特质,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劳动精神范式,犹如一把思想的利刃切入学生劳动认知的核心,为高校思政课中的劳动教育树立了鲜明的精神标杆。传统劳动教育往往侧重于理论与实践技能的传授,忽视劳动内在思维和精神的挖掘培育,^[11]而“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能促使大学生深入思考劳动的内在价值,理解劳动是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引导大学生理解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在个体与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作用;将挑山工的实践比作人类社会的实践,使学生深刻领会是劳动将实现自我价值与推动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在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环节,持续性的劳动实践项目为大学生提供了体验“挑山工”精神的平台。

(二)有利于强化高校思政课的思想引领效能

在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课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强化思政课思想引领效能。

“挑山工”精神所蕴含的目标明确和坚持不懈等内涵为高校思政课的思想引领锚定了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广大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12]挑山工们始终将山顶作为唯一的目标,坚定不移地稳步攀登,将他们对目标的坚定执着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助于大学生依据时代需求和个人志向精准定位人生坐标与价值追求。高校思政课借助“挑山工”精神深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帮助其树立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抱负。

“挑山工”精神中脚踏实地的实践品格为高校思政课的思想引领注入了强大的实践动力。挑山工用汗水和坚持书写了脚踏实地的实践品格,高校将此实践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中能促使大学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等活动中。以挑山工为榜样在实践中磨砺意志品质并锤炼专业技能,将思想道德观念转化为行动自觉,有助于大学生成长为既有高尚思想品德又具备扎实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青年。

(三)有利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品格

高校思政课是塑造大学生精神品格的关键阵地,挑山工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将“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长为契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3]挑山工们肩负着重担仍不断攀登的精神品格正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学习的。高校思政课融入“挑山工”精神能让大学生们直观且深刻地感受到奋斗的力量。新时代的大学生在人生发展的道路上同样也会面临诸多挑战。将“挑山工”精神融入思政课能够帮助大学生将其内化为个人精神品格,在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时能够以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姿态去应对。

大学生担负着民族复兴的重大使命,将“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能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到担当的意义。挑山工们担起的不仅是生活的重担,更是一份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思政课上通过讲述挑山工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的故事,让大学生明白担当不在大小,而在于有无坚定的决心和切实的行动。引导大学生勇于担当班级和学校里的各项工作责任,使其走向社会更能主动担当起建设祖国和服务人民的重任,成为能吃苦、肯奋斗、有担当和能作为的有为青年。

三、“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逻辑理路

“挑山工”精神能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在理论维度上在于其哲学意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通,在实践维度上,则因“挑山工”精神可以激励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践行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一)理论逻辑:“挑山工”精神与高校思政课理论体系的内在契合

“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理论逻辑体现在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协同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具有传承性上。

其一,马克思主义为认识与改造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挑山工”精神与之存在诸多相通之处。^[14]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挑山工”精神诠释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挑山工在陡峭山路的每次前进都是“挑山工”精神量的积累过程,他们用信念和脚踏实地,实现其精神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将“挑山工”精神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融入思政课有助于深化学生对量变与质变理论的理解,重视量的积累以达成质的突破。从认识论视角看,“挑山工”精神展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

证关系。挑山工经过反复摸索积累了对完成任务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实践是认识来源及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其融入思政课有利于学生理解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点,注重实践与认识的有机结合进而提升认知与实践能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挑山工”精神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的伟大力量。“挑山工”精神融入思政课有利于引导大学生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促使其自觉地投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

其二,“挑山工”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个层面相互呼应、高度契合。在价值导向层面,“挑山工”精神蕴涵的坚韧不拔、勇于担当、敬业奉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高度契合。将“挑山工”精神融入思政课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将价值观内化为自身行为判断的准则。在精神追求层面,“挑山工”为完成任务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入思政课有利于大学生认识个人精神追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

其三,“挑山工”精神的内涵集中于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和一往无前,这些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的精华,^[15]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挑山工”精神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一精神不仅帮助大学生深入理解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更能引导他们将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内化为个人品格,激励他们在社会实践中践行这种精神,使其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生。

(二)实践逻辑:“挑山工”精神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及大学生实践中的多维体现

“挑山工”精神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凭借着“挑山工”精神为代表的伟大民族精神,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挑山工”精神继续激励人们保持初心、一往无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挑山工”精神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增强教学效果的关键一招。

其一,在高校思政课中将挑山工的感人故事与课程主题衔接。挑山工们在崎岖山路上负重前行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神内涵,他们的故事能够唤起大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为后续教学奠定良

好情感基础,引导学生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思政课的学习。

其二,高校思政课可将挑山工的故事打造成极具说服力的案例分析素材。思政课教师引导大学生深入挖掘挑山工案例背后潜藏的精神内涵,引导学生更直观深刻地领悟“挑山工”精神的实质与精髓,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有效升华。例如,在思政课中分析挑山工在不同路况下调整步伐或者根据货物重量分配体力等细节,让大学生感悟其中的坚持、专注和科学规划等特质,从而深化对思政课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挑山工”精神的认同。

其三,组织开展“挑山工”精神相关的小组讨论活动。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大学生分享各自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的应对经验,以及如何借鉴“挑山工”精神来克服困难。通过讨论,一方面加深大学生对“挑山工”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将精神特质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真正实现“挑山工”精神在教学实践中的有效落实,使其成为指导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的重要精神力量。

其四,在志愿服务及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力弘扬“挑山工”精神,激励大学生勇挑社会责任重担,以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和勇挑重担的豪迈气魄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助于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社会实践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效果。

四、“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将“挑山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意义重大,需多路径协同推进构建高效教育模式,让其在高校思政课中落地生根、发挥引领作用。

(一)重塑思政课教学范式,深度熔铸“挑山工”精神内核

其一,要更新思政课教学理念。传统思政课教学往往偏重于理论灌输,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应以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与引领取代单纯知识传授,在讲述理想信念、奋斗精神等相关课程内容时可以突出“挑山工”精神的特质,引导大学生深入思考并确立学业与人生目标,使大学生明白在知识追求与人生道路上需如挑山工般一往无前。

其二,要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实现“挑山工”精神的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精准教学,所教学生为理工科时,可以讲述挑山工如何精准规划路线和

科学合理分配体力;所教学生为文科时,可以阐释挑山工的坚韧不拔等特质。思政课堂上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法,以“挑山工”精神为项目主题,让学生分组开展调研、撰写报告并进行课堂展示。也可以运用情景模拟法和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分别扮演挑山工和游客,模拟挑山工在面对游客不解时坚守初心的场景,增强大学生的情感体验。

其三,要完善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确保“挑山工”精神有效融入思政课的重要保障。通过构建多元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将“挑山工”精神真正融入自身行为,从而有效实现思政课的教学目标,使这一精神在高校中落地生根,深度熔铸于思政课教学范式之中。

(二)培育校园文化新生态,强化“挑山工”精神传承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地,其文化生态的构建对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精神风貌具有深远影响。将“挑山工”精神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强化大学生对精神财富的传承与弘扬,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设校园物质文化是传承“挑山工”精神的有效途径。高校图书馆可以设立“挑山工精神学习专区”,收藏有关挑山工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集以及以“挑山工”精神为主题的书籍等。同时配备多媒体资料,通过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阅读与观看资源。高校体育馆可以设置“挑山工精神挑战专区”,依据人体运动科学原理设计和模拟挑山场景。大学生可根据自身能力选择挑战难度,借此体会挑山工在负重攀登过程中的艰辛与坚持。

建设校园精神文化是传承“挑山工”精神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通过开展“挑山工精神年度人物评选”等活动,建立完善的评选机制,成立由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校外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制定明确的评选标准,包括学习上的刻苦钻研精神、工作中的责任担当意识、日常生活中坚韧不拔的品格等。评选过程公开、透明,确保评选结果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对于获评者,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媒体矩阵,在学校官网、校报、校园广播等校内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并确保这些报道能持续稳定地触达广大师生,使“挑山工”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保障其在校园文化中的传承和发展。

(三)融合社会实践与网络资源,深度践行“挑山工”精神使命

在新时代的教育实践中,社会实践与网络资源是推动“挑山工”精神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两大重要载体。二者的有机融合可以构建更加开放、互动及高效

的思政课育人模式,促进大学生深度践行“挑山工”精神使命。

拓展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让“挑山工”精神在大学生实践中扎根生长。一是鼓励学生将“挑山工”精神融入创新创业实践中,如开展以“挑山工”精神为灵感的创业项目,设计以“挑山工”精神为主题的文创和艺术产品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高校可与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联合提供创业指导和资金支持,帮助学生将创业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二是设立“挑山工学习月”,鼓励学生深入挑山工聚居地和新时代挑山工先进集体进行采访、体验和学习,以在实践中真切感知“挑山工”精神。三是进行“挑山工”精神主题实践成果汇演。可以让大学生创作以挑山工的生活、工作经历为样本的话剧或舞剧剧本,以现场及网络传播的方式生动直观地演绎“挑山工”精神。

利用网络资源,打造“挑山工”精神传播的思政“云平台”。一是建立“挑山工”精神网络学习社区。教师发布相关学习资料,尽可能方便更大范围内大学生自主学习与交流互动。二是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注册“挑山工”为主题的账号。定期分享“挑山工”精神的具体案例和工作日常等,利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发起“挑山工精神我践行”的话题挑战,鼓励学生打卡并分享自己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践行“挑山工”精神的点滴经历与感悟。三是邀请挑山工代表、思政教育专家等开展“挑山工”精神主题网络直播。挑山工代表可以在直播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与感悟,让大学生近距离感受“挑山工”精神;思政教育专家可以从理论出发剖析“挑山工”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上的应用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知,2019(11):4-10.
- [2] 刘家义.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N].学习时报,2018-07-11(001).
- [3] 武丽民,赵传华.泰山“挑山工”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探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3(34):168-169.
- [4] 赵传华,武丽民,仇善章.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泰山“挑山工”精神的培育与弘扬研究[J].高教学刊,2020(4):162-164.
- [5] 王金花,夏晓明,王军,等.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提升高校育人实效[J].高教学刊,2023,9(30):47-50.
- [6] 肖宏云,刘巍.新时代泰山“挑山工”优秀品格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程建设路径探究:以泰安地方高校思政课程建设为例[J].泰山学院学报,2024,46(4):140-144.

- [7] 李悝悝. “挑山工”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探究[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6): 111-113.
- [8] 李勇图. 泰山“挑山工”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2): 13-16.
- [9] 习近平.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J/OL]. 求是, 2024(17) [2024-09-01].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8/31/c_1130197120.htm.
- [10] 熊丽, 吴吉惠. “五育”并举下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探索[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4, 39(8): 117-123.
- [11] 陈云龙, 吴艳玲.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价值[J]. 人民教育, 2020(7): 35-38.
- [12]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1(5): 14-16.
- [13]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3(002).
- [14] 王晓旭. 以“挑山工”精神塑造新时代青年: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22, 35(2): 28-31.
- [15] 姜维枫. 新时代泰山“挑山工”精神的文化生成[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7): 177-182.

The Value Implications, Logic and Practice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Mountain Porter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IAN Yu, LI Mei

(Marxism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mountain porter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labor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haping the spiritual characte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key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mountain porter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at it has an internal fit wit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s a multi-dimensional embodiment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reshape the teaching paradig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deeply cast the spiritual core of “mountain porters”; to cultivate the new ecology of campus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piritual blood of “mountain porters”; integrate social practice and network resources, and deeply practice the spiritual mission of “mountain porter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mountain port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alue implication; logic approach; practice pathways

重黎一羲和氏族衰微考

张德苏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重黎一羲和氏族虽因颛顼的“绝地天通”,垄断巫文化而盛,却始终受制于政权,处于附属地位;至殷商中期,巫文化转型,甲骨占卜巫术出现,重黎一羲和氏族遂走向政治边缘;至商周之际,史文化兴起,理性时代到来,重黎一羲和氏族进一步衰微;到周宣王时期,其后裔最终融入了史官阶层。由于重黎一羲和氏族在巫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这个神权部族在“文王受命”事件中、汉武帝时期以及王莽时期仍然现出了余波尚存的态势。

关键词:重黎一羲和氏族;巫文化;史文化;程邑

中图分类号:K21;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3-0021-05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简明而完整地描述了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兴衰史:“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1]3285}由于话题所限,太史公并没有具体陈述其兴衰历程,更没有言及其兴衰背后的原因。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兴衰史是一个意义重大、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与远古时期巫文化的兴起、发展、转化及衰微历程息息相关。由这个问题入手,不仅可以对重黎一羲和氏族有更加具体的历时认识,也能够对巫文化的特征、巫文化与政治结合的方式、巫文化的转型及最终衰落的根本原因等问题获得具体生动的了解。

笔者曾以系列文章探究重黎一羲和氏族的族源及其兴起、发展、存续等方面的状况,本文则欲就其衰落与转型问题作一探析。

一、神权在政权之下:重黎一羲和氏族之附属地位

在颛顼时代到商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重黎一羲和氏族作为通天大巫,为当时政权所尊崇。颛顼立之,帝誉用之,帝尧复之。羿征羲和,夏以昆吾继之;汤灭昆吾,殷商又以大彭、豕韦续之。此族在千余年间的政治格局中始终不失其优越地位,概言之,其表现有三。其一,世序天地。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所谓“序天地”,亦即沟通天人。颛顼“绝地天通”,“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属民”,其实质是重黎一羲和氏族掌握了向上与天意沟通的能力,并拥有向下控制人心、整齐步调的特权。他们口含天宪,是帝王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政权作出决断的根据,是协同万邦、慑服百姓的重要凭借。从颛顼时代到商朝中叶,这一神圣权力始终掌握在重黎一羲和氏族之手。其二,为帝王伯。《国语·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2]511}“伯”本义是“伯仲叔季”之“伯”,是兄弟排行中的老大,引申为诸侯、万国之“老大”,位在众诸侯之上。《郑语》虽只说了夏商时期的情况,亦可笼括自颛顼至商朝中叶的整体状况——其地位一直如此。背后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重黎一羲和氏族既然职掌重要,故其地位特殊。其三,与帝王婚。据现存资料可以看到:从帝俊、少典到五帝时代的颛顼、帝誉、尧、舜,再到三代之始祖,皆与重黎一羲和氏族存有婚姻关系,帝王之母或其配多为重黎一羲和氏女。试截取尧舜时期进行断面观察会清晰地看到这个现象:这一时期的核心领导层中,作为天子的尧、舜、禹皆以羲和氏女为配,而在司徒、后稷之位上的契与弃皆羲和氏女之子。帝王与重黎一羲和氏族的联姻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巫术上的原因。这方面的详论,请参见拙文《重黎一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考》^[3]。

虽然地位尊崇,掌管着与天地沟通的权利,但重黎一羲和氏族从来也没有拥有过独立的神权,他们一直是政权的辅佐者和助手,在诸侯之上,在帝、王之下。其原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自其远古的起始点上,就不是宗教政治,而是典型的世俗政治。从历史表现上看,重黎一羲和氏族的附属地位、被动处境也是非常清晰的。

收稿日期:2025-02-25

作者简介:张德苏(1965—),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化及文学研究。

首先,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崛起”根源于颛顼的授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2]562}可见重黎一羲和氏族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神权力量的适时崛起,而是根源于巫术时代政权的需要,通过政治权威的“任命”而拥有了神圣权力。

其次,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兴衰”取决于帝喾的予夺。《史记·楚世家》载:“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1]1689}原本天官不理俗政,而由这条史料我们看到:帝喾可以抛开其“天官”之任而将这一文化氏族当成武力来用;甚至可以因其“诛共工而不尽”而罪杀之。可见重黎一羲和氏族并没有独立的神权地位。虽然最终天官之位未出重黎一羲和氏族,帝喾只是改任其弟吴回,但政治首领通过对神权首领的生死予夺,进一步宣示了双方的主从关系。重黎一羲和氏族在政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由此彻底确立。

最后,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复兴”有赖于帝尧的提携。帝喾之后,原始的政治格局出现波动,三苗废弃了颛顼以来的“绝地天通”,恢复了“家为巫史,民神杂糅”的状态,重黎一羲和氏族遂失其官。到帝尧时,重修颛顼之政,“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2]562}“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4]28},恢复了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天官地位。可见此族并无决定政治走向的能力,其衰、兴皆取决于政权考量。

此后由夏至商时代,“天官”之权位虽一直在重黎一羲和氏族内部延续,但是,受到政权的冲击却更加频繁而严重。夏初,羿夺夏政,太康失国,胤征羲和而灭之,仲康遂以昆吾为伯。神圣地位由重黎一羲和氏族正宗转向了支系。夏末,汤灭昆吾,殷商以大彭为伯。其后商灭大彭,又以豕韦为伯。神圣地位在支系间被动辗转。重黎一羲和氏族神圣地位辗转的过程,更是政权强于神权的表现。虽然政权的确立仍然离不开重黎一羲和氏族的支持,但政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这一氏族的的不同支系间作出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重黎一羲和氏族完全是被动的,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可以说胤征羲和而灭之之后,重黎一羲和氏族更加陷入傀儡化的状态。

这些打击当然会使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势力和影响力不断地削减,对其神圣权威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只是出于权力争夺或立场对立而产生的政治打击,而不是在文化上或者价值上对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否定。在以星历通天的巫文化时代,王朝仍然需要重黎一羲和氏族作为大巫为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强化政令的权威性。因此,这样的政治打击不会导致这个垄

断了星历文化的氏族被抛弃,也不会导致其真正衰落。

二、巫文化转型:重黎一羲和氏族之边缘走向

《史记·太史公自序》:“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1]3285}司马迁认为重黎一羲和氏族的影响终止于殷商,非常准确。正是在殷商王朝中后期,重黎一羲和氏族最终走向了政治的边缘。

综合众多史料,我们可以梳理出重黎一羲和氏族在殷商时期边缘化的大体历程。

首先是巫咸取代了重黎一羲和氏族的“传天数”之职。《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1]1343}雷学淇细考其年代云:“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则太戊以前几百年,犹是重黎之子孙叙其职也。”^{[5]1398}则重黎氏族的衰落最早始于商王太戊之世。

其次是彭祖、豕韦先后失去“伯”位,并被商王所灭。《国语·郑语》:“祝融……其后八姓,董姓鬲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2]511}大彭曾为商伯,灭在何时?史无明文。然其灭于商代则无疑。《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彭祖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篋铿之后,后为大彭,亦称彭祖。”^{[1]139}正义云:“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1]139}所谓大彭八百岁,其实质即由尧复育重黎“不忘旧者”,至“商灭之”,历年八百岁。“大彭之死”,其史学含义即重黎一羲和氏族之大彭一支的衰灭。大彭之灭,必在豕韦之前,因为豕韦是大彭的继承者。并且豕韦是大彭的支族,《世本》卷三《氏姓篇》:“豕韦,防姓。”张澍粹补云:“防,一作彭。豕韦本彭姓,大彭之孙元哲封豕韦。”^{[6]52}《潜夫论·志氏姓》亦云“彭姓豕韦”。^{[7]413}西汉韦贤自认是豕韦氏之后,《汉书·韦贤传》载贤《谏诗》云“我祖斯微,迁于彭城”也显示出豕韦、大彭关系密切。豕韦氏曾做过商王朝的大巫也是无疑的,《庄子·大宗师》:“豕韦氏得之,以挈天地。”商灭大彭而用豕韦,或如帝喾诛重黎而用吴回。豕韦被灭的时代,有较明确的说法。《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贾逵曰:“刘累之后至商不绝,以代豕韦之后。祝融之后封于豕韦,殷武丁灭之,以刘累之后代之。”^{[1]388}豕韦灭于武丁之世。此时是殷商王朝中后期。

小结一下,重黎一羲和氏族失其“传天数”之位,在殷商早期,失其“伯”位在殷商中后期。

重黎一羲和氏族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古人没有留下更多资料,就现有资料看,其衰落应该是由巫文化的发展、转型造成的。更具体地说,是因为甲骨占卜巫术取代了星历巫术。《尚书·洪范》所言对卜筮的强大依

赖显示了这一点;考古发掘出的绝大部分带有卜辞的甲骨归属于商朝中后期,也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甲骨卜辞最早虽可以上溯到盘庚时代,但其大量出现却是到武丁之时。^{[8]32-34}这与文献资料中所记载重黎—羲和氏族被灭的时代是相合的。或许我们可以说:甲骨占卜巫术的兴起之时正是重黎—羲和氏族的星历巫术衰微的开始。

占卜巫术为什么会导导致星历巫术的衰微呢?

首先是天文星历之学不容易垄断。星历知识由于其重要性往往更容易在社会中不断传播,其他部族会努力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到商周时期,掌握天象规律的已有多家氏族。《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11]343}可以清晰地看到,殷商之后,传天数者,不专一族,如此,重黎—羲和氏族的垄断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是天文星历之学逐渐失去神秘性。天文星历之学面对的实际上是有规律的、客观的、不可移易的自然现象,这种学问越发展,其神秘性就会越来越低,就会在巫术的层次上逐渐否定自我。由于星历观察与推步越来越不利于证明天命的意志与惩罚,其政治功效就随之减退以至于消亡了。

随着天文星历之学的式微,一种更新的、更“可靠”的获知天命的方式兴盛起来,这就是甲骨之卜。甲骨之卜的出现,带来了巫术方式的变化,这对重黎氏族的冲击当然是巨大的。于是,衰落的重黎—羲和氏族被商王朝徙封于边鄙之地——程邑。《路史》云“商封吴回后今咸阳故安陵城,周程邑也”^[9],未言在何王时期。以理推之,当在商王朝后期;或在武丁弃用豕韦之后。“封之于程”是对重黎—羲和氏族之后人作出的最后安置。至此重黎—羲和氏族彻底偏离了王朝政治的中心。

三、程邑:大巫的最后余光

没有直接资料证明重黎—羲和氏族参与了周文王的“受命”,但有限的史料证明双方在同一空间中有较长时间的重合,而且这种重合是周人主动的、有意的追求。吴回之后被迁居于“程”,后有王季“伐程”“克程”“都程”,又有文王“归程”。从这点上看,文王受命很难说与这个曾经掌天命的部族没有关系。这是学界尚未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作一探索。

周人与重黎—羲和氏族曾于同时处于同地,证之如下。周之程邑,就是商封吴回后之“程”。《路史》卷二十六《国名纪三》:“商封吴回后今咸阳故安陵城,周程

邑也。”罗苹注:“《地志》:安陵隶扶风。阍骊云:古程邑。”^[9]郑樵《通志》:“程氏,伯爵,风姓,重黎之后也。重为火正,裔孙封于程。”^{[10]453}《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九年(前350)”,胡注引宋白曰:“咸阳县本周王季所都,秦又都之。”^{[11]56}

王季“伐程”“克程”,最终“都程”皆为吴回后之“程”。《竹书纪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12]228}这里需要辨明一个问题,此战与《逸周书》“毕程氏以亡”之事并非同一事件。《逸周书·史记解》:“爵重禄轻,比口不成者亡。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匿,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13]1028}此亡毕程氏者为殷商,商王灭毕程氏后将程邑封给了“吴回之后”。因此《逸周书》所称“毕程氏”,不可以用来称吴回之后,吴回之后只是建国于此,而非“毕程”之“氏”。《竹书纪年》所记“克程之战”乃王季克重黎—羲和氏族之役也。

需要注意的是,王季之伐、之克,并非要灭掉重黎—羲和氏族,也不是迫使他们让出此地。直到周宣王时期,重黎—羲和氏族后裔仍有“程伯”之号,《史记·太史公自序》:“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封为程国伯,休甫,字也。”^{[13]285}说明他们一直居于“程”。而且,其“程”毫无疑问正是王季所伐、所克、所都之“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13]286}与《路史》所言吴回后所封之“程”正是一地。

王季徙都于“程”。《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云:“王季徙程。”^{[14]754}《路史》卷二十六《国名纪三》“高辛之后”:“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阳故安陵,亦在岐南,与毕陌接,所谓毕程。”^[9]可见王季所居之“程”即商所封吴回后之“程”。王季克程,随即徙都于此,不免让人感到这是他的主观意图。王季为何必徙都于程?我认为,王季伐程、徙程,极似于羿迁穷石,为接近羲和之后也。不同的是后羿没有成功,而王季成功地获得了重黎—羲和氏族后人的支持。这与后来的文王受命大有关联。

文王亦居“程”,且在“程”完成了他的“受命”大事。《竹书纪年》:“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12]231}《帝王世纪》:“文王合六州之诸侯以朝纣,纣以崇侯之谗而怒,诸侯请送文王,弃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帝王世纪》又谈到文王在程受命之事:“太妣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柞棫。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后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15]27}再看《逸周书·程寤》篇,其说更为明确:“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妣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柞棫,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

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14][1836]}《清华简·程寤》与此大同小异^{[16][47, 136]}。

文王“作灵台”一事,是其“受命”得到重黎—羲和氏族支持的一个很好的证据。《易乾凿度》:“二十九年伐崇侯,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于天下。”^{[17][40]}《诗含神雾》:“作邑于丰,起灵台。”^{[17][464]}《大雅·灵台》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18][1038]}观天象而得天命乃早期巫术时代重黎—羲和氏族沟通天命的传统方法,此灵台的主持者、使用者也许正是重黎—羲和氏族之后。

“文王受命”得到了重黎—羲和氏族的支持,还有一个证据。重黎—羲和氏族自帝尧时期得到了“祝融”美称,于是“祝融”与重黎—羲和氏族有着复杂的互渗纠缠关系(请参阅拙作《“祝融”先后两族及其混同考》^[19])。“祝融”一称是重黎—羲和氏族神性的表达。依照巫文化传统,“祝融”的出现、相助,是帝王更迭合“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国语·周语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2][30]}《墨子·非攻下》云:“(成汤伐夏)天命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20][150]}在《尚书大传》及《太公金匮》等书中也有祝融等七神雪天远来,助周灭殷事,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重黎—羲和氏族用传统巫术的方式参与了翦商过程的一种表现。

以上这些史料所表现的周人与重黎—羲和氏族间的关联,不能完全视为巧合。在周文王受命、武王翦商这些环节上,重黎—羲和氏族“与有为焉”的可能性极大。果真如此,那“文王受命”则是重黎—羲和氏族历史命运的最后一缕闪亮的余光。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史家并未明言。《程寤》所记文王受命,是由梦、占得到证明,不是由天象得到证明。儒家又有断虞芮之讼而受命的“佑德”之说。这些似乎说明,时至商周之际,社会思想愈益多样,周人或亦多方利用,使社会各方接受其“受命”的说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人就不可能舍弃曾有最高神权的重黎—羲和氏族。

史书中“程”邑所在地有两说,这个现象也值得探讨。《路史》卷二十六《国名纪三》存两说:“商封吴回后今咸阳故安陵城,周程邑也。一云,洛阳上程聚,程伯休父卿士之采。”^[9]《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下》认为重黎—羲和氏族裔孙所封之“程”在洛阳:“程氏出自风姓。颛顼生称,称生老童。老童二子:重、黎。重为火正,司地,其后世为掌天地之官,裔孙封于程,是为程伯,雒阳有上程聚,即其地也。”^{[21][3396]}

重黎—羲和之后所封不在洛阳一带,史料是有确证的,但洛阳也确有程氏居地——上程聚。这或许说明西周初立东都之时,周王就封重黎—羲和氏族的一支

于洛阳,其居地仍称“程”。也可能是平王东迁之时,重黎—羲和氏族随迁至此。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重黎—羲和氏族后裔与周王朝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四、史文化兴起:重黎—羲和氏族之衰微

重黎—羲和氏族在程邑的际遇,并不能改变这个巫文化部族衰落的走向。因为史文化取代巫文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理性时代的到来这一历史发展大势是无法违背的。

王国维称“中国文化变化之剧,莫过于商周之际”,诚为深识。周人代商,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它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大飞跃:巫祝文化式微,史官文化遂盛。从其内涵上讲,史官文化与巫文化是根本异质的,周公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念,认为王完全可以通过维持自己的“德”而受到天命的眷顾,不必在具体的行事上处处求得天命,遵从天命。而“德”的核心表现是“保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保民而王”。如此,则不只是重黎—羲和氏族之星历巫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连兴盛于商朝后期的甲骨占卜之术,也从逻辑上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因此,周朝虽一度有甲骨的使用,然而很快就不再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照了。

在这样的文化走向里,重黎—羲和氏族要想获得从前的政治高位则更是不可能的了。《国语·郑语》:“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末有。”他们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除了“受命”这一个环节,他们的知识系统、思想系统已经无法给予周族更大的帮助。故自武王伐纣、周公制礼至成康盛世,皆未见重黎—羲和氏族的信息,直到宣王时之程伯休父。然而程伯休父却是一个失去世业,转型为史官的人物,“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2][564]}。至此,昔日高高在上的通天大巫,重黎—羲和氏族,不仅跌落神坛,失去了旧日的名分,也不得不放弃了世传的家学。

重黎—羲和氏族文化转型后的一些现象,也值得我们去了解,我们可以把这些看作重黎—羲和氏族深刻的历史影响的袅袅余音。

首先,程伯休父所任之“司马氏”,仍然属于“天官”。《太史公自序》中一边说“司马氏世典周史”,一边又说“司马氏世主天官”。《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别名记》云:‘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马顺天。’”^{[22][132]}所谓“顺天”,其义与《尚书·尧典》之“钦若昊天”同。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是司马亦名天官也。”^{[23][63]}

其次,至汉,司马家族所任的“太史公”仍然“掌天官”。《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司

马迁参与了太初历的制订,可谓其为“天官”的一个明证。《汉书·兒寬传》言:“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24][2633]}更有甚者,史上有“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之说。《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1][3287]}《史记索隐》引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1][461]}这些说法有些让人吃惊,故引起了学者的一些怀疑与争论。但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包含了值得重视的历史信息。如果从重黎—羲和氏族深刻的历史影响角度看,这种秩序安排有可能出现过。汉朝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或曾一度有恢复古制的想法甚至做法。若复古制,必定要兴复司马氏、太史公的天官旧位,使其地位在皇帝之下、丞相之上。然而,时代不同了,这样的政治体制必然行不通,故而只是昙花一现。

最后,王莽建立新朝后,欲恢复上古之制,知“司马氏”来源于上古之重黎,故命其职事曰:“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24][4101]}王莽还重新启用了“羲和”这一官称。“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24][4103]}细察王莽的“复古”,“司马”只是众官之一,并无特殊地位。“羲和”只是“大司农”一职的新称。这些官职虽仍与天文历法有关,但其指向只是农业而已,已失去神性,完全世俗化了。后来又更名“纳言”,则是听取民间意见的角色,勉强与“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有所关联,而与通天意的关系则是非常模糊了。如果说天意可以通过民意来表达,纳民之言就是通天之意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已是“史文化”时代的思想了。此后,重黎—羲和氏族残存的这点神光也彻底消散。

A Study on the Decline of the Chongli-Xihe Clan

ZHANG Desu

(Culture Communication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handong 264209,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Chongli-Xihe clan became prosperous as the shaman culture was monopolized by the regime due to Zhuanxu's "seve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t was alway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egime and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By the middle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shaman culture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ivination technique using oracle bones emerged. Consequently, the Chongli-Xihe clan gradually moved to the political periphery.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historical culture rose, and the era of rationality arrived, leading to a further decline of the Chongli-Xihe clan. By the reign of King Xuan of Zhou, its descendants were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 of court historians. Owing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hongli-Xihe clan in the history of shaman culture, this theocratic clan still showed a gradually weakening aftereffect in the event of "King Wen receiv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n the Wang Mang period.

Key words: Chongli-Xihe Clan; witchcraft culture; historiographical culture; Chengyi (程邑)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 校. 国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 张德苏. 重黎—羲和氏族女子婚姻考 [J]. 德州学院学报, 2023(5).
- [4] 李学勤, 主编. 十三经注疏: 尚书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5] 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梁保群, 吕宗力, 点校. 日知录集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6] 张澍. 稗集补注. 世本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7] 王符, 著. 汪继培, 笺. 彭铎, 校. 潜夫论笺校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陈梦家. 殷虚卜辞综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9] 罗泌. 路史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郑樵. 通志: 第3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2]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3] 黄怀信. 逸周书汇校集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4] 李昉. 太平御览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5] 皇甫谧. 帝王世纪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1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编. 李学勤, 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0.
- [17] 安居香山, 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 [18] 孔颖达. 毛诗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张德苏. “祝融”两族的存在及其混同考 [J]. 德州学院学报, 2021(3).
- [20] 孙诒让. 墨子间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1] 欧阳修.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2] 陈立. 白虎通疏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3] 孙星衍. 尚书今古文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4]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清华简《筮法》阴阳五行思想申论

孙 航^{1,2}, 沈孝凤¹

(1.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2. 山东大学 中国经学研究中心, 济南 250199)

摘 要:在清华简《筮法》中,明确存在体现阴阳五行思想的内容。其中,阴阳思想蕴涵着阴阳分判、崇阳抑阴、阴阳和合三个方面的旨趣;五行思想则包括五行归类、五行相克、五行相生三个层次的内容。尽管清华简《筮法》受文本局限,未呈现出系统、成熟的阴阳五行理论,但其以别样的形式展现了阴阳五行和《周易》交叉融合的历史图景,代表了先秦易学发展的一个面向。

关键词:清华简《筮法》; 阴阳; 五行; 《周易》; 思想融合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26-08

清华简《筮法》虽属筮书,但从中可观“大道”,窥见中国类型的文化^①的要义——阴阳五行思想。在此之前,刘成群先生从先秦时期阴阳思想融入易学的宏观视角,论及清华简《筮法》中的阴阳思想。^{[1]12-19}冯华先生认为“清华简《筮法》中蕴涵着深刻的阴阳思想,大部分筮占理论与卦例均遵循阴阳关系对应原则”^[2]。然而,冯先生只论阴阳,不论五行,即便是阴阳,也只谈筮占理论中的乾坤、男女、干支等和卦例中阴阳对应的关系——“阳与阳对应,阴与阴对应”。就阴阳思想而言,已有研究在研究深度、阴阳思想的分类和规律的把握上存在不足。本文拟从分析筮占理论和卦例入手,揭示清华简《筮法》中蕴涵的阴阳五行思想。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阴阳思想

在易学中,阴阳是一对基本概念。就《周易》古经而言,卦爻辞虽无“阴阳”一词,但阳爻(刚爻)“—”和阴爻(柔爻)“--”蕴涵着阴阳的观念。就《易传》而言,阴阳已成为易学的主要范畴,其经典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正是对

它的高度概括。虽然清华简《筮法》受筮书文本性质的限制,没有对阴阳思想进行专门的理论阐释,但是经过分析依然可以揭示出阴阳思想三个层次的内涵:阴阳分判、崇阳抑阴和阴阳和合^②。

(一) 阴阳分判

在清华简《筮法》中,阴阳分判的思想不同程度地体现于具体筮例和理论叙述的文本之中。括而言之,它包括八卦分阴阳、干支和筮数分阴阳、四季分阴阳三个方面。

1. 八卦分阴阳。在清华简《筮法》中,八卦可以分为阴阳两类,其中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兑、离、巽为阴卦,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

第一,从具体筮例看八卦分阴阳。在清华简《筮法》中,明确涉及阴阳的内容,只有第二节《得》之第七例,其文曰:

䷀ ䷁ 作于阳,入于阴,亦得,其失十三。

整理者以为“作于阳”“入于阴”的主语是兑卦,即兑卦“作于阳”,指右侧兑卦居于乾卦之上,左侧兑卦居于坤卦之下。^{[3]83}这一说法,是符合卦例的实际情况的。对此,赖少伟先生根据《果》节“外事数而出,乃果;内

收稿日期: 2024-01-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字卦研究”(20YJC720019)。

作者简介: 孙航(1986—),男,河南洛阳人,助理教授,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早期易学与出土文献。

① 根据庞朴先生的研究,“中国类型的文化”是一种“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77页。

② 业师杨效雷先生在建构“易学考古”理论的过程中,曾提出易学“阴阳三观”的说法,认为阴阳观包括阴阳分判观、阴阳交易观和尊阳抑阴观三个方面(参见杨效雷、张金平:《数字归类、阴阳归类和八卦归类——易学推类逻辑的基本前提》,《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第75-77页;杨效雷、徐婵菲、张金平:《〈周易〉阴阳观与洛阳汉代画像》,《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41-47页;杨效雷、曾华东:《〈周易〉阴阳卦与和合文化论析》,《周易研究》2017年第5期,第92-96页)。兹结合清华简《筮法》的实际,略作调整,将其蕴涵的阴阳思想概括为阴阳分判、崇阳抑阴与阴阳和合三层次。

事数入,亦果”的理论,说:“得”属于“外事”,右上之兑“作于阳”为“数出”,是外事而兑出现在外卦,结果应为“得”;左下之兑“入于阴”为“数入”,是外事而兑出现在内卦,结果应为“失”,但“数出”胜“数入”,所以是“亦得,其失十三”。据此,他认为这里体现出“崇阳抑阴”的思想。^[47]这一认识,实际上是对此处卦例的误解,因为它是由一个乾卦、一个坤卦和两个兑卦构成的,属于“三女同男”,所以虽有兑卦之“作于阳”“入于阴”,仍然“亦得”。由此可知,所谓“阳”是指右下的乾卦,所谓“阴”是指左上之坤卦,是以“阴阳”指八卦而言,即八卦有阴阳之分。^{[11][95]}在《筮法》中,八经卦可以明确分为乾、震、坎、艮四个男卦和坤、兑、离、巽四个女卦。刘大钧先生认为,清华简《筮法》中八卦的男女取象与《说卦》相同,即乾、震、坎、艮为男,坤、兑、离、巽为女。^[6]这一说法在《筮法》中有明显的例证,是可信的。这里以乾卦为阳卦、坤卦为阴卦,以此类推,乾、震、坎、艮皆为阳卦,坤、兑、离、巽皆为阴卦。可见,它体现的是阴阳分判的思想,而非“崇阳抑阴”。

第二,从理论叙述看八卦分阴阳。第二十六节《崇》集中概述了八卦之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其中,坤崇、兑崇、离崇、巽崇与女性、雌性有关,乾崇、艮崇、坎崇、震崇与男性、雄性有关。如乾崇之“纯、五,祖宗”“淆,乃父之不壮死”“莫纯,乃室中,乃父”,艮崇之“五,乃桎魃”,坎崇之“九,牡虞”,震崇之“日出,东方”云云,将四个男卦与祖宗、父、旱鬼、雄性动物、太阳等联系起来。坤崇之“纯,乃母”,兑崇之“女子大面端吓死、长女为妾而死”,离崇之“长女殇”,巽崇之“字殇”,将四个女卦与母亲、女子、长女、妾、生育等联系起来。^[77]它所体现的男卦与男崇、雄崇相关,女卦与女崇相关的内容,隐含阴阳分判的思想。

2. 干支、筮数分阴阳。在清华简《筮法》中,十个天干、十二地支和六个筮数皆被分为两类。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

第一,在《天干与卦》中,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艮纳丙,兑纳丁,坎纳戊,离纳己,震纳庚,巽纳辛。在《地支与卦》中,震纳子午,巽纳丑未,坎纳寅申,离纳卯酉,艮纳辰戌,兑纳巳亥。在《地支与爻》中,九纳子午,八纳丑未,七纳寅申,六纳卯酉,五纳辰戌,四纳巳亥。结合起来看,八卦、天干、地支、爻数四者之间可以建立一系列的对应关系。其中,乾和甲壬、坤和乙癸彼此对应;艮、丙、辰戌、五彼此对应,兑、丁、巳亥、四彼此对应,坎、戊、寅申、七彼此对应,离、己、卯酉、六彼此对应,震、庚、子午、九彼此对应,巽、辛、丑未、八彼此对应。在《筮法》中,乾、震、坎、艮为男卦,而甲壬、丙、戊、庚为阳干,子午、寅申、辰戌为阳支,

九、七、五为奇数,男卦、阳干、阳支、奇数相应;坤、兑、离、巽为女卦,而乙癸、丁、己、辛为阴干,丑未、卯酉、巳亥为阴支,八、六、四为偶数,女卦、阴干、阴支、偶数相应。八卦、天干、地支、筮数、男女,按照二分思维整齐对应,极富规律性。从中不难发现,阴阳思想应是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其中的。

第二,将天干、地支分为刚柔、阴阳、牝牡的做法,在放马滩秦简《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尽管与上述由类推得出的认识不尽一致。其文曰:

凡甲、丙、戊、庚、壬、子、寅、巳、酉、[卯、戌],是谓刚日、阳[日]、牡日也,女子之吉日也;凡乙、丁、己、辛、癸、丑、辰、午、未、申、亥,是谓柔日、阴日、牝日也,男子之吉日也。^[8,9]

在传世文献中,《礼记》亦有刚日、柔日的说法,如《曲礼上》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10],《表記》曰:“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11]。所谓“外事”即“郊外之事”,“内事”即“郊内之事”;“刚日”即“吉日”,“柔日”即“偶日”。两处皆是刚日、柔日对举。由此可见,将天干、地支分为刚柔、阴阳等,在数术中应是一种通行的办法。

3. 四季分阴阳。在清华简《筮法》中,一年四季被分为两类。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

第一,在清华简《筮法》中,有《四季吉凶》一节,叙述了六子卦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吉凶状况,其文曰:

春:震巽大吉,坎小吉,艮离大凶,兑小凶。

夏:坎大吉,震巽小吉,艮离小凶,兑大凶。

秋:兑大吉,艮离小吉,坎大凶,[震巽小凶]。

冬:艮离大吉,兑小吉,震巽大凶,[坎小凶]。

在这里,虽然吉凶有大小之分,但是大吉、小吉都是吉,大凶、小凶都是凶。其中,在春季、夏季,震、巽、坎为吉,艮、离、兑为凶;在秋季、冬季,兑、艮、离为吉,坎、震、巽为凶。与此同时,在清华简《筮法》中,卦位图明确记载了四正卦在一年四季轮流用事的过程,认为震卦居东方“司雷”,坎卦居南方“司树”,兑卦居西方“司收”,离卦居北方“司藏”,体现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序特征。其中,震、坎为阳卦,对应于春夏二季,而兑、离为阴卦,对应于秋冬二季,所以震、坎在春夏为吉,离、兑在秋冬为吉。^{[7]69-7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化平先生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所以震、坎两阳卦处春、夏,兑、离两阴卦处秋、冬。”^{[12]216-217}以此观之,在清华简《筮法》中,不仅卦位图对四正卦的安排契合阴阳思想,而且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也与阴阳思想相符。四季分阴阳,且四正卦中的男卦在春夏为吉、女卦在秋冬为吉,这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

第二,在清华简《筮法》中,虽然有“作于阳,入于阴”的内容,但它还停留在八卦分阴阳的水平,远未成为一对统摄天地的范畴。据《管子·四时》记载,方位、四时、阴阳、五行已经建构起一系列的对应关系,其文曰:“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宗正阳,治堤防……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13]可见,春夏为阳,其中春为木、夏为火;秋冬为阴,其中秋为金、冬为水。又,帛书《要》篇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道产焉。《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14,15]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一年四季之中,春夏为阳,秋冬为阴。

由上可知,清华简《筮法》从八卦、干支和筮数、四季的归类三个方面,体现了阴阳分判的思想。

(二)崇阳抑阴

基于阴阳分判的思路,清华简《筮法》中蕴含的阴阳思想,流露出崇阳抑阴的思想倾向。

1. 所谓“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体现的是尊崇天道的尚阳思想,与《周易》“扶阳抑阴”的精神相一致。其中,“男胜女,众胜寡”是“天之道”的表现,用在清华简《筮法》的诠释中就形成定性、定量两大原则,与四位卦的形式是相适应的。柯鹤立先生认为它说明了《筮法》的三个概念,一是“天之道”,二是乾、震、坎、艮四个男卦强于坤、兑、离、巽四个女卦,三是多数胜于少数。^[16]这句话在《筮法》中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既是对《筮法》诠释原则的高度概括,也可以视为攻解卦崇的原则,更是易道精髓的体现——易道效法天道。这与《易传》强调《周易》的天道来源,异曲同工。实质上,这是从来源的角度赋予清华简《筮法》以神圣性,说明它是以天道为理论基础的。这一说法和《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都是旨在为其理论寻找形而上的依据,两者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天道思想、阴阳思想与易学的结合素有来源。

2. 在《筮法》中,以七统六的情况,在根本上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第一节《死生》曰:

 六虚,其病哭死。
  五虚同一虚,死。

对于这两则筮例,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成群先生认为清华简《筮法》虽然不用六爻,但是隐含有六爻的观念。在这里,阴阳思想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1]18-19}贾连翔先生认为这两例解卦的方式是将彼此并列的两个六爻卦左右合观,即左右两卦的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和上爻分别对应,有阳爻的为为一类,无阳爻的为为一类,其中应当含有阳统阴的思想。^[17,18]赖少伟先生明确认为清华简《筮法》透露出“崇阳抑阴”的思想。在他看来,“六虚”是指“左右两卦六爻之位均有阳爻”,“五虚同一虚”是指左右两卦六爻中,五个有阳爻,一个为两爻皆阴。据此,他认为左右两爻都是阳或有一个是阳的,皆视为阳,都为阴爻的则视为阴,这种情况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4]71}在这两则筮例中,确实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但学者的分析普遍忽视了“虚”在根本上是指筮数七、六这一事实。在这里,理解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合观左右”的思路,二是七可以统六。其中,在清华简《筮法》中,作为筮数常数的七、六已经具有符号的意义。^[19]在这个意义上,以七统六,的确应该蕴涵着崇阳抑阴的思想倾向。

3. 乾不纯而称“纯吉”,纯坤而仅称“吉”,隐含了崇阳抑阴的思想。就第十四节《贞丈夫女子》而言,在“贞女子”的四个卦例中,都为三个坤卦,且坤卦皆由六构成,而在“贞丈夫”的四个卦例中,前两例有三个乾卦,后两例只有两个乾卦,且所有乾卦中都有一个筮数九。由四位卦象的比较可知,“贞女子”的四个卦例比“贞丈夫”的四个卦例更“纯”,但后者称“纯吉”,前者只称“吉”而不称“纯”。^{[3]99①}这大概和乾坤两卦的性质及其关系有关。乾坤虽然并称父母,但是两者并不相同,乾可以统坤,而坤不可以统乾。《崇》节末尾曰:“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可为明证。这一点,与七可以统六,而六不可以统七的认识是相适应的。又《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朱子曰:“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20]可见,乾为至纯,与坤不同,既名之为“纯”,则坤不宜称“纯”。乾坤之间存在的这种细微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

4. 在“娶妻”的语境下,以“三女同男”为吉,以“三男同女”为凶,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第六节《娶妻》曰:

①“纯吉”之“纯”,整理者季旭升先生训为“皆”(季旭升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读本》,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57页),冯华先生释为“大”(冯华:《〈筮法〉中的阴阳思想与卦象解读》,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7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00-201页)。无论何者,它都与乾坤两卦的性质密切相关。

 凡娶妻,三女同男,吉。
  凡娶妻,三

男同女,凶。

在第一例中,右下卦为艮,为男;右上卦为坤、左上卦为离、左下卦为兑,合称“三女”。所谓“三女同男”,正是就此而言。在第二例中,左下卦为巽,为女;右上卦为艮、右下卦为乾、左上卦为坎,合称“三男”。所谓“三男同女”,此之谓也。^{[3]88} 基于卦例的构成,刘成群先生根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认为第一例三女之阴卦同一男之阳卦而获吉,第二例三男之阳卦同一女之阴卦而获凶的情况,明显体现了阴阳思想。^{[1]18-19} 这种差异,与《周易·大过》以“老夫得其女妻”为“无不利”,而以“老妇得其士夫”为“无咎无誉”一般,不仅反映阴阳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更体现了崇阳抑阴的思想。

由上可知,在清华简《筮法》中,崇阳抑阴的思想既存在于“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的理论概括中,也渗透于具体筮例的诠释之中。

(三)阴阳和合

基于阴阳分判和崇阳抑阴的观念,在清华简《筮法》中所蕴含的阴阳思想,又体现出阴阳和合的面向。如《享》《贞丈夫女子》《乾坤运转》三节,都流露出阴阳思想的旨趣。

1. 月之朝夕与卦之雌雄的匹配,隐然含有阴阳和合的思想旨趣。第三节《享》曰:

 凡享,月朝纯牝,乃飧。
  月夕纯牡,

乃亦飧。

整理者以“纯牝”“纯牡”为无杂色的牺牲,认为“纯牝”是指第一例中的三个坤卦,“纯牡”是指第二例中的三个乾卦。^{[3]85} 这一认识是有其道理的。这里的第一个卦例由三个坤卦、一个巽卦组成,皆为女卦。其中,“纯牝”是就四个女卦而言。第二个卦例由三个乾卦、一个艮卦组成,皆为男卦。其中,“纯牡”是就四个男卦而言。^{[2]202[3]85[25] ①} 这样理解,同样是合适的。就此,郭和杰先生说:“月夕适于男性,对于男性为吉;月朝利于女性,对于女性为吉。”^[21] 由于对“纯牝”“纯牡”含义的把握不够准确,他的这一理解是欠妥当的。因为《享》节的主旨是讲用牲献享的,而不是讲利男利女的。在筮例中,“纯牝”是以“月朝”为吉,“纯牡”是以“月夕”为吉。以月之朝夕与卦之雌雄的匹配为吉,其中隐含着阴阳和合的观念。

2. 月之朝夕与卦之男女的匹配,隐含有阴阳和合的思想。第十四节《贞丈夫女子》曰:

 凡贞丈夫,月夕乾之

萃,乃纯吉,无春夏秋冬。

 凡贞女子,月朝坤之

萃,乃吉,无春夏秋冬。

在“贞丈夫”的四个卦例中,前两个卦例皆有三个乾卦,后两个卦例俱由两个乾卦和一个震卦或艮卦组成。所谓“乾之萃”,即是就此而言。可见,在“贞丈夫”时,是以“乾之萃”在“月夕”为“纯吉”。在“贞女子”的四个卦例中,都有三个坤卦出现。所谓“坤之萃”,正是就此而言。可见,在“贞女子”时,是以“坤之萃”在“月朝”为“吉”。月夕乾吉、月朝坤吉,这一情况体现了阴阳和合的思想。结合《享》和《贞丈夫女子》两节的内容看,它们是对第二十二节《乾坤运转》“凡乾,月夕吉;坤,月朝吉”之理论的举例说明。这表明“月朝”和坤卦所代表的雌性、女子是相适应的,“月夕”和乾卦所代表的雄性、丈夫是相适应的。月夕乾吉,月朝坤吉,其间蕴含的正是阴阳和合的思想。“月夕乾之萃”“月朝坤之萃”云云,即乾在月夕吉,坤在月朝吉。根据月体纳甲的说法,张文智先生认为《享》节的内容和《乾坤运转》节的“凡乾,月夕吉;坤,月朝吉”,可能反映了一种“阴阳交合互补”的思想。^[22] 这一认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与放马滩秦简《日书》刚日女子吉、柔日男子吉一样,体现的都是阴阳和合的思想。

3. 清华简《筮法》《别卦》卦序的安排,可以兼容阴阳分判、崇阳抑阴、阴阳和合的思想。《别卦》卦序横向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男卦和女卦分类,属于阴阳分判;纵向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属于阴阳交错。在整体上,横向和纵向都以阳卦乾、艮、坎、震居前,则是崇阳抑阴的体现。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先父后母,先男后女,男女交错杂居,体现的应是阴阳和合之义。当然,无论是阴阳分判,还是阴阳交错,都蕴含着崇阳抑阴的共同旨趣,表现在社会伦理上,就是男尊女卑。这是阴阳思想在伦理中的朴素表达,属于易学伦理的基本内容。又先父母后六子,父母之后紧接着是艮兑,然后是坎离、震巽,其中又有尊老爱幼之义。

总之,在清华简《筮法》中,阴阳思想不仅存在,而且有多个层面的体现,如阴阳分判、崇阳抑阴、阴阳和合。这一现象,具体展现了先秦时期阴阳思想与易卦占筮渐趋融合的历史图景。

二、五行思想

清华简《筮法》不仅将八卦与五行相配,而且将卦

① 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以“纯”为“皆”。这一点,整理者认为“亦通”,子居、冯华则径持此说。

与卦之间的五行关系作为分析卦象和判断吉凶的方法之一,这是战国易学的重要进展。^{[12]219-220[23]} 约而言之,在清华简《筮法》中,它所蕴含的五行思想,可以细分为五行归类、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三个方面。

(一)五行归类

清华简《筮法》中已经存在使用八卦之五行关系进行诠释的筮例,表明八卦和五行思想不仅已经结合,而且已经运用到实际的筮占活动中。其中,五行归类是基础,它包括八卦、四季和筮数的五行归类三个方面。

1. 八卦的五行归类。清华简《筮法》中明确言及五行的内容有第十一节《雨旱》和第二十四节《卦位图、人身图》。《雨旱》节第二例曰:


 金木相见在上,阴。水火相见在下,风。

对此,整理者根据卦位图进行解释,认为右上卦兑在西方,属金,左上卦巽在东南,属木,是“金木相见在上”的卦象;右下卦艮在东北,属水,左下卦坎在南方,属火,是“水火相见在下”的卦象。^{[3]95[6]} 这一解释,是符合筮例的实际情况的。由此可见,在清华简《筮法》中,兑卦为金、巽卦为木、艮卦为水、坎卦为火,是十分明确的信息。在卦位图中,震在东方,五行为木,颜色为青;坎在南方,五行为火,颜色为赤;兑在西方,五行为金,颜色为白;离在北方,五行为水,颜色为黑。^{[3]111-113} 将两处内容结合起来看,在《筮法》中,除乾坤两卦外,六子卦的五行都是明确的。

针对此例,子居先生从五行相克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金木相见’为金克木,兑卦属金,为阴‘在上’,即不见日之象,所以是‘阴’;‘水火相见’为水克火,艮卦属水,同样是阴,阴‘在下’,所以是‘风’”^[25]。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从卦之五行和阴阳来理解筮辞的。这一解释在前后两个卦例之间融通一致,可备一说,但他解“相见”为“相克”,似不符合《筮法》诠释的习惯。第七节《雉》“妻夫相见”,据整理者意见,是指右上卦艮之少男和左上卦兑之少女左右相对。“妻夫相见”,不谓“在上”而实为“在上”者,以前言“女在悔上”之故而“在上”之义自明。艮属水,兑属金,并非相克的关系。可见,“相见”和“相克”并不相等。因此,子居先生的这一理解是欠周全的。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对六子卦之五行属性的考察。

由上可知,按照五行属性的不同,六子卦可以分为四类,其中震巽为木,艮离为水,兑为金,坎为火。在清华简《筮法》中,这是十分明确的信息。它将八卦与五行相配,并用于诠释实践,这是与其理论体系相适应的。

2. 四季的五行归类。在清华简《筮法》中,不仅存在八卦的五行归类,而且存在四季和五行匹配的情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季的五行归类。

第一,在《卦位图、人身图》中,明显运用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令思想。其中,震居东方,五行为木,其色为青,职司为“雷”,于时为春。坎居南方,五行为火,其色为赤,职司为“树”,于时为夏。兑居西方,五行为金,其色为白,职司为“收”,于时为秋。离居北方,五行为水,其色为黑,职司为“藏”,于时为冬。可见,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与木、火、金、水“四行”匹配,而独缺“土”。这和八卦的五行归类一样,两者都缺“土”。这说明战国末期以后才出现的季夏为土说、土王四季说,当时应该尚未成功纳入清华简《筮法》的理论体系。

第二,基于八卦和四季的五行归类,以及四季运行的规律,《四季吉凶》节对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作了安排。在该节中,四季六卦之吉凶虽然不是由其五行生克关系决定的,但它将六子卦分为震巽、坎、兑、艮离四组,论其四季吉凶^[23],毕竟与五行关系密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化平先生认为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状况虽然与五行生克理论并不完全契合,但它明显是在用五行思想判断吉凶,因此六子卦的吉凶和五行密切相关。^{[12]213-214} 第十一节《雨旱》“金木相见”“水火相见”例,说明八卦与五行已存在初步配纳的情况,以五行解《易》在实际上已经存在,但由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和五行生克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看,当时五行生克的思想并未系统纳入清华简《筮法》。从卦位图四正卦排列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看,张克宾先生认为,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不是由五行生克关系决定的,而是从四时运行的角度安排的^[23],这倒是与卦位图较为契合。尽管两位先生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个强调四季吉凶和五行思想的关系,一个强调四季吉凶和季节运行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六子卦在四季的吉凶,确乎与五行思想存在一定的关联。如在《四季吉凶》中,卦的五行属性和季节相同,则为“大吉”。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体现了四季的五行归类情况。

3. 筮数的五行归类。在清华简《筮法》中,不仅有卦的四季吉凶,而且有爻的四季吉凶。所谓爻的四季吉凶,是就第二节《得》的四个特殊筮例而言的,其文曰:


 春见八,乃亦得。
 
 夏见五,乃亦得。


 秋见九,乃亦得。
 
 冬见四,乃亦得。

有学者认为,《得》的四个特殊筮例不仅反映了八、五、九、四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和筮数出现概率的高低顺序,还反映了爻的四季吉凶。^[26,27] 在《筮法》中,七、六已经具有符号的意义,而八、五、九、四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功能。李学勤先生怀疑《爻象》节八、五、九、四的次序存有深意,揣测它可能和各数自身出现的概率高低有关。^[26] 在此基础上,张克宾先生根据《得》节的上述四个筮例,认

为这一次序还应当和四季的顺序相关。具体而言,八、五、九、四和春、夏、秋、冬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春数为八、夏数为五、秋数为九、冬数为四,所以春占遇八、夏占遇五、秋占遇九、冬占遇四,主所谋之事可得。^[23]由此可以推论,八可以配春,五行为木;五可以配夏,五行为火;九可以配秋,五行为金;四可以配冬,五行为水。这样,清华简《筮法》的六个筮数,除七、六外,都可按五行归类。这一情况,与八卦、四季的五行归类一样,都因五行缺土而存在空当。从数与四时、五行、五方的配纳看,易学的发展有一个与外界不断配纳的过程,即与阴阳、五行等学说交叉的过程。这一点,与易学发展过程中诠释力不断增强,以更好地解释世界之要求是相适应的。回顾易学发展的历史,其重大发展的实现,每每都是由“学科交叉”引发的。如帛书《要》篇孔子德义优先易学思想的建构,是卜筮之易和德义思想交叉的结果。再如以《易传》为代表的战国易学,是和阴阳思想交叉的结果。又如王弼易学,则是与玄学交叉的结果。

由上可见,五行归类的思想在清华简《筮法》中是明确存在的,只是由于文本的限制,其表达程度不尽相同,如八卦和四季的五行归类相对明显、确切,而筮数的五行归类则要含蓄一些。

(二)五行相克

在清华简《筮法》中的确存在五行思想,但是否存在五行相克的观念,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妨作一试探性考察。

尽管五行相克的思想 and “男胜女”的原则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在五行说和筮数说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不妨基于五行思想确切存在这一前提,暂且承认清华简《筮法》中存在五行相克的思想。第十六节《战》曰:

䷧ ䷧ 凡是,内胜外。 ䷧ ䷧ 凡是,外胜内。^{[25]①}

在对这两个筮例的解释中,整理者未就卦象进行分析,而是仅就筮辞进行解读,认为“内”指战争中的我方,“外”指敌方。^{[31]②}这就给后来的解释留下了较大的余地。总而言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五行说。在第一例中,下面两卦为离,上面两卦为坎,而在《筮法》中,离卦五行为水,坎卦为火。在第二例中,上卦为离为水,下卦为坎为火。据此,子居先生自五行相克的角度予以分析,说第一例下卦离水克上卦坎火,即“内胜外”,第二例上卦离水克下卦坎火,即“外胜内”。同时,他根据《四季吉凶》节,将八卦分属五行:“震巽属木、坎属火、兑属金、艮属水,乾坤属土”,并总结出五行生克的诠释规律,认为它是按四位卦之五行的生克关

系判断内外孰胜。^[25]这是主张以内外卦的五行生克关系判断胜负。可见,按照五行相克的思路对这两例进行解释是行得通的。第二,筮数说。与五行说不同,王化平先生认为《战》节是利用“爻象”断吉凶,即依内外卦的数值大小判断胜负,数值大者为胜,数值小者为负。^{[12]180-182}与之相似,郭和杰先生从筮数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第一例左右两卦的六个筮数由外到内依次为四、五、六、七、八、九,代表内胜外,第二例左右两卦的六个筮数由外到内依次为九、八、七、六、五、四,代表外胜内。^[21]在具体的筮例中,王化平和郭和杰两位先生的解释也是行得通的。那么,五行说和筮数说,何者更为可取呢?

从卦例来看,左上和右上、左下和右下皆同,且第一例自上而下,第二例自下而上筮数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四、五、六、七、八、九。可见,无论从五行生克的角度,还是从筮数的角度,两种说法都讲得通,但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好回答。从五行的角度讲,在第一例中,外卦皆为坎卦,五行为火,内卦皆为离卦,五行为水,水克火,故“内胜外”;在第二例中,外卦皆为离为水,内卦皆为坎为火,故“外胜内”。问题在于,它违背了“夫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的基本原则。从“男胜女”的角度讲,第一例是外卦坎男胜内卦离女,当为“外胜内”而非“内胜外”;第二例是内卦坎男胜外卦离女,当为“内胜外”而非“外胜内”。可见,单纯从“男胜女”的原则出发,根本无法分辨两种说法的合理性。针对此例,整理者之所以不分析卦象,或许有这方面的考量。从此处筮数七、六、八、五、九、四齐全且严格按序排列的特殊性看,它应是为了凸显筮数。从《战》《成》《志事、军旅》属于一类,且后两节皆从“数”的角度进行分析看,《战》节当是从筮数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据此,符合“众胜寡”原则的筮数说应当较为合理。尽管如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排除五行说的可能性。

按照五行相克的说法,在清华简《筮法》中,五行为水的艮、离克五行属火的坎卦,五行属金的兑卦克五行为木的震、巽。其中,艮、坎、震为男卦,离、兑、巽为女卦。无论是按照《筮法》,还是《易传》设定的五行属性——艮为土、离为火、坎为水,都无法保证男卦相对于女卦的优胜地位。这与《筮法》“男胜女”的原则,以及《周易》扶阳抑阴、男尊女卑、亲君子而远小人的核心理念,在根本上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总之,清华简《筮法》无论是尚显稚嫩的五行说,还是成熟形态的五行说,与《周易》的核心精神都有着深层次的矛

① “是”,网友有鬲散人读为“征”,子居先生从之。参见暮四郎:《初读〈清华简(四)〉笔记》,简帛论坛,2014年1月8日,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155>。

盾。^[29]①所以,代表易学发展方向的《易传》必然是要摒弃五行思想的,而作为数术的《易》,为求得解释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它趋向于吸收甚至改造五行思想,而不顾忌《易传》所造成的筮占体系内部五行和阴阳的矛盾。甚至可以说,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易》为了扩大易卦的诠释空间而积极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专门的卜筮之书,对于五行思想与“男胜女”原则的矛盾,清华简《筮法》完全是可以兼容并蓄的,甚至说这正是《筮法》所需要的。

由上可知,尽管五行相克的思想 and “男胜女”的原则存在矛盾,但鉴于清华简《筮法》卜筮之书的性质,两者的共存可以视为兼收并蓄,以增强其理论张力的一种体现。

(三)五行相生

清华简《筮法》中所见卦位图与《周易》后天八卦图相比,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坎离颠倒,二是艮卦五行为水。

根据《说卦》“帝出乎震”章,后世学者认为后天八卦图是以坎为水,离为火,震、巽为木,乾、兑为金,坤、艮为土。据此,传统易学家往往按照五行相生的理论,将后天卦位图中的八卦次序排列为:坤土→兑、乾金→坎水→艮土→震、巽木→离火。在这一八卦序列中,艮土的存在令其十分尴尬。如果按照清华简《筮法》所设定的五行——艮离为水、坎为火,那么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后天卦位图的八卦次序可变为:坤土→兑、乾金→坎、艮水→震、巽木→离火。在清华简《筮法》中,坎、离的位置和后天卦位图互相颠倒,离卦居北,五行为水,坎卦居南,五行为火,其次序正好符合五行相生的理论。^{[12][171-172][28, 29]}这样,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之八卦的五行相生,与震“司雷”、坎“司树”、兑“司收”、离“司藏”之四季流转,都应是按照古人的农业生产活动规律而安排的,它们恰可构成一个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宇宙图景。

由上可知,五行思想在清华简《筮法》中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表达。大体而言,它包括五行归类、五行相克和五行相生三个方面,其中后两者体现并不明显,而五行归类的思想则明确得多。无论如何,五行思想可以和清华简《筮法》的理论体系实现兼容,这对增强其理论张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在清华简《筮法》中,明确存在体现阴阳五行思想

的内容。其中,阴阳思想蕴涵着阴阳分判、崇阳抑阴、阴阳和合三个方面的旨趣;五行思想则包括五行归类、五行相克、五行相生三个层次的内容。由于清华简《筮法》文本的局限,这些思想因素虽然没有构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恰是这些吉光片羽般的存在,初步展示了阴阳五行思想和《易》交叉融合的历史图景,代表了先秦易学发展的一个面向。

参考文献:

- [1] 刘成群. 清华简《筮法》与先秦易学阴阳思想的融入[J]. 周易研究, 2016(3).
- [2] 冯华. 《筮法》中的阴阳思想与卦象解读[M]//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第7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91-206.
- [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编. 李学勤, 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 下册[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3.
- [4] 赖少伟. 战国楚简数字卦演卦方法补议[J]. 统计与决策, 2017(23).
- [5] 李宛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筮法》研究[D]. 台中: 中兴大学, 2016: 171.
- [6] 刘大钧. 读清华简《筮法》[J]. 周易研究, 2015(2).
- [7] 柯鹤立. 巽之崇[J]. 文史哲, 2015(6).
- [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天水放马滩秦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92.
- [9] 孙占宇. 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 140.
- [10] 郑玄, 注. 孔颖达, 等, 正义. 礼记正义[M]// 十三经注疏: 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251.
- [11] 郑玄, 注. 孔颖达, 等, 正义. 礼记正义[M]// 十三经注疏: 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644.
- [12] 王化平, 周燕. 万物皆有数: 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3] 黎翔凤. 管子校注: 中[M]. 梁运华,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842-857.
- [14] 裘锡圭, 主编.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18-119.
- [15] 刘彬, 孙航, 宋立林. 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56-259.
- [16] 柯鹤立. 试用清华简《筮法》解读包山占卜记录中的卦义[M]// 简帛研究: 2016春夏卷.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9-20.
- [17] 贾连翔. 出土数字卦材料整理与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128-129.
- [18] 贾连翔. 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M]. 上海: 中西书局, 2020: 212.

① 在区分八卦的五行之象和五行之性的基础上, 梁韦弦先生认为“《说卦传》的八卦方位中是不包含五行的”, 所谓“坎水离火只是八卦之象而不是五行的水火”。就此而言, 他的这一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参见梁韦弦: 《出土易学文献与先秦秦汉易学史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74-80页。

- [19] 廖名春. 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J]. 文物, 2013(8).
- [20] 朱熹. 周易本义 [M]. 廖名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0.
- [21] 郭和杰. 清华简《筮法》全文注解(附《别卦》) [EB/OL]. (2014-10-5) [2024-11-27]. <https://www.eee-learning.com/article/3629>.
- [22] 张文智. 从出土文献看京房“六十律”及“纳甲”说之渊源 [J]. 周易研究, 2015(5).
- [23] 张克宾. 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 [J]. 周易研究, 2014(2).
- [24] 蔡运章. 清华简《卦位图》哲学思想考辨 [M]// 蔡运章, 董延寿, 张应桥, 主编. 易学考古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56-57.
- [25] 子居. 清华简《筮法》解析(修订稿上) [J]. 周易研究, 2014(6).
- [26] 李学勤. 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 [J]. 文物, 2013(8).
- [27] 贾连翔. 清华简《筮法》与楚地数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3).
- [28] 王化平. 读清华简《筮法》随札 [J]. 周易研究, 2014(3).
- [29] 梁韦弦. 有关清华简《筮法》的几个问题 [J]. 周易研究, 2014(4).

On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ought of *Shifa* in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SUN Hang^{1,2}, SHEN Xiaofeng¹

(1. Confucius Institute of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2. China Research Center of Confucian Class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Abstract: In the *Shifa* of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there is a clear content that embodies the thought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Among them, the Yin–Yang thought contains three aspects: the division of Yin and Yang, the preference for Yang over Yin, and the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ought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ve Elements, the mutual restraint of Five Elements, and the mutual generation of Five Element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ext of *Shifa*, although it hasn't presented a systematic and mature theory of th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it has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interweaving and integration of the Yin–Yang, Five Elements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in a unique form, which represents one aspect of the Yi–ology's development in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the *Shifa* in the Tsinghua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 Manuscripts; the Yin–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ideological fusion

“以赋著论”：陆机《文赋》体制探微

沈 强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 魏晋时期是一个思辨的时代、文学自觉的时代, 论体、赋体皆十分盛行, 陆机在此背景下提出了“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的论断。《文赋》体制“以赋著论”则是“论”的精微与“赋”的浏亮之结合, 其局限性在于巧而碎乱, 其优势在于既能论述理论, 又能描述体悟性的创作经验。就共时性因素而言, 《文赋》“以赋著论”之体制是魏晋文学创作繁荣与玄学思辨盛行下的产物, 也是陆机个人文体融通意识与创新意识的结果。就历时性因素而言, 与赋文体本身的兼容性及其发展相关。以赋体写论文之作, 一方面, 突破了赋体的讽谏、体物、抒情功用, 开拓了赋体的论说析理功能, 突破了以往“丽以则”的赋体审美观念, 另一方面突破了文体之间的界限, 对后世文艺思想论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陆机;《文赋》;“以赋著论”;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34-06

“赋”作为独立的文体, 产生于先秦战国时期, 兴盛于两汉, 多为体物、讽谏之作。魏晋以来, 随着玄学思辨发展, 出现了阐释玄理、表达玄思的赋作, 陆机则进一步将赋体的表现对象拓展到论文。台湾学者王礼卿敏锐注意到《文赋》“以赋著论”的体制特点, 其《文赋课微》有言:“全文以赋为论, 排纂恣肆, 波澜层叠;而论议精审, 析理入微, 调逸辞妍, 气畅味永, 诚千秋之绝调也。”^{[1]280} 王氏揭示出《文赋》既有赋体“排纂恣肆, 波澜层叠”的铺陈性, 又有论体“论议精审, 析理入微”的精微性, 正是赋、论结合, 使之达到“调逸辞妍, 气畅味永”的审美高度, 从而成为“千秋绝调”。陆机是辨体的高手, 臧荣绪称陆机“妙解情理, 心识文体”^{[2]309}, 《文赋》中亦有“十体论”, 所论文体风貌精要恰当, 可见陆机辨体意识非常强。因此, 《文赋》“以赋著论”体制是陆机有意为之, 体现了陆机的文体融通意识, 是一种体制的创新。究其原因, “以赋著论”体制得益于玄学盛行与文体创作繁荣的时代背景, 以及赋体本身的发展。就价值而言, “以赋著论”体制开拓了赋体的论说析理功能, 对后世诗论、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赋、论相通的学理基础

陆机《文赋》中明确指出赋、论两体的特征是“赋体物而浏亮”与“论精微而朗畅”, 看似特点鲜明的两种

文体, 其实有相通之处, 即对其特征的论断, 皆与玄学思维方式有关。“体物悟理”与“论理精微”所需的待物方式与思维方式相同, “朗畅”和“浏亮”都是洞鉴神明, 在阐明义理上可以相通。这也是“以赋著论”体制得以成行的学理基础。

陆机《文赋》提出“赋体物而浏亮”, 一般理解为“赋描写物象, 要求语言清朗流畅”^{[3]32}。李善注曰:“浏亮, 清明之称也。”^{[2]312}《说文》曰:“浏, 流清貌”^{[4]547}“亮, 明也”^{[4]405}。“浏亮”本义为“清朗明亮”。陆机以“浏亮”作为赋的审美特征, 实则是从“体物”这一根本特征中自然生发的美学要求, 是对“赋”本质特征的概括。体物是就内容而言。陆机之前及同时期有“感物”“睹物”“称物”“因物”“触物”“写物”“咏物”“叙物”“象物”“状物”“品物”之说, 陆机为何选择“体物”作为赋体的本质特征呢?

陆机所说的“体物”不仅仅是指“体物赋”, “体物”之“体”与“体道”之“体”一样, 有体认、体悟的意思, 强调在文章创作时人的主体地位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思想根源上来看, “‘体物’说来源于《庄子》的‘体道’说”^{[5]3}。如《知北游》篇说:“夫体道者, 天下之君子所系焉……视之无形, 听之无声, 于人之论者, 谓之冥冥, 所以论道, 而非道也。”^{[6]751}“道”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说, 所能谈论的“道”都不是真正的“道”, “道”需要以“心斋”“坐忘”“虚静”之心, 去除功名欲望, 去体

收稿日期: 2024-12-11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博士基金项目“‘二陆’文艺思想研究”(2024xjrc120)。

作者简介: 沈强(1992—), 女, 满族, 辽宁葫芦岛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魏晋文艺思想研究。

悟以达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精神境界。陆机所说体物过程伴随着思维活动与精神的愉悦，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想象，“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之情感变化。“‘体’所要求的主体心灵的清虚亮达则与‘体道’者的心态颇为契合”^{[5]4}，如陆机所说的“玄览”“罄澄心以凝思”“收视反听”。又其《演连珠》中说：“镜无蓄形，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殊之妙。”^{[7]763}“虚己应物”即虚心观察事物，很明显受到《庄子·人间世》“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6]152}的影响。陆机不仅强调创作时澄心的状态，对待客观事物时，即“体物”时，也要求虚己的心态，这样才能探究到事物变化的无穷面貌。

陆机“体物”之论除了受到道家“体道”思维方式的启发，在具体“体物”实践过程中，还受到儒家“体仁”说的影响。如《周易·乾·文言》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孔颖达疏：“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泛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8]体仁，即躬行仁道，在实践中体悟仁道，《文赋》中所说“操斧伐柯”的写作原则，“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聊宣之乎斯文”的写作动机都是在具体写作实践中的体悟。因此，陆机所说的“体物”是以虚己之状态应物，在物我交融的实践中，对事物进行细致的描绘，“由物象形貌而进入物象神理”^{[3]5}，最终体认的是事物所蕴藏的“理”，如陆机《演连珠》中所说“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6]732}。描绘事物不仅是对外在形貌的写实，而且注重挖掘事物的内在“精神”，因而尽管有铺陈事物之嫌，但赋的风格仍在“浏亮”。

“体”链接了“心”“物”“理”，使心灵与大道相通、与事物合一。“体物”以事物为主体，在铺陈写物的过程中，可以感物抒情、情触物兴、体物写志、借物发端、因物讽谏、“志因物见”^{[1]113}“托体于物，以显隐喻”^{[1]112}，最终归之于体悟人生哲理或者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规律，都可以定位为赋“体物”，因而“体物”可以涵盖“感物”“睹物”等。感物与体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感物仅仅是感性情感的抒发，而体物在抒发情感之后，还有理性的哲思。如陆机《思亲赋》抒发在岁暮肃杀的环境下对双亲的思念之情，最后体悟人生哲理“天步悠长，人道短矣。异途同归，无早晚矣”^{[7]115}。又如《叹逝赋》本为感叹亲朋故去的伤逝之作，却也抒发了“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5]184}的哲理。“体物”重在哲理、哲思、致理，这也是赋体和论体可以相通的原因之一。赋是体物明理，论是由理而议论。

体物时要求主体心灵达到清明的境界，文体风格自然清朗明亮。“清”是玄学的审美境界，如嵇康《释私论》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

情不系于所欲”^{[9]1334}“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9]1335}。可见静、虚、亮、清的关系密切，心神虚静则身体清亮，体清神正则则在体物过程中，能够窥见物理，行诸文字则风格浏亮，给人透彻清朗之感。“浏亮”审美风格同“精微”一样，皆与玄学审美相关。

《文赋》提出“论精微而朗畅”。李善注：“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吕向注：“论事得失必须精审，微密明朗，而通畅于情。”^{[5]312}可见，论是用来评议臧否的，论事得失必须精审，微密明朗，言辞、情理通畅。陆机从意、辞两方面说“论”的本质特征，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说：“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10]“精微而朗畅”意味着说理逻辑清晰、论证详实、达意明确，具有说服力与表现力。

陆机以“精微而朗畅”作为论的本质特征，是对魏晋“论”体文的深切体会。陆机以“精微”来说论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以“宜理”，体现了魏晋时期论体的创作内容的新变，不仅有“依经立义”的儒家之论，如王粲《儒吏论》；“因事说理”的政论，如陆机《辨亡论》《五等诸侯论》；还有辨名析理的玄学论，如王弼《周易略例》、嵇康《声无哀乐论》、嵇康《养生论》、向秀《难养生论》、嵇康《答难养生论》。由于玄谈对象具有抽象性、本体性，使“精微”成为玄谈、玄理的最高评价，如爱俞“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11]，王修以《贤全论》被刘惔称赞“足以参微言”^[12]，殷浩被赞为“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13]470}。还有王长史赞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13]475}可见在重视理论思辨的时代，“精微而朗畅”是对“论”的本质要求及最高评价。晋李充《翰林论》认为“论”应“研求名理”的需要而产生，创作准则是“贵于允理，不求支离”^[14]，“允理”即是精微，“不支离”即为朗畅。其后刘勰以“锋颖精密”来说曹魏论文，刘师培以“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来论魏晋论文特点，都可与陆机之说相印证。

陆机对赋体与论体特征的论断与当时的赋、论创作，以及玄学盛行的时代背景暗合。魏晋时期的赋、论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赋不仅仅是铺陈与讽谏，而且多了敷理与哲思。论不仅仅是“依经立义”，而且多了辨名析理之玄论。赋“体物”而悟理与论理“精微”一样都与玄学思维方式相关，“朗畅”和“浏亮”都与玄学审美相关，在内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文赋》“以赋著论”体制得以实行的内在学理基础。

二、“以赋著论”体制的成因

“以赋著论”体制的创造既有共时性因素，也有历

时性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就共时性因素而言,客观原因在于西晋文学创作繁荣与玄学盛行之时代背景,主观原因在于陆机个人的文体融通意识与创新意识。就历时性因素而言,在于赋体本身的发展与兼容性特征。

(一)“以赋著论”的共时性因素

就共时性因素而言,西晋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围绕着愍怀太子、张华、贾谧、石崇等贵族权臣,形成了文学集团,在宴饮集会游览之际,往往同题赋诗、清谈,促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盛景。

1. 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各种文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时人对文体体制及文体特征进行了思考与规范。文体创作的繁复性、多样性使作者突破常体,创造了“新体”“讹体”与“变体”。就“论”文体而言,现存陆机论作《辨亡论》《五等诸侯论》皆为政论,另外,《汉高祖功臣颂》《大田议》《豪士赋》诸篇也带论的性质。用不同的文体表达议论、理论可见陆机对于不同表现对象灵活选取文体的意识。《文赋》以赋体论文,是论述文章的创作,不是议论文的好坏,这里包含陆机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也体现了陆机的文体融通意识。

陆机具有文体融通意识,故而对文章体制看法较为通达。陆机在指出十种文体的本质特征后说:“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1]99}各个文体之间虽有差异,但有共同的原则“辞达理举”。因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所以描绘事物可以“因宜适变”“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方兹解释为“文之至者,变化无方”^{[1]124},何焯《义门读书记》中评曰:“二句盖亦张融所谓文无定体,以有体为常也。”^[15]文体在具体应用时,可以有所变化。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实际创作中,有兼采众体的现象,如借鉴写作手法上的“颂体敷写似赋”,风格上的融通,如“雅而似赋”“碑文似赋”“诗颂同体”“颂而似雅”,有些虽为批评之语,但也体现了各个文体之间的融通借鉴。在理论上,陆机首先肯定了文体变通,其后也有相关论述,如张融所说“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6],萧子显自称“体兼众制,文备多方”^[17],谢灵运说“文体宜兼,以成其美”^[18],刘勰《通变》篇“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19]1079}等等。《文赋》“以赋著论”体制体现了陆机文体上的变文之术及大胆创新。

2. 随着文学创作繁荣而来的是对文人的评价与比较,创作诗文不仅仅可以获得名声,还是庶族寒门文人进入仕途的佳径。“新”成为当时文才的代名词,不论是文体的新变,还是风格、辞藻的创新,都是文才与创造力的体现,追求创新成为一时风气,如刘勰所说“俪

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9]208}。为了显示文才,在文坛甚至政坛有一席之地,陆机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如其在《文赋》中说“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强调为文之创新。同时期对陆机的评价也是“多新声”,如陆云说“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而”^{[20]1112},又“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20]1089},评《祠堂颂》“新绮”^{[20]1082}。臧荣绪《晋书》也称陆机“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曲,系踪张蔡”^[21]。《文赋》“以赋著论”体制即是陆机创新意识的结果。

《文赋》“以赋著论”体制将赋体功能拓展到论文,亦得益于玄学盛行而带来的思维方式转变。玄学的主题才性之辩、言意之辩、有无之辩,都是以客观抽象概念为对象进行辩论,清谈时需要思辨之思维技巧。不管是因为“疾虚妄”也好,还是没有跻身名士群体也好,虽说关于陆机参与清谈的记录并不多,但陆机在创作上、文艺思想上明显受到玄学的影响。《文赋》从“物”“意”“文”之概念要素入手,贯穿文学创作过程,在文学批评范畴交互之中,将文学创作的各个问题论述清楚,体现了高度的抽象分析与思辨能力。赋体是魏晋时期盛行的文体,在玄学的浪潮下,刘勰总结“赋乃漆园之义疏”。虽然说东晋时期玄学对文学思想内容的影响很大,但以赋体阐释玄理、表达玄思,从正始时期就开始了,如阮籍《清思赋》《大人先生传》、嵇康《卜疑》《琴赋》、成公绥《啸赋》、庾敳《意赋》、挚虞《思游赋》、谢尚《谈赋》,这些赋作都带有理论思辨的意识,但没有涉及论文的领域。陆机论赋的本质特征为“体物而浏亮”,其敏锐注意到玄学影响下的赋体创作的新变,如明谢榛《四溟诗话》所说:“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22]陆机《文赋》以赋体论文,是对玄思赋作的继承与发展,把“文”“为文”作为客观的抽象事物,进行哲理性的描述,所使用的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与玄思赋相同,同时又是对赋体功能的拓展。以纯文学的赋体论文学创作问题,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而不是客体评论的视角,深入文学内部,探索创作的规律,体现了陆机的思辨意识。

(二)“以赋著论”的历时性因素

就历时性因素而言,“以赋著论”体制的创造还在于赋体兼容性特征以及赋体本身的发展。如宇文所安所说:“不谈赋这种文体就无法理解《文赋》。”^[23]早期赋的体制为问答体,首尾为文,中间为赋,具有辩论特征。赋体有序有乱,序可纵笔议论,乱整饬似诗,赋体结构的多元性增强了赋体的包容性、融通性。就赋本身特点而言,赋体弘丽博大、“依类托寓”^{[24]3072}。如

司马相如所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25] 赋内容广博，能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甚至相当于当时的类书。赋体以兼容性、博大性成为写论文的最佳载体。

赋体源于先秦时期诗歌与散文的混融，在其初创阶段尚未形成固定的体制与规范，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兼体”特性。这一特性使得赋体能够灵活吸纳多种文体的表现手法，从而在功用与表现对象上形成极大的张力。一方面，从文体渊源来看，赋体脱胎于《诗经》的铺陈传统与战国散文的叙事说理功能。例如，荀子《赋篇》以隐语形式说理，而屈原《离骚》则兼具抒情与铺陈，二者虽同属早期赋体，但体制迥异。这种来源的多元性，使得赋体在初创时期既非纯粹的韵文，亦非严格的散文，而是介于诗、文之间的混合形态。如余嘉锡指出“《侏诗》一篇，前后皆四言，中杂长句，其体盖在诗赋之间”^[25]。另一方面，“兼体”特性使赋体在表现功能上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汉代大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铺采摘文为主，服务于宫廷颂美；而抒情小赋如张衡《归田赋》，则转向个人情志的抒发。同一文体既能承担宏衍巨丽的叙事，又可表达个人情感体验，这种张力的形成，正是源于赋体未被单一体制所限，而是兼容诗、文之长，随时代需求而不断调整。随着赋体的发展，虽有一定的文体规范，但容易产生“破体”“兼体”“讹体”的现象。如后世与诗结合有律赋、骈赋，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以赋为诗；与文结合有文赋，如苏轼的《赤壁赋》，即是以文为赋。而陆机《文赋》“以赋著论”的体制得以确立，与赋体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兼综众体”的文体特征密切相关。

三、“以赋著论”体制之价值

“以赋著论”是《文赋》体制的特征，也是《文赋》体制的创新。如钱志熙所说：“陆氏用纯文学的赋体写论文，这种体制上的大胆创新也是《文赋》的一个显著特点。”^[26] “以赋著论”体制有独特的价值。

（一）在赋体功用上，开拓了赋体的论文析理功用

在赋体功用上，《文赋》“以赋著论”是对赋体的讽谏、体物、抒情、娱乐、博物功用的突破，开拓了赋体的论文析理功能。在陆机之前，赋的创作与赋论皆注重赋文体的讽谏作用。汉代司马迁首先肯定了辞赋委婉讽谏的政教功用，并同《诗》之讽谏类比。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论曰：“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24]^[3073] 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之赋虽有“虚辞滥说”之不足，但与《诗》一样具有

讽谏功用。东汉班固则进一步将诗作为赋的源头，故而要求赋具有诗之政治教化功用，其《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2123-24] 在班固看来，赋具有讽谏、颂美的社会作用，是《诗》的遗风余韵。王符论述诗赋的特点也以政教作用为主，其《潜夫论·务本》说：“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27] 魏晋时期，杨修继承班固之说，称：“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21748] 与陆机同时期的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28] 挚虞所说“古诗之赋”“今之赋”脱胎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内容上强调以“情义”为主，在体要方面强调“假象”“逸辞”“辩言”“丽靡”要中正恰当，不过分，过大、过壮、过理、过美则会妨碍情义的表达，对政教有害无益。陆机之前，除了赋的讽谏、赞颂功用，还论及赋的娱乐功用、博物识见功用，但没有成为主流学说。可见在陆机之前，讽谏赋论思想根深蒂固，陆机《文赋》“以赋著论”突破了赋体讽谏、赞颂、博物等功能，开拓了赋体论文功能，这是陆机的一大创举。

（二）在赋体的艺术特征上，突破了以往“丽以则”的赋体审美观念

在赋体艺术特征上，《文赋》“以赋著论”体制突破了以“丽以则”、征实为准则的赋体审美观念。汉代赋论家虽然认识到赋体宏丽博雅的文体特征，但仍以儒家“中庸”“言志”文艺观为核心价值，强调赋体符合“丽以则”“辞事相称”的审美准则。如班固以讽谏为批评原则，对于大赋之“閎衍之词”“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审美特征给予批判。魏晋时期，曹丕提出“诗赋欲丽”，赋不再作为儒家政教的附庸，不受“则”的约束和规范。但曹丕所谓“丽”，包含着赋文体的征实特征与比兴手法，如其《答卞兰教》说：“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91]^[1086] 提出赋依附类比如于实事，具有征实的特点。曹丕论屈原、相如赋说“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29]，对赋的托物喻志手法予以赞扬。左思《三都赋序》具体提出赋体之征实要求及训诂作用，“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29]。左思所谓征实,带着赋体博物功用,作赋以显示才华。可见,陆机之前虽有曹丕对赋体“丽”特征的体认,但在文体功用上限于讽谏、言志、抒情、博物,因而对赋体风格论,也限于敷陈、触类而长、弘丽等特征。《文赋》以骈俪句法,运用对偶、押韵的句式,颇具文采性,并且论文精密,是“体物而浏亮”之作,突破了赋体“丽以则”、征实的审美特征。

(三)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突破以往在政论、经论、史论中论文的藩篱,为后世以纯文学的形式论文开辟了道路

陆机之前,没有专门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文章,文论多在政论、经论、史论、序文之中,《文赋》是第一篇专门论述文学创作诸问题的文章。若单以“论”体论文,文章创作中艺术思维过程、应感之会的描述,“文逮意”过程中的体会,很难以科学的、精准的语言来谈论。而以赋体骈俪的语言、体物式的描述,可以将感性的直观感受,以优美的辞藻表现出来。既有论体的“精微”,又有赋体的艺术手法,造就了《文赋》体制的优势。如邹思明《文选尤》说:“文之品质者庀材未闳,华鲜者抽思未彻,至如此《赋》,博洽玄微,周详委曲,殆所谓探颐妙门,精穷奥业者也”“丝理秩秩,艳不伤雅。体致鳞鳞,异不浇淳。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127]“博洽玄微”“探颐妙门”“丝理秩秩”是论体的精微,“周详委曲”源于赋体的浏亮,“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是“以赋著论”达到的审美效果。《文赋》“以赋著论”体制突破了文体之间的界限,为后世以纯文学形式表达文艺思想如“以诗论诗”“以赋论赋”“以赋为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王羲之《用笔赋》、唐人窦泉《述书赋》、白居易《赋赋》、司空图《诗赋》、北宋刘攽《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赋》、刘敞《杂律赋》、南宋项安世《诗赋》、清人谭宗浚《述画赋》、吴锡麒《赋赋》、沈叔埏《文心雕龙赋》、孙纘《赋赋》、杨曾华《赋赋》、章耒《赋赋》、周如兰《诗人之赋丽以则》、万殊《赋体物而浏亮赋》等。“以赋著论”体制不必像“论”体一样,完全追求纯理性的思考,讲求逻辑的严密、论证的层层深入,可以将直觉的体验以描述的形式呈现,是论的“精微”与赋的“浏亮”的完美结合。“以赋著论”体制为陆机首创,对后世文艺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

余论

当然“以赋著论”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这

种文体上的创新,陆云评价道:“《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20][11]}《文赋》绮丽的辞藻多,但其文体貌呈现多种文体的特征,使文章不清利。陆云的批评是后世对《文赋》诟病之所在,也说明文体创新难以立即获得普遍认同。刘勰《总术》篇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19][63]}又《序志》篇称“陆赋巧而碎乱”,《文赋》泛泛论了一些琐碎的问题,对文体的论述不完备,其理论缺乏全面系统性。受制于单篇赋体,《文赋》通论了创作过程,对于具体的创作问题,没有全面展开论述。又钟嵘《诗品》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批评《文赋》缺乏“论”体的臧否评议性。另外,《文赋》以骈化对句,使得表意不明确,读者难以判断是否采用了互文见义手法,这容易导致对《文赋》的观点产生歧义。如胡适论《文赋》“其始也……抚四海于一瞬”,说“这种文章,读起来很顺口,也很顺耳,只是读者不能确定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东西”。^[30]又如张少康先生认为“体物”和“缘情”应当处理为“一种互文见义的说法”,“赋也是要‘缘情’的,诗也是要‘体物’的,不过在当时的创作中,诗歌‘缘情’更突出一些,辞赋‘体物’更突出一些”。^{[11][32]}张先生此说为精到的见解,就是否为“互文见义”而言,正是《文赋》的赋体语言带给了我们理解上的多义性。

参考文献:

- [1] 张少康. 文赋集释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2] 萧统, 编撰. 李善, 吕延济, 刘良, 等, 注. 六臣注文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3] 张怀瑾. 文赋译注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 [4] 许慎, 撰. 段玉裁, 注. 说文解字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5] 曹虹. 陆机赋论探微 [M]//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七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郭庆藩, 撰. 王孝鱼, 点校. 庄子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 [7] 陆机, 著. 刘运好, 校注. 陆士衡文集校注 [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 [8] 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5.
- [9] 严可均, 校辑. 全三国文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10] 刘熙载, 著. 王气中, 笺注. 艺概笺注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0: 126.
- [11] 陈寿, 撰. 裴松之, 注. 三国志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781.
- [12] 房玄龄, 等, 撰.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2419.
- [13] 刘义庆, 著. 刘孝标, 注. 余嘉锡, 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4] 严可均,校辑.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767.
- [15]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881.
- [16] 萧子显,撰.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729.
- [17] 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12.
- [18] 谢灵运.山居赋序[M]//严可均,辑.全宋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2604.
- [19] 詹鍈.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0] 陆云,著.刘运好,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21] 臧荣绪.晋书[M]//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84.
- [22] 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81.
- [23]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80.
- [2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5] 葛洪,辑.西京杂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 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J].求索,1996(1).
- [27] 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19.
- [28] 欧阳询,撰.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081.
- [29] 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1989:380.
- [30] 胡适.白话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122.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tyle of Fu :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Lu Ji's *Wen Fu*

SHEN 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an era of speculation and literary consciousness, on style and Fu style were very popular, under this background, Lu Ji put forward the judgment of “Fu gives the normative forms of things and is clear and bright” “Essay treats essentials and fine points, lucidly and expansively”. *Wen Fu*'s system of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tyle of Fu” was a combination of the subtlety of “Essay” and the brilliance of “Fu”. Its limitation lay in its cleverness and fragmentation, and its advantage lay in its ability to both discuss theory and describe the creative experience of comprehension. In terms of synchronic factors, the system of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tyle of Fu” in *Wen Fu* was the product of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prevalence of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It was also the contribution of Lu Ji's personal style integration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s far as diachronic factors were concerned, they were related to the compati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Fu style itself. On the one hand, it broke through the satirical, physical and lyrical functions of Fu, expanded the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functions of Fu, and broke through the previous aesthetic concept of “li and ze”. On the other hand, it broke throug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ry styles and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literary theory creation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Lu Ji; *Wen Fu*; writing literary theory in the style of Fu; style

《魏书·释老志》“旧式村坞”处标点勘误

公维章

(泰山学院 历史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 北朝后期, 由于实行均田制, 北方出现了与以往村坞不同的新式村坞, 由于对“旧式村坞”的理解有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及修订本《魏书·释老志》中“旧式村坞”处标点均有歧义, 理应论证。

关键词: 《魏书·释老志》; 旧式村坞; 塔寺; 敦煌

中图分类号: K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40-03

中华书局新修订本《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有一处标点疑似有误, 其内容如下:

凉州自张轨后, 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得其旧式, 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1]3294}

新修订版《魏书·释老志》中此段文字的标点乃承袭 1957 年版中华书局点校本, 两者完全相同。最早引用此段文字并加以标点的是汤用彤。汤先生的标点与中华书局点校本有所不同: “凉州自张轨后, 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得, 其旧式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2]397} 史苇湘亦与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同: “凉州自张轨后, 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得, 其旧式村坞, 相属多有塔寺。”^{[3]134} 汤用彤与史苇湘的标点大体一致。张鹤云在论及济南石窟与摩崖造像时, 引用此段文字的标点为“凉州自张轨后, 世信佛教, 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 得其旧式, 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4]。张鹤云的标点不符合《魏书·释老志》整篇受当时影响颇深的骈体文四字一句的特征。那汤用彤与中华书局新修订本的两种标点究竟哪种正确呢? 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记载的基础上认为, 汤用彤的标点更符合历史实情。

一、“道俗交得”之含义

中华书局点校本与新修订本“道俗交得其旧式”殊不可解。从语法角度分析, “其”字指“敦煌”, “敦煌旧式”殊不可解; “其”字若指“道俗”, 则“道俗旧式”亦不可解。需对“道俗交得”“其旧式”及“村坞”的内涵加

以考察, 才能准确地标点此段文字。

张弓研究汉唐佛寺时, 引用此段文字并对其中的“旧式”与“道俗交得”加以解释: “《魏书·释老志》曰: 敦煌地接西域, 道俗交得其旧式, 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所谓‘旧式’, 即指‘塔寺’; ‘道俗交得’指僧寺和民间精舍皆取塔式。敦煌郡在凉州西端, 必是西域‘旧式’先达之地。”^{[5]159} 张先生的解释恐有误, “旧式”是修饰“村坞”的, 并非指“塔寺”; “道俗交得”亦非指僧寺和民间精舍皆取塔式; 既然此“塔式”为“旧式”, 那“新式”为何? 据宿白考察, 魏晋南北朝隋代的佛寺布局沿袭印度佛寺布局, 佛殿围绕在塔的周围, 从唐代开始, 演变为以佛殿为寺院的主要建置, 佛塔被移出寺院中心位置。^[6] 北齐魏收编撰《魏书》时并无所谓的“新式”塔寺, 所以张先生的解释并不正确。

“道俗交得”为何意?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 “神龟元年夏, 光表曰: 如闻往者刺史临州, 多构图寺, 道俗诸用。”^{[1]1625} “图”者“佛图”, “图寺”即“塔寺”, 乃“道俗”共用。《魏书》卷九〇《冯亮传》: “延昌二年冬, 因遇笃疾……数日而卒……乃焚于山。以灰烬处, 起佛塔经藏……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1]2091} “山中道俗”共同“营助”佛塔, 则“道俗”乃指出家僧人及在家佛教信徒, 两种不同身份的佛教四众弟子共同参与营造塔寺等佛事活动, 故可称为“道俗交得”。另外, 《后汉书》第一一三《郡国志·五》“敦煌”条之刘昭注引《耆旧记》“水有县(按: 应为‘悬’)泉之神, 山有鸣沙之异, 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7]3521} 此“华戎所交”与“道俗交得”之“交”含义相同, 有交织、交融之义。

收稿日期: 2025-01-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山东佛教石经收集、整理”(16BZJ020)。

作者简介: 公维章(1970—), 男, 山东沂源人, 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出土文献学。

二、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村坞”

“村坞”乃汉魏两晋南北朝及其之后野外聚落“村”与“坞”的合称。“村”的名称及其组织形式在东汉后期已经出现,是分布于野外的一种聚落。至南北朝时期,“村”逐渐取代其他聚落名称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称谓。^[8]“坞”亦出现于东汉后期。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面对中原战乱和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内徙,一些地方豪强和乡村居民纷纷修筑坞壁以自保,魏晋时期的坞壁,除了具有军事色彩和防御功能外,还具有纠合、聚集宗族、乡民进行生产、自治的功能。在和平年代,“坞”渐渐演化为“村”,“村坞”合称的例子在魏晋时有所见。^[9]

《晋书》卷八九《麹允传》:“允性仁厚……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7]2308}《晋书》卷一二〇《李特载记》:“蜀人危惧,并结村堡(坞),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7]3028}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相州刺史李神轨闭门自守,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荣启求讨之。”^{[1]1786}《魏书》卷八七《孙道登传》:“永安初,为萧衍将韦休等所虏,面缚临刃,巡远村坞,令其招降乡曲。”^{[1]2050}

从以上引文可知,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村坞聚落。敦煌中古时期的聚落形态有三变:自东汉至北魏太和年间均田制实行之前,为传统的村坞;均田制实行后,不设村坞,民多散居;隋炀帝之后,转而变为“百姓多悉居城”^[10]。

据考古资料,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各住宅都向南或稍偏东、西开门,互不连接,排列的也无次序。各住宅间的距离,近的15米,远的约30米或更远些”^[11]。河南内黄三杨庄西汉、东汉之交的聚落遗址,“户与户之间并不紧连,中间均有距离25米到50米农田毗地相隔”^[12]。《汉纪·孝文皇帝纪》下卷第八“荀悦曰:……本志曰:古者……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救”^{[13]115}。八家共用20亩庐舍,平均每家为2.5亩,每家庐舍内不仅有居住及放杂物的房舍,还应有圈养牲畜的畜舍及菜地,故每家每户的相隔距离与考古资料相一致。由于未见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敦煌自东汉至北魏中期的村落形态或大抵如此。

三、北魏均田制实施后的“旧式村坞”

北魏太和年间实行均田制后,村坞的聚落形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均田制之前的“旧村”与均田之后的

新式“散居”村坞。“散居”村坞形态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S.613v《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帐、籍》^{[14]317-341}得知。此为残件拼接而成,记录了西魏时期敦煌居民的授田情况,有四户尚完整,即刘文成、侯老生、叩延天富、王皮乱,所授田地皆在舍(宅)周围,便于就地耕种,兹据此分析其居所形态。刘文成家(户)分得麻田一段10亩舍西二步,正田一段20亩舍东二步;侯老生麻田三段25亩,一段10亩舍南一步,一段5亩舍西三十步,一段10亩舍西一步,正田三段38亩,一段20亩舍西五步,一段10亩舍南一里,一段8亩舍南十步;叩延天富麻田二段15亩,一段10亩舍西一步,一段5亩舍西二十步,正田一段10亩舍东二步;王皮乱麻田二段15亩,一段10亩舍东二步,一段5亩舍西一里,正田一段7亩舍西二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亩约当今0.97亩^[15],与现在差别不大,则四家周边的邻居距离大约百米以上,正所谓“散居”状态。与此新式“散居”村坞相比,均田制实行之前的村坞称为“旧村”,“旧村”之名散见于北朝史籍中。

《魏书》卷四三《房崇吉传》:“自皇兴元年(467)二月至四月,粮矢俱尽,崇吉突围出走,遁藏民舍,母妻见获。道固遣治中房灵宾慰引之,崇吉不肯见道固,遂东归旧村,阴募壮士,欲以偷母,还奔河南。”^{[1]1077}

《资治通鉴》卷一三五“永明元年(483)五月”条:“车骑将军张敬儿好信梦。初为南阳太守,其妻尚氏梦一手热如火;及为雍州,梦一胛热;为开府,梦半身热。敬儿意欲无限,当谓所亲曰:‘吾妻复梦举体热矣。’又自言梦旧村社树高至天,上闻而恶之。垣崇祖死,敬儿内自疑,会有人告敬儿遣人至蛮中货易,上疑其有异志。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朝臣皆预,于坐收敬儿。”^{[16]4255}

《魏书》卷五八《杨侃传》:“后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事在孝昌三年,527年),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除侃镇远将军……侃白稚曰:‘……修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率众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1]1402}

《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记:“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陘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亭侧……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疆余聚,亢仇旧是饁飧亭,悉属上艾。”^{[17]226}

庾信《庾子山集》卷十三“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西临砥柱,东背轘辕,河鸣阳坂,山响苏门,翔禽歌嘒,流涧弦喧,度河余兽,移关旧村,昔为畿服,今成塞垣。”^{[18]721}

尽管上引《魏书》房崇吉本传及《资治通鉴》张敬儿梦中所言时间皆在北魏实行均田制之前,但所据资料应为均田制之后所搜集,属于追叙,此在史籍中较为常见,

北魏之前“旧村”称呼未见于史籍,故可理解为均田制后新式“散居”村坞之对称。

隋代之前敦煌村坞聚落形态之变迁,亦见于《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其年(开皇二年),突厥复犯塞……吐谷浑复寇边……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稀……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19][352]}“(陇右)彼俗不设村坞……民虽散居”正说明陇右地区之一的敦煌,北魏均田制实行之前设立“旧式”村坞,均田制实行后,村民“散居”,此种状况,至北齐史家魏收编撰《魏书》时亦应如此。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东汉时即称“华戎所交一都会”,东汉时来内地之西域高僧皆经敦煌,敦煌为最早浸染佛教之地;西晋时,号称“敦煌菩萨”之竺法护即在敦煌译经传道,法护之弟子竺法乘亦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十六国时期,又有“乐傅法良发其宗”;至北魏时,敦煌已塔寺林立。由于北魏实行均田制,耕作之民众处于“散居”状态,再加上佛教功德转变为开窟造像为主,塔寺营建减弱。再有《魏书·释老志》的文体深受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的影响,故《魏书·释老志》涉及敦煌的此段文字应标点为:

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参考文献:

- [1] 魏收,撰.魏书[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 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J].敦煌研究,1982(1).
- [4] 张鹤云.济南石窟及摩崖造像[J].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1).
- [5]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6] 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87-311.
- [7] 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 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J].史学月刊,2006(12).
- [9] 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城市与聚落的变迁[J].东岳论丛,2018(3).
- [10] 宋翔.唐宋时期沙州的城市形态与居住空间[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1).
- [11] 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J].考古学报,1957(1).
- [12] 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J].古今农业,2008(3).
- [13] 荀悦,著.汉纪·孝文皇帝纪(下卷):第八[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4]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三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5] 陈昌远.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亩有多大[J].史学月刊,1958(11).
- [16]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7]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8] 庾信,撰.倪璠,注.庾子山集注[M].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9] 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Punctuation Erratum on the Old Village and Castle in *Weishu Shilaozhi*

GONG Weizhang

(School of History,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21, China)

Abstract : In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qual field system (均田制), a new village and castle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village and castle 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China. Due to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old village and castle”, the punctuation of the “old village and castle” in the collation edition and the revised *Weishu Shilaozhi*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was wrong, which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 *Weishu Shilaozhi* (《魏书·释老志》); old village and castle; pagoda temple; Dunhuang

不同版本系统《录鬼簿》剧目书写差异研究

杨晨阳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现存三个版本系统的《录鬼簿》在剧目书写上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了金元杂剧的活态发展和不同时期人们对金元杂剧的认知差异。作者与后世传抄刊刻者的加工修订、剧目著录标准、时代的发展使得不同版本系统《录鬼簿》剧目名称书写多有不同, 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则是金元杂剧艺术体制与演出表演形态的多样性。

关键词: 《录鬼簿》; 版本; 剧目书写差异; 题目正名; 艺术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43-09

王钢将现存《录鬼簿》版本按内容详略分为简本、繁本、增补本三个系统。简本以明钞《说集》本和孟称舜刻本为代表, 繁本以清尤贞起钞本和曹寅刻本为代表, 增补本即明天一阁钞本。^{[1][9]}这三个版本系统的《录鬼簿》在体例、内容、文字、版式等方面多有差别, 尤其是剧目名称的书写差异较大, 本文拟从金元杂剧艺术本体出发探究造成差异的原因, 以深化我们对金元杂剧的认识。

一、剧目书写差异表现概况

简本系统《录鬼簿》不分卷, 所录作家数目较少, 共 113 人(《说集》本脱 2 人, 孟本脱 3 人), 传记较为简略。作家共分 6 类, 所录剧目共计 389 种。

繁本系统《录鬼簿》分为上下两卷, 所收作家共 152 人, 传记也较为详细。类别比简本系统多出第七类“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 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剧作家的排列顺序, 大体以所作剧目多寡为序。所录剧目共计 451 种。

增补本系统《录鬼簿》是明初戏曲家贾仲明增补的《录鬼簿》, 赵万里在《〈录鬼簿〉校注提要》中曾言其为明正德年间抄, 传世增补本皆出于此。所谓增补, 是指贾仲明增补的 80 首吊词, 无名氏在《录鬼簿》剧目下增注的题目正名, 以及书后所附《录鬼簿续编》。除此之外, 它仍是一部完整的《录鬼簿》原本。增补本分上下两卷, 收录的作家数目与繁本近, 共 151 人(传本衍元好问 1 人), 其与繁本系统多有互补。收录作家类别分为 3 类,

剧目著录共计 418 种。

不同版本系统的《录鬼簿》中载录的剧目数量不同, 同一种剧目在不同版本系统的名称著录亦多有不同。简本系统《录鬼簿》除部分剧目著录全名外, 其他剧目多以三字或四字简名格式著录; 繁本系统《录鬼簿》除部分剧目著录简名外, 多以全名著录; 增补本系统《录鬼簿》中剧目或仅以三字或四字简名著录, 或除著录剧目简名外, 又于剧目简名之下著录该剧目的题目正名, 题目正名的书写形式也各有不同, 从句数上可分一句和两句两种情况, 从每句的字数上又可分为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四种情况。

同一种剧目的名称不仅在诸种版本系统中存在着书写差异, 在刊本中的著录也与诸本《录鬼簿》存在着差异。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收录的 30 种杂剧为例, 除《霍光鬼谏》《小张屠焚儿救母》两剧不见于现存诸本《录鬼簿》外, 其余 28 种剧目均著录于其中。《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大部分剧目和繁本系统《录鬼簿》所载录名称相同, 但亦存在著录名称介于简名和全名之间的情况, 如《风月紫云亭》《公孙汗衫记》《萧何追韩信》和《张千替杀妻》; 还有简名与全名混用的情况, 如《赵氏孤儿》和《东窗事犯》。《元刊杂剧三十种》在标注的题目正名上与增补本系统《录鬼簿》在字句内容、字句数量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如表 1 所示。

剧目名称书写的差异以及简名、全名的混合使用是对于金元杂剧发展状态的一种活态反映, 体现了人们对剧目名称使用的标准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规范性, 同时剧目名称书写的变化也折射出金元杂剧剧目

收稿日期: 2024-11-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戏曲评点整理与研究”(18ZDA252)。

作者简介: 杨晨阳(1999—), 男, 安徽界首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

表 1 《元刊杂剧三十种》 ^① 与不同版本系统《录鬼簿》 ^② 著录剧目名称对照表				
作者	《元刊杂剧三十种》著录 剧目名称	简本系统著录 剧目名称	繁本系统著录 剧目名称	增补本系统著录剧目名称
关汉卿	关张双赴西蜀梦	双赴梦	关张双赴西蜀梦	双赴梦 [荆州牧阆州牧二英魂,关云长张翼德双赴梦。]
关汉卿	闺怨佳人拜月亭	拜月亭	闺怨佳人拜月亭	拜月亭 [闺怨佳人拜月亭]
关汉卿	关大王单刀会 [乔国老谏吴帝,司马徽休官职;鲁子敬索荆州,关大王单刀会。]	单刀会	关大王单刀会	单刀会 [鲁子敬索荆州,关大王单刀会。]
关汉卿	诈妮子调风月 [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	调风月	诈妮子调风月	诈妮子 [双莺燕暗争春,诈妮子调风月]
高文秀	好酒赵元遇上皇 [丈人丈母狠心肠,司公倚势要红妆;雪里公人大报冤,好酒赵元遇上皇。]	好酒赵元遇上皇	好酒赵元遇上皇	遇上皇 [好酒赵元遇上皇]
郑廷玉	楚昭王疎者下船	疎者下船	楚昭王疎者下船	疎者下船
郑廷玉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疎财汉典孝子顺孙,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冤家债主	看钱奴冤家债主	冤家债主 [贪财汉空使幸劳神,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马致远	泰华山陈抟高卧	陈抟高卧	太华山陈抟高卧	陈抟高卧 [西华山陈抟高卧]
马致远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为神仙休了脚头妻,菜园中摔杀亲儿死;王祖师双赴玉虚宫,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马丹阳	王祖师三度马丹阳	马丹阳 [王祖师重创七真堂,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武汉臣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举家妻从夫别父母,卧冰儿祭祖发家私;指绝地死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老生儿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老生儿 [指绝地苦劝糟糠妇,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尚仲贤	尉迟恭三夺槊 [齐元吉两争锋,尉迟恭三夺槊。]	三夺槊	尉迟恭三夺槊	三夺槊 [齐元吉两争锋,尉迟恭三夺槊。]
尚仲贤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 [张子房附耳妬隋何,汉高祖濯足气英布。]	无	汉高祖濯足气英布	无
纪君祥	赵氏孤儿 [韩厥救捨命烈士,程婴说妬贤送子;义逢义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冤报冤	赵氏孤儿 [义逢义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
石君宝	风月紫云亭 [灵春马适意误功名,韩楚兰守志待前程;小秀才琴书青琐帙,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无	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紫云寺 [韩秀才诗礼青云路,诸宫调风月紫云寺。]
张国宾	公孙汗衫记 [马行街姑侄初结义,黄河渡妻夫相抛弃;金沙院子父再团圆,相国寺公孙汗衫记。]	汗衫记	相国寺公孙汗衫记	汗衫记 [金山院父子再团圆,相国寺公孙汗衫记。]
张国宾	薛仁贵衣锦还乡 [白袍将朝中隐福,黑心贼雪上加霜;唐太宗招贤纳士,薛仁贵衣锦还乡。]	薛仁贵衣锦还乡	薛仁贵衣锦还乡	衣锦还乡 [张仕贵赖功治罪,薛仁贵衣锦还乡。]
孟汉卿	张鼎智勘魔合罗	魔合罗	张鼎智勘魔合罗	魔合罗 [曹司屈推货郎汉,张鼎智勘魔合罗。]
王伯成	李太白贬夜郎	贬夜郎	李太白贬夜郎	贬夜郎 [李太白贬夜郎]
岳伯川	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 [吕洞宾度脱李岳]	铁拐李岳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铁拐李岳 [韩魏公潛托病曹司,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狄君厚	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火烧介子推	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介子推 [火烧介子推]
孔文卿	东窗事犯 [岳枢密为宋国除患,秦太师暗结勾反间;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东窗事犯	秦太师东窗事犯	东窗事犯 [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杨梓	霍光鬼谏 [长安城霍山造反,海昏县废王遭难;长信宫宣帝登基,承明殿霍光鬼谏。]	无	无	无
宫天挺	死生交范张鸡黍	范张鸡黍	死生交范张鸡黍	范张鸡黍 [第五伦举善荐贤,死生交范张鸡黍。]
宫天挺	严子陵垂钓七里滩 [刘文叔醉隐三家店,严子陵垂钓七里滩。]	钓鱼台	严子陵钓鱼台	钓鱼台
郑光祖	辅成王周公摄政 [说武庚管叔流言,辅成王周公摄政。]	周公摄政	周公辅成王摄政	周公摄政 [辅成王周公摄政]
金仁杰	萧何追韩信 [霸王垓下别虞姬,高皇亲挂元戎印;漂母风雪叹王孙,萧何月夜追韩信。]	追韩信	萧何月夜追韩信	追韩信 [萧何月下追韩信]
范康	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吕纯阳显化沧浪梦,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无	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竹叶舟 [吕洞宾显化沧浪梦,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无名氏	诸葛亮博望烧屯 [曹丞相发马用兵,夏侯惇进退无门;关云长白河放水,诸葛亮博望烧屯。]	无	无	博望烧屯 [关云长白河放水,诸葛亮博望烧屯。]
无名氏	张千替杀妻 [悍妇贪淫生恶计,良人好义结相知;贤明待制翻疑狱,鲋直张千替杀妻。]	无	无	替杀妻 [贤明待制翻疑狱,刎头张千替杀妻。]
无名氏	小张屠焚儿救母 [炳灵公府君神怒,速报司梦中分付;王员外好贿贪财,小张屠焚儿救母。]	无	无	无

① 《元刊杂剧三十种》以郑骞校订的《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为主,同时参考了徐沁君校点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和宁希元校点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本表中的《录鬼簿》著录剧目引自王钢校订本,见参考文献[1]。

内容和形态等方面的变迁以及不同时期人们对金元杂剧的认知差异。

二、剧目书写差异解读

简本系统《录鬼簿》多以剧目简名著录,是比较接近于钟嗣成《录鬼簿》成书后第一次修订本原貌的版本。元代时杂剧繁荣,人们对剧目的人物剧情都比较了解,对剧目名称的使用比较随意,用简名来称呼也是自然而然的,比如夏庭芝在《青楼集》中所举的剧目:《伊尹扶汤》《比干剖腹》《伯瑜泣杖》《剪发待宾》《杀狗劝夫》《磨刀谏妇》《田真泣树》《赵礼让肥》《管鲍分金》《范张鸡黍》《樊事真金篦刺目》《菊花会》,多以简名而非全名著录,这与简本系统《录鬼簿》剧目名称著录情况相类。周德清《中原音韵》中提到的《刮王莽》《乐昌分镜》《周公摄政》《岳阳楼》《登楼》《西厢》《切鲙》《金山寺》等剧目,也大多用二至四字不等的简名。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中载录剧目名称的方法也和简本系统《录鬼簿》方式相似,多使用简名。宋《官本杂剧段数》与金《院本名目》载录剧目名称大多使用简单标目的做法,这种做法同样对于以宋金杂剧、院本为发展基础的金元杂剧产生了深刻影响。金元杂剧剧目也多为简标名目,比如在金《院本名目》中出现的《藏闾会》《牵龙舟》《芙蓉亭》《庄周梦》《红梨花》等剧目是以简单标目的形式被著录于简本系统中,朱权的做法可以看作是对前人剧目名称使用方法的沿袭。

繁本系统《录鬼簿》多用剧目全名著录。在元代时既有用简名著录剧目者如简本系统《录鬼簿》和《青楼集》等书,也有使用全名著录剧目者如《元刊杂剧三十种》,因此不能就此判定繁本系统《录鬼簿》中剧目名称载录方式的变化是后人所为而非钟嗣成顺应当时金元杂剧实际发展的变化所作出的改动。繁本系统《录鬼簿》中载录的曲家和剧目数量的增多,以及使用全名而非简名对剧目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都说明钟嗣成在对剧目进行著录时是不断增补的,他在搜集剧目资料时既受到当时纸质化演剧文本(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以全名著录剧目的做法)的影响,也受到当时戏班广告宣传的影响,这些因素合力不断增强他由列简名改为列全名的修订意识。从钟嗣成给剧曲作家写的吊词可知,钟嗣成注重文辞之美和曲文之妙,具有一定的文人意识,他使用全名对剧目进行著录既体现了他对故事内容完整性的重视和对剧目名称形式整饬的追求(全名有助于读者和观众对剧情人物等方面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是钟嗣成对当时戏班、书坊刊刻以全名作为宣传方式的顺应和吸纳,因而繁本系统《录鬼簿》以全名对剧

目进行著录不能仅仅看作是钟嗣成的个人行为。

增补本系统《录鬼簿》在简名下又标注剧目的题目正名,题目正名应当是其他传抄者如贾仲明等人增补的,而非出自钟嗣成之笔。

三、“题目正名”考

厘清增补本系统中题目正名出现的原因,首先应对“题目正名”的含义和流变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梳理。

在金元杂剧的剧末或是剧首处大多会有两句或四句对称的话,被称为题目正名,一般来说题目在前,正名在后。《元刊杂剧三十种》收录的三十种杂剧中,有题目、正名或题目正名者凡二十二种。连用“题目正名”者有十二种,单独使用题目者有四种,单独使用正名者有六种。正名有一句和两句两种情况,“题目”与“正名”两者不存在对立或隶属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人们可以从题目正名中了解该剧目的主要人物情节和基本故事内容,也可以从中获悉剧目全名和简名。从现存的各个金元杂剧刊本可以看出,题目正名有总结剧情、品评人物的作用。

有些剧目题目正名中的末句体现了主要人物的性别,可以作为我们划分剧本为旦本或是末本的依据,如关汉卿《谢天香》题目正名为“柳耆卿错怨开封主,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谢天香是全剧的主要角色,为正旦,因此该剧为旦本;高文秀《双献头》题目正名为“孙孔目上东岳,黑旋风双献头”,李逵是全剧的主要角色,为正末,此剧为末本。但也有剧目的题目正名末句并未出现反映主要人物性别的句子,我们无法判断该剧目为旦本抑或末本,故而在判断剧目属于旦本还是末本时要结合作品本身的情况。

《夷坚丁志》卷二《班固入梦》条载“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12];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第四出中“今早挂了招子”^[1227];杜善夫《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中“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122];无名氏所作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中“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4117];夏庭芝《青楼集·小春宴》中“勾栏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15]38}。从以上材料可知,“纸榜”(或称“招子”)因为颜色多样,又被称为“花招”。说话和南戏、杂剧等艺术形式都有这种宣传方式,可以在节目演出之前张贴以吸引观众,还可以在招子上写剧目名称,供观众点戏,似乎有广而告之的作用。但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题目正名是写在招子上做广告宣传的。按理说广告应该写在一本戏的最前面如南戏的题目正名,才能够引人注目,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而金元杂剧题目正名位于剧

末很难体现出广告意义。招子的面积不大,无法容纳题目正名这么多的文字,不过书写演出剧目名称倒是有可能的。书写文字内容过多的题目正名不仅不符合广告效益,也不利于观众获取重点信息。

从《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我们可以得知题目正名并不是金元杂剧的固有内容,其中八种杂剧没有题目正名,即使有题目正名的二十二种杂剧也分为有题目无正名、有正名无题目、题目正名三种情况。通常在杂剧第四折的结尾处标有“下”“散场”等字样说明杂剧演出结束,这样演员或乐工在演出结束时就没有念诵题目正名的必要和可能了,很多杂剧结尾时剧中角色的“词云”和“断语”等末两句台词和题目正名中的内容并无二致,同样的内容在演出结束时重复两次,这是不符合演出常理的。另外民间戏班演出条件不佳,演员也不太可能会在演出结束时念诵题目正名。

题目正名属于文本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元代时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范形式,也不是剧本固定的组成部分,是由剧作家、艺人、刊刻者等共同创作出来的,在没有直接和完整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认定它是舞台演出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更不能判定在演出开始前抑或演出结束时由谁诵念或演唱。

“题目”“正名”没有主次、虚实、从属之分,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不应该将其割裂开来。从《元刊杂剧三十种》我们可得知元刊本中题目正名的位置是位于剧末的,且对题目正名的处理比较随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规范标准,在形式、字数等方面都不太稳定。后来随着文人把金元杂剧剧本作为案头文学处理和刊刻者对杂剧题目正名改订和增补,原本随意多元、富有弹性的题目正名才变得整齐划一。

但用简名容易引起相近似剧目的混淆,尤其是在杂剧演出相较于元代不是特别频繁的明代,人们便在记录简名的基础上增加题目正名,从而使得某些名称相似的剧目能够得到区分,增补本系统《录鬼簿》中对剧目题目正名的著录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但由于传抄者搜罗不全和所见有限(这种失察和疏漏体现在增补本系统《录鬼簿》“诸公失载传奇名氏”中),及其所能接触到的刊印本的刊印情况各异,使得剧目的题目正名体例不一,有的题目正名俱全,有的只有题目或只有正名,在句数和字数上也多有不同,这反映了题目正名由多元随意到标准规范化是有一个过程的。

同一剧目在不同版本系统《录鬼簿》中之所以会产生名称差异,和杂剧的演出体制也是有关的。我们在研究题目正名时应该注意,有些题目正名存在混淆和歪曲剧中人物和剧情内容的情况,这和次本、二本的功能有关。

“次本”和“二本”都对名同实异即名称相同而表演模式、故事剧情、演出套路等方面不同的剧目有标识的作用。但由于作为反映概括故事剧情的题目正名会随着实际演出内容发生变动,且同名剧目存在演绎方式的多样性和类如“次本”“二本”标识的简略性,而文本刊刻者和传抄者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导致在整理剧目题目正名的过程中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另外标有“次本”“二本”等注文的剧目文本大多亡佚,增补本《录鬼簿》中著录的剧目题目正名和现存文本所记录的剧目如《三战吕布》《倩女离魂》《沙门岛张生煮海》《东窗事犯》等题目正名也存在剧情繁简和关目演绎方面的差异(见表 2)。《倩女离魂》现存文本有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本、《柳枝集》本、《元曲选》本,前两个版本所著录剧目题目正名相同,《元曲选》本题目正名则相对简略,且在文本上也存在差异,《元曲选》收录的多为经过臧懋循改动后的文本。《沙门岛张生煮海》文本现存《元曲选》本和《柳枝集》本两个明刊本,这两个版本虽然题目正名相同,但在第三折的演绎上有很大区别,若不细察文本而只依据题目正名会忽略二者实际内容上的差异。

表 2 增补本《录鬼簿》标有“次本”“二本”的剧目与存本著录名称对应表^①

作者	增补本中剧目名	存本剧目名
武汉臣	三战吕布 [元 帅府单气张飞,虎牢关三战吕布。]	三战吕布 [辕门外单气张飞,虎牢关三战吕布。]
郑光祖	倩女离魂 [次本]	1. 迷青琐倩女离魂 [凤阙诏催征举子,阳关曲惨送行人;调素琴书生写恨,迷青琐倩女离魂。] 2. 迷青琐倩女离魂 [调素琴王生写恨,迷青琐倩女离魂。]
李好古	沙门岛张生煮海 [二本]	张生煮海 [石佛寺龙女听琴,沙门岛张生煮海。]
孔文卿	东窗事犯 [二本杨驹儿按。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东窗事犯 [岳枢密为宋国除患,秦太师暗结勾反间;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证东窗事犯。]

另外,由于钟嗣成和其他传抄修改者见闻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同名剧目都进行类如“次本”和“二本”的标注,因此我们在研究题目正名前应将剧目题目正名与文本实际内容结合起来进行考量。

四、剧目书写差异根源

金元杂剧继承和发展了宋金杂剧、院本的表演、化

^① 钟嗣成,撰.佚名,续.王钢,校订.《录鬼簿》校订[M].北京:中华书局,2021;袁世硕,张倩倩,都刘平.《录鬼簿》及《续编》校订笺释[M].济南:齐鲁书社,2021.

妆、脚色、音乐伴奏、剧目等多种艺术内容和体制。金元杂剧沿袭发展了宋金杂剧、院本的演出形式,且有大量文人对演剧文本进行整理与编创。宋金杂剧、院本一般为分段演出,如《东京梦华录》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6]85} 金元杂剧的演出形式通常表现为四折一楔子,分折演出形式便是在宋金杂剧、院本的分段演出基础上发展而来。从出土的众多戏曲文物如杂剧雕砖、戏俑等可以看出宋金杂剧、院本和金元杂剧在服饰化妆和动作表演等方面并无多少差异,宋金杂剧、院本演员在表演中脸敷粉墨的做法在金元杂剧中每每可见,而且在乐器伴奏方面也多沿袭宋金杂剧、院本。^{[7]329} 金元杂剧许多剧目也是从宋金杂剧、院本移植改编加工而来的,诸本《录鬼簿》中载录的剧目与“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剧目”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说明此论不虚,如表3所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杂剧之渊源》提到有三十二种金元杂剧源于宋金杂剧、院本^{[8]71-72},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则认为有一百零二种金元杂剧可能脱胎于宋金杂剧、院本^{[9]255-261},胡忌《宋金杂剧考》又有一些新的发现^{[10]153-155}。诸本《录鬼簿》和其他书目著录的剧目名称中有带“旦”“末”“末泥”者如关汉卿《切脍旦》、李致远《还牢末》、吴昌龄《货郎末泥》等,也是受到了宋金杂剧、院本剧目命名方式的影响,是对宋金杂剧、院本剧目的再度创作,如“官本杂剧段数”中有《孤夺旦六么》《双旦降黄龙》《老姑遣姐》等剧目,“院本名目”中有《货郎孤》《酸孤旦》《毛诗旦》《偌卖旦》等剧目。美国哈佛大学的伊维德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奚如谷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戏剧:1100—1450》一书中揭示了金元杂剧与宋金杂剧、院本之间的“形态连续性”特征。^{[11]667} 奚如谷对冯沅君提出的元代音乐剧的兴起使宋金杂剧消亡了的论断不认同,他结合宋金元时期的文学、演剧文本和最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认为,宋金杂剧并没有消亡,而是在继续发展完善,宋金杂剧在诸宫调的滋养下发展成为金元杂剧,宋金杂剧、院本和金元杂剧在演出形式上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金元杂剧本质上是宋金杂剧、院本连续发展的产物。^{[12]76} 金元杂剧与宋金杂剧、院本之间的关联在元代文献的记载中也说得十分清楚,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说:“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浑。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5]7}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也有类似说法:“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浑、词说,金

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13]276} 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8]63},则肯定了宋金杂剧、院本的艺术成就。

表3 《录鬼簿》载录剧目与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有关剧目对应表^①

宋官本杂剧剧目	金院本剧目	《录鬼簿》载录剧目
	范蠡	关汉卿:进西施 赵明道:范蠡归湖
	蝴蝶梦	关汉卿:蝴蝶梦[开封府单问后姚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牵龙舟	关汉卿:牵龙舟 庾天锡:江月锦帆舟
	刘盼盼	关汉卿:刘盼盼闹衡州
	断上皇	关汉卿:宋上皇御断姻缘簿 郑廷玉:宋上皇御断金凤钗
	武则天	关汉卿:王皇后 关汉卿:担水浇花旦
烧花新水	烧花新水	李文蔚:卢亭亭挑水浇花旦
	藏闾会	关汉卿:藏闾会
	变柳七鬟	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戴善甫:柳耆卿诗酒翫江楼 杨景贤:柳耆卿诗酒翫江楼
裴少俊伊州	鸳鸯筒 墙头马 广寒宫 月夜闻箫	白朴:墙头马上 白朴:幸月宫 郑光祖:月夜闻箫
崔护六么 崔护道遥乐		白朴:崔护谒浆 尚仲贤:崔护谒浆
	衣锦还乡	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 无名氏:冻苏秦衣锦还乡
	襄阳会	高文秀:刘先主襄阳会
	水母	高文秀:锁水母 须子寿:澹水母[泗州大圣澹水母]
霸王剑器 霸王中和乐 诸宫调霸王 入庙霸王儿 单调霸王儿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补塑霸王 霸王草	高文秀:禹王庙霸王举鼎 张时起:别虞姬 顾仲清:火烧纪信
病郑道遥乐	病郑道遥乐	高文秀:打瓦罐 石君宝:曲江池
	芙蓉亭	王实甫:芙蓉亭
莺莺六么		王实甫:西厢记 王实甫:贩茶船
	调双卿	纪君祥:信安王断复贩茶船 庾天锡:苏小卿诗酒丽春园 无名氏:豫章城人月两团圆
	师婆儿 庄周梦 月明法曲 船子和尚四不犯	杨显之:借通县跳神师婆旦 史九散仙:庄周梦 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 李寿卿:船子和尚秋莲梦
	回回梨花院	于伯渊:丁香回回鬼风月 吴昌龄:老回回探狐洞 吴昌龄:浪子回回赏黄花
	红梨花 蔡消闲	张寿卿:红梨花 李文蔚:蔡道闲醉写石州慢

① 周密,撰.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20;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钟嗣成,撰.佚名,续.王钢,校订.《录鬼簿》校订[M].北京:中华书局,2021;张正学.中国杂剧艺术通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10-14.

续表

	张生煮海	李好古:张生煮海 尚仲贤:张生煮海
风花雪月爨	风花雪月	吴昌龄:张天师夜祭辰钩月
	唐三藏	吴昌龄:西天取经
	货郎孤	吴昌龄:货郎末泥 沈和:祁甘雨货郎朱蛇记
	说狄青	吴昌龄:狄青扑马
裴航相遇乐	兰昌官	无名氏:狄青复夺衣袄车 庾天锡:兰昌官
	列女降黄龙	庾天锡:裴航遇云英
	封陟中和乐	庾天锡:列女青陵台
	越娘道人欢	庾天锡:封陟先生骂上皇
柳毅大圣乐		尚仲贤:越娘背灯
		尚仲贤:柳毅传书
	十样锦	尚仲贤:十样锦诸葛论功
	王魁三乡题	尚仲贤:负桂英
五柳菊花新		尚仲贤:归去来兮
	诸宫调卦册儿	戴善甫: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卦册儿	郑廷玉:孟姜女送寒衣
	孟姜女	李直夫:尾生期女滄蓝桥
诸宫调卦册儿	滄蓝桥	红字李二:武松打虎
	打虎艳	周文质:苏武还乡
	苏武和番	乔吉:荆公遣妾
	王安石	朱凯:刘玄德醉走岳阳楼
打王枢密爨	大刘备	王仲元:私下三关 [王枢密知流 二国,杨六郎私下三关]
		范康:曲江池杜甫游春
	杜甫游春	钟嗣成:蟠桃会 [宴瑶池王母蟠 桃会]
	蟠桃会	钟嗣成:寄情韩翃章台柳
宴瑶池爨	王母祝寿	杨景贤:偃时救驾
	瑶池会	杨景贤:楚襄王梦会巫娥女
	杨柳枝	杨景贤:佛印烧猪待子瞻
	救驾	无名氏:人头峰崔生盗虎皮
梦巫山彩云归	病襄王	无名氏:搬运太湖石
	佛印烧猪	
	虎皮袍	
	太湖石	
打球大明乐	打球会	无名氏:打球会
	双打球	
	浮沔傅永成双	无名氏:朱砂担滴水浮沔记
	浮沔暮云归	
像生爨	刺董卓	无名氏:银台门吕布刺董卓
	访戴	无名氏:忆故人戴王访雪
	学像生	无名氏:风雨像生货郎旦
	二郎熙州	无名氏:二郎神醉射索魔镜
二郞神变二郎神	变二郎爨	无名氏:灌口二郎斩健蛟
	趑鼓二郎	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
	八仙会	无名氏:争玉板八仙过沧海
	双斗医	无名氏:双斗医
闹八妆爨	闹元宵	无名氏:村姑儿闹元宵
	刘千刘义	无名氏:刘千病打独角牛
	滕王阁闹八妆	
	五变妆	无名氏:四国旦 [八十知风流五 变妆,十样配像生四国旦]
闹八妆爨	六变妆	
	四国来朝	

关于宋金杂剧、院本的艺术体制,黄竹三认为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偏重于歌舞的杂剧;一类是偏重于假面表演的杂剧;一类是偏重于说白、滑稽成分较多的杂剧;一类是偏重于故事表演的杂剧。^{[14]122-126} 宋金杂剧、院本并非是一种单一的表演形式,而是一个丰富的表演

艺术综合体,内中含有许多不同的艺术形态和不同风格特点的表演形式。因为宋金杂剧艺术体制多样,故而金元杂剧的演出也存在多种表演形态:既有根据剧曲作家改编或者个人创作的剧本演出,这种演出富有故事性,注重抒发主人公的感情,多有曲文记载,以唱功戏为主,流传于世的剧目很多;也有突出演员个人技艺,表演性比较强的,如滑稽调笑短剧和做工戏、武打戏等,更重视表演形态和观众的观感,表演动作较多,故事情节较少,这类剧目由于不使用文字记录,不具有文学读物的形态,缺少固定的演剧文本(即曲文)流传于世,更多的是靠口传心授,因此我们目前较少看到这类剧目的文本形态。

演出形态是指为适应演出场合和演出目的而产生的演出形式和演出表现方式。演出形态影响了文本书写形态,金元杂剧并非皆为“四折一楔子”结构。金元杂剧的本数和折数没有严格的限定,并非每个剧目只有一本,每本只有四折,比如关汉卿《五侯宴》、白朴《东墙记》、纪君祥《赵氏孤儿》和刘唐卿《降桑椹》等剧目为五折,张时起《赛花月秋千记》、李文蔚《金水题红怨》二剧为六折,王实甫《西厢记》为五本二十折,吴昌龄《西游记》则为六本二十四折。楔子也并非只能有一个,也可以有两个或者没有楔子,且没有固定的位置,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曲牌和句格的变化也很多,用韵比较随意。金元杂剧艺术表演体制也是发展变动的,《录鬼簿》中载录剧目的多样性说明了金元杂剧的演出存在多种形态或者说是表演模式,即多种形态的表演在舞台上共存并行。死板的定义不能够科学合理地解释文学艺术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也不利于我们厘清其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与样貌。诸本《录鬼簿》中记载的剧目并不都是“四折一楔子”的完整文本形态,部分是以表演形态或滑稽调笑为主的剧目,故而只有简名或者全名而没有题目正名,剧目名称中没有提及主人公姓名,故事内容比较笼统空泛而缺少实际指向,前辈研究者在做剧目提要时也只能说剧情不详。关于这些剧目为何无题目正名只有简名或全名,且均无文本(抄本、刻本等)传世,一部分原因是钟嗣成和后世的众多传抄刊刻者如贾仲明等人所见有限故而未得有文本传世,但也和这些剧目自身的形态有着莫大的关联。

《录鬼簿》中所载录的剧目很大程度上不是剧曲作家的独家创作,而是先有伶人的演出实践,再有人对演出实践之文词剧情记录整理,最后剧曲作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在普遍流传的金元杂剧剧本出现之前,很多故事已经被演员们搬演了无数遍,剧本的产生是演出活动的结果,如徐朔方先生所论这些剧目乃为民间世代累积型的作品^[15]。经过了民间艺人的多次改编创作,《录鬼簿》中所载之剧曲作家不过是其最后的

写定者。这可以从《录鬼簿》中作家小传和吊词中对金元杂剧作品产生过程的记录得到证明。《录鬼簿》中多用“编”和“捻”来进行描述而不是以“创”或是“制”来标注,另外杂剧剧目有新旧之分,有的剧目是在“旧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如表 4 所示。这也可以从《录鬼簿》载录的剧目的注文中得到印证,比如说在孔文卿和金志甫二人名下都有《秦太师东窗事犯》,在孔文卿名下剧目中有“杨驹儿做(作)者”或“杨驹儿按”的注语,在金志甫名下剧目中则有“喜春来按”的注语。所谓“按”指的是“按行本”即“演出本”,孔文卿和金志甫两人的剧目创作分别和杨驹儿、喜春来的舞台演出实践分不开。孔、金二人各自在两位演员的舞台演出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丰富完善。这一过程体现了伶人舞台演出实践对于剧目生成和创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伶人和剧曲作家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表 4 《录鬼簿》载录剧曲作家编、捻剧目及剧目新旧关系表

剧曲作家吊词/小传	吊词 / 小传内容
关汉卿吊词	总编修师首
高文秀吊词	编敷演《刘耍和》
王实甫吊词	新杂剧,旧传奇
汪泽民吊词	编《糊涂包正臣》
杨显之吊词	么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扬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
赵公辅吊词	寻新句,摘旧章,按谱依腔
陆显之吊词	编《好儿赵正》钻空
李取进吊词	捻《耍巴》《破雨伞》
李文蔚吊词	瑞昌县、为新令,真定府、是故关
康进之吊词	编《老收心》李黑厮
王廷秀吊词	将《坑儒焚典》修
狄君厚吊词	编传奇。捻《火烧介子推》
孔文卿吊词	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
张时起吊词	新杂剧,旧传奇
李时中吊词	四高贤合捻《黄粱梦》
史九散仙吊词	编《蝴蝶庄周梦》
尚仲贤吊词	弃官归去捻《渊明》
顾仲清吊词	撰《陵母伏剑》,编《纪信火蒸》
赵文敬吊词	编《莱檐儿仙》传奇,撰《武王伐纣》精微
张国宾吊词	捻汉高、歌《大风》
红字李二吊词	再编一段《全火儿张弘》
范子安小传	乃编《杜子美游曲江》
鲍吉甫小传	故其编撰
赵君卿小传	所编《梨花雨》
屈英甫小传	编《一百二十行》《打看钱奴》院本等
秦简夫吊词	灯窗捻出新杂剧
汪勉之小传	鲍吉甫所编《曹娥泣江》,公作两折

杂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各个不同时期的杂剧演出形态当然也会有所不同。金元杂剧是一种在适应了当时观众的审美喜好下对宋金杂剧、院本进行继承和革新的戏曲艺术形式。虽然目前尚未发现保存完整的宋金杂剧、院本的剧本可供与现存金元杂剧剧本进行比较,但是取材相同已足以说明有不少金元杂剧就是由宋金杂剧、院本丰富或改编而成的。人们的艺术审美

观具有相对稳定性,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和精湛的表演不会因岁月的更迭而失去欣赏价值,“观众的趣味虽然会不断发生变化,但那些持续了数百年的爱好,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而且也没有理由要消失”^{[16]302}。剧曲作家的创作是以观众的审美趣味为指向的,故而剧曲作家既会对那些有思想性、剧情内容丰富的剧目进行加工改编,也会对那些深受观众欢迎、流传已久、以表演形态为主的剧目进行设计加工。比如京剧既有《四郎探母》《红娘》《锁麟囊》等极具故事性和表演情节的剧目,同时也上演《小放牛》《拾黄金》等这类不具有明显情节性或故事性的剧目。

金元剧曲作家的改编创作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继承发展宋金杂剧、院本剧目的结果,“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中著录的剧目是《录鬼簿》中载录的杂剧剧目产生的基础。剧曲作家们对宋金杂剧、院本剧目的加工改造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宋金杂剧表演形态中偏重滑稽说白类的剧目稍作处理,在舞台上继续呈现演员的个人技艺,高文秀名下的很多剧目可以归于此类。高文秀改编创作了大量有关黑旋风李逵的戏,如《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双献头》《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等,其中《黑旋风双献头》有剧本存世,其余皆佚。《黑旋风斗鸡会》之表演内容应与《水浒传忠义志传》第九十六回“黑旋风异境遇仙翁”中李逵追虎情节关目相类,至于其他剧目表演内容也可进行大致稽考。黑旋风李逵是《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好汉中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人物,让他“穷风月”“大闹牡丹园”等自然是滑稽可笑、富有趣味的,会取得很好的舞台演出效果。《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等书中多处记载以“乔”字冠名的模拟滑稽言行和滑稽人物逗笑的说唱名目,如《乔学堂》,不重情节,主要是模拟学堂中师生滑稽言行取笑,《黑旋风乔教学》应是在此剧目上进行加工改造而成,这在《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也有涉及。杨显之名下的《黑旋风乔断案》与高文秀《黑旋风乔教学》同为梁山泊好汉李逵发乔的滑稽剧,都是没有过多的故事情节的调笑科范戏。高文秀还有《黑旋风敷演刘耍和》一剧,刘耍和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教坊艺人,花李郎和红字李二都是其女婿,庄一拂认为“黑旋风”三字可能是“衍文”^{[17]192},这种观点可备一说,“敷演刘耍和”五字是注文,高文秀的黑旋风题材剧目可能正是由刘耍和扮演的。在《录鬼簿》中多处记录了剧曲作家和演员共同加工创作剧目的事例,如马致远和红字李二、花李郎、李时中四人合写《黄粱梦》一剧,孔文卿与杨驹儿合作创作《东窗事犯》。高文秀三种以“豹子”开头的剧目和《穷秀才双弃瓢》《醉秀才戒酒论

杜康》《烟月门神诉冤》等剧应为滑稽调笑、没有复杂故事情节的剧目,从剧名中带有“秀才”二字的剧目中可猜测其与金院本“拴略打搐”类中的“秀才家门”有一定的关联。

宋金杂剧、院本中本来就有偏重于故事表演的表演形式,且和乐演唱,金元杂剧继承其表演形式,如刘时中、高文秀《烟月门神诉冤》、关汉卿《金银交钞三告状》和王廷秀《盐客三告状》等剧目内容皆为无复杂人物情节、以讲唱为主体、以叙事扮演的的方式来表现的院本式短剧,这些作品是从院本名目(如刘时中《代马诉冤》、姚守中《牛诉冤》)中改编而来。金元杂剧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演员自身技艺的呈现有时候比故事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在某些时候是技艺表现影响乃至决定故事的表演方式,故事只是给某些剧目表演提供了一个外壳,技艺表现才是这些剧目所要表达的内在核心。除上述剧目之外,关汉卿《藏闾会》在金院本“诸杂大小院本”类中有同名剧目,在诸本《录鬼簿》中只录有简名而无全名和题目正名,具体剧情内容不可知,应亦属于此类剧目。红字李二名下剧目皆为叙述梁山泊人物故事,当与其岳父刘耍和之影响有关,《窄袖儿武松》和《板踏儿黑旋风》等剧目都是以人物特征加入名的形式命名。红字李二名下剧目多为以科范为主的武打戏,多有表演打斗之场面,《南村辍耕录》载:“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泛。乐人皆宗之。”^{[13]277}“刘”即为刘耍和,他擅长科范即动作表演,其剧目当是为了适应其表演特点而作,梨园中人所作之戏,自然本色当行。郑廷玉《一百二十行贩扬州》没有主角姓名,剧情关目亦不得其详,可能是以说唱为主的短剧,说学多种扬州货物的名称或叫卖声,在“官本杂剧段数”中有“讲百果爨”“讲百花爨”“讲百禽爨”等,在院本名目“打略拴搐”中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书集名”等剧目类别,以叙事扮演的演出方式来对这些名目进行敷演,而不是对其进行单纯的罗列。李直夫《刎斗娘子劝丈夫》《风月郎君怕媳妇》《俏郎君占断风光》《谎郎君坏尽风光》四个剧目都没有言明人物姓名,可能都为表演性强、富有幽默性的短剧,而不是定型于四套曲组成的“四折一楔子”的金元杂剧剧目。很多剧曲作家都有多种表演形态的剧目创作,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所说:“元人既创新杂剧,而又有院本,则院本殆即金之旧剧也。”^{[8]130}

第二种是将技艺类表演型剧目穿插到故事表演为主体的剧目当中,利用故事转折的间隙来显示诸般技艺,这既是由于技艺内容的表演是中国戏曲的先天基因的缘故,同时也是为剧目表演的主要角色化妆、换装腾出时间。这类例子很多,具体改编情况可以杨显之

《师婆旦》等剧目为例进行说明。《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有《师婆儿》一剧,可见扬显之《师婆旦》当是对此剧进行加工后的结果。增补本系统《录鬼簿》中扬显之吊词“么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扬补丁”^{[11]157}，“么末”即杂剧,起源于院本的“院么”，“院么”相比杂剧略为简单,正如吊词所说其剧目是在“补缺加新令”后成为“么末”的。明初刘兑《金童玉女娇红记》杂剧中插演大量院本,其中也有《师婆旦》。师婆是以装扮神鬼附身而为人卜占吉凶或符水治病者,在各种艺术表演中多有此类剧情故事,如《变羊计》和曲艺《关亡》等,都可作为参考。在杂剧剧目中穿插院本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穿插有“双斗医”院本,刘唐卿《蔡顺摘榭养母》中也穿插有“双斗医”院本,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中穿插有“针儿线”院本,《张生煮海》中穿插“四道姑”院本,《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穿插“呆秀才”院本,胡忌在《宋金杂剧考》中论述甚为详慎。^{[10]68-73}臧晋叔在《改订玉茗堂四种传奇》之《还魂记》第二十五折的“眉批”中说:“不知北剧每折间以鬻弄、队舞、吹打,故旦末常有余力”^[18],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说:“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观音舞,或百丈旗,或跳对子。”^{[19]204}张岱《陶庵梦忆·世美堂灯》说:“余敕小僮串元剧四五十本。演元剧四出,则队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间浓淡、繁简、松实之妙,全在主人位置。”^{[20]115}上述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是都说明了在杂剧演出间隙有技艺类表演型剧目的穿插演出,这种现象大约到明万历以前都是如此,在杂剧中穿插技艺类院本剧目的做法也被明清文人在编排创作传奇剧本时采用,如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无名氏《精忠记》传奇、梁辰鱼《浣纱记》传奇、张凤翼《红拂记》传奇等剧目,这正说明中国戏曲自古以来就是百戏杂陈、重视技艺表现的。

第三种则是对宋金杂剧、院本中故事表演性、直观演出性、抒情性比较强烈的剧目进行改编创造,为之增加了思想内蕴,使之能够在不依赖表演形态的情况下独立存在,这类剧目被归为戏曲文学作品。如李寿卿《月明三度临歧柳》应当是在金院本《月明法曲》《净瓶儿》及传说的基础上结撰而成的,关汉卿《宋上皇御断姻缘簿》、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郑廷玉《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宫大用《宋上皇御赏凤凰楼》等剧目应是据金院本中“上皇院本”和其他传说敷演而来。众多有文本存世的杂剧剧目大都可归于此类。

结语

现存三个版本系统的《录鬼簿》在剧目名称书写上

存在的较大差异是受到作者与后世传抄刊刻者的加工修订、剧目著录标准、时代的发展等方面影响的结果;另外由于金元杂剧是受宋金杂剧、院本的深刻影响形成的艺术形式,无论从表演形态还是命名方式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深刻的亲缘关系,受宋金杂剧艺术体制多样性的影响,金元杂剧的剧目演出也存在多种表演形态,从而导致了不同版本系统的《录鬼簿》在剧目名称的书写上产生巨大差异。对以上差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金元杂剧艺术形态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钟嗣成,撰.佚名,续,王钢.校订.《录鬼簿》校订[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2]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4]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5] 夏庭芝.青楼集[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6] 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周峰,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 [7] 元鹏飞.古典戏曲脚色新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9] 谭正璧.话本与古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0] 胡忌.宋金杂剧考[M].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1] 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2] 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13]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M].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4] 黄竹三.中国戏曲文物与演出叙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
- [15] 徐朔方.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J].浙江学刊,1999(4).
- [16] 傅瑾.戏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7]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8] 臧懋循.还魂记:改评本[M]//汤若士,撰.臧晋叔,订.玉茗堂四种传奇.苏州:金阊书业堂,1751(清乾隆廿六年).
- [19] 顾起元,撰.客座赘语[M].孔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0] 张岱,著.林邦钧,注评.陶庵梦忆注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of Plays in *Lu Gui Bu*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ystem

YANG Cheny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of plays in the three existing versions of *Lu Gui Bu*. These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Jin and Yuan Zaju and the differences 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Jin and Yuan Zaju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uthor's processing and revision, the standards for recording play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have led to different names of play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Lu Gui Bu*.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is the diversity of the artistic system and performance forms of Jin and Yuan Zaju, which makes the writing of plays diverse.

Key words: *Lu Gui Bu*; edition;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of plays; title correction; art form

《红楼梦》时序错乱问题辨正 ——以戴不凡《时序错乱篇》为中心

职 伟

(山东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100)

摘 要: 纪年与时序问题是《红楼梦》时间研究的重要内容, 戴不凡先生曾精心梳理《红楼梦》的故事时间, 列举出文本中的二十八项时序矛盾。综合考察这些矛盾, 其中多有不能成立之处, 主要集中在贾宝玉生于何年、“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是否矛盾、黛玉离扬于何时、英莲被拐卖时的年龄、薛家启程与入京的时间、刘姥姥一进荣府的时间、宝玉等闹学堂的时间这七个问题上。详加考证, 戴先生在这七个比较集中的时序问题上论证有误, 与此相关的其他时序错乱问题也难以成立。

关键词: 《红楼梦》; 时序错乱; 戴不凡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52-07

《红楼梦》中的时序错乱问题, 曾一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 戴不凡先生在探讨《红楼梦》成书问题时, 对《红楼梦》中的时间线进行了精心梳理, 撰有长文《时序错乱篇——前八十回时序的矛盾》^[1], 列举出二十八项时序矛盾。笔者考辨文本信息、版本异文和诸家观点, 发现戴先生所提及的诸多时序矛盾并不成立。下文将戴文集中指涉的七个关键时序问题逐一辨正。

一、贾宝玉生于何年

戴不凡先生指出: “贾宝玉生辰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详第六十二回); 今炎夏尚未入世, 故其诞生最早应在翌年(可见香菱实长宝玉三岁或更多)。《表·历》(指周汝昌《红楼纪历》)列本年宝玉 1 岁, 误。”^{[1]269} 戴先生认为第一回甄士隐梦见一僧一道时, 贾宝玉尚未出生, 按照时序贾宝玉并非生于故事开始之元年(简称“红元年”), 而应生于红二年。因为“贾宝玉生辰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 尚是初夏; 而宝玉出生前甄士隐昼梦幻游之日乃“炎夏永昼”, 已是仲夏, 所以宝玉非元年出生。

戴先生据六十二回贾宝玉生日时“憨湘云醉眠芍药裯”之“芍药”而考证贾宝玉生日应在四月:

[按] 据康熙戊辰(1648)(原文如此, 应为 1688)原刊本《花镜》(署“西湖陈扶摇汇辑”)卷一《四月事宜》

条: “芍药相于阶”。又据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帝京岁时纪胜》(署“大兴潘荣陛在廷著”)《四月·丰台芍药》条: 丰台芍药“于四月间连畦接畛”。无论贾府地点南北, 都可见宝玉生日是在四月。^{[1]314}

根据物候判断贾宝玉生日在四月是合理的, 那么能否精准到四月二十日左右呢?

在宝玉生日前不久的第六十一回, 柳家的与看门小厮关于大观园水果的对话也可看出时令:

(小厮)说: “好婶子, 你这一进去, 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柳氏笑道: “……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只当我摘李子呢……说又是‘还没供佛呢’, 又是‘老太太, 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2]835}

由此可知, 宝玉出生前几日杏子和李子已经成熟。我们可以由杏、李的时令对宝玉的生日进行更准确的判断。《齐民要术》引《嵩高山记》曰: “东北有牛山, 其山多杏, 至五月灿然黄茂。”^[3]嵩高山即嵩山, 在河南登封, 山上杏五月成熟, 平原地区成熟时间应稍早。宋人王应麟补注《急就篇》“枣杏瓜棣饴饧”条言: “杏, 夏小正四月, 囿有见杏。”^[4]王应麟为浙江人, 其四月可见杏。元人胡古愚《树艺篇》载: “四月收杏子, 杏熟时收核。”^[5]元人萨都拉有诗: “五更门外过风雨, 四月街

收稿日期: 2025-01-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方志稀见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19BZW092)。

作者简介: 职伟(1994—), 男, 山东单县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

头买杏梅。”^[6]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四月八日佛生日……时果则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类。”^[7]言开封在四月初杏、李已开始上市。明人何栋如《皇祖四大法》记载明朝皇宫祭祀贡品为:“四月,杏、梅、樱桃、黄瓜、薤、雉;五月,来禽、茄子、桃、李、大麦、小麦、嫩鸡。”^[8]而明人冯曾、李汛修纂《嘉靖九江府志》之《果属·李》载:“脐深而大,色红黄者可食……又四月熟者曰麦熟李。”^[9]其他果品多不言成熟月份,而特别指出江西九江的一种麦熟李在四月成熟,说明应是一种特殊的早熟李。由以上材料可知,无论南方北方,杏在四月普遍成熟,北方的山中会在五月成熟。而李子比杏子晚,一般五月成熟。

看门小厮让柳家的偷摘大观园中的杏,说明此时杏已普遍成熟,月份应在四月。而柳家的提到李子初熟尚未采摘,时令应是四月底、五月初。所以戴先生言宝玉生日在四月二十日左右是合理的。胡联浩先生《贾宝玉生日新考》一文亦从多方面论证宝玉生日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10]

宝玉生日的四月二十日左右与甄士隐昼梦的“炎夏永昼”的前后关系是判断贾宝玉是否出生在红元年的关键证据。而判断此问题首先需要考察甄士隐昼梦之“炎夏永昼”是仲夏还是初夏。

甄士隐昼梦初醒即与贾雨村相见,雨村看到丫鬟娇杏“在那里撷花”,由少女采花的情节可知此时不应是仲夏。一者仲夏可采之花无多,二者仲夏正午烈日灼人,既无采花之兴致,又无娇嫩之花可采。再者,少女采花多少带有一些春意,且回目“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已指明春情,自应是春天。若此时是春末或夏初,牡丹、芍药、蔷薇等花盛开,既有繁花可采,又有春情可怀。春末夏初天气已然炎热,特别是江南地区,气候转热较早。

进一步证明甄士隐昼寝在初夏,须考察《红楼梦》中夏初(四月底五月初)的气温描写是否与甄士隐昼梦时一致。第二十八回元春命五月初一至初三在清虚观打醮,在打醮前贾母说:“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贾母所言“长天老日”与甄士隐昼梦之“炎夏永昼”义同。五月初一,张道士说:“况是个暑热的天,哥儿受不惯。”林黛玉回到家“又中了暑”。五月初三,凤姐说:“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当日,“谁知目今盛暑之时,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等人多半都因日长神倦”。以上四月底五月初的夏初环境描写,与甄士隐昼梦时的“炎夏永昼”“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并无差异。

后文宝玉庆祝生日时的环境描写与上述炎夏景象一致。六十三回,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

才好”“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可知宝玉生日时天气已较热。贾敬在宝玉生日之夜去世,“目今天气炎热,实不得相待”,此处作者已用“炎热”形容宝玉生日时的天气。可见宝玉生日之初夏气温与士隐昼梦的“炎夏”并无不同。因此,宝玉在红元年甄士隐昼梦时出生是合理的,戴先生认为宝玉出生在红二年的观点不当。

二、“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是否矛盾

戴先生指出第二回的时间矛盾问题:

但据雨村“去岁我在金陵”曾在甄家处馆,终于“因孙辱师责子”辞馆来计算,时间上有问题。设若“去岁”(故事第七年)正月下旬雨村入甄家处馆,估说他两个月后(这是低得无法再低的估计)即辞馆,则已是三月下旬;辞馆后“偶又至维扬(游至维扬)地面”,“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由旧友介绍入林家为西宾,这无论如何已经是第七年五月以后的事了。即使说贾敏病歿于本年十二月,也不应当说是“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此其一。根据第三回林如海之言:“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从扬州噩耗报入都中,贾府“前已”遣过船只来扬州,而黛玉当时病未大痊致未成行,直到此刻病痊可以启程,这是需要一段颇长时间的。故“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一语,显有不合。^{[1][270]}

概言之,戴先生认为自贾雨村在林府做西宾至与冷子兴相遇之间远不足一年,而言“又是一载的光景”,与前后时间矛盾。戴先生《时序错乱篇》年表言“雨村任知府不上两(一)年被参革”,而笔者考察十数种重要的版本发现,只有戚蓼生序本是“不上两年”,其余版本皆是“不上一年”,说明戴先生对《红楼梦》时序的统计也参照了戚序本。此处时间词的版本差异如表1。

表1 贾雨村为林府西宾至与冷子兴相遇时间各版本对照

第二回文本	版本
堪堪(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阴)	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梦稿本、蒙府本、列藏本、戚序本、舒序本
看看又是一载有余	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据表1可知,除甲辰本等是“一载有余”外,其他版本皆为“一载”,并无较大的版本差异。

戴先生推论贾雨村“入林家为西宾,这无论如何已经是第七年五月以后的事了”,无可厚非;而其言“即使说贾敏病歿于本年(红八年)十二月,也不应当说是‘看

看又是一载的光景”’,却使人不解。若贾敏最晚在红八年十二月去世的话,距红七年五月已一年半多的时间,言“又是一载的光景”并不矛盾。一年半是推测的最大时距,若推算最小时距的话,须先论证此时——“冷子兴言说荣国府”——的时间。“言说荣国府”不久,贾雨村就陪同林黛玉入贾府,黛玉入府之时已是冬天。时众人穿着大袄,贾母住在暖阁,且贾母说“等过了‘残冬’”,而非过了“冬天”,可知当时为残冬无疑。黛玉入贾府时已残冬,时贾府在北京,扬州乘船沿大运河北上至京,迟则两月,故启程时已是秋末冬初,启程前不久贾雨村与冷子兴相遇也应在初冬或秋末。而其相遇时,“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遂连日不曾上学”,距贾敏去世不久。那么,贾雨村为林府西宾时间最迟为去年十二月,至与冷子兴相遇之次年秋末冬初,历时至少已九个月,近一年,且中间跨年,而文本所言“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来形容最小时距(九个月)至最大时距(一年半)皆可。其实贾敏去世应在秋末,最大时距从七年五月至八年秋末,近一年半。梦本、程本作“一载有余”也不为过。可见,此处文本“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在顺序上并无扞格处。

贾雨村为林府西宾一年左右,贾敏病重秋末去世。不久贾母遣人接黛玉,接黛玉的船只到扬州林府之时,距贾敏去世一个月左右,即冬初。此时贾敏去世刚一月余,黛玉病未痊愈,至多再等一月,也不过寒冬,并非戴先生所言“需要一段颇长时间”。寒冬启程,一两个月后入贾府,正值残冬,时序上也颇符合。此与上文论证贾雨村做西宾“看看又是一载的光景”以及贾敏去世,也无矛盾之处。

三、黛玉离扬于何时

戴先生据戚序本言黛玉应于红九年“正月初六日”入都。并按曰:

“正月”,应从戚本。(甲戌、庚辰均作“出月”)黛玉入府见阿凤穿“大红洋缎窄袖袄”、“外罩石青银鼠褂”;宝玉“穿着银红洒花半旧大袄”;请吃晚饭的丫头“穿红绫”,这全是寒冬景象。贾母说“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二玉收拾房屋,亦可证“正月”二字不谬。(从扬州至“都中”,路上尚需时日也。)^{[1]271}

戴先生此处推论认为黛玉应于正月初启程入京,甲戌、庚辰之“出月”(出了本月,即下月)即是言“正月”。考察脂本与程本此处时间的异文如表 2。

表 2 黛玉离扬时间不同版本对照表

第二回文本	版本
如海乃(又)说(已)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	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舒序本、列藏本、梦稿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如海乃说已择了正月初六日小女入都	蒙府本、戚序本

据表 2 可知,仅戚序本和蒙府本作“正月初六”,其余皆作“出月初二”,戚本与蒙本相对晚出,很有可能是传抄时作了修改。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是指入都的启程时间,并非入贾府时间。戴先生所认为的正月启程实与其前后论据冲突,黛玉正月启程不合理。其论证黛玉入贾府时“全是寒冬景象”,明显应是冬月、腊月,并言“从扬州至‘都中’,路上尚需时日也”,须有一两月的路程,而正月初启程的话,一两个月后到京都,应是春天景象才是,如何“全是寒冬景象”?进一步考察戴先生所据戚序本之第三回贾母说“等过了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发现同作“正月初六”启程的蒙本,此处却作“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戚本无“残冬”二字,应是据前文所言黛玉“正月初六”启程推算,入京时已然春天,与残冬无关,传抄者或读者有意删掉蒙府本的“残冬”,径言“等过了春天”,戚本的改动反而可以实现本回内部的时序自恰,而戴先生却又据他本补充上“残冬”之后,其时间无论是就本回内部时序,还是故事前后时序而言,都与“正月初六”启程不相吻合。薛家人贾府是在第九年春天,距黛玉入府已经较长时间(约两个月左右),时宝玉、黛玉已有较深感情,黛玉入府时间绝非在第九年,实应在第八年冬。所以,黛玉启程时间并非戴先生所认可的戚序本之精准化后的“正月初六”,而他本所作模糊化的“出月初二”反而无碍,“出月”似应指十月或十一月初,而非正月。此外,“出月”也非“正月”之误,首先,从版本源流上看,甲戌、己卯、舒序、梦稿本等早于蒙本、戚本。^[1]再者,文本内部多有“出月”的行文。如第十六回,贾琏“本该出月到家,因闻得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第六十六回,“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功夫才来”。总之,蒙本、戚本改“出月”为“正月”,不当,戴先生据此推论时序亦不当。

四、英莲被拐卖时的年龄

关于英莲被拐卖时的年龄,戴先生分别指出:

“倏忽又是元宵佳节”。——故事进入第二年。本年英莲 4 岁,被拐,三月十五日葫芦庙失火延烧甄士隐家。^{[1]270}

据第一回,香菱被拐为 4 岁;本回雨村对门子说“听见五岁被人拐去”。不合。——但“听见”不

一定就是事实如此。^{[1]273}

据戴先生推算,英莲被拐时四岁,而贾雨村却说听闻五岁被拐,二者时间不合。戴先生在取舍时,以雨村所言五岁被拐之论乃道听途说未必属实为由而取四岁。看似合理,实则不然。

雨村与门子相逢交谈时,隐瞒了自己曾在大如州做知府的经历,故意说“听闻”英莲被拐,实际绝非道听途说。第二回雨村听英莲外祖父封肃说英莲丢了之后许诺:“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雨村受甄士隐恩情颇深,对英莲失踪一事必定十分重视,印象深刻,所闻“五岁”被拐不应有误。且门子接着言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也表明英莲被拐应五六岁。再者,门子与英莲是邻居,“天天哄他玩耍”,十分相熟,听雨村言英莲五岁被拐也并无异议。又,门子言:“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光景。”只有被拐时五岁,七八年之后才能是“十二三岁光景”。因此,英莲应于红三年五岁时被拐无疑。

红元年中秋后雨村不辞而别,接着“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此元宵节英莲五岁被拐,应是红三年。按照时序推算,雨村审理冯渊案时是红九年春,英莲十一岁,上一年被卖时方十岁。故戴先生言:“香菱到了第八年时应为10岁。本年冯渊则已‘长到十八九岁上……’;这样一个人,岂有见了一个10岁幼女就‘立誓再不结交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之理?”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女子十岁开始发育,也不能排除发育较早的情况。门子说这种拐子通常将小姑娘养至十一二岁才卖,说明英莲被卖时应十一二岁,相对较为合理些。且在英莲被卖次年门子说其“如今十二三岁光景”,再次证明被卖时应十一二岁,所以作者在组织故事时预设英莲五岁被拐,十一二岁时被卖,中间应相隔六年。戴先生推算相隔五年,红八年英莲被卖时十岁;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系年》统计“乱判葫芦案”是红八年^{[12]4},则英莲红七年被卖与冯渊时方九岁;周汝昌先生《红楼纪历》^[13]、王彬先生《红楼系年》^[14]统计英莲红七年九岁被卖,皆不当。

笔者推论,英莲于红三年五岁时被拐。据书中的文本信息,存在两种计算方式推算英莲被卖的年份,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一是红八年十岁,二是红九年十一岁。导致这两种不同结果的关键文本信息是,第一回言“(甄士隐)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再兼上年惊唬(英莲失踪等)”,随后甄士隐出家;第二回封肃对雨村说“(士隐)今已出家一二年了”倘若此处统计为一年,则英莲被卖时为红八年十岁;若按两年来统计,则英莲被卖时为红九年十一岁。从作

者对英莲被卖时的年龄预设来看,后一种推断方式似乎更为契合。但是,考虑到此处纪年与整体纪年的最优契合度,最终选择前一种推算结果(红八年十岁)更为妥当。

五、薛家启程、入京的时间

在第四回,关于薛蟠毆死冯渊的时间、冯家告状的时间、薛家入贾府的时间问题,戴先生认为矛盾重重。

本回(第四回)仍为故事第九年。据第二回,雨村入京“不到两个月”便补了应天府缺,一到任就遇薛蟠人命案;此案冯家仆人“已经告了一年的状”,则薛蟠打死冯渊扬长入京明在第八年。

[按]……②据第三回末所写,黛玉入府后第二天,王夫人与阿凤拆阅金陵来信,知薛蟠闹人命案。很显然,薛蟠在金陵打死冯渊之时,应和黛玉离扬州之时相去不远。雨村携黛玉入都不到两个月就赴应天上任,其间往返时间,充其量不会超过半年。他刚刚上任怎么就会遇到冯家“已经告了一年的状”?时间显有不合。

③薛蟠打死冯渊后即带母妹入都。书中用“在路不计时日”来模糊时间,但是,黛玉从扬州入都,和宝钗从金陵入都(不问京都在何处),其里程时日均不致相去过远。是则黛玉入府后,宝钗接踵而至。此点与小说以后的具体描写,有一系列矛盾。

本回明写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亏雨村从中维持了结以后“过了几天”,薛蟠母子才入府的。则薛家一行在路上实际上走了一年多(还加上雨村断完案的消息传入都中的时间)才到都中,时间未免过长、不合。^{[1]273}

如上文所证,黛玉约冬初离扬州,不久后薛蟠打死冯渊。寒冬岁末黛玉入贾府,随后贾府得知薛蟠命案(消息、书信的传送速度要比旅行迁徙速度快很多)。薛家于寒冬由金陵启程赴京。雨村入京一个多月(“不上两月”)后得以候补应天府,雨村离京约一两月后到达金陵应天府就任(雨村只身且因公赴任速度应比黛玉、薛家进京速度快),时已第九年春天,雨村当即结案,速报知京都贾府,随后薛家到达贾府。

从冯渊被害案发至雨村审理,其间至多四个月,冯家称“已经告了一年的状”,虽未免夸张,但因中间跨年,其说却也合情理。

戴先生言“黛玉入府后,宝钗接踵而至”,非也。曹雪芹叙述黛玉入府、雨村就职审案后,接着叙述薛家入贾府,看似薛家紧跟黛玉之后入府,其实距黛玉入府相隔三四个月。黛玉入府之时,薛蟠已毆死冯渊,或未启

程。待薛家入贾府之时,黛玉已在贾府生活相当一段时间,并与宝玉感情深厚。黛玉刚入贾府时“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至宝钗到来时,黛玉已“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入贾府或已数月。而戴先生所言“此点与小说以后的具体描写,有一系列矛盾”,应是指第二十七回等处“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在故事文本中应是保留了一些早期稿本设定的宝黛二人青梅竹马的痕迹,在后期修改中未完全订正。黛玉、宝钗入贾府虽未曾相隔几年,但至少相隔数月。

薛蟠在黛玉启程离扬州不久后打死冯渊,黛玉入贾府时薛家或已启程离金陵。薛家赴京类似举家北迁,经历了冬、春两季,中间跨年,笼统地说“在路上走了一年”也合情理。而戴先生在第十回又较为准确地说:“薛家实是在第九年夏秋以后才入府的。”也就是冬季入府,薛家行速虽慢,却也不至于从南京到北京十几个月才到,行程至多三四个月。薛家入贾府时春梅正开,正是红九年二三月间。

六、刘姥姥一进荣府的时间

第六回刘姥姥进荣府时“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戴先生指出:

第五回“梅花盛开”在前,本回“秋尽冬初”在后,时序颠倒。昨晚才是“秋尽冬初”,次日进荣府,凤姐是满身皮衣烘手炉,却是隆冬景象了。不合。^{[1]276}

先生认为“梅花盛开”之梅为蜡梅,时已寒冬腊月(十二月),而紧接其后的刘姥姥却是在“秋尽冬初”的十月左右进荣府,时序明显颠倒。而宁府赏梅是在春初,因此,才有了宝玉游太虚幻境的“春意”和偷试云雨的“春情”。其后,“因这年秋尽冬初”,刘姥姥进贾府,明显是在叙述春天之后同年秋末之事,虽然中间空了两季,但时序并非颠倒。“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虑”,说明在刘姥姥来贾府前已然是相对寒冷的初冬。北方初冬寒潮来袭时,气温未必不低於隆冬,加之凤姐体弱多病,会见刘姥姥时“满身皮衣”“烘手炉”,并无不合之处。第十九回黛玉说过“冬寒十月,谁带什么香呢”,可知冬初十月已然寒冷。几日后下雪,雪雁送手炉,亦是初冬。

第七回,戴先生言:

刘姥姥进府之同日晚间,凤姐向王夫人回说,送甄家的东西“趁着他家年下送献的船去”带去。

[按]既曰有“年下送鲜的船”,则不会是刘姥姥进府“秋末冬初”的时候。但这和第五回“梅花盛开”倒是衔接的。^{[1]277}

戴先生的意思是,既然有“年下送鲜的船”,则当时时间应是接近春节,与第五回的“梅花盛开”之蜡梅时令相接,也由此证明其此前推论刘姥姥初冬进荣府有误而实是隆冬景象。

其实,这仍不能说明刘姥姥是寒冬腊月而非冬初进荣府。戴先生此处不仅对梅花之春、腊时令有误会,也对“年下送鲜的船”的时间有误解。

凤姐打发刘姥姥走后,向王夫人回复:“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贾府在北京,距南京甄家较远,可趁甄家进贡的返航船只将礼物捎去。董建中先生《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称:“有的学者强调端午贡、万寿贡、年贡是进贡的常例,笔者赞同此看法,可以肯定实际进贡中以上述三贡为盛。”^[15]从“年下进鲜的船”可知,甄家在有资格例贡的官员范围内,每年需要定期纳贡。潘浩先生《清代土贡制度简论》一文提到:“清代土贡,各省每年入贡次数不等,承担的贡额亦不等……如吉林土贡,于四月、七月、十月、十一月分四次呈进”“各省多数贡物的解送日期相对固定,如盛京例贡粉子蕨菜,皆为五月下旬或六月送到……前后浮动约在一月间,毕竟土产食物,生长采获各有规律”。^[16]所以,甄家从南京来的“年下进鲜的船”也未必要紧邻“年下”才进京,所谓的“进鲜”应多是进贡食品、食材等^{[17]133},冬季无多鲜物,应是将秋季鲜物或地方特产土贡在冬初赶到京城进献,是为年贡。从凤姐向王夫人的汇报,可知由甄家进鲜船只捎带贾府年礼已是常例。再者,节礼必然在节前送达,南京、北京相隔路程较远(约耗时一两个月),贾家送甄家节礼必然提前一两个月。而甄家送到贾家之时贾家尚未送,说明距春节至少一两个月,所以凤姐提议让甄家进鲜的船捎回去,礼物捎到之时必然赶在春节之前。那么此时必然非十一、十二月,冬初的十月方合适。周瑞家的送走刘姥姥的当日“送宫花”遇到智能儿说:“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周绍良先生在《〈红楼梦〉系年》第七回按曰:“可见此时是十月初之后,十五之前。”^{[12]6}此说比较合理。

戴先生在第六回指出:

周瑞家的说“我们这里又不是(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刘姥姥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岁罢了。”

[按]据第二回(五),第八年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今已娶了两年”;本回为第九年,则琏娶凤尚不过三年,与周瑞家说的“五年前”之语明显不合。《表·历》列第二回冷子兴演述荣国府为第七年,则琏凤结婚应为第五年;同时又到刘姥姥进府为第九年,按这一排列,周瑞家的“五年前”之语,仍有不合。^{[1]276}

按戴先生的推算,在红八年时凤姐嫁入贾府“已两年”,在刘姥姥一进贾府之红九年时,凤姐嫁入贾府应“已三年”;若按周汝昌先生《红楼纪历》推算,凤姐此时嫁入贾府“已四年”,皆与周瑞家的所言“五年前”之语不合。但细读周瑞家的原话:“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琏二奶奶管家了。”周瑞家的所说的“五年前”,应非戴先生所理解的凤姐在五年前嫁入贾府并管家。“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周瑞家的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预设的是刘姥姥对贾府此前(五年前)的情况尚较熟悉。“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琏二奶奶管家了”,说明周瑞家的深知刘姥姥此前了解王夫人管家等事,而对近五年贾府管理人员的变动并不知晓。当周瑞家的见到刘姥姥:“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又问板儿:“你都长这们大了!”周瑞家的上次与刘姥姥相见时,板儿应出生不久,此时板儿约五六岁,那么二人上次相见应是五年前。此五年间刘姥姥未曾与周瑞家的谋面因而不得知晓贾府事。所以,周瑞家的所言“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之“五年前”,乃是指二人相别时的五年前,而并非言王熙凤嫁入贾府管家已五年。即刘姥姥真正意义上的一进荣国府是在红四年。

七、宝玉等闹学堂的时间

戴先生在《时序错乱篇》的长文中,围绕贾宝玉、秦钟等闹学堂的相关时间问题,列举出“矛盾拾贰”至“矛盾拾陆”五项时间矛盾。下文将集中予以辨正。

刘姥姥秋末冬初(十月间)来贾府,次日宝玉和秦钟相会,几日后宝玉与秦钟入学,“不上一月之工,秦钟在荣府便熟了”,宝、秦与香怜、玉爱关系暧昧,“几个滑贼”打趣嘲弄“这也非止一日”。

戴先生在第九回指出,宝、秦入学在第五回宁府“梅花盛开”之后,因此认为二人“实应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入塾的”。而又“按旧日塾中惯例,在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送灶王爷上天”之日),正是开始“放年学”时间,由此认为宝、秦入学的时间不合常理。上文已论,第五回梅花盛开应是红九年春,戴先生视作红九年冬,此为推算其他情节的时间,因而列出多处时序

不合的问题。宝、秦入学是在刘姥姥进贾府不久后的冬初,所以入学一月后,才有了与香怜等的暧昧关系和同窗的嘲弄,故未曾遭遇年假阻隔。

在金荣、茗烟等闹学堂之后,第十回金荣母提到:“你这二年在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戴先生言:“就情节排列来看,闹学既是第九年冬事;《表·历》则谓此事‘已接入次年’。然不论此为第九年或第十年,薛家实是在第九年夏秋以后才入府的,‘这二年’薛蟠怎么会帮了塾友金荣七八十两银子呢!”上文已证,薛家入府不久,宁府春梅盛开、宝玉春梦幻游,薛家实是初春入贾府。若闹学堂发生在红九年冬(戴先生观点),则可称薛蟠入学一年;若发生在红十年,则可称入学“已二年”。此处需要论证两个问题:一是闹学堂时间是否在冬天,二是是发生在红九年还是红十年。

首先论证闹学堂是否在冬天。在闹学堂的两日后,张友士言秦可卿病情“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可知此时在冬初及其之前;次日凤姐在贾敬寿宴看望秦氏时提到比较具体的日期——“如今才九月半”。但考察《红楼梦》重要版本发现此处存在文本差异,如表3。

表3 宝玉等闹学堂的时间不同版本对照表

第十一回文本	版本
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	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
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纔(才)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麼病治不好呢	蒙府本、戚序本、舒序本、列藏本
若是不治,怕春天不好;如今才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残纸约阙五六字)	梦稿本

在蒙府本、戚序本、舒序本、列藏本、梦稿本五个重要版本中都有“如今才九月半”的时间信息,而已卯本、庚辰本、甲辰本、程本却未提及。因甲戌本缺此回,从版本上难以判断“九月半”的异文情况是后人增删还是作者修改的结果。但结合其他文本信息中提到的时间线索和环境描写还是可以判定“九月半”符合时序。

闹学堂三日后贾敬寿宴日,尤氏言秦氏“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们玩了半夜”,说明此月是九月无疑。再看其时景物——“这个时候天气正凉爽,满园的菊花又盛开”“黄花满地……树头红叶翩翩……西风乍紧……又添蛩语”,一派晚秋景象,与“九月半”相合。因此,闹学堂的时间在九月中旬左右比较合理,而非冬季。

红九年冬初刘姥姥进贾府,几日后宝玉、秦钟入学堂,可知二人入学堂时已是冬季无疑。而之后的闹学堂是秋季,因此入学堂与闹学堂不是同年。由同窗

嘲弄秦钟、玉爱等“这也非止一日”，表明入学、闹学之间在叙事上省略了一段时间，而由冬至秋，只能是中间省略多半年。既然戴先生也认可宝、秦红九年冬入学，那么秋季闹学则应在红十年。推算出闹学堂的季节和年份之后，诸如“宝玉入塾是隆冬，入塾后个把月闹学，闹学后四五天即是贾敬生日，情节扣得很紧，怎么时间忽从隆冬变成了九月半呢？是可谓岁月倒流”等戴先生列举的“矛盾拾贰”“矛盾拾肆”“矛盾拾伍”“矛盾拾陆”四个时间矛盾问题则不证自明。

由此，结合第九回“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以此推算薛蟠红八年春入贾府，不久入学堂，其在第十年秋闹学堂时，已入学近两年。所以，可知金荣母言薛蟠“这二年”资助其七八十两银子并无时间不合之处。

戴不凡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不少观点至今仍具启迪作用。《红楼梦》的时间问题较为复杂，虽然戴先生所指出的一些时序错乱矛盾并不成立，但其梳理《红楼梦》时序的前提，已默认其整体时序的合理性。即认可《红楼梦》故事时序整体呈矢向进展的事实，承认作者在创作中是在尽力遵循时序，从而否定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曹雪芹有意模糊化、混乱化故事时序的相关论点。

参考文献：

- [1] 戴不凡. 红学评议·外篇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 [2] 曹雪芹. 红楼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3] 贾思聪. 齐民要术 [M]. 清光绪十六至二十四年桐庐袁氏刻浙西村舍丛刻本.
- [4] 史游. 急就篇 [M]. 清同治光绪间福山王氏刻天壤阁丛书汇印本.
- [5] 胡古愚. 树艺篇 [M]. 明纯白斋钞本.
- [6] 萨都拉. 萨天锡诗集 [M]. 明弘治十六年李举刻本.
- [7]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M]. 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
- [8] 何栋如. 皇祖四大法 [M]. 明万历刻本.
- [9] 冯曾, 修. 李汛, 纂. 嘉靖九江府志 [M]. 明嘉靖刻本.
- [10] 胡联浩. 贾宝玉生日新考 [J]. 红楼梦学刊, 2000(4).
- [11] 刘世德. 《红楼梦》版本探微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3.
- [12] 周绍良. 红楼梦论集: 周绍良论红楼梦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13] 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55.
- [14] 王彬. 红楼梦叙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80.
- [15] 董建中. 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 [J]. 清史研究, 1991(1).
- [16] 潘浩. 清代土贡制度简论 [J]. 江汉论坛, 2015(5).
- [17] 何新华. 清代贡物制度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A Study on the Temporal Disorde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Centered around Dai Bufan's *Chronological Chaos*

ZHI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chronology and timing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tudy of tim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ai Bufan once carefully sorted out the story tim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listed 28 timing contradictions in the text.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se contradictions, many of them can not be established. Mainly focused on Jia Baoyu was born in what year, see another year of the scene is contradictory, when Daiyu left Yang, Yinglian was abducted and sold when the age, Xue's departure and the time of entering the capital, grandma Liu into the Rong Fu, Baoyu and other school time these seven questions. On closer examination, Dai is wrong about these seven concentrated episodes of time, and other examples of temporal dislocations related to them fail to hold up.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emporal disorder; Dai Bufan

清人编选的三部咏物诗选本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王 乐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清人编选的三部咏物诗选本,即康熙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贺光烈编《三家咏物诗》及俞琰编《咏物诗选》,在江户后期随商船传至日本,并相继有经过日人抄录或精校的和刻本出版,因此得以在日本幕末明治汉诗坛广泛传播。在此时期涌现的日人整理和创作的咏物诗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和俞琰编《咏物诗选》两部咏物诗选本在体例或创作规范方面产生的显性或隐性的影响。贺光烈编选的《三家咏物诗》为日本咏物诗的创作建立起一种范式,更多地从实际创作层面影响了日本咏物诗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咏物诗;日本汉诗;文化传播;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59-07

日本汉诗创作自古以来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江户时代尤为显著,其汉诗风尚的转移基本与清代保持一致。江户时期,日本汉诗创作达到高潮,尤其是咏物诗的创作广受欢迎。然而,目前学界对清代诗学文献在日本的受容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理论的传播与影响、日本所藏清人诗歌珍本文献的整理以及清诗大家在日本诗坛的受容这三个方面,对于清人咏物诗选本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仍显不足。

在江户时代,日本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仅与中国和荷兰在长崎进行贸易往来。这一时期,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商船成为了中国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清人编纂的三部咏物诗选本——康熙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贺光烈编《三家咏物诗》及俞琰编《咏物诗选》,在江户时代的中后期随着商船抵达日本,随即在日本汉诗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作品不仅被日本学者精心抄录,还经过校对以和刻本的形式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此同时,在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咏物诗创作迎来了一个高峰,菊池五山与大沼枕山等诗坛巨擘的积极倡导,促成了众多咏物诗别集与选本的涌现。三部选本的传入与和刻,契合当时日本汉诗创作需求,为日人整理咏物诗文献和创作咏物诗提供了编纂体例与创作范式。

一、三部咏物诗选本的东传

中国古代咏物诗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

零散的赋物诗句,屈原的《橘颂》和荀子的《蚕赋》则被普遍认为是咏物诗的早期代表作。进入六朝时期,咏物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正式确立,并逐步走向成熟。延至清代,集历代咏物诗之大成的巨著问世,即康熙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佩文斋咏物诗选》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收录了从远古至明代的 14 590 首咏物诗作。最初,该书未进行分卷,直至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根据内容将其分为 486 卷,并将其纳入《四库全书》。该书各卷依照体裁顺序编排,体系宏大且井然有序。

《三家咏物诗》共三卷,由清人贺光烈精心编纂,并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付梓。所谓“三家”,是指元代诗人谢宗可、明代诗人瞿佑、清代诗人张劭。谢宗可长于咏物,有咏物七律 106 首。瞿佑以《剪灯新话》闻名,受谢宗可影响而仿照其例、另立新题,亦赋诗百首,颇有与谢氏一较高下之意。张劭,贺光烈之师,著有《木威诗钞》六卷。谢宗可和瞿佑的咏物诗歌原本各自以单行本流传,贺光烈将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以及其师张劭的 125 首咏物诗集结一处,经过校对后一同刻印,命名为《三家咏物诗》。

俞琰编选的《咏物诗选》,又名《历代咏物诗选》,出版于雍正二年(1724),是继《佩文斋咏物诗选》之后的又一部通代咏物诗总集。该选本有雍正二年(1724)刻本、雍正三年(1725)宁俭堂刻本,体例多遵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以天、地、人、物作为主要分类依据,细分为 30 个类别。与《佩文斋咏物诗选》不同的是,该书专注于收

收稿日期: 2024-12-30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清诗在日本的受容进程(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中心)”(2020xjrc223)。

作者简介: 王乐(1991—),女,山东德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诗学研究。

录近体诗,时间跨度从六朝开始直至明代,同时额外收录了俞琰同乡诗人的作品,选本总共收诗 1385 首。

目前在所见及的舶载书目资料中尚未发现《三家咏物诗》东传的记录,但根据和刻本《三家咏物诗》的序

文可知,此选本在日本汉诗坛颇受瞩目,此点将在后文论及。现根据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之“资料篇”,整理出另两部选本传入日本的详细记录见表 1、表 2。

表 1 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东传日本一览表

次 数	时 间	数 量	数 据 源
1	元文五年(1740)	一部八套	《商舶载来书目》目字号
2	天明二年(1782)	一部八套六十四本	天明二年寅拾番船持渡书改目录写
3	寛政十一年(1799)	廿五部各八套	《外船贡来书目》(寛政十一年末三番船)
4	享和三年(1803)	三部各八套	书籍元帐(享和三年亥八番船改济书籍目录)
5	享和三年(1803)	一部四套	书籍元帐(享和三年亥拾番船改济书籍目录)
6	文化元年(1804)	二部各八套	书籍元帐(文化元年子八番船改济书籍目录)
7	文化二年(1805)	半本七本	瓊浦又綴の内(文化二年丑貳番船)
8	文政十二年(1829)	一部	直组帐(文政十二年丑五番船书籍直组帐)
9	文政十二年(1829)	三十部	直组帐(文政十二年丑五番船书籍直组帐)
10	天保十二年(1841)	一部六套	书籍元帐(天保十二年丑壹番船)
11	弘化元年(1844)	四部各六套	书籍元帐(弘化元年辰四、五、六、七番船)
12	弘化二年(1845)	四部	落札帐(弘化二年巳二番割落札帐)
13	嘉永四年(1851)	一部六十本	书籍元帐(嘉永四年亥一番船)
14	嘉永四年(1851)	一部四十本	书籍元帐(嘉永四年亥四番船)
15	嘉永四年(1851)	一部四套	书籍元帐(嘉永四年亥一番船)

表 2 俞琰《咏物诗选》东传日本一览表

次 数	时 间	数 量	数 据 源
1	宝历九年(1759)	十二部廿四套	《外船贡来书目》(宝历己卯一番船)
2	宝历九年(1759)	五十部五十套	《外船贡来书目》(宝历己卯十番船)
3	宝历九年(1759)	四十部四十套	《外船贡来书目》(宝历己卯十二番船)
4	宝历九年(1759)	一部一套	《商舶载来书目》礼字号
5	天明二年(1782)	一部一套四本	天明二年寅拾番船持渡书改目录写
6	享和元年(1801)	一部一套	《外船贡来书目》(享和元年酉二番外唐船别段卖)
7	弘化三年(1846)	一部一套	书籍元帐(弘化三年午一、二、三番船)

对比同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清人编选的这两部咏物诗选本,被相对频繁且大量地引进日本,反映出当时日本对汉文咏物诗集的迫切需求和市场热度。自日本的元文五年(1740)至嘉永四年(1851),有关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东传的记录有 15 条之多,并且在寛政十一年(1799)和文政十二年(1829),该书一次舶来数量分别达到 25 部、30 部之多,从整个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记录来看,此东传规模对 480 卷、64 册的大部头著作来说实为难得。俞琰《咏物诗选》的东传则集中在和历宝历九年(1759),单次最大规模高达 50 部,与其他清人编选之诗歌选本的东传记录进行横向比较,其东传规模仅次于《御选唐宋诗醇》《佩文斋咏物诗选》《钦定题画诗》《明诗综》4 种。这两部诗选的东传高峰期均集中在江户时代的中后期,这与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咏物诗的蓬勃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咏物诗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在江户时代后期,这一体裁的诗歌在汉诗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诗坛的新潮流。江村北海在和历安永九年(1780)刊刻的《六代咏物诗纂》序文中言及“近时才俊每好咏

物”^[1],已指出咏物诗风尚的萌芽。刊刻于寛政十年(1798)的冈田新川《畅园咏物诗》,其凡例述及此书刊刻目的云:“今钞咏物诗,以应书林之需”^[2],反映出咏物诗作在市场上的紧俏和流行趋势。文化元年(1804)之后,日本汉诗人对咏物诗的热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许多日本汉诗人投身于咏物诗的创作中。比如大沼枕山曾自豪地宣称其咏物诗为其得意之作:“余之最少年,用力于唐宋五古。弱冠左右,好作咏物七律,殆及二百首,颇为得意,以付木板。”^[3]在诗友宴集的场所,咏物诗也发挥出重要的社交作用。中村三蕉言其《咏物百律》之所以成书,乃因“我公(丸龟藩主琴峰公)政务之暇,颇好吟咏,尤嗜咏物,余每陪诗筵,必有赐题”^[4]之故。菊池五山是推动咏物诗创作的领军人物,在与五山来往甚密的梁川星岩、牧野默庵的诗集中,亦多有含“五山堂课题”的咏物诗。菊池五山在教学中亦十分重视咏物诗的推广,“余缔诗社殆四十年,多课以咏物”“余教人学诗,率以咏物为课题,会月一次,殆且三纪”云云^[5],常见论及。此外,菊池五山还与牧野默庵合作,编选并校订了《清人咏物诗钞》,其《五山堂诗话》中也记载了众多涉及咏物诗的条目。

在日本幕末明治汉诗坛咏物诗盛行的情况下,清人编选的三种咏物诗选本的传入恰好迎合了日本汉诗坛的需要,因此一经传入便受到广泛的关注,不久后即有和刻本出版。

二、三部咏物诗选本的和刻

舶载书目中两部选本的东传记录清晰地反映了日本汉籍市场对这些作品的热烈反响,但单凭这些进口书籍,尚不足以满足日本汉诗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汉籍著作之所以能在日本汉籍市场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和刻本的出版。日本学者在编纂和刻本过程中,必然要对原著作品进行筛选和品评,这是汉籍著作在日本汉诗坛被进一步接受和融合的体现。和刻本《咏物诗选》《三家咏物诗》《佩文斋咏物诗选》的陆续出版,不仅使其在日本汉诗坛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得到显著提升,也间接反映出它们在日本幕末明治时期汉诗坛咏物诗发展浪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现依照三部选本和刻本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和刻本《咏物诗选》出版于1781年,该选本由大江玄圃精心编选,其子大江维翰承担校对工作,所依据的底本是雍正三年(1725)刻本。大江维翰于《咏物诗选》校雠十分精细,为了便于日本汉诗人阅读,不仅在正文中标注了片假名的注音,而且在天头处对一些日本汉诗人难以理解的诗句加以注释。如杜甫《返照》诗有“已低鱼腹暗,不尽白盐孤”句,天头处注释云:“鱼腹,浦名。白盐,山名。”^[6]此外,每卷末尾均详细列出了勘误的数量,如卷一末有“右正误凡二十二”、卷八末有“右正误凡十三”等校语。当然,由于文化隔阂,尽管校对质量普遍很高,但仍存在少数错误,如温庭筠《怀真珠亭》“香灯怅望飞琼鬓,凉月殷勤碧玉箫”句,校语云“‘碧’恐‘弄’误”。^[6]其实诗句中的“飞琼”指的是神话中的仙女许飞琼,她是西王母的侍女,擅长音乐。在文学作品中,“飞琼”常喻指歌姬舞女,而“碧玉”指的是晋代汝南王司马亮的妾刘碧玉,因孙绰所作《碧玉歌》而闻名,后来成为古代文学中一个标志性的女性形象,成语“小家碧玉”中的“碧玉”即由此而来,用以形容出身寒微的年轻美丽女子。在古诗词中,“碧玉”也常用来形容年轻美丽的女子或普通人家的女儿。“飞琼”与“碧玉”在词性、意义、色彩、文化意象和平仄上形成了精妙的对仗,使得诗句在音韵、意象和文化内涵上显得和谐而层次丰富。大江维翰将“碧”误校为“弄”,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导致的,对于非母语的汉诗校对者来说,这种误解在所难免。总体来说,该诗集的校对和注释工作都极为细致,反映出编者对作

品的高度重视。

和刻本《三家咏物诗》出版于1810年,在此选本正式刊印之前,谢宗可和瞿佑两位诗人的咏物诗作已经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汉诗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瞿佑《咏物新题诗集》二卷已有和历宝永七年(1710)濑尾源兵卫刊本,谢宗可《咏物诗》一卷亦有和历明和七年(1770)初刻本、文化六年(1809)重刻本。和刻本《三家咏物诗》以清刻本原书为底本翻刻,前有山本北山、松井长民序文。北山在序文中提及,众多日本汉诗界的学者参与了校对工作。

吾门人美浓菅原冰清精于学,善于诗,为人温润敦厚,洒洒落落如光风霁月,与仙台诗人松井长民、美浓诗人梁伯兔相善。长民、伯兔亦皆洒洒落落,不羁乎尘俗矣。三子于诗殊好咏物,尝得合刻谢、瞿、张三家咏物善本,与友人诗佛、淡斋、绿阴校雠数回,遂命荆嗣氏。今兹文化庚午杪冬,既卒业,以数于世,其功于咏物邃矣、醲矣、博矣、清矣。^[7]

由序文可知,此选本由菅原冰清、松井长民、梁川星岩三人组织刊刻,大洼诗佛、佐羽淡斋、山本绿阴参与校雠,六人通力合作,在原书已是“善本”的基础上,对选本进行了多次精心校对。山本北山更是亲自为之作序予以推广,彰显了这本咏物诗选本在当时日本汉诗坛的极高地位。

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的和刻本分为初编与二编,每编均包含两卷两册,由馆柳湾精心从清刻本中依次辑录,并由江户时期的万笈堂书肆负责刊印,均为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形式。初编完成于文化九年(1812),而二编则刊印于文政十三年(1830)。此外,该选本在嘉永三年(1850)还有过一次重印。编选者馆柳湾性格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对诗歌与书法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学诗于龟田鹏斋,在宋诗广受欢迎的时代背景下,他依然坚持推广中晚唐的诗歌风格。馆柳湾热衷于汉诗的和刻工作,编有和刻本汉诗选本十余种,如《金诗选》《晚唐十家绝句》《晚唐诗选》《王荆公绝句》等。另著有汉诗集《柳湾渔唱》一集、二集、三集,其中咏物诗约占半数,菊池五山称其得庄子“乘物以游心”之真谛,“烟波万顷已浩然于胸中,物未始扰其心,吐属清妙”^[8],可见其对咏物一体颇有心得,且造诣非凡。

有趣的是,馆柳湾编选和刻本《佩文斋咏物诗选》的初衷并非为了出版,而是由于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帙浩繁,不易翻阅。馆柳湾为了方便自己随身携带,以备常常查阅,因此抄录在小册子上,后来应书肆之邀才付之梨枣。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以天、地、

人、物为纲,分为 486 类,又有附件者 49 类,每类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的顺序排列。馆柳湾依据清刻本精心挑选,初编覆盖了 251 个类别,二编选录了 171 个类别,总计 332 个类别。在选择诗歌时,他特别考虑了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例如,从第一卷到第四十八卷的“天部”诗歌,涵盖了天文、气象、季节变化以及节日等主题,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因此被广泛收录。除了“瑞气”“立冬”和“佛日”等类别未被收录外,其他类别均有涉及。在“地部”中,被选中的山水诗歌多涉及那些广为人知的名山大川,如泰山、华山,或常被诗人吟咏的“虎丘山”之类,而那些不太知名的山脉如茅山、小孤山和罗浮山则未被收录。对于“地部”中的“门阙”“省掖”和“苑”等与帝王和官员生活紧密相关的类别收录较少,相反,与日常生活更为贴近的“台榭”“亭”和“楼”等类别则被广泛收录。“物部”的“花木类”“兽类”多录其常见于题咏者,如“梅花”“菊花”“牡丹花”“莺”“燕”“鹤”等,而“棠梨”“山矾”“楝花”“鹖”“雕鹗”“骆驼”等则未予收录。在“人部”中,“武备类”诗歌由于涉及战争、狩猎和武器等主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较远,因此收录较少。在“人部”的“人文”类别中,收录标准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例如“仙类”和“道士类”的诗歌并未被收录,而与佛教相关的“佛类”和“佛寺类”诗歌则被广泛收录,这自与日本崇尚佛教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馆柳湾细心筛选和重新编定的和刻本《佩文斋咏物诗选》,虽然在容量上不及御制本,但其四卷四册的格式便于携带和传阅,且保留了原书约 68% 的分类,充分考虑了日本读者的特定需求,无疑是一个更适合日本汉诗人学习和参考的历代咏物诗精选集。

三、三部咏物诗选的影响

三部诗选和刻本的出版是其在日本汉诗坛受容的主要表现,除此之外,三部诗选还引发了日本整理出版其他和刻本咏物诗作以及创作咏物诗的热潮,同时也为日本人整理咏物诗文献和创作咏物诗提供了编纂体例和创作范式。

在幕末明治时期,咏物诗的流行促成了大量别集和选本的涌现,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进行探讨。

第一类是日本人对中土咏物诗的整理和编选,这包括对已有的中国诗集或选本进行的整理和复刻工作,以及基于这些文献资料独立编纂的新选本。中国汉诗向来是日本汉诗创作的借鉴对象,在江户后期咏物风尚萌芽之初,对中国咏物诗作进行整理和再出版,是日本汉诗人必不可少的工作,以期为本国汉诗人提供可供取用的“咏物诗武库”。和刻本《咏物诗选》《佩文斋咏物诗选》《三家咏物诗》即属此类。现根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将江户至明治期间(1603—1912)成书的此类著作整理见表 3。

表 3 江户至明治期间(1603—1912)出版的和刻本咏物诗集表

序号	成书时间	书名	作者	卷数
1	元禄七年(1694)	兰花百咏	邓会(撰)	不分卷
2	宝永七年(1710)	咏物新题诗集	瞿佑(撰)	二卷
3	享保二十一年(1736)	弇园咏物诗	王世贞(撰),小池恒(校)	一卷
4	宝历十一年(1761)	李巨山咏物诗	李峤(撰),石川金谷(校)	二卷
5	明和七年(1770)	咏物诗	谢宗可(撰),高田拥(校)	一卷
6	安永五年(1776)	唐咏物诗选	冈崎庐门(编)	十卷
7	安永九年(1780)	六代咏物诗纂	香山适园(编)	五卷
8	享和三年(1803)	王氏咏物诗选	王銮(编)	三卷
9	文化七年(1810)	三家咏物诗	贺光烈(编),菅原琴等(校)	三卷
10	天明元年(1781)	咏物诗选	俞琰(编),大江资衡(校)	八卷
11	文化九年(1812)	佩文斋咏物诗选初编	康熙(御选),馆柳湾(钞录)	二卷
12	文政七年(1824)	花历百咏	翁长祚(撰),大洼诗佛等(校)	二卷
13	天保元年(1830)	佩文斋咏物诗选二编	康熙(御选),馆柳湾(钞录)	二卷
14	天保七年(1836)	美人百咏	铃木松岚(编)	不分卷
15	弘化元年(1844)	朱之蕃咏物诗	朱之蕃(撰),井伊仁山(辑)	不分卷
16	嘉永五年(1852)	清人咏物诗钞	菊池五山(编)	不分卷

在表 3 的 16 部著作中,可以看到最早受清人编撰之咏物总集影响的是《唐咏物诗选》。《唐咏物诗选》十卷,由冈崎庐门编选,成书于 1776 年。冈崎庐门认为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中收录的诗作时代、诗体混杂,因此他特别挑选出唐代的咏物诗进行单独刊印,命名为《唐咏物诗选》,其实是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的派

生文献。该书收录了 895 首绝句,分为 19 类,序文中提及还有五七言古诗、律诗、排律七十卷待出版。稍后,香山适园编选的《六代咏物诗纂》也与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有着密切关联,六代谓“唐、宋、金、元、明、清”是也。江村北海序文有言:

近时才俊每好咏物,于是咏物纂集比比綉梓。

余阅之,或曰唐人咏物,或曰宋人咏物,或曰明人咏物,作弗咏物也。然而诗局一代,亦从豹之一斑一点也。如求其全豹,独有《佩文斋》纂集而已。但西贾所贵,人苦不易得焉。今也吉甫有撰,可配《佩文》著纂,其绩岂不伟乎?^[1]

与冈崎庐门不同,香山适园和江村北海对“一代之诗”的咏物诗选本并不满足,他们渴望“窥全豹”,而舶载输入的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又难以满足需求,因此编

者竭尽全力编纂此选,虽不及《佩文斋咏物诗选》,亦能解书林之渴。

第二类咏物诗著作是日本人原创的咏物诗集或以此为文献来源的选本,标志着此阶段日本汉诗人咏物诗创作的丰硕成果,此类著作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第一类。虽为日本人原创或原选,但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了清代咏物诗选本的影响。现将江户至明治期间成书的此类著作整理见表4。

表4 日本江户至明治期间(1603—1912)出版的咏物诗集列表

序号	成书时间	书名	作者	卷册
1	承应二年(1653)	倭汉十题杂咏	立论	不分卷
2	贞享四年(1687)	新撰梅花百咏	熙晦岩	一册
3	元禄四年(1691)	菊花百诗	东山润甫	一册
4	元禄十五年(1702)	梅花百咏	小川重胜	一册
5	正德二年(1712)	名墨新咏	松井元泰	一册
6	正德二年(1712)	和李峤百二十咏	公弁法亲王	一卷一册
7	正德五年(1715)	梅花百咏	相良玉山	一册
8	享保五年(1720)	名花百咏	竹内三圭	一册
9	享保十四年(1729)	咏象诗	奥田士亨	一册
10	明和六年(1769)	花月吟	混沌社友(编)	一册
11	安永六年(1777)	日本咏物诗	伊藤君岭	三卷三册
12	天明三年(1783)	樱花百绝	中野焕	一册
13	天明三年(1783)	玩鸥先生咏物杂体百首	太田玩鸥	一册
14	天明六年(1786)	梅花百绝	川合春川	一册
15	天明六年(1786)	花间百咏	宫田五溪	一册
16	宽政二年(1790)	小云栖咏物诗	大典显常	二卷二册
17	宽政十年(1798)	畅园咏物诗	冈田新川	四卷四册
18	宽政十一年(1799)	名山楼咏物百首	岛津天锡	一册
19	文化十年(1813)	咏物入门	大江玄圃(阅);大江维翰(辑)	二卷二册
20	文政七年(1824)	菅茶山花月吟	菅茶山	二册
21	文政九年(1826)	咏物百律	簾太平	一册
22	文政九年(1826)	寰内奇咏甲编	建部裕斋	一册
23	文政十一年(1828)	花月吟	菅茶山	一册
24	天保四年(1833)	落花三十律	都筑虚堂	一册
25	天保六年(1835)	梅花百律	三上恒	一册
26	天保七年(1836)	江户名物诗初编	方外道人(作)	一册
27	天保七年(1836)	樱百绝	荒川常春	一册
28	天保十一年(1840)	咏物诗	大沼枕山	一册
29	天保十一年(1840)	台樱杂咏	大沢顺轩(编)	一册
30	天保十二年(1841)	岁寒堂咏物诗	松井千年	一册
31	天保十二年(1841)	梅花诗集	佚名	一册
32	嘉永元年(1848)	咏物诗	秦同(咏);大沼枕山(编)	一册
33	嘉永二年(1849)	梅东先生雁字诗	山田敬直	一册
34	嘉永五年(1852)	咏雪百首	中岛棕隐	二卷
35	嘉永五年(1852)	梅花百咏	野村円平	一册
36	嘉永六年(1853)	春夏咏物百题	真善	一册
37	文久二年(1862)	梅花百咏	武田栗荫	一册
38	明治九年(1876)	咏石小诗集	片山冲堂	一册
39	明治十一年(1878)	美人百咏	広瀬玄治	一卷一册
40	明治十三年(1880)	大日本刀	幕内幡次郎	一册
41	明治十四年(1881)	芦洲咏物诗钞	植村芦洲	一册
42	明治十七年(1884)	太宰府廿四咏	吉嗣拜山	一册
43	明治十七年(1884)	花月寄兴	大江敬香等	二册
44	明治十九年(1886)	明治狂体咏物诗选	胡逸轮道太	一册
45	明治二十一年(1888)	咏物百律	中村三蕉	一册
46	明治二十四年(1891)	金洞咏物诗钞	智仙	一册
47	明治二十八年(1895)	墨水花月集:古今吟咏	古屋櫻村	一册
48	明治三十六年(1903)	海关咏物诗集	桥本海关	一卷

在表 4 所列的著作中,最早可以看到受清人编撰之咏物诗总集影响的是《日本咏物诗》。《日本咏物诗》是江戸后期庆长、元和以来的首部诗歌总集,也是收录诗人诗作最多的咏物诗总集。由伊藤君岭编撰,并于安永六年(1777)正式出版发行,分为三卷三册。该总集收录了来自 134 位诗人的 545 首诗歌作品,并将这些作品细致划分为 26 个类别。编者伊藤君岭在本书“凡例”中明言:“是编部分题目一遵清俞长仁《咏物诗选》例,盖俞选中吾邦未详名物及有其物而无其咏者,今并缺之。”^[7]将二书所选咏物诗部类及数量进行详细对比可以发现,伊藤君岭的选诗标准确实大体上遵循了俞琰的体系,同时根据日本文化的特点进行了适当调整。

在俞琰划分的 30 个部类中,伊藤君岭删除了岁时部、巧艺部、谷部、水族杂部,除“岁时部”外,其他 3 种部类盖其凡例中所云“吾邦未详名物及有其物而无其咏者”。另外,在地部、山部、水部、居处部等分类中,《日本咏物诗》所收录诗歌数量远远少于俞琰的《咏物诗选》。这些类别通常涉及自然景观和地理环境,反映了诗人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观察与感受。《咏物诗选》在这些类别中收录的诗歌数量较多,可能是因为中国诗人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为丰富和细腻。而日本汉诗人在创作时,虽然也受到自然景观的启发,但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与日本本土文化密切相关的题材,因此在这些类别中的诗歌数量相对较少。相对而言,在杂玩部、饮食部、花部、木部、草部、鸟部等部类中,二书在作品数量上则显示出较高的相似性。这些类别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品和生物,是与日人敏感于季节变化、擅长细腻的情感表达的审美特性相契合的咏物题材。另外,为了强调日本特色,伊藤君岭选择将“樱花”置于“花部”的首位,这与俞琰将“梅花”放在首位的做法形成了对比。

伊藤还对俞琰的选诗标准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认为尽管俞琰的选本以咏物为主题,但在各个部分中包含了过多的内容,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并称“余不敢效之”^[7],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体类”意识。例如俞琰在编选《咏物诗选》时,按照《佩文斋咏物诗选》的惯例设立“岁时部”,而伊藤君岭则未遵循此例,因为他认为“岁时”并不属于咏物的范畴。其后冈田新川《畅园咏物诗》在凡例中也提到:“辑咏物之诗,例设‘岁时’部,是集不载者,别有《畅园节序诗》故也。”^[12]咏物诗设“岁时”部,起源自《佩文斋咏物诗选》,“辑咏物之诗,例设‘岁时’部”云云,一方面可以看出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在体例方面成为了日人编选咏物诗选本的轨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日人对这一轨范不足之处的反思和修正。

从和刻本咏物诗集的数量上来看,在《唐咏物诗

选》刊刻之前,仅有 3 部中国咏物诗集的和刻本,分别是邓会的《兰花百咏》、瞿佑的《咏物新题诗集》以及王世贞的《弇园咏物诗》。而且这三部和刻本均以清刻本为底本,编者只需在清刻本的基础上进行筛选与校对即可。然而,在《唐咏物诗选》刊刻之后,中国咏物诗的和刻本数量显著增加,多达 13 部。其中,《六代咏物诗纂》《美人百咏》和《清人咏物诗钞》这三种总集均由编者从众多诗集和总集中辑录而成,耗费了编者大量精力。以《日本咏物诗》的刊刻为界,日本原创的咏物诗著作在数量上更是呈现出前后比例悬殊的情况,早期与后期的比例高达 5:19,且早期作品的题材远不如后期丰富。从这一数据比例来看,《佩文斋咏物诗选》与俞琰的《咏物诗选》不仅在体例上对日本咏物诗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提升了日本诗人对咏物诗的关注度以及创作热情。

与前两部咏物诗选本不同,和刻本《三家咏物诗》为日本咏物诗的创作建立起一种范式,更多地从实际创作层面上影响了日本咏物诗的发展。此选本刊刻后,在日本汉诗坛引起强烈反响,收获好评如潮。香山适园如此评价三家咏物诗:“咏物之什,古人有焉。然而至四唐诸大家,固无辞之可赞。自来若谢宗可、瞿佑、张劭诸人,其巧极矣。”^[11]山本北山在为《三家咏物诗》撰写的序言中首次将谢、瞿、张三位诗人的作品誉为咏物诗的典范:

吾闻赋事虚而易,譬犹画写鬼神;咏物实而难,譬犹画描人物。抑难矣,以故遂别一种体裁,至元殊为盛。先是无辑编咏物诗为一篇书者也,其为之昉于元人萨都刺,谢宗可继之,明有瞿宗吉,清有张木威,咸咏物规范也。^[9]

大沼枕山附和其说,以三家咏物诗为最:“古人咏物之诗,以元之谢宗可、明之瞿宗吉、清之张木威为最,因号三家。”^[10]井伊仁山亦言:“往岁仙台诗人松井长民镌元、明、清三家咏物,以布于世,诗家多取为著题模范,至今盛行。”^[11]可见三家咏物诗作为创作典范的观点在日本汉诗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它们在日本汉诗人咏物诗创作上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在日本汉诗人中,大洼诗佛无疑是受到《三家咏物诗》影响最深的一位,他不仅深入研习,还亲自参与了和刻本的校对工作。通过对比大洼诗佛《诗圣堂诗集》中的咏物诗与三家咏物诗,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构思诗句、选择物象,还是运用典故方面,大洼诗佛都深受三家咏物诗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创新。此点已有专文论及^①,故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清人编选的三部咏物诗选本,即御制

① 详情请参见张陶《近世中国与日本汉文学》第十九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48-363 页。

《佩文斋咏物诗选》、贺光烈编选的《三家咏物诗》和俞琰编选的《咏物诗选》,在咏物诗风尚萌芽的江户中后期传入日本,并相继有和刻本出版发行,在日本幕末明治汉诗坛广泛传播,对这一时期日本咏物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阶段涌现的日本人整理和创作的咏物诗选本中,可以看到前两部咏物诗选本对日本咏物诗在体例或创作规范方面产生的显性或隐性的影响。贺光烈编选的《三家咏物诗》亦备受日本人珍重,其贡献在于为日本咏物诗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创作范式,在创作层面对日本咏物诗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香山适园,编辑. 六代咏物诗纂 [M]. 京都:文林轩,1780:序文页.
- [2] 冈田新川. 畅园咏物诗 [M]. 爱知:永乐堂,1798:序文页.
- [3] 井田智仙. 金洞咏物诗钞 [M]. 东京:井田智仙,1891:序文页.
- [4] 中村桑子榆. 咏物百律 [M]. 高松:植田竹次郎,1888:序文页.
- [5] 大沼枕山. 咏物诗 [M]. 东京:和泉屋吉兵卫,1848:序文页.
- [6] 大江玄圃,校订. 咏物诗选 [M]. 京都:林权兵卫,1781:1.
- [7] 伊藤君岭,选. 日本咏物诗 [M]. 爱知:东壁堂,1777:序文页.
- [8] 馆机枢卿氏. 柳湾渔唱 [M]. 东京:万笈堂,1877:序文页.
- [9] 谢宗可,瞿宗吉,张木威. 三家咏物诗 [M]. 菅原老山,松井梅屋,梁诗禅,校. [出版地不详]:文光堂,1825:序文页.
- [10] 植村芦洲. 芦洲咏物诗钞 [M]. 东京:小菅直太郎,1881:序文页.
- [11] 井伊源左卫门,编辑. 朱之蕃咏物诗 [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 [出版时间不详]:序文页.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ree Qing-Dynasty Anthologies of Object-Praising Poetry in Japan

WANG L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ree poetry collections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Peiwenzhai Yongwu Shixuan*, *Sanjia Yongwu Shi* collected by He Guanglie, and *Yongwu Shixuan* collected by Yu Yan, were shipped to Japan with merchant ship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do Period. They have received the attention and praise of the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field. And they have been copied or refined by Japanese and printed successively, which greatly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yle of poems describing objects in the late Edo Period and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In the works of chanting poems organized and created by Japanese people in this period, we can see the explicit or implicit influence of the first two selected poems on the style or creation norms. The influence of He Guanglie's books on Japanese chant poetry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radigm in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chant poetry,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hant poetry from the practical creation level.

Key words: Yongwu Poetry of Qing Dynasty; Japanese Chinese poetry; cultural diffusion; impact analysis

古尔纳《天堂》中的跨文化空间及其文化意义

高文惠, 崔秀霞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 古尔纳的《天堂》通过一个被父母遗弃的斯瓦西里儿童的成长史, 构建了东非印度洋沿岸地带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跨文化空间。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前殖民社会向殖民社会过渡的时期, 这一过渡时空中的多层社会权力结构和不稳定的社会运转状态是《天堂》描绘的中心。《天堂》中的商旅叙事集中反映了东非社会脆弱的社会运转状况, 以及混居族群间的刻板印象。通过这些描写, 古尔纳揭示了东非印度洋沿岸地带尤其是桑给巴尔在欧洲殖民力量的冲击下一触即溃的内部原因。

关键词: 古尔纳; 《天堂》; 跨文化空间;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66-04

《天堂》(Paradise)是英籍非裔的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 1994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古尔纳长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曾被列入布克奖的短名单。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古尔纳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人们怎样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探讨的是地区的文化意义。我记得在《天堂》的创作之初,我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怎样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什么?又是什么影响了这种理解?”^{[1]163}通过虚构故事探索桑给巴尔所在的东非印度洋沿海地区的文化意义是《天堂》的一个重要诉求。与非洲其他地区相比,东非印度洋沿海地带呈现为多族群混居的跨文化特征。小说通过主人公尤素福寻找地上乐园的精神历程和跟随阿拉伯商队由印度洋海岸地带深入非洲内陆的商贸之旅,展示了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东非海岸地带多族群文化交织的跨文化空间的复杂性,呈现了古尔纳对东非印度洋沿海地区混杂文化土壤、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本质问题的独到理解。

一、多元混杂的跨文化空间

古尔纳的故乡桑给巴尔由东非沿海的一系列岛屿组成,属于混合了非洲本土班图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斯瓦西里文化区,“‘斯瓦西里’一词源自阿拉

伯文‘斯瓦西拉’,意为‘沿海地区居民’。这些人因与波斯和阿拉伯半岛有着频繁的贸易而兴盛起来”^{[2]797}。作为重要的印度洋贸易口岸和海上要冲,该地区早在 7 世纪后期就开始了与阿拉伯、印度、波斯等地的文化进行接触,大量的阿拉伯人迁移到该地区居住,波斯设拉子人还曾经在这片区域建立过强大的桑给帝国。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进入,该地区自 16 世纪起与欧洲文化开始了被动的接触。总之,桑给巴尔的历史脉络极为复杂,文化上呈现为非洲土著、阿拉伯、印度等多元文化的交融共处,居民虽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但其信仰体系中也并存着本土宗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其他信仰。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用古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我出生成长的东非海岸更为复杂的”^{[3]128-129}地方了。出于这种切身体验,古尔纳小说中的东非也从来不是种族和宗教同质化的非洲,而是“用出现在独立前后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的各种族群的混杂和冲突状况来动摇民族主义概念,并指向东非印度洋沿岸各种文化纵横交织的关系历史”^{[3]125}。也就是说,在古尔纳看来,东非需要被想象成“地理上毗邻地区的跨文化、跨语言空间”^{[3]125}。《天堂》中的桑给巴尔就被描绘成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跨文化空间。研究者法齐亚·穆斯塔法(Fawzia Mustafa)指出:“《天堂》的世界是由印度洋海岸的伊斯兰世界、非洲腹地的非伊斯兰世界和刚刚进入非洲的欧洲殖民世界混合在一起形成的复

收稿日期: 2024-11-13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南部非洲地区女性英语文学研究”(22CWWJ01)。

作者简介: 高文惠(1971—),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杂社会、政治结合体”^{[4]14}。具体来说,《天堂》对东非印度洋沿岸跨文化空间的描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多元复合的人物谱系。主人公尤素福的父亲是沿海地带非洲原住民血统的阿拉伯人,母亲则是非洲内陆的原住民。这种血统的混合正是东非海岸斯瓦西里民族属性的典型特征。尤素福的伙伴哈利勒、主人阿齐兹、山区小店店主哈米德、商队的领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商队监工辛巴·姆文等均是阿拉伯商人,机修工卡拉辛加则是印度人、卡车司机巴克斯是希腊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商队的成员中还有一些索马里人等。阿齐兹商队的向导、商队所到的各部落的居民都是非洲原住民班图人。伊斯兰教是《天堂》这个虚构世界的主流宗教,除此之外,小说还涉及到了锡克教、非洲本土神灵信仰、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小说中人物血统及宗教信仰的多元性正是对东非海岸复杂文化语境的真实反映。

二是地域空间的交叉性。导致地域空间交叉性的核心动力是商旅活动。尤素福一家原本生活在南部一个群山环绕的农业小镇,后来迁移到内陆小镇卡瓦,因为“当德国人把卡瓦当作他们正在建设的通向东非高原的铁路线的仓库以后,这个地方繁荣了起来”^{[5]5}。尤素福的父母离开卡瓦,则是因为小镇的“繁荣很快就过去了,现在火车在这儿停下,仅仅是为了装木材和补给水”^{[5]5}。由于经济萧条,为了抵债,父亲将尤素福卖给阿齐兹。尤素福跟着阿齐兹来到海边的一个不知名小镇。尤素福早期的被动迁移作为故事的开端,起因明显是商贸关系。在阿齐兹的商铺里工作了4年之后,阿齐兹安排他参加了阿拉伯商队前往非洲内陆的两次商业旅行。第二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在幽暗和苍翠的山区的最深处”^{[5]119}的东非内陆湖区,从沿海到内陆,从内陆到湖区的旅行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空间的穿越,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斯瓦西里商人与内陆原住民和欧洲殖民者相遇并产生了互动。

三是源自不同文化的文本的互文性。小说的第2、3、4章的叙述与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中心》有明显的互文关系。两部小说中的旅程有共同的目的地——非洲内陆,共同的目标——象牙、橡胶、黄金等,两部作品呈现的非洲腹地有共同之处——贫穷、野蛮、疾病、不同族群的冲突等。小说对东非海岸阿拉伯商队两千年贸易史的回顾、对商队甘冒巨大风险也要外出进行贸易活动呈现出的商业精神、商队成员在商旅活动中呈现的商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千零一夜》的艺术世界中商人们忙碌的身影及对财富的巨大欲望;《天堂》与《圣经》《古兰经》这两部宗教经典的互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天堂”的书

名就明确指向伊甸乐园的主题。尤素福被父母抵债为奴被动离开家乡,就像伊甸乐园里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一样,总是想重回作为生命源头的那个乐园。《天堂》的第5章“血块”的章名则直接取自《古兰经》第96章的章名。尤素福被家人卖掉、遭女主人调戏却被女主人反污的情节模式是《圣经·创世记》中约瑟传说的现代翻版。尤素福这个名字则与《古兰经》第12章尤素福的故事有更为直接的关联,在尤素福的衬衣是从后背被女主人撕破的、主人确信一切皆是妻子的诡计等细节处,《天堂》也与《古兰经》有更多的暗合和对应;此外,《天堂》和斯瓦西里语的一些文本也具有互文关系,学者穆斯塔法专门对此进行过细致的梳理,他指出,“‘内陆之旅’和‘火焰之门’这两部分的观念源头是塞勒曼·本·姆文耶·钱德(Selemani bin Mwenye Chande)的《我的非洲之旅》(*Safari Yangu ya Bara Afrika*)……另外一个斯瓦希里语文本来源是托罗·本·姆维尼·巴卡里的《斯瓦西里人的风俗》(*Desturi za Waswahili*),这本书可能为古尔纳在《天堂》中表现契约奴内心生活和描绘日常生活细节提供了素材”^{[4]16}。这样,在《天堂》的叙述底层,其实存在着与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非洲斯瓦西里民间文本、欧洲帝国主义旅行叙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故事等来自不同文化的多个文本的对话,这些潜在对话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文本关系网络,而文本对话的实质,则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总之,《天堂》中呈现的多元复合人物谱系、跨文化空间的商旅活动、多元文化文本的互文关系等交织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跨文化的空间。在古尔纳搭建的这个跨文化空间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和交互作用是造成东非印度洋沿岸地区独特文化特征的根源。

二、过渡时期混杂空间中的多层权力结构

《天堂》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古尔纳在小说中似乎用德国指代欧洲殖民势力)殖民统治刚刚开始,桑给巴尔人意识到一些变化即将到来的时刻。然而,《天堂》的“叙述对德国殖民主义的涉及是间接的,大多数情况下提及的德国人都是传闻和谣言,叙述的中心在于描述德国殖民之前、殖民秩序与非洲传统社会秩序共存期间,以及德国殖民秩序初建时期的社会和经济空间。小说的结尾……将前殖民和殖民空间结合在了一起,这促使我们去思考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6]54}。《天堂》并非将再现欧洲殖民势力给东非带来的灾难性变化作为中心主题,其核心内容实际上描绘的是从前殖民时期向殖民社会过渡的阶段,东非海岸在混杂的文化土

壤里所形成的多层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各个力量之间力求达成平衡的权力关系图景。

《天堂》中物理空间的权力图景,呈现为等级序列结构。最低一层是内陆空间,被描绘为盛行野蛮风俗的蛮荒之地。居于中间的是以尤素福的家乡卡瓦镇为代表的通往海岸的铁路沿线地区,其兴衰完全取决于贸易线的改变。最高一层是阿齐兹的家所在的印度洋沿海地带,这是商业中心和富庶之地。沿海地带的居民先天有一种优越感,哈密德的自豪之感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意识:“你知道我们这些从沿海地区来的人称呼自己为绅士吗?……这个称呼意味着我们是有荣誉的人,这是我们称呼自己的方式,尤其是身处这里的恶魔和野蛮人之中时。”^{[5]99-100}沿海地区不仅把内陆地区当作商业征服的对象,而且也看不起中间地带。哈利勒在向顾客介绍刚到沿海地区的尤素福时说:“他看起来如此瘦弱,是因为他刚从野蛮之地来到这里,他的家乡就在山的后面。在那儿,他们只有木薯和野草可吃。所以他才像个半死不活的人。”^{[5]22}

与地理空间的等级序列相对应,居住在不同空间的族群也有相对应的社会角色,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如阿拉伯人大多从事贸易,属于富有阶层,从事金融信贷的大多是印度人,尤其是古吉拉特人。斯瓦西里人大多是些像尤素福父亲那样的小业主和商人,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并不富裕,但却看不起从高地、湖区、草原等内陆地区来铁路沿线给德国人打工的原住民,将他们视为“崇拜住在树上和岩石里的精灵和魔鬼”^{[5]6}的野蛮人。生活在铁路沿线和沿海地带的阿拉伯人、印度人、斯瓦西里人等对内陆的原住民则普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家庭信仰混杂的锡克教徒卡拉辛加声明自己决心把《古兰经》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目的是嘲讽伊斯兰教的不宽容。姑且不论这种表述背后的文化冲突意味,仅从“让你们这些愚蠢的原住民听到你们所敬拜的真主的咆哮”^{[5]84}这句话来看,对“愚蠢的原住民”的定义潜藏着外来文化对本土进行改造的欲望,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征服。

在《天堂》所反映的外来文化中,欧洲文化的支配性力量渐渐凸显,成为东非沿海地区权力结构中的新顶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意识到,欧洲人将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东非社会即将迎来新的变化。尤素福最终主动追随德国征兵部队离开,则是前殖民地与殖民地空间开始结合在一起的重要表征。

三、混居族群间的商业往来与彼此间的刻板印象

古尔纳一向反对根据人的外貌和血统认定人的身

份。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出:“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天堂》这样的作品去丰富人们的认知。我认为有必要试着写写,看看如果笔下有一个实际上支离破碎的社会,它会如何运作。支离破碎并不意味着无法运作,而是以不一样的方式运作。所以我想描绘这样一个世界:它虽然总是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但仍然有接近于公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之类的东西。”^{[7]81-82}也就是说,古尔纳在《天堂》中试图展现桑给巴尔的社会运转状况。

《天堂》的核心事件是阿拉伯商队深入内陆的贸易之旅。从某种意义上说,尤素福追随商队两次深入非洲内陆的商业旅行,可以视为他的成长教育史。旅行之初,领队阿卜杜拉就告诉尤素福:“你会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做买卖,学习文明人和野蛮人商业方法的不同之处”^{[5]52}。通过尤素福的眼睛,古尔纳既展示了沿海和内陆、阿拉伯商人与非洲原住民的商业模式,也揭示了族群交往中彼此的刻板印象。

各个族群均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和习俗。阿拉伯人的商队有自己的组织、运行模式和一定的规模,如阿齐兹第二次商业远征的商队里就有“四十五个脚夫和护卫,但与上个世纪膨胀的商队相比还不算大”^{[5]109}。商队成员一般由商人、领队、监工、脚夫、护卫、翻译、向导等组成。每次出发、归来或到达目的地时,都要有鼓乐开道。阿拉伯商队进入内陆地带,与非洲土著部落进行贸易的方式是以货易货。就商队来说,是为了获取利润,就内陆各部落来说,是为了换取生活所需。双方谈妥后,一般来说部落酋长也会接待商队,给他们补足给养。各个部落有自己的习俗,进入部落的商队也必须遵守。

阿拉伯商队和非洲各部落进行和平交易基本靠双方的习俗和信用。靠习俗和信用维系的社会一旦信用受损,交往双方努力维持的力量平衡就会遭到破坏。阿齐兹的商队在最终目的地马龙古遭遇重创,货物被扣留,成员生命面临巨大危险。酋长查图认为,阿齐兹的前行者偷走象牙和黄金的恶劣行为,使“灾难开始降临到我们头上。你们到这儿是来加深我们的灾难的”^{[5]160}。扣留商队的货物,查图认为是一种公正的补偿,“我拿走你们的货物,这样就可以抵消你的兄弟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给我的百姓以公正”^{[5]165}。阿拉伯商队与土著部落发生的这场冲突显示了不同文化间的平衡是相当脆弱的。然而东非地区几百年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维持着社会的运转。

在小说反映的那个年代,这种不稳定的文化博弈和脆弱的力量平衡终因欧洲人的到来而难以为继。一队偶然来到马龙古的欧洲人以政府法律的名义,调停了阿拉伯商队与土著部落的冲突。查图交还了扣押的

大部分货物,而商队则交出了枪支,因为“政府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秩序,没有必要拥有枪支了”^{[5]171}。摆脱困境的阿齐兹为阿拉伯商队和原住民部落不能按传统商业协商模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而倍感沮丧,他感慨道:“现在欧洲人已经到了那里,他们将来会拿走整片土地。”^{[5]172}小说中的侯赛因预见了欧洲人将给非洲带来深刻的变化:“我们会失去所有,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5]187}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因预感到欧洲人的到来对东非传统生活模式的冲击而陷入惶惑、恐惧和愤怒的情绪。

在《天堂》的商旅叙事中,导致混居族群在商业活动中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彼此之间的刻板印象。在原住民眼里,来自沿海地带的商人是掠夺者和瘟神,而沿海地区的居民则视内陆土著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另一方面新到非洲的欧洲人则把整个非洲人视为野蛮人。《天堂》的商旅叙事中,鲜明地展示了东非混居族群因缺乏共同文化粘合而导致的社会运转支离破碎的状况,这正是古尔纳创作《天堂》的主要意图:“要说《天堂》一书真有意图,那就是要说明,不同社群之间谋求平衡的复杂行为——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到来时沿海地区一触即溃的原因。”^{[7]82}

综上所述,《天堂》主要描述了前殖民与殖民转换时期的桑给巴尔及其所在的东非印度洋沿海地带的跨文化空间。通过主人公尤素福的成长史,古尔纳勾

勒出了该地区等级序列的权利结构图景,揭示了因缺乏文化的粘合而导致的混居族群间社会运转的破碎状况。这一状况则是该地区在欧洲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一触即溃的重要内部原因。在小说结尾,尤素福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他们体验到的充满压迫的传统社会空间”^{[6]60},随前来征兵的德国军队离去,这个选择暗示着东非传统文化空间正遭遇巨大挑战。

参考文献:

- [1] STEINER T. *A Conversation with Abdulrazak Gurnah*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013 (1): 157-167.
- [2] 拉尔夫,伯恩斯,米查姆,勒纳.世界文明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3] STEINER T. *Writing "Wider Worlds": The Role of Relation in Abdulrazak Gurnah's Fiction*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10 (3): 124-135.
- [4] MUSTAFA F. *Swahili Histories and Texts in Abdulrazak Gurnah's Paradise*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015 (1): 14-29.
- [5] GURNAH A. *Paradise* [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 [6] BERMAN N. *Yusuf's Choice: East African Agency During the German Colonial Period in Abdulrazak Gurnah's Novel Paradise* [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013 (1): 37-41.
- [7] 纳斯塔,著.刘子敏,译.“不易说清的东西”:阿卜杜勒扎扎克·古尔纳访谈录[J].世界文学,2022(2): 74-84.

The Intercultural Space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Gurnah's *Paradise*

GAO Wenhui, CUI Xiu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Gurnah's *Paradise* constructs a cross-cultural space formed by the mixed-culture soil in Zanzibar and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Indian Ocean in East Africa through the growth history of a Swahili child abandoned by his parent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the novel's story is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pre-colonial society to the colonial society. The multi-layer social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unstable social operation in this transitional time-space are the focus depicted in *Paradise*. The narrative of merchants and travelers in *Paradise* centrally reflects the fragile social operation in East African society and the stereotypes among the mixed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se descriptions, Gurnah reveals the internal reasons for the vulnerability of Zanziba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uropean forces.

Key words: Gurnah; *Paradise*; intercultural space; cultural significance

对抗性的发现

——论阿多诺电影思想的嬗变

莫小红, 陈 啸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 要:从视电影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 到发掘电影内在的对抗性, 阿多诺的电影观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在阿多诺的前期思想中, 他认为电影是高度同一化的文化工业产品, 其内部冲突被消解, 观众的思考能力被剥夺。然而, 随着德国新电影运动的兴起, 阿多诺看到了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包含的“隐藏讯息”。他认为电影的内在影像运动, 特别是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能打破图像和书写的界限, 赋予电影内在对抗性。同时, 阿多诺也修正了前期对于电影与音乐关系的看法, 提倡电影与音乐的融合, 认为电影的“先验集体性”具有解放潜力。

关键词:阿多诺; 电影思想; 嬗变

中图分类号: J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70-05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阿多诺的电影思想伴随着他的人生经历以及电影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流亡英美期间, 他看到了文化工业模式下好莱坞电影的弊端, 认为电影对人的思想进行了高度集中的控制, 使大众丧失了思考能力, 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回到德国之后, 随着电影运动的兴起以及电影理论的发展, 阿多诺企图打破好莱坞确立的惯例, 创造出一种“新”的电影。基于此, 阿多诺逐渐修正了对电影的认知, 看待电影的视角更加全面、更为深刻, 并在电影中有了对抗性的发现, 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解放社会的潜力。

一、从同一性复制到对抗性显现: 电影功能认识的转变

阿多诺认为, 在商业利益驱使下, 所有的电影趋于一致, 电影内部的冲突被消解, 电影审美表象的独立性丧失。在好莱坞, 塞纳开创了制片人专权的先例, 制片人拥有影片拍摄的最终决定权, 甚至可以任意修改剧本。制片人为了让影片投资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 往往为了利益舍弃艺术。观众对影片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与演员有关, 因此制片人往往对演员进行类型化、平面化的包装, 将演员塑造为某种类型或气质的代表以吸引观众。于是许多电影演员被捧红, 形成一种明星制度。

阿多诺指出, 文化工业电影模糊了形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电影中所表现的形象统治着叙事的流程, 观众会将电影中的角色等同于演员本身, 将银幕影像等同于现实生活。

阿多诺反对电影复制技术, 认为电影通过一种重复的方式对现实不加变动地复制, 成为控制现实的手段。电影为现实生活带来了表面的诗学, 这种伪诗学用奢华表演的力量包装现实欺骗成年人, 并为他们准备了“延伸的童年”以至于让他们可以一直做未成年人。电影伪诗学中表现的每一个被强调的客观性都是被意识形态所期许的,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 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 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1]63}。阿多诺认为, 想象活动能够把电影中分散的现实元素聚合为真理性的期待, 但在高度复制技术的影响之下, 观众的想象活动被机械的控制机制所取代, 作为能动性的观众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只能被动地接受电影带来的一切既定的程序, 并还会心甘情愿地为其“鼓掌”。在这一过程中, 电影内部冲突被消解——电影制造出一种美好的梦, 使大众误以为现实也是这样的, 从而安于现状, 最终达到服从统治的目的。

20 世纪 60 年代德国新电影运动兴起。以亚历山大·克鲁格为首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在奥博豪森电影节上发表宣言, 宣告旧电影灭亡, 并提出新电影理念。德

收稿日期: 2025-02-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古典美学批评研究”(24YBA137)。

作者简介: 莫小红(1978—), 女, 湖南桃江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文艺美学。

国新电影运动在电影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革新,试图摆脱好莱坞制片制度的影响,创造出一种“新”电影。阿多诺认为,旧的德国电影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挑选的演员都是毫无瑕疵的,总是致力于营造一种完美的图景,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在德国新电影运动之后,阿多诺发现电影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电影应该像漂亮姑娘脸上的“瑕疵”一样,只有“瑕疵”才能打破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欺骗性。“瑕疵”意味着电影里也包含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内容,电影在表现的过程中可以和大众文化原本预设的效果产生偏差。正是在德国新电影运动的影响下,阿多诺看到了电影的解放潜力。他认为,电影内部存在着对抗性,并指出“没有完全掌握文化工业的技术的那些作品表现出了一些有幸未被控制的、偶然的東西,因而具有解放性质”^{[2]220}。阿多诺由此修正了之前对电影功能认识的批判态度,认为在文化工业技术的影响下也存在着某些未被控制的东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也可以主动作出选择。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指出,“使用广电媒体是一种高度习惯性和非理性的活动,比起使用媒体带来的满足感,那些有动机指导和经过选择的特定节目或内容可能会相形见绌”^{[3]135}。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征。阿多诺认为这种“非理性”特征使电影实际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工业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目的与其预设的影响模式以及影响观众的实际模式这三者之间并不一致。由于大众媒介自身理性和算计的特性,与真正的艺术作品相比,大众媒介表达的意义更加清晰,因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浓缩为若干个清晰的“讯息”,这是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优于艺术作品之处。电影传递出的多义层次是为了同时在几个心理层面迷惑观众而精心设计的,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中含有“隐藏讯息”和“公开讯息”,“隐藏讯息”比“公开讯息”更为重要,“隐藏的讯息脱离了意识的控制,不会被‘看穿’,不会被销售阻力阻挡,但是很可能会沉淀在观众的心灵中”^{[4]341}。所以相比于电影中的“公开讯息”,“隐藏讯息”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控制,虽然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会轻易觉察,但这些讯息仍能给观众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阿多诺指出,“大众媒介也包含了许多互相叠加的不同意义层面,每个层面都对效果有作用”^{[4]341}。大众传媒这种或隐或显、互相叠加的特点是由于文化工业的生产采纳了精神分析的多层人格概念。文化工业为了生产就必须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权衡,因此电影中包含了多层次的行为反应模式。与意识形态相符的被称为正式的模式,与正式的模式交叠在一起的是非正式的

模式,后者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但会被正式模式中中和消解。虽然被消解了,但为了能够吸引消费者以获得商业利益,文化工业不得不给予某种替代性的满足。在电影“隐藏讯息”层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大量被压抑的满足,被禁忌所压抑的力比多会以某种笑话的方式或者某种揭示性的情境浮现出来,这种力比多行为模式虽被压抑,却因电影的传播而得到大众的一致认可,如在德国或是保守的瑞士和天主教罗马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男孩、女孩手挽手过马路、旁若无人的亲吻,这些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想要操纵大众的意图与其想要控制的社会充满着内在矛盾,文化工业在电影中采用多层次的行为模式试图对社会进行控制,但这一过程又会使其无意中泄露“隐藏讯息”。这一“隐藏讯息”具有脱离意识形态的性质,是一种异质的意识形态,对解放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正如阿多诺所说的那样“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自身谎言的解药”^{[2]225}。

二、从图像书写到影像运动:电影技术认识的转变

最早察觉到电影语言重要性的是法国电影理论家维克多·贝罗。1919年他在法国的《迫击炮》杂志上发文指出“电影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字,一种原始时代的象形文字”^{[5]91}。这一论断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的普遍性和直观性,认为电影画面具有像语言文字一样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的功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指出“象形文字表明,文字最初也具有有一种图示功能”^{[6]12}。在这种象形文字中,文字和图象是相融合的。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字与图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分离。阿多诺认为,在无声电影时期,电影的图像和书写符号是交替出现的,突出了电影图像的形象特征;而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受文化工业垄断的影响,电影实现了从图像到文字的转变。麦克卢汉指出,“在好莱坞,无声电影配音以后就减少并最终消除了模仿动作的作用”^{[7]27}。随着技术的进步,好莱坞有声电影的出现使表演当中的触觉与动感消失了,图像的模仿欲望被文字的模仿欲望所取代,电影图像书写化特点开始显现。阿多诺指出电影中“形象是被捕捉而不是被思考的”^{[4]325}。从视觉的角度来看,电影图像技术的转换类似于书写形式,观众的眼睛在观看电影时如同阅读文字,电影胶片的每一次切换就像是书本翻页,阿多诺称这种特性为电影的“似书写性”,这种“似书写性”加重了大众文化的象形性,观众把图像当成文字符号,不经思考加以接受。由于文化工业排斥任何难以被理解的

东西,它必然要求回到过去的生产模式中。电影中的形象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观众通过认同电影所提供的形象,接受了电影所给的虚假的社会身份。在电影中,大众文化看似在处理冲突,其实整个进程又没有冲突,这是因为电影胶卷具有无抵抗、平滑展开的特性。电影通过不间断的摄影序列塑造人物形象,所以在每次图像转换之前观众就已经预判了冲突的发展,已经提前知道主人公有可能死掉。然而他的死激不起任何水花,因为电影里半真半假的死亡是预先就知道的,所以不能引发观众的任何思考,观众不会在意电影图像的细枝末节。图像被文字符号取代,文化工业所传输的“道理”就不经思考地直接灌输进观众的脑子。文化工业抛弃了无声电影时期图像和书写符号的交替叙事的传统模式,电影中的书写符号被驱逐,图像本身完全转换成了书写,电影呈现出图像书写化的特点。

本雅明对复制技术有不同的认识,他指出“摄影机总是不断地改变镜头来对准演出现场。电影的这种状态是通过按照剪辑顺序提供给它的材料组接在一起的,一种由剪辑合成的电影也由此产生”^{[8]14}。电影的成片 and 镜头的切换剪辑等都是可以通过剪辑组合来修正的,电影的拍摄技术是一种可变化的、运动的状态,本雅明的这种电影观影响了阿多诺的电影思想。阿多诺指出,“正是在运动的间断中,内在独白的影响仿佛是创作的现象:写作现象在我们眼前的相似运动确定了分离的征兆”^{[2]223}。他认为最可信的电影技术理论就是带有运动性质的摄影技术。通过摄影机的运动,电影能够弥合图像和书写的分离,将二者结合起来。内在影像的运动对于电影来说就好比视觉世界对于绘画的作用,是认识电影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式。正是因为电影拍摄技术是可以变化的,所以电影有潜在的脱离意识形态控制的可能性,从而蕴含某种革命性质。

传统的蒙太奇镜头是按照剧情的逻辑进行排列的。安德列·巴赞对此提出批判,认为传统的蒙太奇镜头切换手法破坏了观看主体与客体间的独立性,使主体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缺失之所以未被观众觉察,是因为自由的条件不存在。巴赞从主体与客体间的独立性出发揭示了传统蒙太奇镜头的缺陷。在巴赞电影观点的基础上,阿多诺批判了电影中软聚焦镜头、叠映和闪回等技术,认为电影的这些技巧在文化工业的统治下是常规的表现而不是以个别的作品需要为出发点的。在这种技巧之下,观众被安排理解电影传达的意义,从而导致观看者被还原为抽象的当下,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电影时间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现实主义的兴起,电影的视听综合走向更为复杂的拓扑结构,方形成具有智性

意义的‘时间—影像’与‘晶体—影像’,抵达复杂的感知系统。”^{[9]162} 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纪实性的影像风格拉开了世界电影新浪潮的序幕。基于此,吉尔·德勒兹就电影的时间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电影中,我们将对世界的知觉从固定的和秩序化的视角中解放出来”^{[10]67}。德勒兹把现代电影的时间图像从感觉运动图像定义中解放出来,使电影成为一种纯粹的光学、声音和触觉图像系统。针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德勒兹揭示了电影的新型运动关系,电影不再是一种感觉运动,而是一种感官运动。他从感官运动的角度将电影中的时间解放出来,最终使电影成为一种纯粹的视听图像。

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和德勒兹的影响,阿多诺企图通过电影蒙太奇手法来达到对电影中时间的解放。他提倡通过电影剪辑的运动技术即蒙太奇手法与经验现实相勾连的途径来摆脱意识形态对电影时间的控制。阿多诺指出,“否定意义的艺术作品,也一定能够将中断的东西连接起来,这是蒙太奇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11]229}。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是揭示作品意义的重要方式。文化工业生产下的电影时间中,内部张力、冲突把过去和未来都集中于现在。电影艺术时间一体化最为重要的是取消一切预先规定的意义,通过自由地放弃主宰时间要素的企图、通过拒绝一切意义让意义出现缺席,并在这一否定性中揭示意义。蒙太奇手法是让意义出现缺席的重要手段,借助“意义缺席”来打破电影中的时空控制,同时意义能从材料的复制当中自行产生,主要表现为否定统一又重申统一。米莲姆·汉森认为“艺术在面对一个越来越毫无意义的世界时对意义的否定,蒙太奇通过破坏艺术作品的有机统一来影响这种否定”^{[12]222}。汉森指出,阿多诺所提倡的蒙太奇镜头可以通过部分的不同来否定统一,同时作为一种形式原则,又重申统一。阿多诺认为,蒙太奇手法使电影摄影超越了摄影对经验现实的依赖,它不是整合摄影的伪艺术效果,而是可以成为摄影的一种自我修正。“蒙太奇并不干涉事物而是通过与写作相似的星群排列事物。”^{[2]227} 电影画面的运动变化就像幻灯片切换,这种不连续的蒙太奇手法加剧了电影画面间的断层。蒙太奇手法通过碎片化的拼接方式将电影的画面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差异性和断裂性,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被规定好的。观众在观看电影时是否阐释或者是否附加自己的主观成分这一行为本身带有一种主观性,具有先验的意义,对电影的意义理解是从自身主观层面出发所形成的,因此观众可以借用电影蒙太奇对镜头的拼接、组装以及剪辑而主观自发地对电影的意义进行阐释。后来阿多诺发现,电影蒙太

奇手法蕴含一种特殊的“规定的否定”特权,在这个过程中,电影被艺术化了。他企图通过蒙太奇手法推动电影的改革,使电影能够像真正的艺术那样对社会解放发挥作用。

三、从反对视觉音效的统一到主张媒介的融合:电影与音乐关系的修正

阿多诺曾多次将电影与音乐结合起来,他认为“电影银幕的真实形象和不真实的形象在流行歌曲的旋律中相遇,陈词滥调的歌词出现显得如此刻板,如此频繁,它们不再有自己的意思,而只是对永恒不变的同一意义的重复”^{[4]324}。阿多诺指出,在文化工业控制下,电影音乐与电影银幕形象的视听融合不能起到解放社会的作用。正如马丁·杰所言,“阿多诺唯恐电影表现的逼真度,以及它们的强有力的视觉和音响的统一”^{[13]194}。

阿多诺的这一认识是基于对好莱坞电影中音乐“物化”现象的斥责。在商业化和工业化主导的好莱坞电影中,音乐服务于商业主义,其乌托邦因素遭到物化,审美性随之丧失。阿多诺认为音乐的物化带来了听觉的退化,“这种衰退使得听者失去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能力而只是关注一首作品最为枝节的碎片”^{[14]22}。音乐听觉的退化导致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心神涣散,这种观影模式没有给观众留下多少想象与反思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体理性思考的能力。他指出,电影听觉认知当中蕴含着一种“集体性”。对于音乐的“集体性”,阿多诺是这样描述的:“音乐本身仍然带有一种理想的集体性——尽管这种集体性是从经验的集体性分离出来的。”^{[15]129}音乐的“集体性”是外在于主体的、不可表达的、没有概念的,代表着音乐自身的普遍性,是一种社会现象。“集体性”正是因为这种特征才会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被误用,在文化工业生产中,音乐丧失了自身,变成了一种非理性得以理性化展开的媒介,使电影呈现出被理性化和技术化的特点。阿多诺认为,正是由于电影听觉认知的这种缺陷,决定了其与视觉融合并不能达到解放的效力。

在对晚期文化工业进行反思时,阿多诺又主张电影媒介与音乐媒介的结合,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是由电影和流行歌曲合成的,目的是为了对工业社会晚期的审判时代进行凄凉的沉思。”^{[16]276}在《电影的透明性》一书中,他对电影媒介与音乐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修正:不再反对视觉和音响的统一,相反,他提倡电影媒介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尤其是与音乐媒介的融合,企图用电影的视觉认知来弥补听觉认知的缺陷。

阿多诺在流亡期间曾多次就电影问题向克拉考尔征询建议。克拉考尔指出,“从美学的观点来说,画面的表达和音乐的表达是必须多少有点关系的”^{[17]187}。他认为音乐实际上是为了把观众带入到电影画面,从而突出电影画面的性质,肯定无声电影的合法性。到了有声电影时期,克拉考尔批判了非自然声音与电影真实性的表现相冲突的观点,认为自然的声音因为自然而容易被人感知到,也最容易被忽略,于是非自然的声音在电影中发挥着吸引观众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电影中的音乐是用来吸引观众、更好地凸显电影画面的,也就是说电影中的音乐实际上是从属于图像的。他的这一观点启发了阿多诺,“电影最广阔的前景显然在其同其他媒介的相互影响,这些媒介自身逐渐融入电影,就像某种类型音乐一般”^{[12]227}。阿多诺不仅提倡电影媒介与音乐媒介的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他从电影自身出发探讨电影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在电影与音乐的关系中,电影不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是让音乐服务于电影图像,媒介的相互融合是为了促进电影自身的解放。

阿多诺认为电影带有“集体性”特征。他指出,“这种集体性内居于电影最内在的要素中。电影呈现的运动是模仿的冲动,这种冲动要先于任何内容和意义”^{[4]324}。电影的这种“集体性”具有“先验性”。这种“先验性”主要体现在观众观看电影时眼睛会自发地将自身加入到相同反应的人群,眼睛看电影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是不具有思考性的,所以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种“先验集体性”受到本雅明“视觉无意识”的影响。^{[8]21}本雅明将电影与绘画进行对比来论述电影接受过程中的独特性。人们在面对绘画的画布时常常会带着思考进行观察,很容易沉浸在联想活动中;而在面对电影屏幕时,由于电影屏幕是动态的,人们很难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阿多诺所说的电影“先验集体性”与本雅明所提到的“视觉无意识”有着相同的含义,但阿多诺将这种“视觉无意识”与文化工业背景相结合,对其意义进行了延伸,认为电影的解放潜力就在于利用这种“先验集体性”。阿多诺指出,电影的功能就在于为集体行为提供一种模式,与音乐中的“集体性”被意识形态误用相反,电影的这种“集体性”有助于摆脱电影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控制。因为耳朵只能被动地去接受技术控制之下的音乐所带来的影响,电影音乐的“集体性”会被意识形态误用而使电影变成一种技术统治的工具,电影音乐变成一种没有冲突和起伏的音乐形式;但电影视觉认知的“集体性”则与之相反,它并不是意识形态为了控制人的思想而强加的,而是电影之中最内在的要素,只有电影预先存在某种意义,这种“先

验集体性”才能发挥作用。阿多诺认为,电影的解放潜力就在这种无意识和非理性的影响之下,利用先于一切内容的“集体性”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有将电影与音乐媒介相融合,才能使电影视觉认知的“先验集体性”弥补听觉认知“集体性”的缺陷,从而达到解放社会的目的。

阿多诺对电影与音乐关系的态度转变,体现了他对电影与音乐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电影解放潜力的重视。

结语

本文通过对阿多诺电影思想的深度剖析,展现了他从视电影为意识形态的单一传播工具,到洞察并挖掘电影内在对抗性思想的嬗变。阿多诺电影思想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理解的深入,也反映了他对社会变迁和文化工业发展的敏锐洞察,他的电影观帮助我们理解电影艺术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启发我们探索电影艺术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2] 阿多诺, 等. 电影的透明性 [M]. 李洋,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 [3] 麦奎尔, 温德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 [M]. 2 版. 祝建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4] 阿多尔诺. 阿多尔诺基础读本 [M]. 夏凡, 编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5] 阿杰尔. 电影美学概述 [M]. 徐崇业, 译. 徐昭, 校.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 [6]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7]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 [8]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M]. 李伟, 郭东, 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9] 冯原. 德勒兹的时间综合与奇异性运作: 以图像小说“分镜”为例 [J]. 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 2023(2): 155-182.
- [10] 科勒布鲁克. 导读德勒兹 [M]. 廖鸿飞,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11] 阿多尔诺. 美学理论 [M]. 王珂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2] HANSEN M. *Cinema and Experience: Siegfried Kracauer, Walter Benjamin, and Theodor W. Adorno*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 [13] 杰. 阿多诺 [M]. 瞿铁鹏, 张赛美, 译. 张晓明,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14] 阿多诺, 艾斯勒. 论电影音乐 [M]. 刘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15] 阿多诺. 新音乐的哲学 [M]. 5 版. 曹俊峰,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 [16] 阿多诺. 最低限度的道德 [M]. 丛子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17] 克拉考尔. 电影的本性 [M]. 邵牧君,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Adversarial Discovery: On the Evolution of Adorno's Film Theory

MO Xiaohong, CHEN X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From viewing film as a tool for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to uncovering its inherent adversarial nature, Adorno's film theory underwent a qualitative leap. In his early thought, film was a highly homogenized produc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with internal conflicts dissolved and the audience's ability to think stripped away.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the German New Film Movement, Adorno saw the “hidden message” contained within film as a mass medium. He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al image movement of film, especially the use of film montage techniques, could brea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mage and writing, endowing film with inherent adversariality. At the same time, Adorno also revised his earlier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 and music,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film and music, and arguing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collectivity” of film has liberating potential.

Key words: Adorno; film theory; evolution

汉语“除 X”类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动因

缪以健, 崔云忠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除”的介词用法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唐以后,“除”类双音介词不断产生,其来源也不尽相同,其中,“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最初为动词短语,受介词“除”的影响,它们产生介词用法;“除了”在介词“除”的基础上直接词汇化而成,属于次生介词。“除”类介词均为范围介词。“除”类介词的句法语义功能极大地受到动 / 介词“除”的制约,其介词用法的产生是介词语义强化要求和汉语双音化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除 X”类介词; 来源; 语法化; 动因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75-07

汉语中存在大量双音介词。“除”类介词是双音介词中比较典型的一类,《现代汉语词典》:“除”类介词有“除非”“除开”“除了”“除去”“除却”^{[1][94]};《现代汉语介词用法词典》还收录“除掉”^[2]。“除”类介词的产生似乎与介词“除”有密切的关系。

太田辰夫、马贝加认为,六朝时“除”产生介词用法,其引例为《齐民要术·杂说》:“一切但依此法,除虫灾外,小小旱不至全损”^[3,4];柳士镇、汪维辉曾论证《杂说》非六朝时贾氏所作,其出现年代不会早于唐朝^[5,6];王鸿滨认为《三国志·张严程阡薛传》“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中“除”已经为介词用法^[7];李宗江认为,“‘除’用于典型的排他式,且挣脱贬义宾语的制约,它才是一个典型的排他标记”^[8]。本文赞同王鸿滨和李宗江的观点,“州县嫁娶”转喻“时间”和“皆”相对应;“除州县嫁娶”附着于后续小句,不能独立运用。从语义和功能看,《三国志》引例中的“除”都可作介词分析。

马贝加、田春来认为介词“除却”产生于唐代,“除了”产生于宋代^[4,9];田春来还认为介词“除非”唐代已出现,且具备发展为关联词的语义条件^[9];胡丽珍、雷冬平讨论了“除非”的演化,认为“除非”是“除……外”句式与“非……不(方)”句式叠套使用的结果,其语法化路径为介词到连词^[10];李晋霞从共时角度推测了连词“除非”类似的语法化路径^[11];陈昌来、朱峰考察了

介词“除了”“除去”“除却”“除掉”“除开”的来源,认为“除了”产生于宋代,由介词后助词“了”而来,“除去”先秦已出现,为动词,明清时产生介词用法,“除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为动词,唐代产生介词用法,“除掉”产生于清代,“除开”出现在五四时期^[12]。学界多关注“除”类介词的语义表现及产生时间,但对于其词汇化来源较少关注。本文拟考察“除”类介词的来源,包括其词汇化过程和介词化过程,同时探讨其发展动因。

一、“除 X”类介词的来源

《广雅·释诂二》:“除,去也”,动词,意为“清除、消除”,如:

(1)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左传·隐公元年》)

大约魏晋南北朝时期,“除”由“消除,清除”义引申出“排除”义,如:

(2)若七日不得作者,必须收藏取七日水,十五日作。除此两日则不成。(《齐民要术》卷八)

最迟至唐代,“除”的介词用法已经成熟,如例(3);甚至出现“除……外”结构,如例(4):

(3) a. 天下噤口,除臣谁敢有言。(《北齐书·列传第二三》)

b. 除嫡子一人,其余皆庶子也。(《通典》卷

收稿日期: 2024-09-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研究”(18FYY028);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日本山口县立大学图书馆等 14 馆藏汉籍编目与复制”(20BHB0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宣和画谱》集校集注”(23CWTJ154)。

作者简介: 缪以健(2000—),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及语法教学研究。

九十二)

(4) a. 除四人外,更无客僧及沙弥、俗客等。(《入唐求法巡礼记》卷四)

b. 昔两汉以郡国治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封疆,杂用周制。(《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Heine 总结了语法化的四项机制。^[13] 语义漂白和结构扩展是汉语动词介词化的重要机制。^[14] 当“除·NP”在“除·NP·V”结构中不能单用,或者语义发生变化时,“除”便有介词化的句法条件。当“除”与“NP”间有介词语义关系,即“除”所表示语义与“NP”所表示语义不具备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此时“除”便完成其介词化。如例(3)中,“除臣”“除嫡子一人”虽可单用,但其语义发生改变;“臣”“嫡子一人”不是“清除”“排除”的对象,而是“谁”“其余庶子”相对的范围,与“谁”“皆”有逻辑对应关系,“除”为介词,介引“范围”。

上例(3) a、(4) a 谓语部分为否定形式,否定“NP”所指以外的范围,意在肯定、强调“NP”,“除”介引“强调范围”,即“唯臣敢言”“仅此四人”;例(3) b、(4) b 谓语部分陈述“NP”以外范围的情况,“除”介引“排除范围”,即“嫡子以外,则……”“郡以外,则……”。

“除”介词用法成熟后,又产生了一批与介词“除”有关的双音介词,有“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除了”,如:

(5) 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旧唐书》卷八)

(6) 既今某甲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须除之。(《祖堂集》卷五)

(7) 除去兴儿之外,就是三班六房,连厨子还是前任的。(《彭公案》第七回)

(8) 除掉护院之外,藩、臬却都不在他眼里,有些事情竟要硬驳回去。(《官场现形记》第三回)

(9) 每期开奖,除开发奖金外,盈余的总是几万,谁说他不是坐地分赃呢。(《广陵潮》第九十七回)

(10) 除了请酒请饌之外,再不轻说一句闲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

以下分别考察“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除了”的语法化过程。

(一) 除非

《汉语大词典》:“除非”,犹只有,表示唯一的条件,唐代吕岩《五言》诗之五有“要觅长生路,除非认本元”。^[15]^[987] 或表示“不计算在内”,如“上山的那条路除非他,谁也不认识”。《现代汉语词典》:“除非”可作连词和介词,作介词时表示不计算在内,相当于“除了”,

作连词时表唯一条件,相当于“只有”。^[11]^[194]

“非”,否定动词,相当于“不是”,如:

(11) 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三国志》卷三十二)

“除非”,唐代始见,为动词短语^[16],其中“除”为“排除”义动词。如:

(12) 队马当直,拟防机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骑。其杂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卫公兵法辑本》卷中)

“除”“非”连用,意为“否定”与“排除”,如例(12)“除非”的宾语既是“排除对象”也是“否定对象”,“除非警急”指“除紧急情况时”或“不是紧急情况时”。

“除非”的宾语只能解作“排除对象”时,“除非”语义凝合,为“排除”义的动词,如:

(13) a. 若情状难舍,敕遣戮尸,除非此途,理绝言象。(《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b. 除非紫水脉,即是金沙源。(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以毛公泉献大谏清河公》)

例(13) a 中“除非”偏向“否定”义,“除非此途”意为“非此途”;b 中“除非”偏向“排除”义,宾语为“排除范围”,“除非”有介词语义,但“非”“是”对举,“除非”动词性较强。

唐代,“除非”产生介词用法,如例(14);可构成“除非……外”结构,如例(5)、(15)。

(14) a. 除非物外者,谁就此经过。(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

b. 除非净晴日,不见苍崖巅。(陆龟蒙《引泉诗》)

(15) 除非僧次外,归寺补袈裟。(王梵志《诗》并序其三十八)

例(14)及例(5)中“除非”介引“强调范围”;例(15)中“除非”介引“排除范围”。“除非”为范围介词。

唐五代间,“除非”可带小句宾语,常与“始”“方”等连词搭配,连接条件分句,产生连词用法,如:

(16) a. 若在人间须有恨,除非禅伴始无情。(罗邺《别夜》)

b. 免斯因缘,有何方术,除非听受法花经,如此灾殃方得出。(《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二)

田春来指出,介词“除非”表示绝对排除,所排除的对象是唯一例外,因而进一步虚化为表唯一条件的关联词,相当于“只有”。^[9]

“除非”唐代始见,其词汇化、语法化路径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连词,其中介词用法出现于唐代。现代汉语中“除非”有介词和连词用法,选取 BCC 语料库中 8 位具有代表性的现当代作家作品,千万余字的

材料为样本^①,统计得到“除非”用例共138例,其中介词用法仅8例,连词用法130例占优势。

(二)除却

《汉语大词典》:“除却”表示“不计算在内”,如“除却阴符与兵法,更无一物在仪床(《哭陷边许兵马使》)”^{[15]987};《现代汉语词典》:“除却”有动词和介词用法,作动词意为“去掉”,作介词时表示“排除”^{[11]94}。

“却”,动词,常出现在动词短语后项,如:

(17)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论衡》卷十七)

“除却”,魏晋南北朝始见,最初为动词短语,意为“消除、除掉”,如:

(18) a. 诸比丘不知当云何,便白佛,佛言,不净除却。(《十诵律》卷六十)

b. 若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无,别处受生。(《六祖坛经》定慧第四)

其词汇化过程在魏晋南北朝已经完成,如:

(19) a. 当除却一切粗细身口恶业,是故次第说持戒。(《大智度论》卷二十二)

b. 我于尔时,为彼一国,除却恶法,成就孝顺之法。(《杂宝藏经》卷二)

例(19)“除却”可以带宾语,a中“除却”受副词“当”修饰;b中“除却”与动词“成就”对举,动词性质显著,“除却”词汇化,为“消除”义动词。

“除却”语义扩大,为“排除”义动词。如:

(20)除却虚日,在路行正得卅四日也。(《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二)

唐代,“除却”产生介词用法,如:

(21) a. 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刘禹锡《麻姑山》)

b. 除却须衣食,平生百事休。(白居易《答卜者》)

晚唐五代间,出现“除却……外”结构,如:

(22) a. 除却数函图籍外,更将何事结良朋。(陆龟蒙《奉和袭美卧疾感春见寄次韵》)

b. 既今某甲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须除之。(《祖堂集》卷五)

“除却”可介引“强调范围”,如例(21) a、(22) a;可介引“排除范围”,如例(21) b、(22) b。“除却”也为范围介词。

“除却”魏晋南北朝始见,其词汇化、语法化路径

可描述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其介词用法唐代出现。统计样本中“除却”用例,共得12例,其中动词性用法1例,介词用法有11例,占优势。

(三)除去

《汉语大词典》:“除去”有“拆除、去掉、废除”义,或表示“不计算在内”,如《墨子·备城门》:“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尽除去之”^{[15]987};《现代汉语词典》:“除去”动介并行,作动词意为“除掉、去掉”,作介词时表示“排除”^{[11]94}。

“去”,动词,常出现在动词短语后项,如:

(23)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史记·列传第二十八》)

“除去”最初为动词短语,意为“消除、去掉”。如:

(24) a.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尽除去之。(《墨子》卷十四)

b. 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同上,卷四)

入汉以后,“除去”的受事宾语往往提前,“除去”进一步凝固。如:

(25) a. 已祭之后,心快意善,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论衡》卷二十五)

b. 睹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太平经》卷八十九)

宋代,“除去”可带宾语,能接续动态助词,能被否定副词修饰,“除去”词汇化为“消除”义动词。如:

(26) a. 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近思录》卷二)

b. 下面有些小为病痛,亦轻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则病痛自若。(《朱子语类》卷十六)

明代,“除去”语义扩大,为“排除”义动词,如:

(27)除去了三两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是有余。(《醒世恒言》卷三)

明清小说中,“除去”出现介词用法。如:

(28) a. 天下除去大哥,小弟无有可惧之人!(《彭公案》第一百一十三回)

b. 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醒世恒言》卷三十五)

清末出现“除去……外”结构,如例(7),又如:

(29)除去婆子丫杯之外,连一个亲近之人没有。(《三侠剑》上)

例(28) a、(29)中“除去”介引“强调范围”;例(28)

① 单部或多部作品范围下,样本数量无法达标,故以语料库内目标作家的全部文字材料为统计样本。其中,鲁迅作品,共543 521字;郭沫若作品,共205 380字;茅盾作品,共1 200 146字;巴金作品,共1 481 945字;老舍作品,共2 625 992字;冰心作品,共2 088 222字;沈从文,共1 917 210字;萧红作品,共489 162字,总计10 551 578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作品清单,下文简称“样本”。

b、例(7)“除去”介引“排除范围”。“除去”也为范围介词。

“除去”先秦出现,其词汇化、语法化路径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其介词用法最早产生于明代。“除去”在样本中共出现 59 例,其中介词用法 18 例,动词性用法 41 例更占优势。

(四)除掉

《汉语大词典》:“除掉”表示“不计算在内”,例子是茅盾《子夜》中的“除掉前清的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班人官办的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不少”^{[15]989};《现代汉语词典》未收录“除掉”;《现代汉语介词用法词典》收录“除掉”。

“掉”,动词,常出现在动词短语的后项,如:

(30)则被你饿掉了三魂,敲翻了五脏。(《全元杂剧》,高文秀《须贾大夫谗范叔》)

“除掉”最初为动词短语,始见于明末具有浓厚南方方言色彩的民歌集《挂枝儿》中^[17],如:

(31)莫把他薄幸名儿除掉了。(《挂枝儿》怨部六)

清代,“除掉”大量出现,如:

(32) a. 丢下哭丧棒,除掉麻冠,脱却麻衣,掇条板凳,请鸣乾坐了。(《歇浦潮》第六十四回)

b. 后来,那个许老太爷除掉了脑袋是搬不下来的,其余阿姑崽只要说一样,他就依一亲,到底把这个宝货得了去。(《冷眼观》第十四回)

例(32) a 中“除掉”与“脱却”对举,为动词短语; b 中“除掉”接续动态助词,能带宾语,动词性强,“除掉”词汇化为“消除”义动词。

“除掉”语义扩大,为“排除”义动词,如:

(33)除掉了送白大块头的,岂不是还好留五十块钱用。(《歇浦潮》第七十二回)

清末,“除掉”产生介词用法,集中在小说中,如例(34);多构成“除掉……外”结构,如例(35)。

(34) a. 这个地方,除掉一死竟没法保得清白(《宦海钟》第十七回)

b. 钦差太太洗的衣服,除掉屋里,只有窗户外头好晾。(《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六回)

(35) a. 除掉瞎子以外,没一个不对墙壁上望一望。(《人海潮》第十二回)

b. 他除掉这些之外,还有磁鼻烟壶。(《负曝闲谈》第二十四回)

例(34) a、(35) a “除掉”介引“强调范围”;例(34) b、(35) b 介引“排除范围”。“除掉”也为范围介词。

“除掉”明代始见,其词汇化、语法化路径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其中介词用法产生于清末。样本

中“除掉”出现 19 例,其中动词性用法 7 例,介词用法 12 例略占优势。

(五)除开

《汉语大词典》:“除开”,表示在什么之外,还有别的,也可以表“除去、去掉”之义,引例都在五四以后^{[15]990};《现代汉语词典》:“除开”只作介词^{[1]194}。

“开”,动词,也常出现在动词短语后项,如:

(36)做劝酒科正旦云:拿开,我不吃!(《全元杂剧》,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

“除开”清代出现,为动词短语,相当于“消除、除掉”,如:

(37)此一来有分教:除开茅塞,终不昧大道之平平。透出林端,真难藏幽兰之郁郁。(《林兰香》第十回)

上例“除开”与“透出”对举,为动词短语,但可带宾语,有词汇化倾向。“除开”词汇化后,为“排除”义动词,如:

(38)有几个新到的说:“除开了他就是了。”(《金台全传》第五十五回)

清末,“除开”出现介词用法,民国以后用例增多,如例(39);也常构成“除开……外”结构,如例(9)、例(40)。

(39) a. 继盛愤愤道:“除开严嵩,还有哪个?”(《明史演义》第六十三回)

b. 咱们七人,除开香菱姊姊,都是双料的,如何不懒?(《红楼幻梦》第二十一回)

(40)除开我的母亲而外,到如今从没有过这样关注我的人。(蒋光慈《野祭》)

上例(39) a、(40)中“除开”介引“强调范围”;例(39) b、(9)中介引“排除范围”。“除开”也为范围介词。

“除开”清代才出现,其词汇化、语法化路径为:动词短语>动词>介词,清末民初时“除开”产生介词用法。“除开”在“样本”中有 14 例,动词性用法 2 例,介词用法 12 例占优势。

(六)除了

据《汉语大词典》,“除了”表示所说的不计算在内或与“就是”连用,表示二者必居其一^{[15]986};《现代汉语词典》指出,“除了”还可以跟“还”“也”“只”搭配,表示在什么之外还有别的,它只有介词用法^{[1]914}。

陈昌来指出,宋、元时期,介词发展的重要现象是出现了介词后附“着”“了”的现象。^[18]

宋代,助词“了”接续在介词“除”后,介词“除了”次生而来,如例(41),也可构成“除了……外”结构,如例(42)。

(41) a. 使辰只合算花筹。除了一天风月、更何求。

(范成大《南柯子·其一》)

b. 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

(42) 今观孔子诸弟子,只除了曾颜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上例(41)a“除了”介引“强调范围”,例(41)b、(42)介引“排除范围”。“除了”也为范围介词。

介词“除了”和“动·助”结构的“除了”来源不同,后者为动词性结构,如:

(43) 两个同出酒店,去空野处除了花朵,溪水里面洗了面。(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而介词“除了”在介词“除”的基础上直接次生而来,其产生时间在宋代。样本中“除了”出现数量最多,共有1377例。

以上,我们梳理了“除”类介词的来源。“除了”为次生介词^①,宋代产生;“除非”“除却”“除去”“除开”“除掉”最初为动词短语,而它们的介词用法,“除非”“除却”产生于唐代,“除去”明代产生,“除掉”“除开”产生于清末。除“除了”外,均先词汇化为动词,再产生介词用法。“除非”继续语法化,产生连词用法;“除却”宋以后渐渐被“除了”取代。“除”类介词均为范围介词,介引“强调范围”或“排除范围”。“除”类双音节词的语义发展过程为:消除>排除>范围。

现代汉语中,“除非”连词用法占优,语法化程度最高;“除了”为次生介词,使用频率极高,语法化程度次之;“除却”“除开”介词用法占优,二者低于“除了”;“除掉”,动词性用法和介词用法均势,介词用法略优;“除去”,动词性用法占优,语法化程度最低。“除”类介词的语法化层次由低到高为:除去>除掉>除开/除却>除了>除非。

二、“除X”类介词的语法化动因

(一)动/介词“除”功能语义的制约

受介词性语素“除”的类推影响^[19],“除X”类介词由“除”生发而来,其句法语义功能受到核心“除”的制约。据上文,其来源有两类,一是由动词短语词汇化、语法化而来,这类最多,有“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二次生介词,如“除了”。

相较于动/介词“除”,“X”的出现加强了“除”的意义,但没有改变“除X”的句法语义功能。“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为动词性短语,核心为“除”,

“X”成分是对“除”语义的补充;“除了”由“除”接续助词而来,核心仍是“除”。和“除”一样,它们都有“消除”“排除”义,都可作介词表“范围”。唐代“除”的介词用法已常见,动词用法依然强势,受介词性语素“除”的影响,或者说作为“除”的衍生品的“除X”类词,自然产生了介词的用法。

至于“除非”连词用法的产生,我们认为这是受到结构义的影响。根据的构式理论,句子的意义来自构式义和词汇义的相互作用,但构式整体的意义也制约着组成成分的意义。^[20]“非……不……”句式中古已常见,“除非”介引“强调范围”时,构成“除非……不/无/谁/何……”句式,该构式蕴含“强调”意味,相当于“只有……才……”。久之,“除非”吸收了结构义,其后即使不接续否定或反问内容,也可表示“只有”义,如“除非……方/才……”句式,这表示“非”完全虚化为构词成分。

(二)介词语义的加强

“除X”类介词常常和“外”“之外”“以外”等构成介词框架,这也是受“除”的影响。介词“除”在唐代成熟后,“除……外”格式开始涌现。刘丹青指出,这类介词框架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句法组合现象,框架中的后置词能够满足联系项居中原则。^[21]

从语义上看,介词框架无疑起到了补充语义、使表达更准确的功能。如方位短语框架,介词“在”只能表达宽泛的“所在”,无法像英语介词“in”“on”“above”“under”等表示更精确的所在。后置词正起到补充“所在”意义的功能,如“在学校里”和“在学校外”中的后置词能够区别意义,达到补充介词语义、精确表达的作用。

当介引的内容高度抽象时,介词虚化,其后置词补充介词语义的功能也会弱化。如上例“在学校里/外”存在本质区别,而“在语义层面里”和“在语义层面上”两者则差别较小,甚至不用后置词,介词短语的意义也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如“在语义层面”。可见,介词框架虚化后,后置词仅起到加强介词语义的作用。

“除……外”结构也是如此,“除”表“范围”,本身就具有“排除”之义,接后置词“外”并非构成“双重否定”,实是加强介词“除”的“排除”意义。

语法化理论指出:“如果一个成分被语法化削弱了,那么,有两种语言保守性的可能性做法:……第二是,强化(Reinforcement),即补偿并校正其衰减(decay)。”^[22]“除……外”框架习用之后,介词“除”单

① 汉语原生介词源于实词性词语;次生介词源于介词或介词与其他词的组合,为二次生成的介词,构成类型主要有“介·介”“动/名·介”等,参见何洪峰、崔云忠:《汉语次生介词》,语言研究,2014年第4期。

用而不构成框架时,介词义被削弱。

我们认为“除 X”类介词的形成是加强介词“除”语义的另外一种方式。刘丹青指出,语法化中的强化是指在已有虚语素上再加上同类或相关的要素,使原有的虚化单位的句法语义作用得到加强。^[23]在唐代,“除”已虚化,甚至介词用法占据优势。“除非”“除却”等的介词用法,较之于介词“除”,句法语义均有加强。它们都不是单词,而是一个双音结构,因此语义内容上较“除”丰富,如动词短语“除非”,否定动词“非”不仅加强了“除”的“排除”义,还使得“除非”句常常构成“非……不……”句式,其构式义最后也被“除非”吸收,又进一步丰富了“除非”的语义;“除却”“除去”“除掉”“除开”中的“却”“去”“掉”“开”虚化为了补语成分,意为“彻底”,有完结体(Completive)的意义;助词“了”则表“完成”,它们都增强了“除”语义。

(三)介词的双音化趋势

从上古末期开始,汉语词汇逐步开始向多音化过渡,最主要的就是双音化。^[24]到唐代,双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双音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5]介词也不例外,崔云忠、王晖指出,隋唐五代时期双音节介词大量产生,发展到宋代,新生介词中复音介词在新生介词中占比持续增长。^[26]“除 X”类介词多是由双音结构发展而来,它们的介词化,一方面有其内部的句法语义因素,另一方面便是受到双音化趋势的影响。如唐代可用作介词的有“除”“除非”“除却”。诗歌之中以二、三音节韵律为主,单音节的“除”很难进入韵律整齐的诗歌之中,故双音节的“除非”“除却”在诗歌中较常见。后双音词渐渐成为主流,尤其在白话及口语之中,“除开”“除掉”“除了”这类的双音介词便顺势产生发展起来。

结语

“除”在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介词用法,介词“除”在唐代成熟后,产生了一批双音介词,有“除非”“除却”“除去”“除掉”“除开”“除了”,它们均为范围介词。“除了”为次生介词,其余则均由动词短语词汇化、语法化而来。“除非”“除却”产生于唐代,“除去”产生于明代,“除掉”“除开”清末才出现介词用法;“除了”为次生介词,产生于宋代。

“除”类双音词发展为介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介词性语素“除”的影响,其句法语义功能极大地受到动/介词“除”的制约。此外,介词语义强化的要求和汉语双音化趋势也是“除”类双音节词语语法化为介词的重要动因。“除”类介词的演变过程对于整理汉语“介词性语素+非介词性语素”

结构的词汇化、语法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 方清明.现代汉语介词用法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7-43.
- [3]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蒋绍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46.
- [4] 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327-328.
- [5] 柳士镇.从语言角度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M]//柳士镇.汉语历史语法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
- [6] 汪维辉.《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补证[J].古汉语研究,2006(2):85-90.
- [7] 王鸿宾.“除”字句溯源[J].语言研究,2003(1):112-117.
- [8] 李宗江.也说“除”类标记词的来源和演变[J].语言研究集刊,2023(2):289-302.
- [9] 田春来.《祖堂集》介词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7:164-165.
- [10] 胡丽珍,雷冬平.论“除非”的功能及其句式演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34-240.
- [11] 李晋霞.论连词“除非”的语法化[J].励耘语言学刊,2009(2):230-238.
- [12] 陈昌来,朱峰.“除”类介词及“除”类介词框架的产生和发展[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91-101.
- [13] HEINE B, KUTEVA T.语法化的世界词库(中译本)[M].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2.
- [14] 何洪峰.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J].语文研究,2014(1):15-22.
- [15]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
- [16] 崔云忠.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3:314.
- [17] 冯文开,王娟,张保.冯梦龙《山歌》与《挂枝儿》的编辑思想及其特色[J].编辑之友,2012(4):120-122.
- [18] 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63.
- [19] 崔云忠,缪以健.汉语介词相关的语法化、词汇化和词化[J].中国语言学研究(第5辑),2024:50-69.
- [20] 李勇忠.构成义转喻与句式压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10-14.
- [21] 刘丹青.汉语中的框式介词[J].当代语言学,2002(4):241-253,316.
- [22] LEHMANN C.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M]. Seminar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Erfurt.

- 2002: 20-21.
- [23] 刘丹青.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J]. 语言研究, 2001 (2): 71-81.
- [24] 周荐.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75.
- [25]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8.
- [26] 崔云忠, 王晖. 隋唐至宋代介词系统成员的变更[J].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2023(2): 210-229, 296.

A Research to the Origin of the Prepositions with Morpheme Chu (除)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Motivation

MIAO Yijian, CUI Yunzho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prepositional usage of “Chu(除)” appeared about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fter the Tang Dynasty, “Chu(除) X” disyllabic prepositions were constantly produced, and their sources were not the same. Among them, “Chufei(除非)” “Chunque(除却)” “Chuqu(除去)” “Chudiao(除掉)” “Chukai(除开)” were originally a verbal phrase,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preposition “Chu”, resulting in prepositional usage; “Chule(除了)” is directly lexical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position “Chu”, which belongs to the secondary preposition. The “Chu” prepositions are all range preposition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u X” prepositions are greatly restricted by the preposition “Chu”. The usage of preposition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emantic strengthening requirements of prepositions and the trend of Chinese disyllabification.

Key words: “Chu(除) X” prepositions; source; grammaticalization; motivation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域出版数据库、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德州学院学报

论董仲舒经济伦理的公平原则

段方乐, 张福磊

(德州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为了贯彻儒家的仁政思想, 董仲舒在经济伦理方面特别重视社会成员财富分配的公平原则。具体内涵上, 他提出了“贫者养生”“自然之赏”“限民名田”“禁民二业”等既保障百姓生存权利, 又防止两极分化的福利经济思想和主张。这对于当时西汉百姓安居乐业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对后世明君贤臣治国理政以及今天美好生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关键词: 董仲舒; 经济伦理; 公平; 贫者养生; 限民名田; 禁民二业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82-04

经济伦理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没有正确的经济伦理尤其是宏观经济伦理指导的经济活动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 还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最关注的经济原则就是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这个原则强调全体国民都有获得生活资料或生产成果的权利。在中国漫长的经济发展史上,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 有关人民福祉的公平性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传统, 也是政治思想的传统, 从孔子、孟子到荀子, 无不把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放在最基础的地位。汉儒董仲舒是这种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者。作为当时最具理性的思想家, 他不仅在哲学上完成了“神学目的论”的构建, 在政治上完善了中央集权理论, 在经济上也提出了独到的经济思想和措施。

一、“贫者养生”与“自然之赏”的“天道”公平原则

人的生存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要义。董仲舒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公平。政府应该给予人民谋取物质财富保障基本生活的权利。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董仲舒认为, 生命的存续与繁衍是天之德, 而使天下苍生都能够获得其生命存续与繁衍的权利则是天之道。所谓“天之道”原则就是“上天”最基本的好生之德, 也

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公平原则。社会之所以出现危机, 国家之所以出现动乱, 就国家治理方面而言就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公平出了问题。而儒家经济伦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即全社会成员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董仲舒强调政府要长治久安, 必须在最基本的经济政策上保障百姓的生存生活权利。这也是一个政府的道德责任与公信力来源。在董仲舒的思想中, 每个个体都有生存的权利, 这是一种天赋人性。满足这一人性需要就是顺应天性。因为人秉天地之气而生, “人始生有大命, 是其体也”^{[1]149}。“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 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 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礼之所为兴也。”^{[1]151} 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 应该是各行业充满生机, 人民生活得到保障, 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和谐的社会。这是“王道”社会的特点。董仲舒认为尧、舜、禹时代就有这样的特点: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 不敢有君民之心, 什一而税。……不夺民时, 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 无怨望忿怒之患, 强弱之难, 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 被发衔哺而游, 不慕富贵, 耻恶不犯。”^{[1]101-102} 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祥和, 帝王何乐而不为? 董仲舒强调, 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 不仅因为在政治上摒弃仁政而以刑罚治国, 而且经济上不注意改善民生, 百官“赋敛亡度, 竭民财力, 百姓散亡, 不得从耕织之业, 群盗并起”^{[2]184}。“至周之末世, 大为亡道, 以失天下。秦继其后, 独不能改, 又益甚之, 重禁文学, 不得挟书, 弃捐礼谊而恶闻之, 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 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 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

收稿日期: 2025-01-13

基金项目: 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董仲舒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24DZZS022)。

作者简介: 段方乐(1969—), 男, 山东齐河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

国破亡矣。”^{[2]2179}他提出,汉王朝若要避免重蹈秦帝国的覆辙,政治方面必须进行更化改制,经济上要体恤民力,改善民生。整顿吏治,变革风俗,奖掖生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良好基础。董仲舒用“自然之赏”来说明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实现。老百姓要活着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百姓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合理的物质回报或报赏。所以,重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2194}的董仲舒并没有一般地否认老百姓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活动。和孔孟一样,董仲舒对个体正当利益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低层次的经济活动,追求整个社会的利益均衡才是高层次的经济活动。他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目的追求不谋而合。这种经济活动的高级形态才是具体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政府道德层面上体现为“公平公义”。大而言之,经济生产虽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前提,但不能把它看成每个人都应该狭隘地获取私利,不能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应当肯定追求正当物质利益,反对追求非正当物质利益,更反对政府或政府人员与老百姓争利。因为人人争利、私欲泛滥会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甚至给国家带来政治动荡。所以,董仲舒主张经济活动应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在道德原则支配下进行,物质财富的谋取和礼法的遵行相统一。这是“天道”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体现,也是董仲舒的经济伦理的要求。“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168}不遵从“天道”或经济道德,人们“各从其欲”,不加限制地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就会遭到经济规律的“自然之罚”。尊重“天道”,取财有道,“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其君安河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1]169}。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要秉承一般的经济均衡原则,避免因小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导致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小化、极端贫困化。“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1]227},社会必然大乱。这是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失败,甚至会导致王朝的覆灭。为人主者必须未雨绸缪,采取得力的措施加以制止。

二、“限民名田”“禁民二业”:防止分化的“人道”措施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从事的农业是主导产

业。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休养生息让西汉王朝从秦末战乱中恢复了元气。可是“清静无为”政策使豪强权贵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刘姓封国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政府的权威造成了威胁。权贵豪强“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2]2192}!显然,这种现象正在孕育极大的社会危机。董仲舒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对权贵经济行为予以法律的制约,并注重“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1]228}否则,产生“两极分化”“两级对立”,导致国家政权不稳定。董仲舒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3]494-495}。汉武帝部分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针对土地兼并现象,用多种方式推行了十几年的限田运动。汉哀帝时期“限民名田”思想进一步得到实践。这一思想是董仲舒面对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具体建议,同时也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彰显。在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史上,“限民名田”思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每当统治阶级意识到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严重时就“用限田”缓解社会矛盾,调和社会关系。

董仲舒认为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财富是有限的,即稀缺是经济的常态,有大富必有大贫。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避免造成社会秩序的失控,国家必须制定政策调节贫富。一个办法就是“禁民二业”,尤其是禁止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官僚从事第二产业,强势群体不可与弱势群体争利。《礼记·大学》说“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4]。“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1]229-230}“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2]2192}“分予”就是要求官僚不能和老百姓争利:“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

之所当循以为行也。”^{[2]2192} 拿朝廷俸禄的官吏进行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与老百姓抢买卖。从社会分工角度而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一般民众,各级官吏是靠国家俸禄养活的。“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2]2193} 的做法是董仲舒坚决反对的。要解决“受大而取小”亦即有权力的人肆意攫取财富的问题,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到“限民名田”是为了维护土地资源的均衡,“禁民二业”是通过为官僚的兼职限制来维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使普通百姓具有保证自身生存的条件。董仲舒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应该看到,董仲舒的经济政策和他作为一个理性经济的现实主义者并不矛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上,他不是只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不是要取消收入的差异性,其儒家经济伦理的正确价值导向和现实经济政策是有浮动空间的,政策的底线是在财富分配方面必须消除极端的两极分化。他同时认为要增加经济福利必须在生产经营方面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必须“藏富于民”。这两个方面必须统筹兼顾缺一不可,让贫富差距维持在一个限度内。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要保证豪强权贵和地主知识分子的利益不被彻底打击。不管是“限民名田”“禁民二业”,还是对百姓轻徭薄赋,不夺民时,让百姓“家给人足”,其边界是老百姓被剥削但又能够维持最低生活而不至于犯上作乱。如此一来,百姓就会无怨恨之心,君王亦算是有德之君。这就是“王道”政治了。客观来说,董仲舒思想直接服务于汉王朝政权的和谐稳定,他的经济思想和措施不一定能及时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统治者可能又不得不采纳一些改善民众生活的政策。这就体现出董仲舒民本经济思想的少许现实化,不至于让儒家悲天悯人的王道政治陷入一种纯粹的说教。

三、“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藏富于民的福利思想

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和赈济灾荒等,国家财政开支巨大。为缓解财政赤字,税收上不得不设立新的名目,如开征酒税、家畜税、人头税等。缗钱税^①和盐铁税是汉武帝时期最主要的两大税种。桑弘羊主理全国财政事务后,各地遍设盐铁机构,垄断铁的全部产销。盐业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体制。

中央计划经济成分加重,打击了豪强商贾的财源,充实了国库。当然,也使得整体经济环境凋敝,抑制了商业发展,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矛盾。为了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董仲舒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藏富于民的观点。所谓“薄赋敛”,就是在充分调查社会成员收入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人民基本生存,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减少或者免除税收。在经济活跃时多征点税。董仲舒曾建言皇帝,一定要重视农业生产,把人民吃饱问题放在首位。税收重点要面向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3]495}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真正体现出了儒家利民养民的民本思想,也反映了一个士大夫为民请命的情怀。他的主张不一定是正确的,但确实契合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连年战争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政府对盐、铁、酒实行官营、专卖,把各个封国的财政权力和税收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削弱藩王的经济力量,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但这种高度计划的控制和垄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行政权力的加强导致官商勾结、损公肥私,最后还是广大百姓买单,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董仲舒主张“盐铁皆归于民”,即将盐铁的生产、销售由官营改为民营,藏富于民。汉武帝把盐铁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尤其是对外战争的巨额耗费。如果把盐铁经营悉归于民,政府自断财路,财政赤字就无从解决。不过,董仲舒作为一介文人从人民安居乐业的王道政治出发,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错。为彻底消灭匈奴的百年威胁,汉武帝强征税赋消耗民财民力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匈奴被打败了,丝绸之路贯通了,大汉帝国的威严树立了,可经济民生已经受到了影响。晚年汉武帝意识到这一点,颁布了“罪己诏”,但社会经济却很难短时间改变了。而到了汉昭帝、汉宣帝以及汉元帝的时候,董仲舒的经济公平原则实行得较好,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更是如此:“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3]497} 汉昭帝、宣帝、元帝时的经济繁荣,董仲舒倡导的经济政策及主张发挥了作用。

^① 缗钱税,是汉武帝时期开征的一种新税。缗:本义是用绳穿连成串的钱。缗钱税的征收方式是:首先由财产所有者根据自己的财物积存数额据实上报,官府经过查验,按率征税。对于商人、高利贷者和放债取利者的交易额或贷款额,税率按缗钱计算,每二千钱为一算(120钱),税率为6%。手工业生产者税率按3%计算。纳税者陈报数与实有数不相符的,除了要没收其缗钱财物外,还要罚犯税令者到边境去服一年的徭役。

四、以民为本的公平性原则和儒家“王道”政治相统一

董仲舒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观点,实际是一种以民为本的福利经济思想,是为他的王道政治理想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没有离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离开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稳固,必须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健康发展。董仲舒主张发展整个社会生产贸易来繁荣经济,夯实国家的经济基础。儒家期望的“大同社会”就是一种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的经济社会,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孟子曾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画面:“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董仲舒说这样的社会:“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图圉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1]102-103}百姓风调雨顺,社会安定和谐,正是董仲舒描绘的人人向往的太平盛世!

董仲舒把历史使命和学术担当集于一身,把造福人民的经济实践与贯彻儒家王道思想的理想相互贯通,认为公平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分配制度,是王道政治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董仲舒的逻辑架构中,经济伦

理的公平原则成为经济活动核心的价值尺度。王道政治不是空中楼阁。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才是为政者安邦定国的前提,治国理政的目的。中国古代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力较为低下,当时的汉王朝正处于长期战乱平息后刚刚稳定的时期。统治阶级要维持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大一统”国家,亟须符合国情民情的经济政治政策。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百姓也盼望安居乐业。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董仲舒的思想正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心声。他建议皇帝鼓励农耕生产、减轻民间税赋、维持财富平衡、安定民生,这些经济政策大大稳固了汉王朝的统治,也为以后的历代贤明君主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了具体的经济政策指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纵观人类历史,新兴王朝必须反思前朝灭亡的教训,方能鉴之而不自哀。我们重新研读两千年前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禁民二业”和“厚积薄敛”等以民为本、倡导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当下坚持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建设惠及全体人民的美好社会,以及管理好广大党员干部,预防经济腐败,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 班固,撰.汉书:董仲舒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 [3] 许嘉璐,章培恒,黄永年,等.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1册[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5.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of DONG Zhongshu's Economic Ethic

DUAN Fangle, ZHANG Fulei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benevolent politics, DONG Zhongshu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among social members in the economic aspect. He put forward specific economic ideas and measures including the poor to live, natural reward, restricting annexation of land, prohibiting the second profession and so on to ensure the people's right to subsistence and prevent polarization. This had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eople's contented life, also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wise monarch and the virtuous official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ent beautiful society.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economic ethic; fairness; the poor to live; restricting annexation of land; prohibiting the second profession

文化共情教学下德州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课程融合研究

杨 博, 宋其勇

(德州学院 美术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传统室内设计教学难以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导致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要改变这一现状,需从课程体系入手,通过教学内容整合、实践体系重构和教学方法创新,引导学生与地域文化建立情感共鸣。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共情不仅能激发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更能促使他们在设计中自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既传承传统又创新表达。德州丰富的文化资源,如鲁北民居、黑陶工艺、运河文化等可为室内设计课程提供鲜活案例。室内设计课程通过系统融入地域文化,不仅能增强教学的本土特色,还能通过培养具有本土文化自觉的设计人才,为地域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设计智力支撑。

关键词:德州地域文化;室内设计课程;文化共情;融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86-04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得到尊重和认可,使得地域文化成为普通本科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德州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装饰图案及色彩等是德州独特的文化符号^[1],为室内设计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德州地域文化资源在室内设计课程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满足本土文化情感需求,激发设计灵感,如苏禄王墓的明代建筑工艺能够启发装饰设计灵感,德州剪纸、宁津杂技、乐陵金丝小枣文化可以作为软装主题;还可以提升设计作品的功能性与文化艺术价值,使其成为文化传承载体;同时还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具备专业素养的设计人才,实现地域文化传承与高校教育质量提升的双重目标。

一、传统教学模式下德州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课程的脱节困境

(一)依赖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限制了地域文化深度融入室内设计课程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室内设计课程往往依赖于教材与教师的课堂讲授。如,在讲授德州地域文化时,教师多通过图片展示或简单文字描述,介绍德州扒鸡文化、运河文化等地域文化知识,学生只能获取碎片化信息,难以深入探究地域文化内涵、历史演变及与当地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由于实地调研、田野考察等深

度挖掘环节缺失,学生无法亲身感受德州地域文化氛围。德州传统建筑中的空间布局往往蕴含着当地人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智慧;民俗活动中所使用的色彩和图案也承载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但由于缺乏亲身体验和深入探究,学生在设计应用环节时,只能机械照搬一些表面元素,无法将传统建筑空间布局的精妙之处、民俗活动中蕴含的色彩与图案象征意义等文化精髓融入设计作品之中,创造出富有地域灵魂的室内空间,这种教学模式不仅限制了德州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课程中的价值体现,更导致教学与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需求脱节。

(二)缺乏跨学科整合,导致设计理念与文化背景脱节

室内设计课程涉及多学科知识,但传统教学往往只聚焦于艺术设计,未能有效整合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资源阐释德州地域文化。例如,在讲解德州地域文化特色元素董子文化街设计时,传统教学仅从建筑的布局、雕刻、彩绘等艺术设计角度分析外观,却忽略了探讨这些设计元素的历史脉络及其形成原因。董子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及礼制理念,对当地建筑装饰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教学中如果不能结合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资源来解读地域风情对室内空间功能需求的影响,学生在进行针对性设计时往往会孤立地看待设计元素,忽视文化背景支撑,其设计理念则缺乏深度与根源性,难以与德州地域文化呼应,设计的

收稿日期: 2024-01-10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 2022 年横向课题“艺术设计助力黄河流域乡村振兴建设研究”(HXKT2022397)。

作者简介: 杨博(1978—),女,吉林松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地域文化方面研究。

作品无法真正体现地域特色。即教学模式在学科融合上的严重不足,会导致设计作品空洞、形式化,无法满足人们对具有文化内涵的室内空间的需求。

(三)学生主观能动性不足,限制了文化共情能力的发展

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索文化的积极性。在学习德州地域文化元素应用时,学生按照教师给定案例模仿,很少自主思考如何从当地居民情感、生活习惯出发进行设计创新。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课程作业与考核方式侧重技法,未鼓励学生深入体验文化、挖掘独特设计视角,导致学生文化感知能力薄弱,难以站在德州当地使用者立场感受空间需求与文化期望,更无法建立文化共情。其结果是设计作品难以引发使用者情感共鸣,不仅不利于培养适应地域文化特色设计需求的专业人才,还凸显传统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文化共情能力方面的缺陷,加剧了课程与德州地域文化的脱节。

二、文化共情及其在室内设计课程中的应用

当下,文化共情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文化共情指的是通过理解和体验他人文化来建立情感联系与认知理解的过程。在室内设计课程中,这种教学理念的实践体现为将区域文化有效融入教学。这一做法不仅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尊重不同文化,还能提高其设计能力,使作品既具文化根植性又具实用性。

(一)文化共情内涵

跨文化交际是世界文化交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共情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有效交流的必要条件。^[2]文化共情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机制,要求个体超越表面的文化现象,深入理解特定文化所蕴含的情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核心内容。这种文化共情不仅促进知识的系统性获取,更在于通过情感共鸣实现文化认同的内化,从而超越自身的文化局限,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不同文化融合。在室内设计课程中,文化共情的意义尤为突出。因为室内设计课程中,文化共情不仅有助于三维空间艺术的呈现,更能促进地域文化的生动彰显和文化价值观的有力承载。

通过文化共情,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德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从文化历史、社会习俗、人文环境等多维度分析和欣赏其精髓。这种深刻理解使他们能更好地响应文化需求,创造出真正反映当地特色的设计方案。文化共情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库,使他们能够

在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普遍性的碰撞中找到灵感,激发创新潜力。此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团队合作,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设计视野。

(二)文化共情对室内设计课程的重要性

在室内设计课程中,文化共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为室内设计课程内容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文化共情高度契合将地域文化融入室内设计课程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它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积极营造开放的课堂氛围。^[3]这种互动超越单向的知识传授,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讨论与体验,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通过反思发展批判性思维树立社会责任感。文化共情作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不仅将地域文化有效融入室内设计课程,还为学生带来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学习体验,助力学生成长为优秀的室内设计专业人才。

(三)文化共情对室内设计课程教学的应用

在室内设计课程教学中,文化共情的应用体现在多个层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挖掘各类地域文化元素,如德州地域文化中的传统建筑风格、民间工艺色彩等,让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设计方案,使作品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情境模拟、案例对比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文化共情。教学中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室内设计案例,让学生体会文化差异对设计的影响,促使他们站在使用者文化背景角度思考设计需求,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换位思考能力和文化敏感度,使设计更贴合使用者的文化心理。

在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参与德州地域文化特色传统民居改造项目。通过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学生切实感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以利于在设计中精准回应。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增强设计方案的实用性,还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设计文化认同感与作品的社会价值。

三、文化共情教学下德州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课程融合策略

(一)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构建地域文化知识体系

在室内设计基础理论课程中,有机融入德州地域文化元素显得尤为重要。教师通过对比德州传统建筑装饰与中国其他传统风格的文化内涵、工艺技法及造型风格,帮助学生认识德州在建筑装饰领域的独特贡献。同

时,定期开设专项讲座,邀请当地文化专家介绍德州的历史和民俗,从而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奠定设计实践的理论基础,并增强他们对地域文化的敏锐感知。

为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学校应系统构建德州地域文化知识体系,将其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传统手工艺等纳入课程大纲。教师可以编写专门教材或教学讲义,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德州地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开设如“德州地域文化概论”等基础课程,帮助学生宏观把握德州地域文化总体风貌与发展脉络。

(二)深入挖掘文化元素与设计的关联,结合实际设计项目进行教学

在室内设计实践课程中,设置以德州地域文化为主题的设计项目,如德州运河文化餐厅、民俗展示馆和传统民居改造。学生首先需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德州的文化元素,收集第一手资料,包括测绘数据、文化样本和居民生活习惯等。在此过程中,他们将提取地域文化元素进行转化与创新,并运用到空间规划、界面设计和陈设布置中,确保设计不仅体现当地文化特色,还能满足现代功能和审美需求。

在实际设计项目中,引导学生从形态、色彩、材质和图案等方面深入分析德州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如德州黑陶简洁流畅的线条,自然的材质与当地质朴的民风形成文化呼应,受此启发引导学生选用木条、藤条等自然材质,设计出符合地域文化气息的陈设家具。德州剪纸的精美图案则可转化为墙面装饰和隔断设计,从而提升空间的文化韵味。通过参与民宿和酒店等实际项目,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创造具有文化内涵和个性魅力的空间。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增进他们对地域文化的理解 and 应用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文化共情意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

(三)以小组合作方式创新教学方法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共同完成德州地域文化主题的室内设计项目。小组成员可以分工合作完成文化调研、方案设计、模型制作、成果展示等工作,在合作中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解决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沟通能力和创新思维,还能加深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增强文化认同,提高文化共情能力。

在小组合作学习的初始阶段,教师应通过创设德州地域文化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情感共鸣。如,教师可引导各小组共同收集德州地域文化纪录片、展示具有地方特色的实物,或在教学场景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这种共同参与情境创设与设计实践的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小组的凝聚力与合作活力,还可为后续

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案例研讨是深化小组学习的重要环节。教师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德州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融合案例,如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德州民俗博物馆室内设计,或地域文化元素与现代商业空间的创新应用等,组织各小组进行深入剖析与研讨。各小组围绕案例中的设计思路、方法和技巧展开讨论,探讨如何将案例经验运用到自身设计项目中。^[4]通过这种深度讨论与分享,学生不仅能在实际设计中掌握传承与创新地域文化的技巧,还能深化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增强文化共情能力,真正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具有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

为保障地域文化教学质量,提升教师的地域文化素养,应鼓励教师深入研究德州地域文化,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文化考察活动、培训课程等,不断提升教师的地域文化素养。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开展德州地域文化研究项目,为教师提供科研经费和时间支持,鼓励教师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提高教师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为了加强室内设计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可以引进具有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这些学科的人才可以与室内设计专业教师合作,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深入挖掘德州地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为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课程的融合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和方法。

此外,还应定期开展教师培训与交流活动,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行业精英来校举办讲座和开设培训课程,分享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融合的最新理念、方法和实践经验。同时,组织教师到其他高校或企业参观学习和交流访问,拓宽教师的视野和思路,促进教师之间的教学经验分享和交流合作,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

(五)建设地域文化特色实践基地,构建学科竞赛平台

学校应与德州当地文化机构和企业紧密合作,建立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深化校企合作机制。通过与室内设计企业共同开展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融合的实践项目,企业为学生提供实际设计项目和实习岗位,学校则输送具备地域文化素养的人才。此外,实践基地如德州民俗文化博物馆、传统手工艺工作室和特色民宿,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真实场景中深入理解德州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提升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组织开展与德州地域文化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和

设计竞赛,如德州地域文化主题的室内设计大赛、传统手工艺创新设计竞赛等。通过这些活动和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热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也可以展示和推广优秀的学生设计作品,为德州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力量。

结语

德州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室内设计课程教学对学生文化共情的培养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深入挖掘德州地域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和特色的教学中,采用理论教学渗透、实践项目驱动和实践基地建设等多元化方式,能够从文化认知、情感共鸣和实践能力提升等多个维度促进学生文化共情能力的发展,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精神的室内设计专业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在实际教学案例中,学生们通过积极参与德州地域文化主题的设计项目,不仅显著提高了专业技能,也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

展望未来,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应进一步加强地域

文化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持续探索更加科学有效、富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培养出更多具备文化共情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室内设计专业人才,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同时,这也将为室内设计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活力,使设计作品更具文化底蕴和情感温度,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和文化归属感的迫切需求,推动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复兴。^[5]

参考文献:

- [1] 季桂起. 德州地域文化概论[M]. 北京:线装书局,2010:8-10.
- [2] 江凌. 情感结构视域下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与共情能力提升策略[J]. 设计,2020(21).
- [3] 严乐. 基于传承地域文化理念的环境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广西非遗文化为例[J]. 喜剧世界,2024(2).
- [4] 严予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室内设计专业教学路径探析[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11).
- [5] 乔治,李妍佩. 艺术类课程思政共情式教学模式与设计实践研究:以建筑文化与工业遗产创新设计课程为例[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11).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Curriculum in Dezhou under Cultural Empathy Teaching

YANG Bo, SONG Qiyong

(Arts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interior design education fails to deeply explore regional culture, leading to students'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ulture.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urriculum system by integrating teaching content, reconstructing practical training frameworks, and innovating instructional methods to guide students in establishing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regional culture. This profound cultural empathy not only stimulates students' passion for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ut also encourages them to organically incorporate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design practices, achieving both tradi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expression. Dezhou's abundant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Lubei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Black Pottery craftsmanship, and Canal culture, offer vivid case studies for interior design courses. B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ing regional culture into interior design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can strengthen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cultivating design talents with cultural awareness, providi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dynamic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rough creative design solutions.

Key words: Dezhou regional culture; interior design course; cultural empathy; fusion research

大文章 小切口 宽口径：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陈伟^{1a}, 王敏^{1b}, 崔玉今²

(1. 德州学院 a.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b.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2. 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 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 涉外法治工作的多样性及其对人才知识能力要求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地方高校有能力也应该做好中低端事务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外法治建设, 推动地方高校法学专业的特色发展。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从“小切口”入手, 即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 结合区域经济社会需求, 聚焦特定国家和特定领域, 着眼特定人才层次; 还应坚持“宽口径”育人, 即合理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重视课程设置的基础性、广泛性和综合性, 以提高学生对职业发展多元化的适应能力, 拓宽学生的就业选择空间。

关键词: 涉外法治; 法治人才; 地方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90-06

对于地方高校来说,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并非勉力难及的高深领域。山东政法学院、潍坊学院等均已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打造了自己的办学亮点, 为法学专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助力。^①

2021 年开始, 德州学院法学专业开展了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经过几年的摸索, 该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思路与做法渐趋成熟, 形成如下共识: 涉外法治人才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高校能够也应该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②, 地方高校的办学条件决定了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小切口”, 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决定了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宽口径”。

一、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篇“大文章”

(一)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很有意义

1.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新时代对法治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首先, 积极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响应。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和深化, 逐渐由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被动改变者转变为重要参与者、积极倡议者, 甚至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走向世界, 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 必须善于运用法治。”^[1] 当前, 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 规则竞争正成为国际角力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 我们必须加快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

收稿日期: 2024-06-07

基金项目: 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地方高校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Z2021306); 德州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地方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dzuzd23-04)。

作者简介: 陈伟(1979—), 男, 山东德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法律理论、高等法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① 2023 年 11 月 10 日, 山东政法学院举行山东省首家涉外法治学院揭牌仪式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座谈会。2024 年 12 月 4 日, 《中国青年报》以《深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积极赋能涉外法治建设》为题报道了该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成效。目前, 山东政法学院以涉外经贸法治人才培养为特色的法学专业已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24 年 12 月 14 日, 潍坊市在潍坊学院建立“潍坊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和“现代律师发展学院”, 为区域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② 一般认为, 涉外法治人才可以分为初级涉外法治人才(能够处理简单的涉外法律事务)、事务型涉外法治人才(能够独立完成特定领域常见的事务性涉外法律工作或者协助处理复杂的涉外法律事务)、专业型涉外法治人才(能够独立处理特定领域的涉外法律事务)、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够处理高难度涉外法律事务)和战略型涉外法治人才(具备卓越的法律素养、战略思维和国际影响力,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法律规则的发展)等不同层次。

务的涉外法治人才”^[2]。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贡献规则智慧的重要力量,其素质和能力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工作大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我国积极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其次,积极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纵深推进和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广泛开展跨境经贸合作,也越来越多地面临跨境金融合规、贸易壁垒、商事争议、国际融资、跨国并购、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保护、合规审查等方面的涉外法律挑战,亟待涉外法治人才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涉外婚姻、涉外继承、出国留学和务工等明显增多,民间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也呈明显上升趋势。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要求:“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3]目前来看,尽管涉外从业人数已初具规模,但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环节的各层次涉外法治人才仍严重短缺,无法满足社会层面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4]

2. 地方高校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有助于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除了国家、社会层面整体上对涉外法治人才的迫切需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对涉外法治人才提出了个性化需求,如胶东半岛与韩国、浙江义乌与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广西云南与东盟国家、黑龙江与俄罗斯、新疆与中亚国家等经贸往来密切,这就决定了上述各地亟需熟悉对象国法律的各层次专门法律人才。地方高校应瞄准区域涉外法治工作需求,通过定向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彰显地方高校的社会价值。

(二)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颇有难度

当前,地方高校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的困难可以概括为“五点”,即难点、盲点、堵点、痛点、断点。

1.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难点”。涉外法治人才是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难点”之所在。“复合型”要求学生既要掌握国内法,又要熟悉国际法,还要谙熟特定对象国家的国别法;既要掌握法律知识,还要具备英语运用能力,甚至对象国家的语言;既要熟悉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还要知晓对象国的法律文化。“应用型”要求学生做到知行合一,既要掌握庞杂的法律知识,又要具备法律实践能力。另外,涉外法治人才还需要广博的通识知识,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大学阶段全部完成上述教育学习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盲点”。法治文化,特别是对对象国社会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教育是很多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盲点”。通常认为,涉外法治人才是具备较强的英语和国别语言能力,能综合运用国内法、国际法和国别法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专门人才。高校育人过程也普遍重视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区域国别法来源于对象国的社会生活,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其法律文化水乳交融,不谙熟对象国的社会与文化就不可能理解其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很难顺利开展涉外法治实践。

3.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堵点”。法学专业是具有鲜明应用型特色的专业,涉外法治人才具有实践性突出、涉外性强、协同合作和交流表达能力要求高等特点,培养过程需要更多的涉外法治实践机会和涉外工作平台的支持。地方高校由于办学条件所限,很难为学生提供充分多样的涉外法治实践机会,学生校内所学与涉外法治实践工作脱节明显,专业实践机会缺乏成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堵点”。

4.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痛点”。得其人则成其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首先需要培养人才的人才,地方高校涉外法治学科建设相对落后,师资水平总体上相对薄弱,熟悉涉外法律实务、能够胜任涉外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数量少,师资问题无疑是地方高校投身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痛点”。^[5]

5.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断点”。涉外法治人才的复合型应用型特点、人才培养的高要求、培养过程的复杂性都决定了仅仅在学校围墙之内难以完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校教育只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前半程,涉外法治人才对国际法规则的运用、对对象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深入学习、对对象国语言的熟练掌握,都需要亲赴对象国进行沉浸式学习和实践。因此,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与国际化办学结合起来。但目前地方高校的国际化办学开展尚不够充分,还不能很好地完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后半程,这成为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断点”。

针对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的上述“五点”困难,地方高校需要立足自身实际,从“小切口”入手,以“宽口径”育人,找准发力点,量力而为推进培养工作。

二、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从“小切口”入手

“小切口”是就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特定性和针对性而言的,意指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量

力而为,要立足自身实际、聚焦特定国家、着眼特定领域、针对特定学生,整合资源、集中精力,做能做之事,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全。

(一)立足自身实际

2011 年,为积极应对涉外法治人才稀缺问题,国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22 所重点高校建设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相关高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与海外高水平法学院校开展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工作,基于自身办学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地方高校办学条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培养高端通用型涉外法治人才,应立足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地方产业特点,着眼自身办学基础与定位,依据本校师资情况,聚焦特定国家和业务领域,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务实探索,小批量精准培养应用型涉外法治人才。

(二)聚焦特定国家

加快培养国别法涉外法治紧缺人才,是党和国家对完善法学教育体系提出的重要指示。^[6]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能大包大揽、贪多求全,必须聚焦特定国家,把有限的力量施加到有限的着力点上。德州学院主要聚焦韩国和马来西亚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这一定位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山东与韩国隔海相望,经贸往来十分密切,涉韩法治人才需求旺盛。二是东盟已成为山东省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马来西亚与山东省在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交往十分密切。三是我校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商学院拥有 10 余名从韩国和马来西亚留学归来的法学、语言学、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具有一定的师资基础。

(三)着眼特定领域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贴近市场。^[7]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经济贸易等领域的法律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就山东省而言,由于“一带一路”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拓展国际经贸合作中面临法律困扰,对涉外法治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涉外合同、涉外仲裁、涉外股权和涉外劳务纠纷等方面。作为以服务山东、辐射周边区域为主的地方高校,德州学院着力培养民商、经贸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四)针对特定学生

地方高校有着特定的学情。首先,地方高校的生源通常以本省或周边省份为主,且农村生源比例较高,同时由于学生家庭背景、个人兴趣、职业志向各异,将

来有意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的只是少数,所以把全体学生“一网打尽”显然不妥。其次,根据调查统计,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一般毕业 2~3 年后工作趋于稳定,其中从事律师工作的占 30% 以上。目前多数律师仍然从事内卷严重的传统法律业务,而面对涉外法律业务这个大蛋糕却因无能为力而望洋兴叹,^[8]所以有志于从事律师工作的学生有着较强的涉外法律学习需求。综上,考虑教育资源、办学环境、教学条件、学生需求等因素,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能硬性撮合,必须针对有学习意愿的学生,最好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方式,设置 10~15 人的小班额“涉外班”,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有需求的学生身上。

三、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应“宽口径”培养

“宽口径”是就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适应性和多元化可能而言的,它要求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重视基础知识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使学生进入社会时有更广阔的就业选择空间和职业发展可能,增强其就业的适应性。

(一)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要务实,不可盲目攀比高水平大学。部分高水平大学确立了培养普适型国际或区域法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以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组织规则等基础性课程为核心,同时开设面向特定国际区域的法律课程。如湘潭大学设有非洲经贸法律研究院,全面推进非洲法研究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了“中国—拉美法律研究中心”和“中国—拉美法律培训基地”,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涉外法律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宜明确设定为培养应用型国别法律人才。国别法律人才是指在学习国际法基础课程的基础上,侧重学习并掌握特定对象国的法律制度 and 法律文化,能够协助我国企业和公民处理与对象国企业和公民之间法律事务的专门人才。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偏重国际法律知识的学习,相对忽略了对特定国家法律的专门学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我国亟需大量通晓“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法律、语言、文化的国别法律人才。地方高校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特定领域较为旺盛的涉外法律需求,着力建设国别部门法课程体系,开展特色化国别法律人才培养。^[9]

基于上述思考,为克服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难点”,德州学院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响应新时代区域涉外法

治实践需要,以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需求为导向,培养思想政治素质高、道德意识强,既熟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体系,又通晓经贸领域国际法和区域国别法,同时拥有较高的职业素养、较强涉外法治实践能力,熟悉对象国法律文化,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外语交流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能够胜任中国与韩国或马来西亚经贸领域涉外法律实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国别法治人才。

(二)创新课程体系

1.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法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了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10+X”分类设置模式,“1”指“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10”指10门专业必修课。针对这些课程,一是必须要高标准建设好,二是在具体授课内容上要“量体裁衣”,体现出涉外特点,如“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要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相关内容,“刑法”和“民法”课程要突出涉外内容、结合涉外案例来组织教学,“法律职业伦理”课程要结合涉外司法、涉外法律服务的典型案例和常见问题来讲授。“X”指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开设的其他专业必修课,针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应重点开设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财税法等课程。

2. 国别法律课程体系。地方高校可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瞄准特定国家特定领域开设国别法律课程。德州学院着眼韩国和马来西亚,聚焦经贸领域,开设韩、马两国民法、经济法、商法、行政法、诉讼法、知识产权法等专业选修课程。

3. 涉外法律实践课程体系。通过和涉外律师事务所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强化学生的专业见习、课程实践和实务实习;建立涉外案例库,强化涉外案例实务研习;聘请涉外业务律师担任兼职教授和特聘导师,来讲学和指导学生。^[10]

4. 英语和国别语言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开设初级韩语、马来语课程,同时推荐中级韩语、马来语慕课资源供学生选修,为学生根据未来职业需要进一步自主学习奠定语言基础。

5. 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指导学生合理选择公共选修课和在线开放课程,积极参加科技文化竞赛,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表达能力、协同合作能力等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的基础性核心能力。^[11]

此外,不同国家法律文化差异很大,可能引发无法预见的“特质性法律风险”^[12],学生只有深刻了解对象国的社会与文化,才能更准确预见和理解其行为,为此德州学院开设了“韩国社会与文化”“东盟国家社会与文化”等课程,有意识地加强国别社会与文化课程建设。这是

弥补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盲点”的有效举措。

(三)强化专业实践教学

为克服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堵点”,地方高校必须与涉外律所、涉外企业、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等加强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和制定联合培养机制,为学生提供涉外法律实践机会。山东载熙律师事务所作为德州市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20年来与德州学院在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近年来,载熙律所回应德州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急剧升温的现实需要,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商会、律所建立合作关系,拓展了涉外法律业务。北京市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则具有鲜明的涉韩法律服务特色,与德州学院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展开了务实合作。德州学院与上述涉外律所深化协同育人,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概括来说,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还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践教学类型的多样性。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和基本学情,针对性设计“认知体验型”“模拟演练型”“综合实践型”实践教学环节。认知即认识和感知,体验即经历和感受。“认知体验型”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涵养学生对于涉外法治事业的归属感。“模拟演练型”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的专业实操能力。“综合实践型”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13]

2. 实践教学环节的体系性。加强学生实务能力培养,必须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本着“由难而易、层梯递进”的原则,科学设计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布局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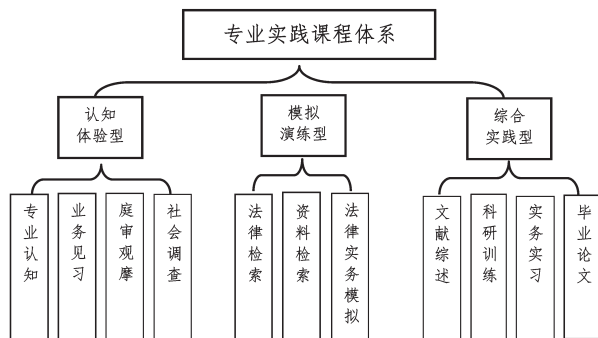


图1 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布局

3. 实践教学内容的融容性。实践教学课程是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阵地,但实践教学不应仅限于实践教学课程,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也应得到充分重视。如刑法、民法、商法、国际法等课程教学可以融入涉外案例研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可以融入涉外模拟法庭演练,国别法律课程要结合对象国法律案例讲解,英语和国别语言课程要融入涉外法律实务教学内容。

4. 实践教学时间的合理性。一是不同类型的实践

课程开设的时间节点要安排合理,结合教学进程,“认知体验型”可安排在大一、大二年级,“模拟演练型”可安排在大二、大三年级,“综合实践型”可安排在大三、大四年级。二是实践教学的时间要合理安排,特别是专业实习,时长应在12~20周。由于涉外案件都有一定办案周期,时间过短,学生难以完整地推进案件实践,实习效果将大打折扣。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的

师资问题是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痛点”所在。地方高校要多措并举强化涉外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师德高尚、结构合理、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1. 加强内部学习培训。高校要做好涉外师资培训顶层设计,有组织地开展师资提升工程,针对教学需要,结合教师学科方向和任教课程,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培养,充分借助线上资源加强国际规则和国别法律的学习研究,有序推进师资培训。

2. 支持教师外出访学交流。通过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借助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有利政策,积极支持教师赴特定国家交流、访学和研修。建立与涉外法治实务部门的多元互动机制和教师赴涉外机构挂职实训工作机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增强其国际化教学能力。^[14]

3. 聘请涉外实务专家,强化师资队伍。运用留学归国博士的学缘关系,聘请具有丰富涉外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教授来校开展涉外司法实践、案例研讨等实务课程的讲授,参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通过虚拟教研室引入国外学者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教学研究活动,加强与国外高校交流合作,吸收借鉴国外的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开展国别法律特色教学。

4. 借助兄弟学院师资力量。涉外法治人才知识、能力的复合性决定了仅依靠法律院系难以完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任务。2021年,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设置了“法学+英语联合学士学位项目”,汇集两校优质资源,实现了两校学科专业的强强联合,是涉外法治人才跨校培养的创新。地方高校法律院系也必须横向联合外国语学院和商学院,借助兄弟学院师资,共同完成育人使命。

(五)运用好数字化教学手段和网络教学资源

运用好数字化教学手段和网络教学资源是克服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痛点”的有效措施。

1. 要运用好数字化教学手段。以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教育技术具有传播方式多元、信息流量大、交互性能强的特点,将其引入教育教学过程为人才培养带来了强大的科技助力,远程国际教学也得以实现,甚至引发了教育教学方法的革命性变革。高校要从“物”和“人”两个方面提升数字化教育水平,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物”即数字化教育教学设备、虚拟仿真实验室等的运用和升级;^[15]“人”即教师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培训和应用。物役于人,人假于物,人物相济,才能促进教育教学数字化水平的显著提升。

2. 要运用好网络教学资源。地方高校教育教学资源相对不足,师资水平比较有限,制约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效性。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地方高校与高水平大学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通过引进各种网络教育平台的优质慕课、AI课程和数据库资源,地方高校建立起线上线下协同发展、课前课后多维度跟踪、教学辅学手段多元化的智慧教学环境,为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六)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与国际化办学结合起来

地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断点”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化办学的支持。涉外法治人才是与外国人打交道、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能“黑板上学种菜”“旱地里学游泳”,而必须躬耕于田、试身于水。学生即便在国内高校和涉外机构完成了涉外法律学习和实践,但终究还是纸上谈兵的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只是完成了前半程的基础学习,后半程的深化提升还需要与高校的国际化办学结合起来,多措并举,积极探索“国内+海外”的培养模式。

近年来,德州学院提出了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应用型大学的建设目标,深入实施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行动计划,国际化办学成绩斐然。^①借助学校出国(境)学习、校际交换生、公派留学、双学位、暑期短期研修等学生交流项目,依托学校东盟研究中

^① 地方高校也承担着国际交流合作的职能使命,地方高校也能打造出一流的国际交流平台。截至2025年3月,德州学院已经与24个国家和地区的112所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个。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5个国家的6所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了联合培养硕博研究生项目。建有国际合作科研平台9个,山东东盟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同时获批山东省俄罗斯中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学校担任中国(山东)-印度尼西亚高校国际合作联盟中方秘书处,先后建成山东省—北伊罗戈省人文教育交流基地、山东省—东盟青年交流基地、泰国语言文化交流中心。获批并实施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药学高端人才培养俄乌白国际合作培养项目。高质量建设“山东省华文教育基地”,高质量承办国侨办“网上外派教师试点”等项目。获批举办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孔子学院,成为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学生接收院校。招收泰国、俄罗斯等国家留学生600余人。

心积极与东盟国家高校合作开展跨境法律人才培养项目,组织涉外班学生赴对象国系统学习当地法律,深度体验其社会与文化。同时,加强涉外班学生与校内留学生的互动交流,提升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

结语

当前中国对于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缺口却与日俱增。^①众所周知,涉外法治工作的复杂性及其对人才知识能力要求的复合性决定了涉外法治人才只能是熟悉某一行业、掌握某一领域知识、具备某一层能力能力的专业型人才。同时,涉外法治工作的多样性及其对人才知识能力要求的差异性决定了社会需要不同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事务型、专业型、复合型、战略型皆有社会需求,高端、中端、低端各有用武之地。地方高校只要立足自身办学定位,紧密呼应地方需求,有效整合区域资源,完全可以在中低端事务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有所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外法治建设,实现地方高校法学专业的特色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25.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EB/OL].(2023-11-28)[2024-04-15].<https://www.12371.cn/2023/11/28/ART11701149406055175.shtml>.
- [3] 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EB/OL].(2019-02-15)[2024-04-1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5/c_1124120391.htm.
- [4] 杜焕芳.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J].中国大学教学,2020(6):22-30.
- [5] 荆珍,赵英杰,孙巍.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J].高教学刊,2023(31):62-65.
- [6] 董静然.涉外法治下区域国别法学的生成逻辑[J].中国大学教学,2024(Z1):31-38.
- [7] 车丕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重视市场的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4(2):27-40,155-156,161.
- [8] 胡加祥.涉外法治人才的分类与培养模式探讨[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66-78.
- [9] 闫冬.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两翼”[J].中国法治,2024(2):99-102.
- [10] 哈书菊,乔杨.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4(12):16-19.
- [11] 石佑启,韩永红.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之优化[J].中外法学,2024(6):1427-1448.
- [12] 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的再思考[J].环球法律评论,2021(3):180-192.
- [13] 陈伟,王敏.地方高校法学专业实践课程改革探索:基于基层法治人才培养的思考[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1(2):68-71,76.
- [14] 范冰冰.高校涉外仲裁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23(3):77-83.
- [15] 张清,刘艳.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的多语能力培养探索:中国政法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J].外语界,2023(5):23-30.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CHEN Wei^{1a}, WANG Min^{1b}, CUI Yujin²

(1a. Law School, 1b. Marxism School,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2.Beijing Yingke (Weihai) Law Firm, Weihai Shandong 264200, China)

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work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talents determine that society needs talents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at different levels. Local universities can and should write a “major article” on cultivating mid- and low-level transactional talents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base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educational positioning and conditions, combine the needs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cus on specific countries and fields, aim at specific talent levels, start with “small incisions”, reasonably set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damentality, extens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curriculum settings, “broaden the caliber”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in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broaden students’ employment choices, and improve students’ adaptability to the diversity of career development possibilities.

Key words: rule of law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legal talent; local university

^① 截至2024年,我国律师数量约为65万人,其中能够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约为2万人,包括高端涉外律师约3千人、中端涉外律师约7千人、低端涉外律师约1万人,仅占律师总数的3%,且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涉外法治人才十分匮乏。据估算,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缺口约为5至1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扩大到10至15万人。

产教融合视域下网络舆情分析课程建设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莉

(德州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产教融合背景下, 网络舆情分析课程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技术应用滞后、产教融合不足等问题。鉴于此, 亟需构建“技术嵌入·真题真练·深度实践·融合共创”的特色教学体系。该体系以大数据等数智技术为支撑, 通过引入行业真实案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采用模块化课程设计和多维实践方法, 重点培养学生的实战能力和高阶思维; 同时打造产教融合生态圈, 促进教育、产业、科研等多方协同育人。该模式的推广应用, 不仅有助于提升网络舆情分析人才培养质量, 更能为行业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 产教融合; 网络舆情分析;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096-05

一、网络舆情分析实务课程教学研究现状

网络舆情分析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的舆情监测、分析、研判、预警、应对能力, 以精准洞察社会舆情动态走向, 优化舆论引导和干预机制, 为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随着社交媒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络舆情分析在社会治理、企业公关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然而, 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的教学模式仍存在明显滞后性, 难以适应数智时代的发展需求。基于此, 创设一种能够紧跟技术进步, 有效融合理论与实践、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模式尤为迫切。

网络舆情分析课程教学的关键是培养学生在网络舆情演变中把握、分析和治理舆情的能力, 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1] 针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实践能力薄弱、教师产学研融合知识不足等问题, 有学者提出通过鼓励高校教师深入企业实践、推动校企联合授课等方式强化课堂产学研融合内容, 构建了以产学研融合为导向的网络舆情分析教学模式。^[2] 而随着舆情监测分析技术的快速升级和迭代以及“新文科”理念的兴起, 传统舆情教学正经历从经验传授向数据赋能的范式转型, 逐步构建起技术驱动的文理交叉教学模式。有学者从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原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方面探索了新文科背景下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课程教学改革实施路径。^[3] 有学者基于“新文科”教学思想, 提出在高校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中, 基于社会科

学的传统舆情分析类课程需要引入计算机网络、大数据挖掘等新技术的应用学习, 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 构建“文工结合”的教学模式。^[4]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 尽管有学者提出“文工结合”教学模式, 但现有课程仍以传统舆情理论为主, 大数据挖掘、AI 算法等技术的教学转化路径尚未清晰。另外, 现有研究在产教融合背景下, 对网络舆情分析课程与实际产业需求的深度结合缺乏系统性探索, 导致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基于此, 本研究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产教融合的现实需求, 聚焦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的教学痛点, 着力推进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

二、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困境”

当前, 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对学生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的深度培养有所忽视。网络舆情具有高度复杂性、动态性和快速演变性特征, 要求学生既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又要具备把抽象理论灵活应用于复杂多样的舆情实际场景的能力。然而, 随着网络舆情行业新技术、新理念和运营模式的不断涌现, 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新却比较滞后, 真实舆情案例和实践应用场景也比较匮乏, 致使学生难以获得与行业需求相匹配的实战经验, 专业能力与

收稿日期: 2025-02-17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校级教改项目“舆论学课程改革中的多维提升与格局再造”(dzums24-24)。

作者简介: 李莉(1986—), 女, 山东聊城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网络舆情、国际传播研究。

岗位要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显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壑”已成为网络舆情分析课程必须直面的关键难题。

(二)实践深度广度流于表面的困境

课堂教学实践的深度与广度,无疑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6]然而,在网络舆情分析这一高度依赖实践应用的领域,在现行教育模式下大多深陷“流于表面”的困境,严重制约了学生综合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当前,实践内容往往局限于基础的舆情数据采集、简单的舆情态势初步判断,以及一些碎片化的模拟应对任务,这种“浅层次实践”如同蜻蜓点水,学生无法深入领悟网络舆情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网络舆论环境复杂多变的特点,以及如何系统地构建行之有效的舆情应对策略体系。此外,在这种挑战性不足、真实反馈欠缺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很容易产生思维惰性。当面对错综复杂的舆情问题时,他们难以表现出所需的敏锐洞察力与创新思维。例如,在舆情涉及多方利益博弈、舆论走向受多种因素左右的复杂情况下,由于缺乏深度实践锻炼,学生难以迅速、准确地剖析问题本质,因而难以提出创新性的应对思路。

(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流于表面的困境

在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的优化发展中,产教融合被视为挖掘教育潜力、促进行业发展的核心策略。然而,当前产教融合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面临着协同创新的重重“壁垒”,阻碍了教育、产业、科研等多方面力量的高效整合与深度合作。^[7]

1. 合作机制不完善是首要难题。在各方合作时,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合理的责任划分以及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这导致合作项目难以长期稳定推进,合作成果也难以顺利转化为实际应用。

2. 信息沟通不畅是另一大阻碍。信息不对称与交流渠道有限,使得各方难以达成共识,阻碍了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网络舆情分析领域,行业动态和技术更新换代迅速。若高校与企业不能及时、准确地互通信息,高校就无法根据企业实际需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企业也难以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人才资源。例如,企业已广泛采用新的舆情监测技术,但高校因信息滞后,仍在传授过时方法,造成学生所学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

3. 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关键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网络舆情分析行业的直接参与者,在人才需求、技能标准、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见解。但因需求表达不充分、参与过程不深入,企业难以将自身资源与该课程教学有效对接,尤其在制定培养标准、共建教师队伍、共享教学资源等方面,普遍未能建立起动态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这使得企业无法为学生提供详细的职业技能指导与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这样

流于表面的合作不仅降低了产教融合的整体效能,还制约了学生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难以满足网络舆情分析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三、产教驱动融合下网络舆情分析课程教学创新策略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必须拥抱前沿技术、打通专业和学科壁垒,面向实践更新人才培养模式,充分洞察行业的人才需求状况,加强业界学界的双向对话交流。

(一)技术嵌入:底层技术赋能与前沿工具引入

1. 将大数据技术优势与舆论理论相互融合。互联网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愈来愈多的网民通过这个平台表达对社会事件、国家方针政策等的观点看法,进而汇集成范围更广的社会舆情。社会舆情虽不能代表社会全部大众的看法,却是衡量社情民意的重要维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焦点。因此,对舆情的分析及管理需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路径,如教会学生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舆论动态,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辅助内容创作,将指标与技术纳入舆情研判工作,从而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舆情分析体系等。

大数据背景下的舆情分析既不能只盲目依赖技术,也不能只用指标对数据进行建构,而应将技术与理论相融合。只有理论与技术的相互衔接嵌套,才能形成更加确证的舆情分析,构建舆情模型,提升舆情预警监测的能力。要教给学生在舆情分析工作中,运用爬虫技术、云计算等对数据库进行实时更新,生成舆情报告。还可以教给学生利用清博大数据进行舆情分析,清博大数据在内容分析中将指标理论与技术运用有效结合在一起,用图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数据结果;通过关键词提取统计、语义情感分析技术对舆情信息进行汇总,可还原宏观的舆情生命周期。

2. 在网络舆情分析课程教学中明确和细化大数据舆情分析的指标体系和引导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是科学的指标体系是网络舆情分析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开展具体舆情分析工作的前提,它作为理论模型,导入数据就能进行量化分析。在对网络舆情事件进行研判时,需要综合考量事件的强度、热度、量度以及公众的情绪、意见等指标,基于指标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舆情分析模型,从而实现对舆情的系统化评估与研判。二是尽管大数据技术为网络舆情分析提供了全新的高效工具,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应用偏差风险。大数据虽然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快速抓取与处理,但其价值发挥仍需依赖指标理论体系的支撑,即通过预先设置的舆情分

析模型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分类,进而揭示数据间的关联规律,最终生成反映网民关注热点的可视化舆情地图。由此可见,大数据并非网络舆情分析中唯一起作用的要素:大数据技术、指标体系设置、理论支撑与舆情研判人员的实践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因此,指标体系的设置在舆情研判工作中不容忽视。细化的指标维度不仅实现了研判过程的量化与系统化,更推动舆情分析向科学化方向演进,显著增强社会舆情的预警与监测效能。三是面对网络舆情特有的突发性、多变性和群体极化等复杂特征,细化的分析维度和动态的引导路径可以帮助学生系统把握舆情演化规律,提升研判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新浪舆情通作为权威的舆情分析系统,为复杂的网络舆情提供了可行的指标建构方案和效度评价模型,为舆情研判提供了指导性方案和创新性技术支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新浪舆情的舆情指数和研究报告进行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利用层次分析法将舆情走势的影响因素整合为系统的指标体系,通过权重赋值和量化分析,依据划定的指标对舆情进行效度评价,从海量舆情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舆情信息;最终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历时性纵向追踪与跨国对比分析,遵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逻辑展开研究,同步建立舆情观测点和数据采集网络,采取个案式和通则式相结合的解釋模式、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数据,建构研究体系,从而得出科学结论。

(二)真题真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网络舆情分析课程在注重相关理论教学的同时,也需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真题真练”理念强调以真实的网络舆情问题为导向,通过引入贴近实际的网络舆情典型案例,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网络舆情分析职业情境中进行学习与实践。因此,真题的选择需要紧密贴合网络舆情分析行业的最新态势与发展趋势,确保教学案例真实且具时效性。这一过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探索欲,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高效转化,为后续的深度实践及融合共创奠定基础。基于此,本课程应通过设计“项目实践”和“专业实战平台”两大真题模块来提升学生的实战技能。

“项目实践”是最为有效的真练途径。教学过程中可以设计舆情监测、危机公关等实战模拟项目,还原真实的舆情场景,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与决策分析中锻炼实践能力,模拟企业实际遭遇的舆情问题。除模拟项目外,还可以进行真实项目合作,带领学生参与真实的网络舆情分析项目,如为德州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实施前的舆

情风险评估,为德州企业开展产品上市后的舆情监测与分析,为德州市重大政策出台后的舆情反馈进行监测与分析等。这些实战项目不仅能使学生紧跟社会热点舆情动向,还能让学生亲身体验网络舆情分析的完整流程——从舆情信息收集、筛选、分析,到舆情报告撰写及应对策略制定,让学生全方位理解行业需求,增强适应能力。在项目实践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决策权,鼓励学生以团队合作方式开展自主探究,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教师需适时提供必要指导与支持,如学生遇到技术难题或分析思路受阻时,给予专业建议与解决方案,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还可选择利用网络舆情分析相关的行业竞赛及专业实战平台来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也可以依托“校内舆情演练平台”开展演练。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搭建“舆情与治理专报”平台来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每年可吸纳 20 余名学生骨干成员,先在校级舆情工作平台锻炼,之后,轮流派往主流媒体的舆情中心,如区市两级宣传部门、网信办等相关单位实习。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体验真实的网络舆情工作环境,有效提升学生的应变能力与风险意识,还能学习党和政府的舆论工作方式方法,理解党的新闻舆论事业发展理念。

(三)深度实践:实战技能锻炼与高阶思维培育

1. 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优化。根据网络舆情分析行业的最新动态和企业的实际需求,网络舆情分析类课程需要秉持“深度实践”理念,灵活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模块。同时需要积极响应新文科建设带来的挑战,推动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和时代背景紧密契合。

搭建模块化课程架构。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需要实现从传统“章节式教学”到“模块化设计”的革新,搭建起模块化课程架构。本课程计划设计网络舆情传播仿真模型、舆情分析技术、舆情监测、态势研判、危机应对五大教学模块,各模块环环相扣,能精确匹配网络舆情分析的核心流程。

构建多智能体仿真系统。在网络舆情传播仿真模型模块,学生通过构建多智能体仿真系统,还原舆情在社交网络中的扩散路径。学生以“准舆情分析师”的角色,深度参与各类模拟舆情项目的全流程运作。舆情分析技术模块,学生将系统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社交网络分析等核心技术,运用情感分析算法识别网民情绪倾向,通过主题聚类技术提取核心议题,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绘制传播关系图谱。舆情监测模块,学生将搭建多维度监测体系实现全网信息抓取。态势研判模块,学生将借助统计学、社会学等知识,深入剖析舆情发展态势。最后,通过危机应对模块,依据不同的舆情态势,制定

相应的应对策略或分级响应方案,并建立效果评估反馈机制不断优化应对方案。通过这一系列实战演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将得到切实提升,逐步培养出解决复杂舆情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能够从容应对网络舆情领域瞬息万变的复杂挑战。

融合现实议题与新文科使命。网络舆情分析课程内容不仅囊括网络舆情分析中的现实问题,还需积极回应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相结合,更新教学内容,使学生掌握最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德州市某高速路段施工引发周边居民投诉这一重大工程舆情事件为例^[8],在该事件的舆情应对实践中,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舆情收集分析、舆情传播规律等核心技能,还应在新文科背景下深化跨学科知识融合。例如,可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理论,探究公众对重大工程建设态度的形成机制;通过爬取微博、本地论坛等平台投诉数据,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扰民”“补偿不公”等高频关键词。同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预测模型,为化解施工噪音、补偿争议等舆情风险提供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工程建设项目特点,学生还可探索通过新媒体平台制作针对性科普内容、策划互动话题等新型传播方式,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工程建设,实现舆情危机的柔性化解。这一全过程实践不仅系统提升了学生舆情分析应对能力,更拓宽了跨学科知识视野,培养了适应数字化时代舆情工作需求的复合型能力与数字化思维。

2.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为有效提升“深度实践”教学效果,更有效地提升课程质量,本课程将依托智慧树等课堂平台,运用数智化的教学手段,践行线上线下交融互补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可上传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网络舆情分析的前沿讲座视频、典型案例资料、相关学术论文等,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与交流。虚拟仿真软件可模拟网络舆情的传播场景,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舆情监测与应对操作,如同置身真实的舆情工作场景,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除了创新教学手段,本课程将巧妙融合五大教学模块,力求让各模块学习内容紧密贴合实际应用场景及企业真实需求,为学生营造既真实又具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实地调研、头脑风暴、自主探究与协作法、模拟新闻发布会、舆情直播实战以及复盘总结反馈等多种创新型教学方法将在课程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方法不仅增强了教学的有效性与趣味性,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更有助于学生应对网络舆情行业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

以“德州市重大政策出台的网络舆情应对”项目为例,在舆情监测环节,学生将首先开展实地调研,深入

政府部门、社区和企业,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及涉及群体范围。通过与相关人员沟通,收集各方对政策的初步看法与潜在关注点,为后续工作积累一手资料。进入态势分析环节,学生运用头脑风暴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分析政策出台后可能引发的舆情态势。大家畅所欲言,列举可能出现的舆情热点、传播路径及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通过思维碰撞,全面梳理潜在舆情走向。在应对策略环节,学生借助自主探究与协作法,共同探讨针对不同舆情态势的应对策略。他们结合政策要点、公众心理及以往类似舆情案例,制定包括信息发布口径、沟通渠道选择、回应时间节点等在内的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形成初步的舆情应对方案。小组成员明确各自分工后,自主开展相关知识学习与技能提升。负责数据收集的学生在项目中要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相关舆情信息,运用文本分析工具进行情感倾向判断。小组定期进行研讨,分享各自的进展与遇到的问题,共同协作解决。在分析舆情传播路径时,大家共同探讨如何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到了引导处置环节,学生模拟新闻发布会场景。部分学生扮演政府新闻发言人,其余学生扮演媒体记者和网民代表,针对可能出现的舆情提问并进行现场回应演练。通过模拟真实场景下的问答互动,锻炼学生在高压环境中准确传达信息、有效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学生还可以开展舆情直播实战,模拟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向公众解读政策内容、回应公众关切,实时观察并分析网友反馈,及时调整直播内容与沟通方式。最后,学生将通过复盘总结反馈,全面回顾整个舆情应对过程。他们分析各环节执行情况,对比预期与实际效果,总结成功经验与不足,进而优化完善舆情应对方案。

(四)融合共创:构建产教融合的深度协作体系

在快速更迭的媒体环境中,网络舆情分析领域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已无法单纯依托校园教育来实现,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迫切需要构建“融合共创”的全新育人生态。这一创新机制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打破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促进资源的共享与优势互补,进而达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以及人才链的全方位融合。^[9]

协同育人机制不仅为学生营造出贴合网络舆情分析行业实际的学习环境,更推动了理论知识与行业实战经验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产业与学生发展的多方共赢。

1. 机制共赢。大力倡导高校与企业构建紧密的合作机制。通过共同拟定人才培养方案,使教育内容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例如,网络舆情分析课程与诸如德州市网信办、抖音字节跳动等行业领军企业的导师展开合作,一同规划教学内容。这样一来,学生既能接触到前

沿知识,又能获取贴近实际工作场景的职业引导。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为企业输送了高质量人才,达成教育与产业的双赢局面。

2. 资源共享。校企双方充分挖掘并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同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实践机会。高校凭借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提供扎实的理论教学与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企业则凭借对行业的敏锐洞察,贡献最新的行业案例与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学校邀请企业的专业人员到学校开展实践讲座和指导,分享行业最新动态和实际工作经验,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行业需求,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双方积极推动实践基地的开放与共享,如依托“网络舆情研究现代产业学院”的校内实训基地,与互联网产业园区等校外实践点展开深度合作,为学生搭建起一座跨越校园与职场的桥梁,让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在这一共建的生态环境中深度融合,切实实现知识向能力的有效转化。

3. 协同共育。鼓励采用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联合授课的教学模式。学术导师负责提供理论指导,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企业导师则着重传授实战经验,引导学生开展舆情市场分析并制定应对策略。这种协同共育的方式,促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相互促进中,实现知识的内化与能力的提升,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能够稳步提升,及时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

结论

网络舆情分析的教学改革在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上均亟需创新性突破。本研究提出的特色教学模式将“实例、实景、实操、实训、实战”全过程嵌入知识体系的传授过程,不仅在知识体系的更新上下功夫,还同

步实现教学场景、智能手段、师资队伍、实践平台、评价体系、成果应用等的同步更新。“技术嵌入·真题真练·深度实践·融合共创”教学模式凭借其创新的教学理念与动态更新的实践策略,为培养契合时代需求的网络舆情分析人才,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探索路径与示范样本。该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应用,有望实现教育内容与网络舆情分析行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教学标准与行业最新动态的高度契合,教学过程与实际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进而有力推动教育成果向行业实际应用的高效转化,为我国网络舆情分析行业的稳健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 [1] 吴越. 网络舆情分析课程的分层教学研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 2024(1): 13-16.
- [2] 王佳, 王浩. 面向产学研融合的《网络舆情分析》新型教学探索[J]. 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 教育, 2024(1): 140-142.
- [3] 刘姿均, 柳溪. 新文科背景下《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研究[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 2023(12): 71-74.
- [4] 侯旋, 杨梅.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一面两线三群”模式[J]. 传媒, 2024(9): 88-90.
- [5] 向剑平, 左劼, 乔少杰, 等. 网络舆情态势分析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50(5): 985-990.
- [6] 赵舟敏. 产教融合视域下媒体经营与管理课程创新改革研究[J].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2(4): 108-116.
- [7] 邓琳佳, 宋志平. 高职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构的价值逻辑、实践难点及推进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3(28): 20-27.
- [8] 征地修建高速公路居然用国家禁止的“以租代征”方式, 且补偿未落实就施工: 德州平原县公路中心哪来的底气?[EB/OL]. (2023-12-06)[2024-12-23]. https://sd.china.com/shangye/20000940/20231206/25821262_all.html.
- [9] 杨诗怡. 四链融合: 苏南县域高职人才培养路径探究[J]. 科技风, 2024(19): 160-162.

Research on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LI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 cours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lagg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In light of thi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distinctive teaching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 embedding, real-case practice, in-depth appli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co-creation”. This system is supported by big data and other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achieving deep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real-world industry cases. It adopts modular course design and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methods,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hands-on capabilities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Simultaneously, it aims to build a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cosystem,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academia, industr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his model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but also provide professional talent support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teaching reform

“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探究 ——以德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汤 敏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 要:“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高校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将其有机融入思政课程。以德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还面临着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材内容的灵活度有待提高、重视度和挖掘性有待加强以及教学方法有待多元化的教学痛点, 这就需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基构建“三模块”教学内容体系、教师积极推动“六个必须坚持”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及开发“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沉浸式的教学场景, 从而有效提升“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融通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六个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3-0101-04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六个方面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1]这“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时代的内涵, 是指导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重要遵循。

一、“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痛点

毋庸置疑, “六个必须坚持”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在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为此本研究对德州学院已经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 2022、2023、2024 级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以深入分析“六个必须坚持”在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存在的教学痛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55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55 份, 有效回收率 100%。

(一) 部分教师对教材内容把握不够到位, 不够灵活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工具, 是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的载体。本研究通过调查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次数所持态度(调查结果见表 1), 发现部分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材内容的把握不够灵活、不够到位。一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六个必须坚持”的探讨频次较低。有 69.86%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基本未提及“六个必须坚持”。尽管“六个必须坚持”已经融入 2023 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 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 且有 81.13% 的被调查学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但大部分教师仍未对此引起重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二是教师将“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相结合的意识不足。38.03%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教师基本未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授课, 可见, 大部分教师尚未形成理论结合的系统教学思维, 缺乏交叉学科授课理念。三是教师对教材内容的处理不够灵活。20.56%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教师已经意识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授课, 但访谈发现, 教学实践中, 教师将“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收稿日期: 2025-02-21

基金项目: 德州学院 2024 年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研究”(dzuzd24-04)。

作者简介: 汤敏(1993—), 女, 内蒙古赤峰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贯通性衔接不足,导致“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联系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教师也未能充分结合学生的思想特点和认知规律,提供生动具体的实践案例,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表 1 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次数所持态度 (单位: %)

“六个必须坚持”已经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内容各章节之中	非常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81.13	17.75	1.13	0
教师在“原理”课堂教学中经常探讨“六个必须坚持”	非常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30.14	42.25	26.76	0.85
教师尚未意识到将“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相结合	非常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14.93	23.1	41.41	20.56

(二)部分教师的重视度不够,阐释不够

本研究调查了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痛点所持态度(调查结果见表 2),发现目前大部分思政课教师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政治站位和挖掘力度还有待提高。一是从政治站位来看,部分思政课教师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 80%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具有高度关联性,但也有 38.59% (15.21%+23.38%)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教师基本上对“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深刻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可见,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六个必须坚持”的融入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对“六个必须坚持”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等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状况削弱了这一思想在课程教学中的指导作用。二是在挖掘性方面,大部分教师并未及时将“六个必须坚持”融入课程之中。94.37%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难以找到有效的结合点是“六个必须坚持”融入教学的最大痛点,教师在教学中往往停留在对“六个必须坚持”字面意义的解读上,简单地将其作为补充内容,而没有将背后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的理论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但在课程的讲授中,教师并未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联系进行充分阐释。

表 2 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痛点所持态度 (单位: %)

“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内容具有一定关联性	非常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80	19.72	0.28	0
在“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时,教学痛点是什么	难以找到有效结合点	教学时间有限	缺乏教学经验	尚未构建融合体系
	94.37	87.32	62.25	66.76
教师对“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内涵和思想缺乏深入研究	非常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15.21	23.38	40.85	20.56

(三)教学以理论灌输为主,学生接受度不高

在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方法所持态度的调查(调查结果见表 3)中发现,“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理论性很强,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接受度并不高。一是教学方法较为单一,重理论轻实践。84.51%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生接受度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60.28% (35.77%+24.51%)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传统理论讲授“内容抽象难懂”,如当教师用“矛盾分析法”阐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时,学生往往陷入“概念—例子—总结”的线性循环,缺乏对“人民利益最大化”这一价值判断的具身体验。这也折射出教学方法与学生认知规律的深层矛盾。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理论性较强,当其融入课程时,如果教师继续采用传统的理论灌输融入方式,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二是互动性和参与度不足。34.08% (19.15%+14.93%) 的被调查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的认知基础薄弱,导致课堂参与度较低。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生动案例、形象符号或具体情境实现知识建构,而抽象的理论讲解容易与学生的认知习惯产生错位。当理论阐述脱离学生的经验世界时,不仅会引发理解障碍,还可能导致学生对理论学习产生抵触情绪。

表 3 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方法所持态度（单位：%）				
“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非常符合 84.51	一般符合 15.21	不太符合 0.28	非常不符合 0
“六个必须坚持”理论性较强，抽象难懂，不愿意听	非常符合 35.77	一般符合 24.51	不太符合 21.69	非常不符合 18.03
对“六个必须坚持”不了解，缺乏兴趣	非常符合 19.15	一般符合 14.93	不太符合 39.72	非常不符合 26.2
教师采用传统的理论灌输融入方式，接受度不高	非常符合 21.41	一般符合 20.56	不太符合 37.75	非常不符合 20.28

二、教学痛点的解决对策

本研究针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痛点向学生征询了改进建议(结果见表 4)发现能否深入探究“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的理论契合点,构建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教学转化机制、创新教学方法,成为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思想性、理论性的重要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2] 思政课教师是课程教学的关键主体，教师的重视程度和挖掘能力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表 4 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痛点提出的建议（单位：%）				
“六个必须坚持”如何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更有实效	构建融入体系 90.14	创新教学方法 70.7	思政教师正确引导 91.83	运用鲜活实践案例 74.37
“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采用的实践教学形式	多媒体教学 95.49	专题讲座 86.76	实地调研 95.32	小组讨论 53.24

（一）从零散到系统：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基构建“三模块”教学内容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并不是孤立式的、分散式的教学，它同其他思政课程一起，完整地构成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思政课程‘共同体’”^[3]，需要通过精心梳理，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90.14% 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应当构建清晰的融入体系(见表 4)，因而，教师应深入研究“六个必须坚持”的内涵和逻辑关系，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的各个章节内容进行系统整合，以教材内容为基础模块，以“六个必须坚持”为融入模块，构建二者精准衔接的“三模块”教学体系表(见表 5)，使“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的教学内容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从单向到共生：教师积极推动“六个必须坚持”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 思政课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思想的引路人，其政治站位和教学态度直接影响着课程的育人效果。因而“六个必须坚持”有机融入课程的关键在于教师提高自身的政治站位，正确引导学生。一

是思政课教师要加强自身理论学习，强化责任意识，提升政治素养。教师的政治站位是实现“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5] 教师只有自身政治站位和理论水平高，才能在教学中准确把握课程的政治方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变成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提升的关键环节。二是思政课教师深入挖掘“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在教学中要秉承融合态度，深入挖掘这种内在联系，找准两者之间的融合点，在构建融入体系的前提下，实现巧妙融合。三是思政课教师将“六个必须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阐释。例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时，可以结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当代体现。通过这样的融合，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意义。

（三）从抽象到具体：开发“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沉浸式教学场景

相比于理论讲解，学生更愿意通过实践的方式在

表 5 “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内容精准衔接“三模块”教学体系表

“六个必须坚持”模块	章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内容模块	精准衔接“模块”
坚持人民至上	导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	站稳人民立场
	第三章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四章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坚持自信自立	导论	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	坚信马克思主义“行”
	第一章第一节	内因和外因学说	坚定“四个自信”
	第六章第二节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走向共产主义光明未来
坚持守正创新	第一章第二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民族发展跌宕起伏
	第二章第二节	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第二章第三节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变”与“不变”辩证统一
坚持问题导向	第一章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
	第二章第三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第一章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坚持系统观念	第一章第二节	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	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结构性
	第一章第二节	事物的变化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章第三节	系统思维能力	树立正确大局观
坚持胸怀天下	第三章第一节	世界历史理论	秉持和践行天下情怀
	第三章第一节	人类文明新形态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第六章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中接受“六个必须坚持”。一是运用鲜活的实践案例将“六个必须坚持”融入课程。“案例选择需要直面当下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做到解决学生困惑,启发学生思考。”^[6]教师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平台,根据学生对“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解程度和学习特点,推送相关的学习资源和案例。例如,对于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推送一些理论程度较高的学术文章和案例分析;对于理解能力较弱的学生,则可以推送一些通俗易懂的视频讲解和图文并茂的资料。学生在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内涵,有效提升“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接受度。二是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学习环境,还原“六个必须坚持”的应用场景。70.7%的被调查学生希望教师使用 AI 创新教学方法,95.49%的被调查学生认为应当使用多媒体教学,运用视频图片将“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见表 4)。在教学实践课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带领学生“穿越”到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场,感受“六个必须坚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内涵,提升学习效果。三是“六个必须坚持”

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注重价值塑造。可以通过实地调研,让学生深入社会,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深刻理解“六个必须坚持”的深刻内涵。因此,只有以“具象化表达”降低“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距离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的“现实关联性”增强价值引领,才能最终实现“六个必须坚持”从知识传授到信念内化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2]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2019-03-19(001).

[3] 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 [N]. 人民日报, 2023-04-01(001).

[4]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17): 4-16.

[5] 一图解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EB/OL]. (2025-01-20)[2025-01-21]. <https://education.news.cn/20250120/b0b1240e424d49dda64058343b7cbaf2/c.html>.

“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创新

张雪

(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如何借助 AI 赋能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已成为数智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任务型教学法(TBLT)与项目式学习(PBL)为此提供了有效载体。当前财经类高校商务英语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滞后、任务设计欠专业、本土化案例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运用 AI 辅助的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学情分析、结合 TBLT 驱动单元教学设计、探索 TBLT 与 PBL 融合模式以设计跨学科综合项目、迭代更新案例教学,构建“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商务英语教学的实效性,为商务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商务英语;任务型教学法;项目式学习;AI 赋能;案例库;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3-0105-06

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正经历以 AI 赋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驱动的结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促进了教学手段的技术升级,而且正在深刻影响知识传授范式与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教育部在《新文科建设宣言》中强调“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度融合”^[1]。目前,AI 技术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已从早期的辅助工具阶段过渡到当前的智能重塑阶段。然而,在商务英语教学中仍存在 AI 技术应用与专业特色结合度不足、评价体系数字化转型不彻底、师生数字素养匹配度欠佳等问题。如何借助 AI 赋能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成为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以 Willis 提出的三阶段模型(任务前、任务环、语言聚焦)为经典框架,强调通过真实语境中的任务驱动实现语言意义与形式的平衡习得。^[2]研究表明,TBLT 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语言准确性、流畅性及综合素养,如批判性思维与协作能力。^[3]徐锦芬、李娟指出,技术赋能 TBLT 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任务设计、实时学习反馈及多模态资源支持等方面,但同时也面临技术适配性不足与教师数字能力缺失等挑战。^[4]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通过真实、复杂的任务驱动学习,强调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和知识建构,能提升学生高阶思维

能力、增强学习动机和参与度等。^[5]Almulla 指出,PBL 通过协作学习、学科知识整合等途径发挥作用,但成功实施需要教师转变角色。^[6]Yao 进一步将 TBLT 与 PBL 整合应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验证实该模式能显著增强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与课堂参与度。^[7]

近年来,AI 技术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为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24 年 11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AI 赋能与公共外语教学研讨会”上,彭青龙指出,在 AI 时代,高校外语教师应主动优化知识结构,掌握数字人文理论与应用技能,以适应智能化教育带来的新挑战;程向莉讨论了 AI 技术对教师角色的深远影响。^[8]如何将 AI 技术融入文科尤其是外语教学中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在 AI 技术与商务英语教学深度融合方面的研究不够丰富,难以提供充足的实操参考。尤其是学术界在 TBLT、PBL 与 AI 技术协同应用方面缺少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针对 AI 赋能 TBLT 与 PBL 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创新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一、商务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当前,财经类高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中在运用 AI 赋能

收稿日期: 2025-04-10

基金项目: 山东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政引领—数智赋能’的高校英语专业个性化人才培养新范式研究与实践”(M2024218)。

作者简介: 张雪(1972—),女,山东即墨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教学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不仅影响了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也制约了他们在真实商业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素质形成。

(一)教材滞后,数字融合不足

一方面,教材中的案例库仍以传统贸易场景为主,对跨境支付、区块链、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覆盖率较低,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对财经人才的培养需求。学生亟需掌握跨境支付、区块链、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专业术语和英语沟通能力。另一方面,教材纸质载体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较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需要额外开发辅助工具以弥补这一不足。

(二)任务设计碎片化,财经场景模拟缺失

现有教材中的学习任务多为独立的、离散的练习,难以形成系统性的能力培养链条。同时,学习任务普遍对财经专业特定语料和术语覆盖不足。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面对跨境支付、金融数据分析等实际业务情境,但现有学习任务更多侧重于一般商务交流,缺乏对财经行业特定场景的模拟,导致学生在面对真实财经工作场景时,往往无法准确、高效地使用英语专业术语进行有效沟通。

(三)教学周期短与跨学科协作不足

商务英语教材单元教学周期较短,无法支持深度学习项目学习。此外,PBL教学通常需要涉及多个学科知识的整合,如金融分析、经济学原理和国际贸易等。然而,由于当前课程体系缺乏有效的跨学科协作机制,在PBL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跨越学科壁垒,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进行有效的跨学科知识整合和实践。

(四)技术适配性不足与教师数字能力缺失

不同院校、不同教学场景的硬件设施与网络环境差异较大,部分AI技术对设备配置和网络要求较高,使得一些条件有限的高校难以应用AI技术,无法发挥AI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赋能作用。在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缺乏运用AI技术进行教学内容开发、学情分析、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的能力,他们对AI的认识较为浅显,仅停留在基础工具的使用层面,无法将AI与TBLT、PBL等教学理念深度融合,并进行教学设计。

(五)商务英语教材本土化案例库的缺失

当前教材中的案例库主要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缺乏对中国本土市场和经济背景的深度剖析。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教师希望引入更多符合中国市场特征和经济环境的本土化案例,但由于版权等问

题,在获取本土化案例时陷入了困境。

(六)商务英语教学评价体系的现存弊端与构建需求

商务英语教学现有的评价体系主要关注学生语言微技能,如语法和发音,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如团队协作、跨文化沟通、数据解读等软技能的培养。然而,传统的评价标准主要针对语言能力,未能充分反映学生的实际商务应用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因此,建立一个涵盖语言能力、商务决策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教学模式与创新

商务英语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财经人才的需求,构建一种创新且高效的教学模式迫在眉睫。笔者在商务英语教学实践中,尝试构建了“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教学模式。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体验商务英语》,主要在AI赋能的“雨课堂”教学平台上进行授课。在16周的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8个单元的学习;每个单元的学习需要两个90分钟的课时,学生需要完成一至两个微任务;最后6周逐步打造一个综合项目——销售推介演讲。整个教学过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TBLT中的微任务向PBL中的综合项目渐进发展,形成双轮驱动教学模式。

(一)学情分析

在开课时根据商务英语的需求和特点,利用雨课堂开展线上问卷收采活动,调查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学习期待等,对原有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提升,并借鉴智能备课助手生成教学大纲、案例、知识点详解等内容。

(二)TBLT 驱动单元教学

以Unit 3 Selling为例。在任务前阶段,雨课堂可以提供全流程智能辅助:通过学情分析实现个性化导入方案设计,基于多维度数据匹配不同学生基础;智能整合与主题相关的多媒体素材,构建系统化教学资源包;自动梳理重点语言知识,生成术语卡片和场景化练习材料;同时融入趣味化教学设计,如销售主题词汇接龙和情景猜谜,有效提升课堂参与度,为后续环节作好充分准备。

在任务环阶段,雨课堂通过学情分析实现科学分组与任务分配;提供实时进度监控与个性化辅导;搭建

互动讨论平台促进师生协作交流；学生可上传 PPT、视频、语音、文档等供全班同学和教师预览。学生汇报时，借助雨课堂的投屏、弹幕互动等功能，增强汇报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其他同学可以发送弹幕提问发表意见，教师也可随时进行点评和总结，使汇报环节更高效、更具价值。雨课堂自动生成学习行为分析报告，为教学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在语言聚焦阶段，雨课堂通过分析学生任务环阶段的语言错误数据，精准定位共性与个性问题；基于分析结果推送个性化练习（如针对语法 / 词汇薄弱的专项训练）；提供多样化题型设计（选择 / 填空 / 翻译等）并实现即时反馈；支持阅读拓展与错题复习功能，强化语言知识的长效掌握。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精准教学，提

升商务英语语言形式的学习效果。

（三）TBLT 与 PBL 融合双轮驱动

在教学周期的最后 6 周，设计了四阶段 TBLT/PBL 双轮驱动的综合项目（见表 1）。主题是销售推介演讲，核心是通过 TBLT 和 PBL 的结合，帮助学生最终完成一个销售推介演讲项目。第一阶段，学生通过模拟销售任务掌握基础推销技巧，包括产品介绍和处理反对意见。第二阶段，学生进行市场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调整销售策略。第三阶段，学生通过演讲模拟练习，提升推介演讲的流利度和说服力，并根据反馈进行改进。第四阶段，学生进行最终的销售推介演讲，并接受评估和反馈。渐进的项目设计为学生在仿真的商务场景下提高表达能力、团队协作和决策能力提供了契机。

表 1 以 Sales Pitch 为例的教学框架

阶段	内容	教学目标	教学活动	任务型语言教学(TBLT)	项目式学习(PBL)
基础任务	销售技巧与产品介绍	1. 学生理解销售推介的基本元素 2. 学生掌握产品介绍技巧 3. 学生学习如何说服客户	任务活动：学生分组讨论并选择一个产品进行推介 任务 1：学生练习产品描述，明确产品的卖点和特色 任务 2：模拟销售场景，学生分别扮演销售员和顾客，进行产品介绍并处理顾客反对意见	1. 产品介绍：学生用英语介绍产品的特点和优势，练习基本的推销语言 2. 反对意见的应对：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练习如何应对顾客的反对意见，并练习反问技巧	1. 项目目标：选择一个产品(可以是虚拟的或真实的)进行推介，并准备一个简短的推介演讲 2. 团队合作：学生分组进行任务，讨论并设计一个简单的推介方案，结合产品特点，准备演讲内容
中级任务	市场调研与客户分析	1. 学生掌握市场调研方法，学会分析客户需求 2. 学生根据目标市场调整销售策略	任务活动：学生进行市场调研，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和行为特征 任务 1：利用网络资源，研究目标市场的趋势和竞争品牌 任务 2：学生讨论并选择适合该市场的销售策略	1. 市场调研：学生通过网上调研，收集有关目标市场的信息(如人口统计、消费者行为等) 2. 销售策略制定：学生根据调研结果调整推介演讲内容，突出产品的独特卖点	1. 项目目标：基于市场调研，调整销售策略 2. 策略制定：学生设计符合目标客户需求的销售策略，并准备如何在推介演讲中融入这些策略
高级任务	推介方案并模拟演讲	1. 学生练习正式的销售推介演讲技巧 2. 学生提高演讲流利度和说服力	任务活动：学生进行推介演讲的模拟练习，并获得同伴反馈 任务 1：每个小组准备推介演讲稿，并模拟演讲场景 任务 2：同学之间进行演讲反馈和修改，提升演讲内容和技巧	1. 推介演讲：学生根据任务准备演讲，练习如何用英语表达产品的核心价值 2. 反馈与修改：学生在模拟演讲后，收集同学和教师的反馈，改进演讲技巧	1. 项目目标：学生完成正式的推介演讲 2. 团队合作：根据之前的策略，学生展示完整的销售推介演讲，并在演讲中展示市场调研和销售策略
最终项目	销售推介演讲与评估	1. 学生完成并展示完整的销售推介演讲 2. 学生接受评估并进行自我反思	任务活动：学生进行最终的销售推介演讲展示，并接受评审 任务 1：准备并展示推介演讲，确保清晰表达产品价值 任务 2：进行团队评估和自我反思，讨论演讲中的优点和待改进的地方	1. 最终演讲：每个小组展示他们的销售推介演讲，展示产品的核心卖点和市场分析 2. 评估与反馈：学生展示后的反馈环节，评估演讲效果，并提出改进意见	1. 项目目标：完成完整的销售推介演讲并进行最终展示 2. 团队合作与评估：每个小组进行演讲并接受评审，其他同学和教师将评估演讲内容、语言运用水平和整体说服力

（四）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商业思维能力和实战应用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当前商务英语教材中的案例库更新滞后，案例缺乏对中国商业创新实践的深度呈现，与市场动态脱节。为克

服这一现象，笔者在教学中以中国特色为根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系统植入了包括本土跨境电商销售策略、华为 5G 技术创新、新能源汽车出海等 8 个典型中国案例（见表 2）。这些鲜活的商业实践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决策情境，更通过展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创新突破,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为培养新时代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商务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教学支撑。

三、“AI 赋能 TBLT/PBL 双轮驱动”教学模式评价

为系统评估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效果,笔者以山东财经大学 2024 年下半年必修这门课的 90 名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李克特量表(5 级评分制),

从教学方法多样性(T1)、技术平台赋能效果(T2)、任务-项目过渡适应性(T3)、案例内容行业关联性(T4)、课程总体满意度(T5)五个核心维度采集学生反馈。量表设计严格遵循心理测量学标准,每个陈述项对应“强烈同意(5 分)”至“强烈不同意(1 分)”的连续态度区间,总分区间为 5~25 分,通过累积分数量化学生对教学创新的综合认可度。数据收集采用匿名电子问卷形式,结合雨课堂平台的行为数据交叉验证,确保反馈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表 2 案例更新对照图

单 元	旧 案 例	新 案 例	原 因
Unit 3 Selling	全球零售连锁如沃尔玛和家乐福的销售技巧	本土电商巨头如阿里巴巴和京东的销售策略	反映了中国线上购物的兴起以及本土电商的主导地位
Unit 4 Great Ideas	苹果的全球产品创新策略	华为的 5G 技术创新	华为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巨擘,代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Unit 7 New Business	星巴克进入国际市场的案例	瑞幸咖啡在中国的商业化案例	反映了本土咖啡文化的崛起和本土品牌如何与国际品牌竞争
Unit 8 Marketing	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的营销策略	本土品牌如小米和比亚迪的营销策略	小米和比亚迪展现了中国品牌在科技和汽车领域的成功策略
Unit 9 Planning	美国科技创业公司的商业规划	滴滴和字节跳动等中国初创企业的商业规划	滴滴和字节跳动的快速崛起,为中国市场中的初创公司战略提供了最新案例
Unit 10 Managing People	谷歌等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	京东和腾讯的管理风格	腾讯和百度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中具有代表性,展示了中国企业如何在数字化世界中进行有效的人员管理
Unit 11 Conflict	国际公司如壳牌或 BP 的冲突解决	中国科技行业中的冲突解决,如新能源汽车的竞争	通过中国科技巨头的竞争案例,展示了更贴近本土的冲突解决经验
Unit 12 Products	福特和通用电气等西方品牌的新产品发布案例	吉利和海尔等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发布案例	吉利和海尔代表了中国制造和消费电子产品的创新,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中的竞争力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的教学改革在《体验商务英语》的授课中取得显著成效。根据 Allen 和徐锦芬提出的数据分析方法^[9,10],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教学方法多样性(T1)获得最高认可度(M=4.5, SD=0.61),92% 的学生认同教师灵活运用 TBLT 与 PBL 双轮驱动模式(“同意”及以上累计占比),其中 65% 的学生明确表示“强烈同意”,该模式有效提升了学习兴趣($\chi^2=12.37$, $p<0.01$)(见表 3)。技术平台 AI 赋能效果(T2)方面,雨课堂的自主学习功能使语言实践频次显著增加,88% 的学生认可其提供的输入输出机会(M=4.3, SD=0.72),且平台行为日志分析显示,学生平均每周主动完成 3.2 次语言任务,相比传统教学模式提升 217% ($t=9.45$, $p<0.001$)。案例内容行业关联性(T4)成为改革的核心亮点,95% 的学生认为动态案例库有效对接了实际商业需求(M=4.6, SD=0.52),

尤其在本土跨境电商销售策略、华为 5G 技术创新、新能源汽车出海等本土化案例教学中,学生的商业决策模拟准确率提升至 78% (较改革前增长 52%)。课程总体满意度(T5)达历史峰值(M=4.7, SD=0.48),97%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与实际职业需求高度契合,且就业跟踪数据显示,毕业生商务谈判能力的企业满意度提升至 89% (相比往届提高 34 个百分点)。

问卷调查表明,“AI 赋能”与“TBLT/PBL 双轮驱动”相互融合的闭环设计,有效提升了商务英语教学的实效性,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技术融合层面,实现了 AI 学情分析系统与场景模拟的无缝衔接;其二,动态案例生态系统(案例更新周期 ≤ 2 周)解决了传统教材案例滞后性问题;其三,场景模拟提升了跨文化商务理解度。

表3 基于 TBLT-PBL 双轮驱动的教学改革多维成效评估 (N=90)				
评估维度	核心指标	数据结果	统计验证	对比基准
T1: 教学方法多样性	双轮驱动模式认可度 (5 点量表)	92% 认同(M=4.5, SD=0.61)	$\chi^2=12.37, p<0.01$	—
	学习兴趣提升率	65%”强烈同意”	—	—
T2: 技术平台赋能	输入输出机会认可度 (5 点量表)	88% 认可(M=4.3, SD=0.72)	t=9.45, p<0.001	—
	语言任务完成频次 (平台日志)	3.2 次 / 周	—	较传统模式 +217%
T4: 行业关联性	案例库商业需求匹配度 (5 点量表)	95% 认可(M=4.6, SD=0.52)	—	—
	商业决策模拟准确率	78%	—	较改革前 +52%
T5: 综合成效	课程总体满意度 (5 点量表)	M=4.7, SD=0.48	—	历史峰值
	职业需求契合度	97% 高度契合	—	—
	毕业生商务谈判能力 (企业评价)	89%	—	较往届 +34 个百分点

注：1. 数据采集时间：2024 年 9-12 月；
2. 传统模式对比数据来自 2023 年同期平行班级 (N=85) ；
3. 企业评价数据来自学生毕业 6 个月内雇主调查 (响应率 81%) 。

结论

“AI 赋能、TBLT/PBL 双轮驱动”教学模式通过系统整合任务型教学法(TBLT)的精准语言输入机制与项目式学习(PBL)的复合能力培养路径,依托“雨课堂”智能平台构建的虚实融合教学场域,成功实现了语言认知建构与商务实战能力的动态耦合。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通过智能情境仿真、协作式问题解决与数据驱动的过程性评价,显著提升了学生在跨文化沟通、战略决策等场景中的语言应用效能,其“任务引导—项目赋能—智能反哺”的教学框架有效促进了学生职业能力的生态化发展。

该模式通过 AI 技术赋能的动态教学系统,构建起“语言输入—实践转化—能力输出”的闭环模式,为数字化时代商务英语教育研究提供了技术融合教学法的新范式。实践层面上不仅实现了教学过程的精准调控,更通过“数字画像—能力映射—资源推送”的智能反馈系统,形成了教学生态的自我进化能力。未来研究可聚焦生成式 AI 在动态商务案例构建中的伦理边界,以及人机协同决策对学习者批判性思维的塑造机制,为新文科背景下商务英语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具前瞻性的实践参照。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EB/OL]. (2020-11-03) [2025-01-20]. [http : //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

[2] WILLIS J. *A Flexible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M]. London : Longman,1996 : 52-62.

[3] ELLIS R.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M]//LOEWEN S, SATO M.*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 Routledge, 2017.

[4] 徐锦芬,李娟 . 外语教育数智化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范围综述[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2): 125-137.

[5] THOMAS J W.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M/OL]. San Rafael : Autodesk Foundation, 2000[2025-01-20]. [https : //tecfa.unige.ch/proj/eteach-net/Thomas_researchreview_PBL.pdf](https://tecfa.unige.ch/proj/eteach-net/Thomas_researchreview_PBL.pdf).

[6] ALMULLA M A.*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pproach as a Way to Engage Students in Learning* [J]. Sage Open, 2020 , 10(3): 1-15.

[7] Yao X . *Exploring a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l Integrating Task-Based Learning (TBL)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J]. Transac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24 , 6(6): 142-146.

[8] 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人工智能与公共外语教学研讨 [EB/OL]. (2024-11-11) [2025-01-20]. [https : //news.sjtu.edu.cn/](https://news.sjtu.edu.cn/)

jdyw/20241111/203887.html.

[10] 徐锦芬. 外语课堂中的教与学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9] ALLEN I E, SEAMAN C A. *Likert Scales and Data Analyses* [J].

2019: 31–36.

Quality Progress, 2007, 40(7): 64–65.

“AI Empowered & TBLT/PBL Dual-Driven” Innov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Model

ZHANG X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 to leverage AI to enhance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has become a crucial topic in higher educatio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serve as effective frameworks for this purpose. Currently,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ies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outdated content, insufficiently professional task design, and a lack of localized case studies, which hinde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By employing AI-powered pre-assessments for learning analysis, integrating TBLT principles into unit teaching design, exploring a blended TBLT & PBL mod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and constantly updating case-based teachi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model with “AI empowered & TBLT/PBL dual-driven” innovation. This approa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Business English pedagogical reform.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I empowerment; case studies; teaching innovation

(上接第 104 页)

[6] 孔洁, 陈道武. “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的内在逻辑、内容要点与推进路径[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

报, 2023, 35(6): 46–54.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into the Teaching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TANG Min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is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s essentia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ructors in universities to consciously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 into their courses. Tak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at De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still faces several teaching challenges: the flex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course materials needs improvement, the emphasis and depth of exploration require strengthening, and teaching methods need greater diversific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three-module”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rooted in the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actively promote their organic integration in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and develop immersive teaching scenarios that embed these principles into the curriculum. This approach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herence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the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Key words: “Six Must-Uphold Principles”;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征稿启事

《德州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德州学院主办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第1, 3, 5期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开设的栏目有地域文化研究，鲁北发展研究，哲学·政治学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和高校教学研究，其中“地域文化研究”为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分为“区域国别研究”“董仲舒研究”“黄河运河文化研究”“德州世家名人研究”“德州风物研究”等专题。第2, 4, 6期刊登自然科学类文章，开设的栏目有基础理论，材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能源与机械，经济与管理，体育与运动科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服装与服饰设计，高校教育研究。

欢迎校内外学者赐稿，来稿请发至邮箱。

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投稿邮箱: xb8985646@126.com;

自然科学类文章投稿邮箱: dzxyxbzrb@163.com。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41卷 第3期 总第201期 2025

DEZHOU XUEYUAN XUEBAO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Vol. 41 No. 3 Sum No. 201 2025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德州学院

主 编 刘印房

编辑出版 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大学西路566号

邮政编码 253023

电 话 0534-8985646 8985652

电子信箱 xb8985646@126.com

dzxyxbzrb@163.com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德州联英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Managed by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Address No. 566, Daxuexi Road, Dezhou Shandong, China

Postcode 253023

Telephone 0534-8985646 8985652

E-mail xb8985646@126.com

dzxyxbzrb@163.com

Distributed by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782, Beijing, China)

中国标准出版物号: ISSN 2097-5287
CN37-1372/Z

ISSN 2097-5287



定价: 20.00元